



THE OTHER SIDE OF THE HILL

# 山的那一边

## 被俘德国将领谈二战

[英] 李德·哈特 著

Basil H. Liddell Hart

张和声 译

曼斯坦因

希特勒和德国将领

伦德施泰特

上海人民出版社





## 德国将领眼中的二战，一切大不相同

本书是一部独特的二战史，大部分来自李德·哈特在纽伦堡对德国高级将领的审讯记录。李德·哈特全面、公正地将与布卢门特里特、伦德施泰特、托马、克莱斯特、海因里希、曼陀菲尔、施图登特等德国将领的谈话汇集起来，删繁就简，并在记述中穿插自己的分析和结论。他让德国将领成为第二次世界大战进程的叙述者，这就是所谓的“山的那一边”——指代德军在二战中的心理和各项军事方针，由此本书记录的不仅是第二次世界大战最直接的证据，读者也能从德国将领的描述中感受当时的真实氛围、领略战争的成败细节。本书具有相当的可读性，精彩程度不亚于《第二次世界大战战史》。

● 如果你是李德·哈特迷，就会知道他有多么喜爱《山的那一边》！这是一部铁杆军事历史迷的必读书！

——亚马逊网站评论

● 李德·哈特的又一部力作！他用采访德国将领的珍贵机会，深度洞察德国在二战中的战略细节和军事思考。书中德国将领对德国为什么拖延进攻敦刻尔克？为什么进攻波兰、希腊？与希特勒周旋战争策略到底有多困难等问题作了一一解答。

——亚马逊网站评论

● 李德·哈特让这些被俘的德国将军变得健谈，从而成就了这部简洁、易读、绝对迷人的佳作！书中一些德国将领的开诚布公令人耳目一新！

——亚马逊网站评论

上架建议：世界历史

ISBN 978-7-208-10085-5



9 787208 100855 >

定价：45.00元

易文网：www.ewen.cc



THE OTHER SIDE OF THE HILL

# 山的那一边

被俘德国将领谈二战

[英] 李德·哈特 著

Basil H. Liddell Hart

张和声 译

上海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山的那一边: 被俘德国将领谈二战/(英)哈特  
(Hart, B. H. L.)著;张和声译. —上海: 上海人民出  
版社, 2011

书名原文: The Other Side of the Hill

ISBN 978 - 7 - 208 - 10085 - 5

I. ①山… II. ①哈… ②张… III. ①第二次世界大  
战战役-军事战略 IV. ①E195.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1)第 133402 号

责任编辑 曹培雷 张晓玲

封面装帧 甘晓培

---

**THE OTHER SIDE OF THE HILL by B. H. Liddell Hart**  
**Copyright © The Executors of Lady Liddell Hart, deceased, 1948**  
**All rights reserved.**

---

**山的那一边**

——被俘德国将领谈二战

[英]李德·哈特 著

张和声 译

世纪出版集团

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

(200001 上海福建中路193号 www.ewen.cc)

世纪出版集团发行中心发行

常熟新骅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开本 720 × 1000 1/16 印张 20.25 插页 4 字数 336,000

2011年8月第1版 2011年8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 - 5,100

ISBN 978 - 7 - 208 - 10085 - 5/E · 40

定价 45.00 元





## 初版序言

克罗克(Croker)的《通信与日记》讲过这样一件事：他和威灵顿(Wellington)公爵在旅途中为了曾经以猜测每座山的那一边的地形来消磨时光。威灵顿屡猜屡中，克罗克大感惊讶，公爵答道：“你知道为什么吗？为了猜测山那边的情况，我付出了一生的精力。”

威灵顿公爵“山的那一边”这句话后来被引申到军事上，指推理敌方和对手的心理究竟发生了什么，这是军人在推理时应当具备的想象力，也成了情报功能的代名词。

在1944年到1945年战争结束之际，我有幸得到到“山的那一边”去探险，为P. I. D. 做的某些工作使我在相当一段时期内可以和德军将领接触。多次的交谈使我能够及时收集战事的证据，否则这些证据将随着记忆的衰退而湮没，或因事后的顾虑而变色。

研究德军将领，倾听他们的陈述，有助于加深对二战的理解。这些将领并不都如人们通常所描述那样是典型的普鲁士铁杆军人。伦德施泰特(Rundstedt)庶几近之，然而他谦恭有礼，举止得体，且不无幽默感，这颠覆了世俗的印象。伦德施泰特身陷囹圄从不怨天尤人，对种种严酷的待遇泰然处之，不失军人的尊严，使大多数与他接触过的英国军人肃然起敬。而虐待战俘未必能让胜利者脸上增光。那些年轻的德国将领凭借纳粹的宠信才身居高位，他们盛气凌人，狂暴粗野，与伦德施泰特形成鲜明的对比。然而绝大多数德国军人与上述两类不同，他们并不那么颐指气使咄咄逼人。这些人本当出现在银行经理或工程师的会议桌前。

他们本质上不过是一介技师，专注于自己的职业，对外界所知甚少。所以不难看出希特勒是如何蒙蔽他们、操控他们，将他们作为便利的工具以售其奸。

了解一些战前的军事背景有助于我们厘清他们的证言。这不仅可以省时间，也能使人们避免那些在战争行将结束时曾广泛流行的误解。那种观点认为，如同1918年之前，德军总参谋部对侵略战争的进程起着决定作用。纽伦





堡审判也多少受到这种观点的影响。德国有军事背景的地下运动长期来一直谋划要推翻希特勒,但由于上述死板的偏见致使英美政府未能向他们发起及时有效的动员。对于在两次大战中间德军的运作格局,凡是能客观地加以追踪,都不难看出有关总参谋部作用举足轻重的观念是何等陈旧。但传言是如此固执,幻觉又是如此冥顽难消。其不幸的后果便是延迟了希特勒的倒台,本来战争可能提前几个月甚至早几年就结束。欧洲直到现在才开始明白由此产生的恶果。

在我最初研究二战战事时,不少人富有历史感的人士提供了帮助,在此谨向他们致谢。尤其要感谢金斯顿(F. S Kingston)上尉,他精通德语善解人意,为我与德军将领的交谈提供了极大的便利。与此同时,我还得感谢在“山的那一边”的人士,感谢他们为此项研究所作的贡献,感谢他们中大多数人在讨论历史事件时所持有的客观态度。下述人士在本书尚未定稿时曾提供颇有价值的意见,在此一并致谢。他们是:少将珀西·霍巴特爵士(Sir Percy Hobart)、切斯特·威尔莫特(Chester Wilmot)、阿特金森(G. R Atkinson)和德斯蒙德·弗劳尔(Desmond Flower)。

蒂尔福特寓所(TILFORD House)

蒂尔福特(Tilford)

1948年1月



## 本版序言

本书的初版是根据五年前我与被俘不久的德军将领交谈时所收集的资料写成的。自那时起,我又收集了大量新的资料,其中很大部分取自于我在1945年尚无缘相交的德军将领的口述,与此同时,我也查阅了有关档案文件对这些资料进行核实。

在本书的第二和第三部分,有关历史证词直接出自德军将领的口述,并扩充和修订了其中大部分章节,还新加了三章。第一部分是笔者对战事和人物的概述,没作多少修订,只是加了有关古德里安(Guderian)的一章。德军在1940年取得惊人的胜利,当时古德里安只不过是个次级军官,可他对胜利所起的作用却决非那么“次”。

尽管已对拙著进行了充实修正,但笔者仍不敢言自己是在“撰写历史”。撰写二战史的时机尚未成熟,只有在资料更为齐全的条件下才可能做到这一点。拙著旨在以清晰可读的形式为公众提供有关二战史重要部分的一些不可或缺的史料。要撰写一部大战史,收集对立面的材料至关重要,如果只是从“山的这一边”来考察这场战争,不仅眼光会受到局限,历史真相也难免会受到歪曲。

早年研究第一次世界大战历史时,我在这方面就有深刻的教训。仅就战事而言,若对敌方的意图、决定、资源和策略漠然无知,那么你对任何战役或战斗的描述必然失真。所以二战一结束,我马上抓紧时机,借用亲自讯问德军将领的便利,到“山的那一边”去调查,因为此时他们对战事的记忆尚比较清晰,对战争的印象也还没受到战后各种见闻和思潮的影响。

许多盟军的将领已经出版了他们的战争回忆录,德军将领最终无疑也会这么做。但是由于德军将领在战后长期身陷囹圄,自由受到种种限制,他们的回忆录出版肯定会有所延迟,有些至今尚未问世。就史料的出版而言,这无疑是一大缺憾。从另一方面看,自传的作者往往将自身利益和一己声名看得比历史的真实性更重。任何国家的政治家和将领在以自己选择的时机和方式编纂回忆录时,往往对自己的行为刻意维护,对历史的曲解莫此为甚。所以最好





能及时对当事人进行质证,并将他们的陈述与有关资料反复核实,这样才能更好地还原真实的历史。

我就各种不同的问题向那些德军将领进行质询,尽可能客观地将他们的回答汇集起来,删繁就简,取其精华编纂成书。如果要把那些原始材料全部编纂成书,不仅卷帙浩瀚,也让读者感到头绪纷繁,因为在探索真相的时候,要击穿“防线”,最好的办法就是经常改变切入的方式。任何一个有经验的审问者都知道,在审问时时断时续,声东击西,最易审出原本深藏不露的事实真相。平心而论,我得坦承在遇到那些棘手的问题时,这个办法屡试不爽,由此而揭示的一些史实也使我修正了不少先入之见,尤其是在这些证言为缴获的文件档案所证实的时候。

德军将领提供证言的准确性和诚信度因人而异,这种现象世所多见。但就我个人的经历而言,在谈及军事问题(军事方针是本书探究的主题)时,德军将领要比大多数世人更为客观。尽管他们的结论往往如啤酒上的泡沫那样浅薄,他们许多人对事实的精准却非常执著。1944年参与密谋推翻希特勒的一些德军将领,就是因为执著于精准和详细记录的习惯而暴露,并被送上绞架。但从历史学的角度来看,这种执著堪称价值万分。

与此同时,我尽可能将与之质询的每一个德军将领的所言所述与其他方面的资料进行核实。在拙著中有关他们的陈述,大部分内容都经过反复核实。例外之处,尤其是存在分歧的证词,书中均加以注明。

德军将领自然有意为他们参与希特勒侵略行径找出种种借口,当然也并非全无理由。在这一点上,我要比纽伦堡审判时的公诉人更了解战前的情况。我着手战后的调研时,也非常清楚他们那些先入之见的错谬所在。

作为一个军事记者,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我一直十分关注欧洲事态的演变,并尽量追踪着德国方面的种种态势。对我来说,与他们保持直接或间接的联系并不是一件难事,因为我的军事著作在德国也颇有读者,有些德军要员曾亲自把我的著作译成德语。

大多数读过我在战前所写著述的读者都知道,我曾就纳粹的威胁发出过警示,并坚决反对“绥靖”政策。早在希特勒掌权之前,我就曾指出种种不祥之兆。那时我也十分清楚,与德皇时代相比,德军总参谋部对希特勒的影响微乎其微,对于希特勒的侵略计划,总参谋部的作用与其说是怂恿,不如说是更倾向于抑制。

这一事实也为缴获的文件档案所证实,戈培尔(Goebbels)日记也使这一



点更为明了,他在日记中大肆诋毁德军将领,指责他们一向与希特勒和纳粹的信念作对。

一方面,盟军要求无条件投降。另一方面,希特勒对军队却仍具有相当的迷惑力,加上暴君的警察和特务系统的严控。而作为爱国者,德军将领又急于保全自己的国家,这使他们处于两难的困境。对此,现在应该可以有更深的理解。我在书中对他们的“盲目”有所批评,但是我也不得不怀疑,在同样的情况下,要推翻这样一个政权,其他国家的将领能否做得更好呢?

尽管德军将领屈从于希特勒,但他们在部队尽力保持军人的尊严,与纳粹的观念时常发生冲突,能做到这一点堪称难能可贵。许多盟军的战俘也曾为此作证。二战开始后,我曾走访法国、比利时和荷兰,经常有些坚强的反法西斯战士向我坦言,那些德国占领军军官的举止不但与党卫队有别,也比前来解放自己的盟国将领表现更好。如此口碑当归功于某些德军将领的举止,尤其是伦德施泰特。

德军将领理当受到指责的是,他们往往对纳粹的胡作非为置若罔闻,对那些他们自己不愿干的坏事,缺乏勇气挺身而出加以抗议,虽然也有一些例外。然而,若不是军事指挥官对希特勒的狂暴的意图巧妙地不予执行,或至少七折八扣,希特勒那些野蛮的命令将导致更严重的暴行,被占领国家将蒙受更深重的苦难。

反抗恶行的道德勇气并非任何军队都具有的共性。我曾遇到许多盟军的将领,他们私下对盟军非人道的轰炸不无遗憾,指出那种策略旨在恐吓平民。但是我从未见有人胆敢就此公开或正式表示抗议。他们通常也对盟军的“野蛮行为”视而不见。他们若提出抗议,其代价至多不过是仕途受挫,而不会像德军将领那样有性命之虞。

伍尔沃顿公园

白金汉郡

1950年6月





# 单击下载PDF图书

## 目 录

初版序言 .....	1
本版序言 .....	1
<b>第一部分 希特勒的将领 .....</b>	<b>1</b>
第一章 自寻死路的分裂 .....	3
第二章 泽克特打造军队 .....	8
第三章 布隆贝格和弗里奇时期 .....	14
第四章 勃劳希契和哈尔德时期 .....	22
第五章 古德里安将军——初期胜利的缔造者 .....	31
第六章 “阳光下的战士”——隆美尔 .....	40
第七章 阴影下的军人 .....	47
第八章 “老卫兵”——伦德施泰特 .....	58
<b>第二部分 走向战争 .....</b>	<b>63</b>
第九章 希特勒的崛起 .....	65
第十章 装甲部队的崛起 .....	70
<b>第三部分 德国将领眼中的战争 .....</b>	<b>83</b>
第十一章 希特勒如何打败法国和拯救英国 .....	85
第十二章 兵临敦刻尔克时下令“暂停进军” .....	116
第十三章 法国战事的终结和德军首次受挫 .....	126
第十四章 哑火于地中海 .....	145
第十五章 希特勒入侵苏联 .....	156
第十六章 何以兵败莫斯科 .....	166



第十七章 兵败斯大林格勒和高加索 .....	182
第十八章 兵败斯大林格勒之后 .....	200
第十九章 红军 .....	208
第二十章 盟军进攻意大利 .....	215
第二十一章 诺曼底失陷 .....	240
第二十二章 西线指挥部眼中的刺杀希特勒密谋 .....	269
第二十三章 希特勒孤注一掷——第二次阿登战役 .....	278
第二十四章 希特勒——一位年轻将领的看法 .....	292
结论 .....	295
德军高级将领列表 .....	297
译名对照表 .....	301
战争是政治的破产(译后记) .....	311

单击下载PDF杂志



## 第一部分 希特勒的将领







## 第一章 自寻死路的分裂

战时发生的一切在当时看来和在战后往往迥然不同，战后通常可以看得更清楚。领导人物的形象变化之大尤其如此。领袖的公众形象在战时常常失真，而且随着胜负的潮起潮落而沉浮。

战前，尤其是一度征服西方之时，希特勒形同巨人，他身兼拿破仑的战略、马基雅维里的狡诈和穆罕默德的激情。德军第一次在俄国受挫，希特勒的形象就开始减色。至二战行将结束时，希特勒被视为不懂军事的鲁莽汉，他那些疯狂的命令和愚笨无知大大成全了同盟国的胜利。德军的一切灾难均归咎于希特勒，德军的一切成就则归功于德军总参谋部。

对希特勒的这种描述显然是不真实的，尽管其中也不乏某些真实之处。希特勒决非一个愚蠢的战略家，恰恰相反，他聪明过人，当然他也逃不脱聪明反被聪明误的命运。

他擅长出其不意，在战略心理方面堪称大师，并将战略心理学提升到一个新的高度。早在战前，他就曾告诉同伙如何在挪威发动大胆的突袭，一举占领挪威，如何将法军诱离马其诺防线。他比任何将领更清楚，怎样才能兵不血刃，先期挫败抵抗力量，以达到不战而屈人之兵的效果。他洞悉对手的心理，将其玩弄于股掌之中，战略艺术运用之妙堪称史无前例。

希特勒常常与他的军事专家意见相左，而事实又往往证明他是对的。专家的失策反衬出他的高明，使其威望与日俱增。这样的结果致使军事专家在后来说话没有分量，哪怕他们对战况的看法更为正确。在俄国的战役中，希特勒的缺点压倒了他的天赋，一错再错导致了彻底失败。尽管如此，我们还是不要忘了，身为战略指挥家的拿破仑也曾为自己的胜利而陶醉，在同样的地点，犯下了同样的致命错误。

希特勒的致命伤在于他拒绝“止损”，在胜利的机会日趋渺茫之时，仍然执迷于进攻。但这显然也是第一次世界大战时协约国将领福煦（Foch）、黑格



(Haig)和德国最高司令部的决策者兴登堡(Hindenburg)及鲁登道夫(Ludendorff)最大的失策。这些人都是职业军人。德军在法国的溃败很大程度上应归咎于希特勒犹豫不决,迟迟不肯批准从法国及时撤退。这种态度也与当年的福煦如出一辙。关键的区别在于当年身处战场的法军将领(并非比较高明)对福煦并不俯首听命,而在1944年和1945年,德军将领却不敢违抗希特勒的命令。

正是通过探究这种对希特勒的恐惧和德军最高司令部的内部矛盾,我们才能对德军战略计划受挫的原因做出真实的解释。希特勒的战略直觉和德军总参谋部的战略运筹结合在一起,本当产生压倒一切的力量,但是双方冲突所产生的致命矛盾却成了他们对手的大救星。

总参谋部体制下所产生的老派将领在战争中自始至终是德国战略思想的执行者。但是在捷报频传的日子里,他们的作用并没有被充分认识,等到战争的格局发生逆转,他们才进入公众的视线,并被同盟国的人民视为真正可怕的大敌。在二战的最后一年,德军总参谋部的代表人物伦德施泰特成为人们关注的重点。无论在战事方面,还是在推翻纳粹的政变问题上,人们常问的不是希特勒将如何干,而是伦德施泰特会有何作为。

人们曾把德军将领视为千人一脑、铁板一块,具有惊人的政治能量。这种印象说明了为什么同盟国方面一直指望德国将领会推翻希特勒,但这种指望最终落空。它也说明了公众为什么坚信德军将领和希特勒一样可怕,应对德国的侵略行为负责。这种看法若是指第一次世界大战尚情有可原,如今早就过时了。对于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爆发,德军将领所起的作用甚微,其作用最多就像一个失灵的刹车。

战争开始时,德军将领的效能对希特勒的成功贡献颇大,但他们的作用被希特勒的成功所掩盖。当希特勒头上的光环黯然失色时,在外部世界的眼中,这些将领的作用开始凸显,但实际上他们在自己国家里却已经是力不从心了。

这种情况是由一系列原因造成的。这些将领代表着保守的秩序,这种传统对新一代毫无感召力。新一代德国人是在革命精神和对国家社会主义狂热的信念中长大的。将领们的任何行动,若是要反对现政权,尤其是反对擅长蛊惑民众的元首,都难以得到部下的效忠。军事将领一向对公众事务颇为疏离,希特勒又狡猾地使他们对国政民情懵然无知,致使其行动受到牵制。另一个因素是,他们严守军纪,对自己在国家元首前作的效忠誓言难以释怀。一个自视甚高的军人却违背誓言岂非荒唐可笑,这是一种绝对真实的情感,也是致使



其缩手缩脚不敢犯上的最为冠冕堂皇的理由。当然,大难临头,却置同胞和国家的最高利益而不顾,这通常是因为一己私利从中作祟。从希特勒崛起到德国失败的12年里,德军将领始终力图排斥来自外界的干扰,为保持其在军事领域的专业话语权而作出不懈的努力。然而,是追逐个人的野心还是割舍一己私利,这对矛盾构成了他们致命的弱点。

斗争的第一阶段以军方的绝对优势而告终,但这种优势是通过希姆莱(Himmler)才间接地确立的。希姆莱利用希特勒的恐惧,促使希特勒一举剪除了罗姆(Roehm)上尉和其他褐衫队(Brownshirt,冲锋队又称褐衫队,德国纳粹党的武装恐怖组织——编者注)的骨干。虽然并不能肯定后者是否真的要推翻希特勒,但他们欲篡夺军权是确凿无疑的。这股势力被消灭以后,希特勒变得更加倚仗将领的支持,后者也得以在军界重树自己的最高威望。

第二阶段在1938年达到高潮,那时,军事将领中了希姆莱的另一个圈套。1933年,希特勒任命维尔纳·冯·布隆贝格(一译勃洛姆堡,Blomberg, Werner von)将军为国防部长。布隆贝格对希特勒俯首帖耳,这使他的部下为之惶惶不安。布隆贝格将军还娶了自己办公室的速记员,这使他的部下更为反感。希特勒却对这场“平民化”的婚姻表示祝福,并亲临婚礼捧场。不久,希姆莱便抛出一纸警方密件,声称新娘原来是个妓女。不知是真还是假,希特勒大光其火,立刻将布隆贝格撤职。希姆莱又抛出一份警方文件,诬陷全军总司令维尔纳·冯·弗里奇(Fritsch, Frh. Werner von)将军是同性恋。弗里奇又被希特勒解除一切职务,此事后来在法庭上得到澄清,弗里奇却再也没能官复原职。(本书第三章对这次危机有详细的描述。)

希特勒利用道德危机打击军方将领,抓住机会控制整个军队。在让希姆莱加强其影响力的同时,为自己掌控最高战略指挥权打开方便之门。德军将领曾就弗里奇受诬陷之事集体抗议,但凯特尔(Keitel)的幕后操控削弱了将军们的统一战线。凯特尔将军接替了布隆贝格的职位,但他的地位更低,不过是希特勒的附庸而已。勃劳希契(Brauchitsch, Walther von)将军被任命为陆军总司令,他既不亲纳粹,也不反纳粹,在军界颇孚人望。希特勒这一着颇为精明,既可对军方有所安抚,又确保总司令不像弗里奇那么难以驾驭。

勃劳希契将军却不像希特勒预想的那么听话,为了维护军方的权力,他组成了一个强大的同盟。他发出警告,声称德军尚未为战争做好充分的准备,告诫希特勒不要贸然挑起战争,试图以此来阻挠纳粹的侵略外交政策。总参谋长贝克(Beck)将军的支持使勃劳希契的反战立场更为坚定。贝克将军公开



谴责希特勒的好战政策,被希特勒怒而撤职。即使在希特勒即将对捷克斯洛伐克痛下杀手时,勃劳希契将军和贝克将军的继任者哈尔德(Halder, Franz)还试图加以反对,但是英法政府屈从于希特勒的战争威胁却如釜底抽薪,致使将军们的努力无功而返。

德国兵不血刃占领了捷克斯洛伐克,这使希特勒威望大增,他进而兵指波兰。将军们试图说服希特勒除非苏联承诺保持中立,不可冒险开战。但舍此他们再也无能为力了。另一方面,希特勒一旦得手,他便可以说服大多数将士,英法会袖手旁观,突袭波兰不会让德国陷入一场大战。

占领波兰后,将领们发现希特勒打算扩大冲突,在西线发起进攻。他们为之忧心忡忡,与希特勒的关系也再度趋于紧张。他们认为进攻的风险实在太大,也不相信有可能征服法国。但是他们的异议再次遭到压制,他们后来所谓要采取一致行动推翻希特勒云云,结果也是一事无成。要责怪他们在这个阶段无所作为显然也有失公正,因为即使将领们要反对希特勒,部下也不会响应。而且,在国家处于战争的关头,他们自然也不愿以叛逆者的面目出现。

面对将领的质疑,希特勒悍然下令入侵法国。侵法成功,部分原因在于希特勒应用新的战术和新式武器,而那些保守的老帅对此曾持怀疑的态度。部分原因在于希特勒将一名下级军官提出的一个极为大胆的新计划付诸实行。还有部分原因在于法国军方所犯的大错,那是连他们也没能料到的。

当然,德军的能征善战是希特勒成功征服法国不可或缺的因素,而正是由于希特勒突然莫名其妙的犹豫不决,才致使德军没能及时渡过英吉利海峡,一举大获全胜。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德军将领对胜利所作的贡献反而进一步削弱了他们自己的地位。胜利使希特勒在世人面前大出风头,胜利的桂冠没有戴到将军们的头上,而是套到了希特勒的头上。希特勒刻意为自己加冕炫耀,其内心也以世上最伟大的战略家自许,从此更是对将军权限内的事务横加干涉,更加无视来自军方与自己意见相悖的看法。

当得知希特勒有意入侵苏联时,大多数德国将领都深感忧虑。但就像许多专家一样,他们对专业以外的事情不甚了了,希特勒通过所谓的“政治情报”,让将领们确信俄罗斯的内在弱点将影响其军事力量,入侵苏联势在必行。侵苏初期德军战果辉煌,但这些战斗的胜利并不具有决定意义,其原因部分在于他们对俄军的抵抗能力有所低估,还有部分原因在于德军指挥部内部对进攻目标存在着分歧。冬季临近了,明白人应当知道大军该稍事停顿。但莫斯科近在咫尺,希特勒和德军将帅都抑制不住进攻的诱惑。他们不惜一切代价





发起猛攻,但取胜的机会却日趋渺茫。莫斯科的惨败对德军几乎是致命的打击。

然而希特勒却善于利用这次失败来巩固自己的权力。陆军总司令勃劳希契因病辞职,希特勒取而代之,亲自出任陆军统帅。这一着不仅加强了希特勒的权力,而且将公众对战败的指责归咎于将领的失误。勃劳希契的解职就像一个将军因战败而引咎辞职,“因病”不过是通常照顾面子的托词罢了。对希特勒而言,这真是一举两得。

在以后的战争中,希特勒就能够把将领的政策建议置之度外,甚至直接否决军事指挥官的具体判断。若有人提出异议,他就让另一个有野心,热衷于进攻的军官取而代之,因为大多数军人出于本能都喜欢进攻。与此同时,武装党卫军(Waffen S.S)在军内的势力日益膨胀,纳粹的密探遍布各个指挥部,指挥官无不受到监视,军方的实力受到削弱。将领要想推翻希特勒,其成功的可能性日趋减少。他们能做的无非是尽力执行元首的命令,或许也可以说尽力让这些命令早日产生恶果。有理由猜测,某些德军将领之所以乐于执行那些荒唐的命令,无非是想让希特勒的图谋受挫,从而尽早结束这场战争。



## 第二章 泽克特打造军队

对第一次世界大战极具影响的德国将军在一战爆发的前7年就已退役，在开战的前1年去世。此人就是史里芬将军(Alfred von Schlieffen)，他来自波罗的海沿岸的梅克伦堡州(Mecklenburg)。正是此人亲自制定了堪称杰出的侵法计划，准备了冲破法军强大防线的“开罐器”，培训了为操控战争的总参谋部成员。史里芬计划为了从翼侧进攻法国，不惜破坏比利时的中立，从而将英国拖入战争。由于史里芬将军的后继者铸成大错，计划没能得逞，但它差点让德国在一个月就大获全胜，这真是危乎其危。

泽克特将军(Hans von Seeckt)对第二次世界大战极具影响，他早在二战爆发的前10年就已退役，在开战的前3年去世。泽克特将军来自位于梅克伦堡州和丹麦之间的石勒苏益格-荷尔斯泰因(Schleswig-Holstein)地区。正是此人在一战后亲自打造了能征善战的德国陆军，为德军的发展壮大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一战后，战胜国制定的和平协议力阻德军重建一支像样的军队。泽克特的计划旨在冲破种种阻碍重振德军雄风，其意义非同小可。二战初期德军战果辉煌，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泽克特将军当年对国防军的精心打造。

泽克特计划对重组德军极为重要，若无视泽克特计划的影响，对二战时期希特勒部将的任何评价都无甚价值可言。只有对泽克特计划予以充分的认识，才能对那些在1939年到1945年崭露头角的德军将领作出切要的评价。有这样一个共同的背景，我们就不难看清这种军队的模式是如何打造成功的。自然对此会有不同的诠释，但是重要的在于，当德军总参谋部尚为凡尔赛和约所禁时，它已经在地下运作，为德军的东山再起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在1914年到1918年战争期间，泽克特中校已经成为克拉克(Kluck)第一集团军的参谋总长，他亲眼目睹了一项精心策划的方案如何在实施时一步步出错，一次决战的胜利如何在唾手可得之时化作云烟。1915年，泽克特在战场上崭露头角，当时他是陆军元帅马肯森(von Mackensen)的智囊。马肯森曾



为轻骑兵司令,素来骁勇善战,号称“快刀手”。泽克特头脑冷静,足智多谋,在他的谋划下,马肯森在西班牙西北部的加利西亚省(Galicia)的戈尔利采(Gorlice)给苏军以致命的一击。苏军被分割成两块,从而元气大伤,一蹶不振。泽克特在这场战役所倡导的战术已经包含现代渗透式进攻战术的因子。现代渗透式进攻战术强调集中兵力,一举攻破敌方最为薄弱的环节,然后尽量深入重地。传统的进攻战术则注重堂堂正正地进军,然后调动后备部队去攻克敌军最为顽固的防线。

泽克特在战场上—显身手,从此声名鹊起。从一个隐身于马肯森背后的智囊成为德军上下众口赞誉的英雄。当时军中盛传:“马肯森在哪里,泽克特就在哪里,泽克特在哪里,胜利就在哪里。”泽克特一直在东线战役中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但不幸的是他不属于兴登堡—鲁登道夫派系,也不会受到他们的重视。从1916年起到一战结束,该派系一直掌控着德军最高权力机构。不过那也倒也使泽克特的声名免于被西线最终的溃败所玷污。战后泽克特作为德方代表团的顾问参与巴黎和会,后来也就顺理成章地成为德国国防军总司令。在和约有关条款的限定下,国防军规模甚小,全体官兵仅100 000人。

更为顺理成章的是泽克特从此竭尽全力打造德军,尽量使条款的约束具有更大空间,从而使德军再振雄风,在当时这种格局下,任何国家的任何一个军人都会如此行事。此事有先例可循,1806年后,法国曾迫使普鲁士解除武装,普鲁士将军夏恩霍夫(Scharnhorst)成功地加以化解,暗中组建了一支军队,而正是这支军队在7年后转败为胜,重创拿破仑的法军。泽克特和他的弟子效法前贤,虽然他们所处的环境更为恶劣,他们做得却更为巧妙。

德国军方往往视民众如草芥,动辄使整个民族一败涂地,新成立的共和国领导自然对军方心存芥蒂。这是泽克特首先必须克服的障碍。兴登堡和鲁登道夫这帮武夫一向对文官骄横跋扈。泽克特则彬彬有礼,富有外交手腕,对国内事务亦有清晰的理解,这给文官留下很好的印象。他那亲近可人的作风与普鲁士将领的横蛮粗鲁形成鲜明的对照。他风度翩翩,趣味高雅,世事洞明又不张扬,以致赢得了“斯芬克司”这个外号。他那略为玩世不恭的态度和冷嘲热讽固然令军方高层不无反感,却让政治家们感到放心,认为他不那么盲目狂热,确信他能将理性的克制与尚武精神加以有益的综合。

泽克特使军队在整体上与政治分清界线。在这举步维艰的时代,他对新建的共和政体的效忠众所皆知,这使他不仅能够如旧派军人所热衷的那样从事半公开的政治活动,还能使他更巧妙地掩饰其扩军计划。在既得利益集团



允许的范围内,他尽可能确保新国防军的骨干选自曾经战争考验的军官和下级军士。泽克特的新国防军规模不大,仅有4 000名军官和96 000名士兵,他的目的是要将这批人打造成一个特种兵团,他们是合格的军事指导员和指挥者,一旦时机成熟,这些骨干系统可以迅速扩充成一支强大的军队。按照新的章程,军训的标准要求极高,国防军官兵士气之高、技能之精远远超过旧式军队。

泽克特通过隐秘的计划加强这支骨干队伍,让军官能够受到更广泛的历练,使老兵的军事技能不至于渐趋荒疏,这在一支被强制剥夺现代武装的军队里原本是很难付诸实践的。许多军事参谋和技术人员被外派到日本、中国、南美诸国、波罗的诸国和苏联进行短期出差,在那些地方,他们可以得到操练坦克的机会。另外一些军官参与民航运输,从而获取飞行的经验。在德国国内许多非官方组织中,许多被遣散的军人得以继续其军事演练。他们利用种种托词来保留足够的武器以供军训。

这些策略证明,为了回避和约的限制,泽克特这个聪明的军人和他的部属是何等足智多谋。负责监督落实和约条款的协约国军官也常常为之担忧。但是,如果过分强调其重要性,认为他们的所作所为导致了德国重新走上侵略的道路,那就会犯历史性的错误。如果德国要东山再起,重新构成严重的威胁,泽克特的所为毕竟还是微不足道的。1933年,希特勒上台,并大肆扩军备战,而协约国则坐视不管。打那以后,德国的侵略步伐才得到实质性的进展。

泽克特更为实在的贡献在于他所提供的一系列思想重新激发了德军的活力,使德国军队在一个新的发展路线上挺进。战胜国惯于在数量上遏制德国军队,泽克特则使德军在质量上占据优势。他的国防军奉机动性为天条,其基本观点在于:在现代世界,只要能运动神速,快速出击,一支精兵就能比庞大的旧式军队更为机动善战,更易占得先手。泽克特的这个观点无疑得之其一战时在东线的经验,东线战场的机动空间要比西线更大。战后国防军首发的军事手册就强调:“兵有所动,必出其不意,否则难以克敌制胜。”灵活性是另一个要诀。“哪怕改变原先的进攻重点,预备部队首先须向有把握取胜的地方进军。”为了促进这种灵活性,国防军倾其所能迅速发展军内的通信系统,在这方面的投入要远远大于战后任何一个国家的军队。灵活性还在于它强调各级别指挥员都要打破常规,深入第一线,指挥员的手指要时刻紧贴着战斗的脉搏,以便更迅速地发挥其作用。

战后德军的军事手册竭力推崇部队的机动能力,这与法国军队所提倡的



战略形成鲜明的对照。法国人总结道：“战争有两大要素：火力和机动，两者相较，火力优先。”1818年法军一再采取缓慢移动的战术，就是这种军事教条最为形象的体现。这种战略思想的区别预示着不祥的后果。

但是德国人的这种观点并非仅仅是为了对付和约所造成的不利因素。泽克特在新编军事手册的前言中直言不讳地写道：“这些军事条例是基于一支现代大军的军事力量、武器装备和部队所需的其他配制而拟定的，而不仅仅是针对根据和约所组成的100 000人的德军。”

1926年，泽克特犯了个错误，他批准德国皇储的长子参加国防军的演习，在政治上引起一场轩然大波。泽克特被迫引咎辞职，他为打造德军所做的努力就此终止。虽然泽克特的思想不像其他德国将领那么狭窄，毕竟还是有着明显局限，尤其是他后来作为德意志人民党的发言人经常发表一些人民党并不成熟的观点，进行政治投机。不过，泽克特独创的军事思想的影响却依然有增无减。

离开军界后，泽克特在1928年撰写了《军人所思》一书，该书清楚地反映了他的远见卓识。他在书中对过去征募大军的做法提出质疑，认为那样做往往事倍功半，只能导致漫长的消耗战。“庞杂的军队往往行动迟缓，难以灵活机动，所以也难以克敌制胜，只会被庞大的规模所压垮。”而且，尤其在和平时期，重要的是“尽可能减少军事机构内的男性冗员”。科技和战术技能对未来的战争至关重要。仓促征募的大军没法受到充分的训练，如果与数量有限却训练有素的敌手交战，其结果无非是化为“炮灰”。这个预言在1940年得以成为现实，当时德军屈指可数的几个装甲师和俯冲轰炸机就把兵员庞杂装备不整的法国军队打得落花流水、一败涂地。

泽克特认为“作战部队”最好由“长期服役的职业军人组成，而且尽可能要用志愿兵”。一个国家的男劳动力最好主要用于军工业，以便给正规军提供充足的先进武器装备。必须事先制定武器的类型，并具备快速大批量生产的能力。

与此同时，国内所有身体健康的年轻男子都必须接受短期的军训，“对年轻人固然要进行军事训练，但更要注重体能和精神面貌的训练”。这套训练系统有助于加强军民联系，巩固国家的统一。“受过军训的广大群众虽然尚不适应机动作战或在正规战争起决定作用，但足以能够保卫国土，同时也能给战场上的正规部队源源不断地提供优质兵源。”1940年德军步兵师的主要兵源就是通过这种方法征募而来的。他们只要跟随先锋部队，把守已经攻克的地





就行了。随着其战斗经验的增加,这些人就可以按照泽克特所预想的那样扩充到冲锋陷阵的先头部队中。

“总之,在我看来,未来的战争关键在于军队的机动性,兵不在多而在于精,加上飞机配合,其战斗力更强。无论是进攻还是防守,全体部队都要同时处于机动的状态。”

奇怪的是在论述机动性时,泽克特的著作几乎没有涉及坦克,而是大谈汽车运输和骑兵的作用。他甚至不无诗意地写道:“只要按照现代的标准加以训练和配置,骑兵的作用并不会如日落西山,在未来的岁月里,轻骑兵的长缨仍将充满自信地迎风招展。”后来有人认为泽克特之所以讳言装甲部队纯粹是出于政治上的谨慎,他书中所谓的轻骑兵就是暗指坦克。这种观点难以自圆其说,因为泽克特在倡议征兵和发展军用飞机时均直言不讳,而和约的条款对这些也是严加禁止的。

综观泽克特的所作所为,与其说他是未来的先驱,不如说他更是一个时代的风云人物。他颇有军事远见,显然已经清楚地认识到任何进攻必须依靠机动作战能力,但他毕竟还没有认识到唯有装甲部队才能使机动作战付诸实施。机动作战的可行性和进攻的必要性,这些任务尚有待于后人——尤其是古德里安将军来完成。

泽克特的视野显然也受到旧式战争的影响,他认为空军进攻的首要目标就是要摧毁敌方的空军。德国空军在波兰将此付诸实践,进攻法国时也在某种程度上如法炮制,入侵英国时又企图故伎重演,却遭遇英国空军的强力反击,受到重创。

在有关战争和生命这些范围更大的问题上,泽克特的某些看法也不无偏颇。他认为亲历战争恐怖的军人要比政治家更为谨慎,不会轻易卷入战争。这固然不无道理,但是他由此认为军人才是真正的“和平主义者”,那也未免言过其实了。军方这种典型的辩解在每个国家都是司空见惯的现象。检视任何发动侵略战争的国家的有关档案,找不到支持泽克特这种观点的证据。泽克特声称高级军人具有“基于知识和责任感的和平主义倾向”,事实往往并非如此。

泽克特认为“军国主义”和“侵略”不过是标语口号而已,这种说法未必有理。但是他的言论却已敏锐地预见到当政策旨在获取权力之时,“政治家马上会发现这样或那样的阻挠,首先便会由此推论这将对其政策构成威胁,进而推断这将危及国家的声望,最终会推定这种攻击事关国家存亡,为保卫祖国,当不惜举国一战”。



现代心理学倾向于颠覆对历史的道德评判,泽克特对此不无微词,他那些冷嘲热讽的议论隐约地闪现着内在的人道精神和先见之明。他曾说:“尼禄习惯于借着焚烧基督徒的光焰才能上床就寝,现在看来已经不能简单地将他视为残忍的暴君,而要把他当作一个智者,一个有点古怪的现代独裁者。”这不是在暗讽纳粹之流所鼓吹的所谓新道德吗?在强调“战斗”的价值时,他那警句般的断言含意深长——“有智无勇,百无一用。有勇无智,危害无穷。”他博学好思,曾不无明智地告诫世人:“‘战争是政治的继续’,已经成为众人皆知的格言,这是很危险的,同样可以言之有理的是:‘战争是政治的破产。’”

泽克特刻意让军队超然于政治的做法本身也有其危险性。他强调军队独立不倚,军政截然分离,这样也就放弃了军人对胆大妄为的政治家潜在的制约作用。

这样,泽克特式的军人就成了当代的彼拉多(钉死耶稣的古代罗马的犹太行省的执政官),以服从命令为口实,洗清双手,不负任何责任。纯粹的军事理论走向极端就会与明智的政策相悖。如果军人仅仅关注极端的军事目的,而对重大的政策不闻不问,他就会丧失自己的底线,全盘接受原本可以阻止的政治观点,因为从纯粹的战略观点看,那样做似乎是正确无误的。

总参谋部本是军人职业精神的象征,但在那里军人精神的统一性实际上从没达到原则上所要求的程度,这就使潜在的危险更大。总参内在的“政治”和个人野心使这种职业精神为之分裂。泽克特不仅回顾了总参谋部的历史,也预见它的未来,他写道:“总参谋部的历史……将是一部相当实证的历史,它将讲述其傲慢与骄横、自负与嫉妒,以及人性的种种弱点。它将反映天才与官僚之间的争斗,揭示胜利和失败的潜在因素。它不仅有胜利的荣光,也不乏悲剧的色彩。”

总参谋部实际上就是要以集体的智慧替代军事天才,因为天才不会在军队亟待其人之际应时而生。作为一个等级森严的官僚机构,总参谋部在本质上就是要钳制天才的发展,而以提高整体水平来加以弥补。总参谋部在运作时所产生的波折不是因为个人天赋的差异,而是因为各人的观点冲突和利益不同。面对升迁的机会,将军们往往会隐忍内心的质疑,这就使希特勒有足够的时间来离间军方的共识。任何军队都会有这种现象,但在专制独裁下,其表现尤为典型。新近得到提升的军官往往自信其所面临的境遇要比前任更好,自己不会重蹈前任的覆辙。这种格局无疑会成为任何统治者手中强有力的杠杆。



## 第三章 布隆贝格和弗里奇时期

泽克特的后任是海耶(Heye),海耶任职四年后,哈默施泰因(Hammerstein)将军继任。两人的才干都远不如泽克特,不过他们都继续执行泽克特的既定方针。哈默施泰因对纳粹势力的壮大深感不安,对纳粹的信条和手段无不感到憎恶。他甚至要抛弃泽克特所谓军人不干涉政治的信念,打算采取强硬措施阻止希特勒攫取政权。陆军元帅、共和国总统兴登堡这个老朽的决定却使哈默施泰因难有作为,兴登堡任命希特勒为总理,从而使其权力具有宪法的有效性。何况哈默施泰因的担忧并不为其他将领所认同,他们是“纯正而简单”的军人。哈默施泰因痛苦地感到这些将领被“军队扩张的美妙前景和升迁的大好机会”所迷惑,已经误入歧途。

希特勒上台伊始便立刻任命布隆贝格将军为国防部长,这是极为重要的一步。选上布隆贝格是因为赖歇瑙(von Reichenau)上校推荐。赖歇瑙是个野心勃勃的家伙,曾在东普鲁士当过布隆贝格的参谋长,与希特勒过从甚密。布隆贝格本人对希特勒并不了解,他的性格在许多地方也与希特勒截然相反。他接受任命并认真履职再一次说明了那样的军人头脑有多么单纯。

### 布隆贝格

此前有一年的时间,布隆贝格在日内瓦裁军会议上任德国代表团的首席军事顾问。他刚过50岁,与德国将领的平均年龄相比尚属年轻,他的突然升迁自然会引来他人的嫉妒。德国将领瞧不起希特勒这个“波希米亚下士”,这种态度也会使他们更加嫉恨希特勒提拔的军官。这些将领原本对希特勒的上台颇为赞许,因为这正迎合他们自己的扩军计划,但是,一个以前的下士居然要对军界事务横加干涉,则必然遭到他们的冷嘲热讽,进而对希特勒出于一己



偏爱的军事任命马上会表示质疑。

布隆贝格就任国防部长以后,就一直受到国防军高级将领的歧视,同僚的侧目而视迫使他只能依靠希特勒的支持,也使他凡事不问是非,违心遵从希特勒的旨意行事。颇具讽刺意味的是布隆贝格生性活泼,与生硬的“普鲁士军人”不同,这使他在依附希特勒的时候很不自在。这种矛盾的状态致使其他军人给他起了个绰号叫“橡皮狮子”。

新政权的不少军官性情暴戾目中无人,布隆贝格却非如此。如果说他比其他军官更亲纳粹,部分的原因在于他更为理想主义,浪漫的激情使他对有些现象视而不见。纳粹运动一度曾吸引了不少理想主义者,虽然其中大多数人要比布隆贝格年轻。不过军人往往成熟较慢。布隆贝格生性浪漫,崇尚骑士精神,并以此来对待现代军人职业。1932年,我们在日内瓦相遇时,他就明显地表现出这种倾向。他对新的军事观念颇感兴趣,对那些以智力博弈的新战争艺术更为关注。不过在提到复兴骑士精神的可能性时,他显得尤为起劲。谈到战争中的“绅士风度”,他简直都有点激情难抑了。长期观察军方高层,难免使人对其所谓的军人精神产生怀疑,布隆贝格堪称异数,虽然不无几分天真,但他对军人的职业信念确是真摯无欺的。他身材魁梧,举止谦和,言谈坦然,不像有些军官那样专横跋扈面目狰狞。不幸的是他得对付两大敌对的集团,成为两边受气的夹板。假如环境好一点,他本来可以成为一个更伟大的角色。

然而,在某个重要方面,布隆贝格的作用却比表面看来更为有效。在遵守战争法方面,德国军队在与西方敌对国交战时的表现要比1914—1918年好得多,这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出乎人们意料之外的一大特点。按理“普鲁士军国主义”加上“纳粹主义”本来会使情况比一战时更糟,但德军的举止相对有所改进,他们比较注意避免让自己的行为成为历史的污点,这要归功于布隆贝格和一大批与他持相同观点的同僚,他们对国防军灌输了比较文明的军人行为准则。相比1914年的前辈,1940年入侵比利时和法国的德军表现得更为克制。这是一个比较明智的策略,它有助于减轻被占领国人民的痛楚感,安抚一下人们的情绪。若不是盖世太保和党卫队的胡作非为,这种策略本来会产生更为长远的效果。

在战术领域,布隆贝格对德军发展趋势的转折也有重要的贡献。哈默施泰因将军不断强调德军传统的进攻观念,但缺乏物质手段进行操练,也没有先进的技术手段来加以磨砺。但是,在东普鲁士,布隆贝格有过应用新战术的经



验,这种战术比较现实地承认现代防御能力的长处,力图将这种防御性的优势转化为进攻性的优势。它不主张攻坚克敌,而强调将敌人诱离防线,促使其仓促进军,贸然进攻,使其陷入困境。趁其慌乱之际,杀一个回马枪,予以致命的一击。假装撤退或以突袭威胁敌方的交通线都可以作为诱敌的鱼饵。当我在研究谢尔曼(Sherman)格鲁吉亚战役时,这种“钓饵行动”的巨大潜力令我为之叹服。它以进攻的战略综合防御的战术,犹如剑与盾的配合。在后来的一些军事著述中,我对如何将其应用于现代战争详加阐述。正是因为布隆贝格对此特感兴趣,这才导致了我们的第一次会面。<sup>①</sup>对于这种以坦克来取代骑兵的新的机动战思想的历史作用,布隆贝格比当时大多数将军都更为欣赏。而除了皇家坦克军团,英国军方对这种新观念的反应却是不冷不热。赖歇瑙自始至终是这种思想的热切拥护者,他曾亲自将我的著作译成德语。不过他不像古德里安将军和托马(Thoma, Wilhem Ritter von)将军那样全面接受装甲战的观念。从1934年起,古德里安将军和托马将军亲自打造德国的装甲部队。

第二次世界大战最初两年,德国的装甲部队大显神威,其战术大获全胜。这给战前那些针对战败国所作的裁军措施以极大的讽刺。从物质层面看,那些措施并非不力。德军所发动的一系列入侵,规模甚小,即使加在一起也谈不上已经恢复到兵力强盛。在纳粹政府公开抛弃凡尔赛和约之前,德国的扩军实质上尚不足以构成严重的威胁。正是由于英法等战胜国在关键时刻的迟疑不决才使得德国趁机坐大。而且,强制裁军使德国能够废弃1914—1918年战争时所积存的陈旧武器,得以轻装上阵。保留那些陈旧武器的战胜国反而受到旧式战术的束缚,还会对自己的军事力量估计过高。一旦德国开始重整旗鼓,它就有更大的空间来应用新的战术思想,发展新式武器。

战胜国曾强行查禁德军总参谋部,这也从反面促使新军事观念的发展。如果保留原来的总参谋部,保留其笨拙的组织形式,它就会像其他总参谋部一样为其庞杂的冗员和死板的条条框框所拖累。被迫转入地下后,德军总参谋

---

<sup>①</sup> 谢尔曼的战术也曾激发巴顿将军的想象力,他对迂回进攻和舍弃辎重以赢得主动的战术尤其有所发挥。1944年,在巴顿行将率军前往诺曼底之前,我曾与他有一面之缘。他告诉我过去他曾认真研读过我著述中有关谢尔曼在格鲁吉亚的战例。我们一起探讨了如何在现代战争中应用那些战术。巴顿将军后来从诺曼底长驱直入法国摩泽尔(Moselle),就体现了这种战术思想。伍德(Wood)将军也是这类战术思想的推崇者,他在抵达塞纳河后写信告诉我,他是如何成功地应用这种战术,率领第四装甲师冲锋陷阵的。





部的成员反而不再受到这些条条框框的束缚,可以专心致志为未来从事富有建设性的思考,其作战效率大为提高。你可以从形式上摧毁总参谋部这样的军事组织,却无法压制其成员的思想活动——思想是压制不了的。

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对德国全面裁军,其实际后果便是为德国军队实现更有效的现代化扫清了道路,政治上一旦时机成熟,它便可重新武装东山再起。对其军队现代化程度的限制主要在于国内的保守主义和利益冲突,而不是因为来自外部的制裁。

## 弗里奇

国防部长的地位使布隆贝格能够实行他所倾心的新战术思想,能够消解那些冥顽不化的老将军的抵制,而不像其他国家,尤其是法国那样的情况。但是,他的地位毕竟如一个“缓冲器”,这一弱点使他的思想难以得到广泛的传播和迅速的发展。1933年底,布隆贝格企图让赖歇瑙取代哈默施泰因将军为陆军总司令,德国的资深将领一致反对,这次任命因此落空。在将军们的建议下,兴登堡选中了维尔纳·冯·弗里奇(Werner von Fritsch)将军。弗里奇将军是个军事全才,但无论在政治上还是在军事上,他都代表保守势力。他深知坦克和飞机的价值所在,但又视新式武器为“新贵”,倾向于将其置于附从的地位。更有甚者,后来成为参谋总长的路德维希·贝克将军(Ludwig Beck)就对坦克“革命”持批评态度,一如他对纳粹革命的态度。可见,德国军事组织虽然先于其他国家打造机械化部队,但走的还是介于新旧模式之间的折中道路。

1920年到1922年,维尔纳·冯·弗里奇曾是冯·泽克特将军为首的国防部里的一位相对年轻的参谋,从事组建国防军工作。不久,他下到军团,当了炮兵连长。后来成了东普鲁士的参谋总长。1927年,他又回到国防部协助负责全面工作的布隆贝格将军。他的主要工作是负责制定作战计划,该计划准备在西线加强防守遏制法国的同时向波兰发动突然袭击。这个计划尚处于雏形,不过它在1939年得到全面实施,由于部队的机械化,其范围和速度大大超过了原计划。

在前纳粹时期,弗里奇已经显示出他非同寻常的外交天赋,这在老派的德国军官中是不多见的。那些民主人士喜欢提一些刁钻的问题,如军费预算为何增加,为何一支规模有限的军队需要配备如此众多的干部和军官。对此弗



里奇往往能够应对自如。他擅长巧言回避问题的要点,打消提问者的好奇心。他知道如何来堵住这些人的嘴,他会利用爱国主义,利用这些人的弱点,或者培养与他们的友情。他通常不苟言笑冷若冰霜,但为了达到某个目的,会马上变得满面春风温馨可人。

随着纳粹的权力越来越大,将军们意识到必须有个能干的人出头来捍卫军官的权力。弗里奇正是最合适的人选,早在1934年他就是一个颇具名望的战略家,并因此获得擢升。而他的第一次升迁正是为了遏制以罗姆上尉为首的非职业军人的野心。罗姆的势力扩张将危及职业军人的权力和利益。弗里奇向希特勒提供情报,证明罗姆计划加强冲锋队的武装以取代正规军,其目的是为发动推翻希特勒的政变铺平道路。出于不同的目的,希姆莱(Himmler)也从另一个方面向希特勒进言诋毁罗姆。他们成功地说服希特勒下令在1934年6月30日血腥清洗冲锋队。

这样既加强了弗里奇与希特勒的关系,也使他赢得了德国其他各派势力的支持,因为他们出于各种理由害怕纳粹的势力过分强大。弗里奇一度使军方在国内的政治角逐中拔得头筹,这样他便可以与希姆莱周旋自如。

但是,在对外问题上,军方与希特勒的关系却趋于紧张,分歧不是在于政策,而在于步子的快慢。希特勒声称德国有权与西方享有平等的权利,要求废止凡尔赛和约强加于德国的种种限制,弗里奇和他的同僚对这种强硬的态度颇为赞许。(1933年,在希特勒的支持下,他们着手准备将德军从8个师扩张到24个师,并生产相应的武器装备。)1933年10月,希特勒事先没有与军方磋商,突然宣布德国脱离国际联盟。此举引起军方的怀疑,他们担心德国会因此陷入危险的孤立。希特勒在演讲中大肆攻击苏联也让军方感到不安,因为德国军方与苏联红军的领导层关系不错,红军把先进的武器装备借给德军操练,因和约所限,这些新式武器在德国是被禁止使用的。

1935年3月,希特勒公然向全世界宣布,他已经抛弃了凡尔赛和约的锁链,德军扩大到36个师,并在德国恢复征兵制。声明之前,希特勒并没有与军方高层协商。军方大吃一惊,因为他们明白这是虚张声势,德国并没有为扩充至36个师做过任何准备工作。军方固然赞成扩军,但是他们担心一下子将国防军扩充三倍将削弱其战斗效率。军方对这个决定和希特勒的大言不惭不无质疑,这使希特勒极为恼火,因为其他国家已经默认了他的声明,既没有提出严正的抗议,也不曾怀疑他在吹牛。他感到这些将军在需要他们激情迸发之时,却像烧不开的温吞水。



一年后,希特勒派德国军队进驻莱茵非军事区,世界再度为之震惊。这次他事先与军方高层有过商讨,但也只是在行动的前夕。军方拟定计划和下达命令的时间不到 24 小时。布隆贝格对这次行动表示强烈质疑,他担心风险太大,尤其是进军莱茵西部。希特勒做了一些让步,同意仅派 3 个营进驻莱茵,万一法国反应强烈,比较容易撤兵。但是法国反应平平,冒险侥幸成功,希特勒狂喜之余也对德军将领的所作所为极为震怒,这些军人表面上对他亦步亦趋,行动起来却总是要拖后腿。

对于德国这些挑衅行为,法英政府却逆来顺受,这大大怂恿了希特勒的侵略野心。英法政府强调所有的外国势力不得干涉西班牙内战,希特勒对此嗤之以鼻,公然向佛朗哥(Franco)提供军援。他向随从解释道:“这样做的主要目的是要把列强的注意力吸引到比利牛斯半岛(Pyrenean Peninsula),以便在德国从容扩军时不受干预”。佛朗哥政变成功就能在西班牙建立法西斯政权,切断法国和英国的海上交通。

弗里奇却反对这么做。他精明地看到就西班牙问题公然向西方列强挑战在战略上并不明智。在他的反对下,原先准备派往西班牙的 3 个师被削减到仅有一个坦克营的临时分遣队。挑衅之举的接连成功使纳粹头目得意忘形,他们对弗里奇的谨小慎微极为不满。弗里奇加强与苏联红军的联系更使这帮人恼怒万分。希特勒的反布尔什维克心结正好为恶语诋毁弗里奇的政敌提供了肥沃的土壤。弗里奇在新组成的军团中努力倡导传统的军人精神,抵御纳粹思想的渗透,这也加剧了他与希特勒的矛盾。

与此同时,弗里奇与布隆贝格的矛盾也在加剧。弗里奇和他的伙伴认为布隆贝格本应维护军方的利益,但他已经为希特勒所迷惑,置军方的利益于不顾。在他们看来,布隆贝格的屈从表明他已经在自己的军装上佩上纳粹的徽章。他们给他起了个外号叫“小希特勒”,那是纳粹电影里的一个狂热崇拜希特勒的小青年。

## 双双撤职

1938 年 1 月,德国军方发生了一次危机,事件表面上的起因与实际原因相距甚远。布隆贝格爱上了办公室里的速记员,娶她为妻。希特勒表示赞许,他认为这个婚姻向公众表明了国社党的军事领导思想开明,与人民大众打成一片,娶妻成亲不再讲究门当户对。希特勒亲自出席婚礼以示祝贺。其他高



级军官认为布隆贝格娶办公室小职员的做法不太得体,但并不像外界传说的那样,军官们众口一词的抗议导致了布隆贝格的下台。事实上,即使有什么抗议,也早就被希姆莱提前下手了。

布隆贝格结婚不久,希姆莱就向希特勒呈示一份警方密件,声称新娘曾做过妓女。战后美国调查人员揭露正是希姆莱把那个女人安插在布隆贝格的办公室,诱其上钩。希特勒对此事大为恼火,因为他亲自出席这个“街头荡妇”的婚礼,真是出丑。他立刻将布隆贝格撤职,甚至将他的名字从军团将领名册中一笔勾销。

这件事尚不足以令其他军官担忧,但接下来的打击却着实使他们为之惶恐。考虑到有人将接替布隆贝格担任新的国防部长,希姆莱又抛出来一个警方密件,说弗里奇将军犯同性恋罪。事实上这份密件原来是指另一个与弗里奇姓名相近的人。但是希姆莱却当面指证那个人就是弗里奇将军。希特勒便解除了弗里奇的职务。

根据勒里希特(Rohricht)将军的说法,希姆莱这样做的目的在于阻止弗里奇接替布隆贝格成为国防部长,那将使他掌握全部武装的军事大权。“谁当上国防部长,谁就会成为德国空军司令戈林(Goering)的顶头上司。要越过戈林提拔新人并非易事,弗里奇军衔高于戈林,是唯一可能的人选。希姆莱诬陷的目的不仅是为了戈林,也是为了实现他自己的野心。他的所作所为无不是为了党卫队逐步篡夺军权做准备。”

弗里奇要求法庭调查,费尽周折才同意举行一次,那还是在伦德施泰特代表全体将领出面强烈要求后才成功的。勉强同意举行听证后,希姆莱又企图由他自己来主持法庭调查。司法部长向弗里奇施予援手,宣称此案必须由军事法庭来处理。希姆莱赶紧网罗证人证言。为了确保人能够出庭和他们的人身安全,将军们派军人护送证人。在法庭调查时,希姆莱的主要证人推翻了自己的证词,后来为此举丢了性命。弗里奇总算讨回了清白。

希特勒趁机攫取武装部队的最高权力,声称将领们的所作所为令他失望。布隆贝格原先的职位权力下降,继任的威廉·凯特尔(Wilhelm Keitel)将军在希特勒眼里不过是个十足的马屁精。与此同时,瓦尔特·冯·勃劳希契(Walther von Brauchitsch)取代弗里奇,就任陆军总司令。等到弗里奇澄清对他的诬陷时,已经没有位子留给他了。由此可见,这次危机是经过精心策划的,其结果是为希特勒的夺取最高权力铺平道路,希姆莱的势力也因此有所加强。



在攫取权力的每个阶段,希特勒都擅长利用派系之争,利用人们明哲保身的本能。他善于玩弄权术,唯恐任何一个部门坐大,从而阻挠他实现自己的野心。虽然总参谋部已于1935年重组,它的权限已经不如原先的总参谋部。在军事问题上,总参谋长须服从陆军总司令,政治事务则归国防部长负责。而且,国防部长布隆贝格还被任命为武装部队总司令。

最高统帅部(简称O. K. W)将政治和行政工作分置三个部门负责。这时又增加了一个规模较小的“国防处”,与其他三个部门配合研究边界事务的政策和策略。这个步骤似乎是要组建一个武装部队总参谋部,但由于其他方面的种种顾虑,这一理论上的设想没能得到实现。

陆军总司令部对组建武装部队总参谋部的设想极为反感,因为这会削弱他们的地位,取代他们成为老的总参谋部的继承人。他们争辩道,要让陆军总参谋部这样一个长期固有的组织从属于尚不谙熟军事的新机构非常不妥,因为大陆作战的重要性为德国的军事问题之最,陆军司令部必须拥有掌控大局的权力。海军也持反对态度,海军高层向来不愿让“旱鸭子”来对自己指手画脚。空军司令戈林出于个人利益也竭力反对。布隆贝格担心各方阻挠,反复强调这个新的协调机构规模极小,他无意让其成为“老大”。希特勒虽然希望削弱陆军总参谋部的权力,但是他也不愿看到一个更高的机构来取代它,因为那同样会对他掌控权力碍手碍脚。所以他转变立场不再支持成立武装部队总参谋部。国防军总司令布隆贝格被撤职以后,希特勒有意将最高统帅部的参谋组织的地位局限于手下的一个“部门”。

那时,总参谋部虽然在总体上服从希特勒的指挥,但还掌握着制定战略的权力。然而希特勒一直企图削弱总参的影响,以实现他随心所欲制定战略的狼子野心。

军方原来规定总参全体人员在制定军事决策时对其上司负有共同的责任,但可以保留不同的意见。这样他们便可以越级上诉。早在1813年起,德国就一直实行这项规定,是年冬季,希特勒采取进一步措施公然废止该规定。按照新的规定,总参谋长必须完全服从总司令的命令,不能提出异议。这一改变削弱了总参谋长和其他参谋的影响力。





## 第四章 勃劳希契和哈尔德时期

希特勒任命瓦尔特·冯·勃劳希契取代弗里奇，而勃劳希契也欣然从命，这件事乍看起来似乎不可思议。勃劳希契毫不讳言他曾经效忠于前共和政权，在政治和经济问题上倾向于自由主义观点，公开批评纳粹的政策。他对容克贵族（Junker，容克为德语译音，指普鲁士贵族和大地主阶级。19世纪中叶逐渐演变成半封建型贵族地主，成为德意志帝国右翼势力的主要支持力量。——编者注）的褊狭和纳粹的狂妄均十分反感。在常人眼里，勃劳希契看重荣誉感，决不是一个利己主义者。他具有强烈的正义感，关心他人，深得同事和部下的信任。1938年2月，勃劳希契却接受希特勒的委任，这是因为他在巨大的利益诱惑下很快屈从于一己野心，还是因为他以为担此重任便能挽狂澜于既倒？第二种可能性似乎更大，因为事实表明，在弗里奇被解职后，勃劳希契仍与他交好，不止一次地向他表示慰问，这使纳粹头目极为反感。然而，事件的演变却表明勃劳希契从此将如履薄冰，想要挺胸阔步那可太难了。

选上勃劳希契纯属妥协的产物。希特勒起初想任命赖歇瑙，伦德施泰特和其他人提出这会引来军方的强烈反对。勃劳希契在常人的眼里是个可靠而不无进取心的军人。虽然他原来是个炮兵专家，但他却要比其他高级将领更能认识到坦克的潜力。另一方面，他也不像弗里奇之类的老派军人那么保守。勃劳希契最明显的优点就是能讨各派人士的喜悦，这样就能打消人们的疑虑，掩盖这次人事变动背后的政治动机以及此前的内部争斗。勃劳希契为人谦逊也使人们相信他不会像弗里奇那么难以对付。

然而，希特勒很快就发现，彬彬有礼的勃劳希契并不比弗里奇更容易操控，他同样不允许政界对军队的渗透。勃劳希契上任后首先采取措施改善普通士兵的福利，争取让他们在复员后有较好的前景。他整饬军纪，坚持不让纳粹组织与军队沾边。勃劳希契力图加快改进军队的装备，但是他又设法缓冲纳粹咄咄逼人的对外政策，以免过早地引起冲突。总参谋长贝克将军也力挺



勃劳希契。贝克是个精明强干的军人,但是他属于“反坦克”派,他反对希特勒的侵略政策,倾向于低估希特勒依靠新式武器所取得的战果。

希特勒将其意图挑明之后,勃劳希契8月初召集全体高级将领开会,通知他们贝克将军草拟了一份备忘录,如果大家同意,他将面呈希特勒。然后,贝克宣读了备忘录的内容。备忘录认为德国的政策应当尽量避免挑起战争,尤其不应在“苏台德地区这样的小问题”上冒战争之险。报告指出德国军队的弱点,认为德军的力量尚不足以对抗可能形成的各国联军。它强调即使美国不直接参战,它也很可能利用其资源向德国的对手提供武器装备。

伦德施泰特曾对我描述会议的情况,他说:“贝克读完备忘录,勃劳希契站起来说,如有任何不同意见请在备忘录上呈希特勒之前提出来。没人表示异议,报告就被送上去了。希特勒气得火冒三丈。”贝克因此被解职,哈尔德继任总参谋长。

反对派的意见就这样被立刻压了下去,但是,当9月捷克斯洛伐克危机迫在眉睫之际,勃劳希契又向希特勒进言,德国军队尚未做好战争准备,告诫希特勒要有所收敛,不可轻易挑起战火。新任总参谋长哈尔德并没有附和希特勒的主张,而是继续前任的路线,支持勃劳希契。这让希特勒明白要想破坏铁板一块的军方决非易事。哈尔德的军事观点相当保守,但像贝克一样,他不乏政治远见,不愿拿国家的前途去孤注一掷。他担心新组建的德国军队羽翼未丰,经不起大战的考验。希特勒决不会从谏如流改弦易辙,有鉴于此,哈尔德便加快步伐,准备以武力来反对希特勒的政策和政权。

然而,法英两国政府更怕开战,根本不愿为捷克斯洛伐克冒险一战,致使希特勒在慕尼黑轻而易举地将苏德台地区收入囊中。

接二连三的胜利让希特勒的势头更难遏制。次年春天,他公然推翻慕尼黑协定,发动突然袭击占领捷克本土,并马不停蹄地向波兰进逼,要求将但泽(Danzig)割让给德国,德国有权建造横穿波兰走廊通往东普鲁士的境外铁路和公路。希特勒无视他人的看法,根本不明白在这种形势下提出所谓有限的要求显然是太过分了。波兰断然拒绝,并在英国的支持下变得态度强硬。希特勒认为自己受到挫伤,为之大怒,加紧施加压力。为了指望波兰能俯首听命,保住自己的面子,希特勒越来越倾向进行战争冒险——只要风险不至于太大。

希特勒与军方头目商讨波兰问题,勃劳希契的回答比凯特尔更为明确。勃劳希契认为如果反对者仅仅限于波兰、法国和英国,结果“很可能”对德国



有利。但是他强调如果德国还要与苏联交战,那就很难指望还能获胜。法国驻柏林大使库隆德尔(Coulondre)得知这个情报后,在6月初向政府作了汇报。

纳粹分子本来就对勃劳希契阻止军队纳粹化的做法颇多怨言,如今他又在波兰问题上提出质疑,并对意大利的盟友地位冷言冷语,这使纳粹更加恼火,于是他们发起了反对勃劳希契的运动。这就可以解释为什么勃劳希契不得不向公众宣称他忠于元首,还在坦嫩贝格(Tannenberg)威胁波兰,发表情绪激烈的演讲,虽然他的这些行为也可以理解为是要做一番自我表白。勃劳希契之所以发表这样的讲话也是可以理解的,他可能认为这番言辞不会造成多大的危险,因为任何一个明白当时军事格局的人都难以想象如果俄国袖手旁观,处于这种毫无希望的战略地位,英法会真正为了波兰不惜一战。考虑到勃劳希契有关俄国的说法,迫于形势,希特勒全盘放弃以往的反苏政策,力图使苏联保持中立。一旦转变立场,希特勒立刻着手加快与苏联签订协议。英国政府当时也在和苏联人谈判,却一再迟疑不决。两者形成鲜明的对比。

尽管苏德协议已经公布,英国政府还是无视合理的军事逻辑,决定向德国宣战,把法国也拖上了战争道路。不过,在英国错误谋略显现之前,希特勒已经下令入侵波兰。这时,勃劳希契和哈尔德也正全力以赴地制定作战方案,他们沉浸于军事事务之中,已经将原先的忧虑置于脑后。

勃劳希契和哈尔德亲自出马制定作战方案,此战迅速获胜。他们赋予前线指挥官以充分的自主权,在传统的风格下展现出的主动性和灵活性表明了这种战略的价值。伦德施泰特的南路集团军扮演了主要的角色。冲破波兰的防线之后,伦德施泰特命令赖歇瑙拥有大部分机械化师的第十军团向北迂回到华沙,切断波兰大军的主要后防线。此举犹如一锤定音,堪称妙着。因为陆军总司令部原来以为波兰人已经撤退到东南部,于是命令第十军直线前进,越过维斯瓦河(Vistula)。但是伦德施泰特和他的参谋长埃里希·冯·曼斯坦因(Manstein, Friz Erich von)却算到波兰的主力部队还滞留在华沙西侧,可以将他们包围在维斯瓦河附近。在此关键时刻,前线指挥官可以自行作出决断,其价值已为结果所证实。而在下一次战役情况相似的关键时刻,希特勒却一意孤行,从而付出极大的代价。

入侵波兰的胜利让希特勒陶醉不已。但陶醉中也夹杂着一丝担忧,他担心如果不能确保西线的局势稳定,东线的形势很可能恶化。陶醉与恐惧的相互作用迫使希特勒决定不计后果,采取新的行动。

勃劳希契和哈尔德并没有像希特勒那样被胜利冲昏头脑。战争的尘埃一



一旦落定,他们便意识到这场胜利所带来的后果相当棘手,意识到进一步卷入战争的危險所在。波兰之战结束后,希特勒认为在西线采取攻势能迫使同盟国求和,勃劳希契和哈尔德均持反对态度,他们看得更远,甚至打算用武力来解决希特勒。但是,仅仅是几个月的太平尚不足于支撑长久的和平。那年冬天温斯顿·丘吉尔(Winston Churchill)在广播电台公开号召“向德国开战”,希特勒自然会利用这点来堵住勃劳希契和哈尔德的嘴。战争的动力正驱使着战争的列车隆隆向前。

德军于1940年4月入侵挪威,这是希特勒第一次事先未经酝酿便贸然举兵。纽伦堡审判时的证据表明入侵挪威与其说出自希特勒的欲望不如说是出自他的恐惧,它是劝阻和怂恿两种势力影响的结果。虽然入侵轻而易举地取得了成功,但希特勒也由此陷入了身不由己的窘境。最先提出劝阻的是挪威亲纳粹分子维德昆·吉斯林(Vidkun Quisling),他认为无论挪威政府是否默许,英国都有可能出兵占领挪威沿海地区。德国海军司令部也担心事态如此发展,因为这样就会加强英国对德国海军的封锁,使德国的潜艇难以施展威力。11月底,苏芬战争爆发,法英向芬兰施以援手。正如精明的德国人所猜测的,英法背后的目的是企图借此控制战略要地斯堪的纳维亚半岛。然而希特勒还是认为挪威保持中立对德国更有利,不希望扩大战争。12月中旬,在和吉斯林会晤后,希特勒便决定静待吉斯林在挪威发动政变,以此实现自己的图谋。

1月,丘吉尔在广播讲话中呼吁中立国参加反对希特勒的战争,同盟国的行动也有所升级,这使希特勒更加紧张。2月18日,英国驱逐舰哥萨克号冲入挪威海域,拦截德国运输船阿尔特马克号,上船营救被德国人俘获的英国海员。正是当时坐镇英国海军部的丘吉尔亲自下达这些命令的。希特勒火冒三丈,他想为了营救区区几个海员,丘吉尔居然不顾挪威的中立地位,那么他也极有可能下令切断从挪威北部港口城市纳尔维克(Narvik)运往德国的铁矿石运输线,那些铁矿石对德国可是至关重要的资源。

有关这点,伦德施泰特也曾告诉过我:“丘吉尔的广播讲话使希特勒勃然大怒,正如后来罗斯福(Roosevelt)的讲话一样,他们就是要激怒希特勒。希特勒一再向陆军司令部强调,如果不及时动手,英国就会在这个中立地区先下手为强。”海军上将福斯(Voss)也在现场,他以自己在海军司令部的经历向我证实了这一点,他说:“英国海军对阿尔特马克号的攻击对希特勒具有决定性的影响,它是点燃入侵挪威之战的‘导火索’。”



阿尔特马克号遭袭之后,希特勒立刻命令法尔肯霍斯特(Falkenhorst, Nikolaus von)将军召集军队准备发起突然袭击,一举占领挪威港口。在2月23日的一次会议上,海军司令埃里希·雷德尔(Raeder, Erich)上将强调:“保持挪威的中立是稳定整体局势,保证铁矿石运输线通畅的最上策。”但是他继续说:“正如我们以前反复申明的,决不能允许英国先下手占领挪威。我们不能无所作为。”

这时,从挪威传来的情报表明吉斯林的党派势头已衰,英国方面的情报却表明英国在挪威的行动是有备而来的,他们正在结集部队调配运输。3月1日,希特勒下令出征挪威。9日,海军司令部上呈他们的作战计划,认为英国对挪威的入侵迫在眉睫,详细阐述了紧急行动的必要性。德国海军忧心忡忡,但要全部完成准备工作又尚需时日,为了防止英国运输舰先行登陆,只能派潜艇埋伏在挪威港口近海准备拦截。

3月13日,芬兰宣布投降,这打乱了同盟国的计划,使他们失去了企图在纳尔维克登陆的借口。海军上将雷德尔在26日晋见希特勒时就表示,目前已不必过于担心英国军队会马上在挪威登陆。但是考虑到英国肯定很快就会另找借口,重新试图切断铁矿石运输线,所以“迟早德国都得将代号为‘威塞演习’(Weseruebung)的入侵挪威计划付诸实施”。与其延误,不如趁早动手。希特勒表示同意,便确定了具体日期。既然准备工作进行到这个地步,入侵挪威已如箭在弦上。几乎与此同时,同盟国决定向挪威和瑞典政府重新施压。他们准备4月5日在挪威海域布上一条水雷防线,8日向挪威的纳尔维克发出第一批运兵护航舰队。但是布雷行动一直被推迟到7日晚上才开始,第二天下午,德国侵略军就起航了。

4月9日一早,主要由战舰运来的德国先遣部队没费多少周折就占领了从奥斯陆到纳尔维克的挪威主要港口。这个结果表明同盟国的计划缺乏有效的实施手段,他们的反抗不堪一击,德国人占领了整个挪威和丹麦。这次成功的入侵并没有动用西线部队的一兵一卒和一枪一弹,也没有影响西线的战备部署。而且,直接指挥这次行动的是最高统帅部,而不是陆军总司令部。

有关西线侵略方案的形成过程比较复杂,非三言两语所能讲清,留待后面的章节加以详述。暂且先来描述一下该计划的概况,揭示其中一些有关大局的基本要素,有了这样一些背景知识,可以更有利于我们讲述人物的作用和德国内部的争议。

在世人看来,德军的突然袭击堪称典范,但他们的神机妙算才真正算得上



不同凡响。由精锐装甲部队组成的同盟国左路军被诱入比利时和荷兰，这是德军制胜的关键。盟国左路军被诱离老巢，陷入困境，这才使德国的装甲部队能迅速穿越盟国左翼的中心地带，一举奠定胜局。而且，德军的装甲部队直驱海峡地带，在盟军的前线撕开了一个口子，机械化师紧随其后，迅速沿着整个口子筑成一道防线。这种战术以防守来协助进攻，犹如四两拨千斤。它将进攻的重负抛到了处于劣势的盟军的身上，盟军首先要突破重围，纠集被打散的部队才能有所作为。这就是神机妙算的战略精髓所在。

随着盟军西翼的崩溃，其失败的命运已是在劫难逃了。只有一部分军队丢弃全部装备，在敦刻尔克(Dunkirk)从海上仓皇出逃。要不是希特勒突然下令让神速前进的装甲部队在敦刻尔克郊区止步待命，本来这些盟军一个也跑不了，其原因且在后面再详加探讨。痛失全歼敌军的后果当时并没有马上显露出来，在西路盟军被歼以后，驻守在法国漫长前线的盟军残部难以抵挡德军猛烈的进攻，在德军再次发起进攻前，法国防线的崩溃已是指日可待。1914年，德国企图先深入敌方防线，然后再围歼对方，但事实证明那个包围圈太大了，非德军所能胜任。1940年，德军司令部的策略是集中优势兵力速战速决各个击破，最终达到全歼敌军的目的。

但是，如同当年的拿破仑，德国的策略并没能成功，它受到来自英伦三岛的持续抵抗，只要英国不被攻克，它就像“肉中刺”一直让德国人寝食难安。德国国防军擅长陆战，对那些逐渐发展的局势有充分准备，但对于目前的突发事件则未必能应对自如。大规模的海上入侵需要运用新的技术，动用船舰装备，面对这些无法预见的情况，德军就有点束手无策了。

海战处于两难的境地，陆战则所向披靡，这就驱使德国人去重蹈拿破仑的覆辙——侵略苏联，而反苏本来就是纳粹理论中固有的信念。希特勒妄图在拿破仑曾经失败的地方取得胜利，勃劳希契和哈尔德则不以为然，他们想要遏制希特勒的侵苏野心，但德军在欧洲大陆的辉煌战绩使他们难以推行温和的政策。而且，在纳粹眼里，征服苏联是轻而易举之事，尽管勃劳希契和哈尔德的看法与此大相径庭，他们比较重视苏联人的力量，但这也使他们容易接受那种观点，即认为要趁早动手，免得苏联的力量变得更强。

勃劳希契和哈尔德制定的侵苏计划和1940年发动的战争基于相同的原则，即突破红军防线中的薄弱环节，将敌军各部分割开来，迫使那些守军要靠反攻来突破重围。他们力图将俄军的有生力量歼灭在俄国边界，尽量不让它全身而退，避免为了追击敌军而深入重地。俄罗斯地形开阔，较之西线更有利



于德军迂回出击,不利的方面在于那里没有像英吉利海峡那样自然形成的障碍,德军在突破后难以咬住敌人穷追猛打。

一开始侵苏计划如愿以偿,德军取得一系列胜利,加上苏联领导人起初过于轻敌,德国人差点就大获全胜。德军装甲部队所向披靡,成功地将苏联大军分割包围,其中还包括一大部分装备优良的精锐部队。但从总体上看,不利因素超过有利因素,俄罗斯开阔的空间固然有利于德军进攻,但它那延绵的纵深也有利于俄国人及时撤退,从而避免了被全歼的厄运。随着战事的延续,这种不利因素变得越来越大。

另一个不利因素是装甲部队数量有限。装甲部队是德军进攻的利器、取胜的法宝。1940年西线的胜利首先要归功于装甲部队。当时10个装甲师冲锋陷阵,为后续的150个常规师打开缺口,使它们得以从容布防。1941年德军入侵苏联时,装甲师增至21个,但只是把原先各师的坦克一分为二。在开阔的前沿阵地,装甲师数量增多可以提高其机动能力,而各师坦克攻击力的减弱在入侵的初始阶段也无伤大局。确实,按照正统的军事观念,要守卫已经攻克的地带,必须增加陆军部队的比例,增加装甲师的做法是可取的。但是,随着战役的延长,尤其是当德军逼近大城市,遭遇更顽强的抵抗时,有限的攻击力就成了严重的问题。

正是在这些顽强的“岩石”上,德军胜利的希望被撞得粉碎。德军越靠近这些目标,进攻的方向就越明确,迷惑敌人回旋的余地也就越小。希特勒天生擅长迂回进攻的战略,并多次得逞,此时面对近在咫尺的大肥肉,他早已将这种战略战术置于脑后。结果,正如当年的拿破仑,莫斯科成了他眼中一块致命的磁石。

德军本来企图在苏军撤退之前将其歼灭在第聂伯河(Dnieper)以西,但是没有成功。面对这种局面,下一步该如何行动,德国高层意见不一,后来还一直争论不休。勃劳希契和哈尔德希望直扑莫斯科,希特勒则主张向南横扫乌克兰。有一些将领支持希特勒的看法,这使他更坚定了自己的主张。但是当德军在基辅成功地包围了苏联军队后,希特勒又改弦易辙了。虽然冬季已经临近,希特勒还是决定在南路德军通过乌克兰向高加索挺进的同时,继续向莫斯科进军。10月初,希特勒宣布攻占莫斯科的大决战已经开始,他决定将自己的声名押在这场豪赌上。

开战之初,德军战果辉煌。博克(Bock, Fedor von)将军在维亚济马(Vyazma)包围了60万苏军。然而就在完成包围之时,严冬降临了,在通往莫





斯科泥泞的道路上,德军唾手可得的胜利陷入了泥沼。

希特勒还要加强进攻,有些将领认为德军必须后撤,加强防守,冬天宜守不宜攻,对敌我双方都是如此。希特勒根本听不进要他谨慎从事的劝告。勃劳希契、哈尔德和博克也倾向于继续进攻莫斯科。毕竟当初他们颇费周章才使希特勒改变主意支持进攻莫斯科,如今他们自然也不情愿就此止步。11月,德军准备再次努力发起进攻。但是德方的意图过于明显,各路军队汇集在一起进攻莫斯科也使俄国可以集中兵力重点防守,免得分心兼顾其他地方的安危。后一阶段的进攻由希特勒直接指挥,除了面上的事情,勃劳希契已经不再具体负责。莫斯科战役失败后不久,德军又从苏联西南部港市罗斯托夫(Rostov)败退,9月份就正式宣布勃劳希契撤职。希特勒决定“遵从自己的直觉”亲自掌控德国陆军的最高指挥权,早在1938年2月将布隆贝格撤职之时,希特勒就已经掌握三军武装的总指挥权。

希特勒夺了勃劳希契的权力,这表明军人最终丧失了对战略战术的决策权。从此以后这个“波希米亚下士”就可以对高级将领颐指气使,对军事大计独断专行。将领们的权力仅限于提提建议略示异议而已。身不由己的执行者难以出色地完成任务。

迪特马尔(Dittmar)在我们的交谈中追溯这一转变的经过。他说:“波兰战役、西线战役、巴尔干战役以及俄罗斯之战的第一阶段都是由陆军总司令部直接指挥的,相对而言,最高统帅部几乎不加干涉。基辅之战首开希特勒亲自指挥先例,他辩解这对冬季来临之前结束战役至关重要。从此以后最高统帅部就越发加紧对陆军总司令部的控制。希特勒对抓权始终就是那么执迷不悟。”

迪特马尔还强调了另一个严重后果,他说:“希特勒决定陆军总司令部只能负责俄罗斯前线战事,其他战场统统由最高统帅部负责。结果造成了陆军总司令部没法了解战争全局,也就越来越没有能力对一些战略错误提出自己的意见。最高统帅部和陆军总司令部之间这种战区和利益的分割造成了德国作战计划的严重缺陷。”

“哈尔德多次对我说起他对希特勒的印象,他说希特勒喜欢故弄玄虚,即便他还不至于全然不顾战略法则,但他的确常常对那些战略法则漠然置之。”

“希特勒认为理性和知识毫无用处,不屈的求胜意志和为实现目的所作的不懈努力才是万应灵药,他也是这样训导部下的。他将那些玄机来取代对时间空间的周密思考和对敌我力量对比的仔细斟酌。将士作战的主动性被彻底

剥夺,甚至连最高指挥官也得对这个令人发指的监护人俯首帖耳,唯命是从。”

另一方面,一些杰出的年轻将领则将这种局面归咎于上级军官。在战争即将爆发之前,这种情绪尤为激烈。针对哈尔德的批评特别多,他们认为哈尔德像勃劳希契一样,在希特勒面前太软弱了,没能履行他应尽的职责。一位年轻军官这样说:“绝大多数德国军官就像呆板的工匠,总参谋部的成员也是如此,仓促组成的国防军本来就缺乏足够的军人教养。一个老练的官僚机构应运而生,为首的就是哈尔德这个头号老官僚,这种体制难以造就伟大的军人和出色的人格。”

原来的总参系统更有利于发挥个人的能动性,其成员也具有更开阔的视野。具有讽刺意味的是,1919年,为了防止德国重启战衅,西方列强强行废止了德国总参谋部,这个体制本来可以更有效地遏制希特勒这样的人物,取而代之的却是一个机械呆板、缺乏政治头脑的官僚机构。



## 第五章 古德里安将军——初期胜利的缔造者

战争第一年，希特勒的侵略战争给欧洲地图带来巨大的改变，尽管这种变化只是暂时的，它对世界历史的走向却有着持久的影响。造成这种划时代的变化的人物与其说是希特勒，不如说是古德里安将军。古德里安目光远大，用兵神速，深谙纵深突破长驱直入战略的玄妙之处。他创建并培训了德国装甲部队，并亲自率领他们所向披靡，取得节节胜利。而且，古德里安兼这种战术的创造者与坚定的执行者于一身，堪称史所罕见。古德里安率军在色当（Sedan）大举突破，坦克部队迅速挺进，直达英吉利海峡和瑞士边界，法国的防线顷刻崩溃。

没有古德里安就不太可能发生这种改变世界格局的大突破。希特勒虽然也颇有眼光，认可新军事技术的价值，但他不可能像古德里安那样运用自如。无论是德国总参谋部还是其他高级将领都难以使这一革命性的新战术化为现实。

在战前的那些年里，德国总参谋部更关注的是军队常规武器的改进，而不是装甲部队的潜能和运用模式。古德里安力排众议，发展这种“新模式”，曾遭到各方强烈反对。所幸他不像英国的装甲武器倡导者那样受到长期的抵制。快速运动的部队可以用在长线的战略突破，即先头部队可以远远超前于主力部队，古德里安认可这种观念，但许多高级将领却对此深表质疑。这些德国将领和他们的英法同僚一样思想呆板，害怕由此带来的风险，对突破制胜战术的巨大潜力视而不见。

甚至在迅速攻占波兰后，这种保守的观念仍在德军总参谋部和大多数高级将领中占主导地位。如他们反对在西线采取攻势。他们墨守成规，没人相信德军能取得大胜。如果当时采取了他们所钟爱的保守的观点，他们当然也肯定要证明这种观点是正确的。在制定进攻计划的会议上，他们坚持古德里安的先鋒装甲师在突破阿登高原（Ardennes）后，必须在默兹河（Meuse）待命，



等待大部队的到达。他们坚持认为部队过河至少需要 9 天至 10 天。如果那样的话,法国人就有足够的时间重整旗鼓,派出增援部队挡住德军的通道。

但是古德里安在开始进攻的第 4 天就到达默兹河,当天就率军强行渡河。他根本不管上司战战兢兢的告诫,长驱 160 英里,深入盟军后方,切断其运输供给线。在第 11 天,他已到达英吉利海峡,分割了盟军的左翼。闪电般的进攻是此战制胜的关键。

面对众将的质疑,希特勒曾力挺古德里安大胆的行动方案,但是他毕竟还是不如古德里安那么敢想敢干。要是希特勒没有下令古德里安止步不前,德军本可以截获从敦刻尔克撤离的英军。希特勒的插手干涉对二战的最终结果具有生死攸关的影响,只是当时并没有体现出来而已。法国军队再也没能从第一次打击后恢复元气,其左翼全军覆没。而且,正是因为古德里安从埃纳河向瑞士边界迅速挺进,才导致盟军残余部队全线崩溃,法国顷刻沦陷。

海因茨·古德里安 1888 年 6 月 17 日出生。他是弗里德里希(Friedrich)和克拉拉·古德里安(Clara Guderian)夫妇两个儿子中的长子。从非德裔化的姓氏可以推断他们可能来自荷兰一个叫做古德里吉安(Gouderjan)的村庄,它位于莱茵河口附近的一个小岛。古德里安的父亲曾是波美拉尼亚(Pomeranian)营的军官。古德里安本人参军后曾被派往汉诺威营,这种营也就是所谓的“轻步兵”,在英国军队里称为“步枪”团。他们进军迅速,行动比其他步兵更快,平时军训十分重视其特有的机动作战的传统。英国最早的三位坦克运动战的先知均出身于轻步兵,这并不是偶然的巧合,它表明训练方式对潜意识的刺激作用。古德里安和他们三人一样,都对第一次世界大战时阵地战僵持不下的局面印象深刻,认识到需要有新的战术和新的武器来恢复作战的机动性。

凡尔赛和约禁止德国拥有坦克,所以有很长一段时间,古德里安对坦克及其运用没有直接的经验。但是他勤于学习,认真钻研有关坦克的文字材料。他告诉我曾经怎样积累这方面的知识,他说:“1922 年,老的国防部任命我为机械化部队的巡视员,我开始对坦克产生兴趣。打那以后,我开始研究坦克在一战的情况,以及一战后坦克在外国军队的发展状况。因此我在 1928 年被聘为坦克战术的教师。我的听众是柏林摩托运输教育处的学生,他们来自各个军种。这个机构是德国装甲部队的发祥地。随后几年,我发展了坦克部队的战术和组织理论。经过这番理论研究,我暗下决心,一旦德国摆脱凡尔赛和约的束缚,就要组建坦克师。”法英战后有关论著探讨了坦克的战术、坦克的历史



和未来发展,古德里安对这些论著详加研究。法国有一种颇为流行的观点,认为坦克只能用来辅助步兵的进攻,古德里安对此不以为然。英国人当时倡导的是一种新的理念,认为坦克是一支独立的武装,可以独立作战,它可以像几百年前的骑兵一样,在战争中起到决定性的作用,古德里安对此颇为赞许。古德里安聪明好学,干劲十足,有关坦克作用的革命性观念对他正中下怀。

1930年,古德里安成为柏林附近第三机械化营营长。在当营长的两年中,他组建了一个坦克侦察连,一个坦克连,一个反坦克连。用模拟的坦克和大炮进行演练。“我用无线电通信来建立坦克之间的联络,效果甚佳。”虽然这种演练规模不大,比不上三年前英国部队进行的“装甲部队试演练”,其实践的方向却是并行不悖的。1931年10月,古德里安被任命为卢茨(Lutz)将军麾下的机械化部队总参谋长。他说:“将军完全同意我的观点,有力地将这些思想付诸实施。”

希特勒在1933年1月掌权后大力促进组建装甲部队。“1934年6月,成立了‘机械化部队指挥部’,后来改名为‘装甲兵司令部’,我成为该部总参谋长。1935年7月,在卢茨将军的指挥下,我们在明斯特拉格(Munsterlager)第一次进行了坦克师的演习,大获成功。1935年10月1日,成立了三个装甲师。第一装甲师驻扎在魏玛(Weimar),第二装甲师在维尔茨堡(Wurzburg),第三装甲师在柏林。”第一装甲师的师长是中将魏斯克(Weichs)男爵,第三装甲师师长是费斯曼(Fessmann)中将,古德里安被任命为第二装甲师师长,当时他只是个陆军上校。

两年前,英国国防部曾在某固定基地组建过一个坦克旅,这在世界上属于首创。与1927—1928年的“装甲部队试演练”不同的是,坦克旅的司令员是坦克专家霍巴特(P. C. S. Hobart)准将,他富于进取精神,对作战机动性有充分的认识。在坦克战术和快速作战的无线电控制方面,霍巴特贡献不小。他还抓住机会将装甲部队独立作战快速渗透的战略思想付诸实践。此前10年我就一直在阐述并倡导这种思想。然而,英国军方高层大多数人对此持怀疑排斥的态度。帝国总参谋长阿奇博尔德·蒙哥马利-马辛贝德爵士(Sir Archibald Montgomery-Massingberd)后来干脆不准霍巴特继续这样演练。更有甚者将坦克旅扩大为坦克师的计划也整整搁置了三年。

霍巴特的演练在国外却引起极大的注意,好学的古德里安对此尤其敏感。战前有一位比利时军官卡恩耶夫(Khandyeff)上校曾到过古德里安的装甲部队,他说:“古德里安坚信坦克的威力,他竭尽全力向部下灌输这种思想。他自

已花钱分发从国外买来的有关军事书刊,还对其内容注以粗略的德译。”卡恩耶夫还说,古德里安是如何将我所描述,霍巴特又加以实验的“每一个步骤”“抄下来,向排练戏剧一样进行演示”。“曾有一位前来访问的反坦克专家指出坦克的种种局限”,还引用了英国那些将军的保守观点来批评新战术。古德里安“忍不住打断他的话,说:‘这种观点太陈旧了,已经过时了。我相信霍巴特,他代表着新思潮。’”古德里安后来也证实“卡恩耶夫的叙述没错,那是在1935—1936年,当时我是在维尔茨堡的第二装甲师的师长”。

新的战略观念主张让装甲部队具有充分的自主权,敢于长驱直入独立作战。然而,事实证明要让德军高层转变观念,接受新事物殊非易事。尽管古德里安对此有着坚定的信念,在阐明自己的主张时,他还是比较谨慎的。以致有些同僚认为在1939年前古德里安尚未全盘接受坦克战的新理念。但是从1936年起就和他接触十分密切的老部下曼陀菲尔(Manteuffel, Hasso von)曾言:“古德里安从一开始就对坦克战术极为推崇,主张不畏侧翼受敌,深入重地,克敌制胜的战术。所以他以同样的方法,将所有的坦克辅助因素(步兵、炮兵、工兵)按部就班地布置好,物资供应(汽油、弹药、食品)有组织地编入各战斗部队。一切以坦克部队为核心,其他部门如众星捧月,伴随其后,直到与之完全融合。这样古德里安的部队就能确保有三到五天的给养。”

“在某些场合,他不会十分强调这个观点,那只是因为那些老军官不会轻易接受。他会用比较容易被别人接受的方式来提出自己的观点。”

可见即使在德国军队,这种克敌制胜的新理论也曾备受阻挠。古德里安生性坦率、心直口快,不会在上司面前闪烁其词、曲意逢迎。他常常直言不讳,不搞转弯抹角的那一套。欧宝(Opel)汽车公司的经理诺德霍夫(Nordhoff)曾对我的一个丹麦朋友讲,战前弗里奇任陆军总司令时,有一次他和其他几个汽车厂的代表受邀参观机械化部队演习。“演习刚刚结束,古德里安的举动让在场的军官和来宾大吃一惊。他径直跑到弗里奇面前说,这次演习太糟糕了,坦克没能发挥其应有的作用。最后他还说‘要是能采取我的建议,我们现在就能有一支名副其实的装甲部队了’。”

在场的一些人认为,面对这么多上级军官,古德里安的言行显得太桀骜不驯了。古德里安对这些议论却颇不以为然,在他看来自己仅仅是遵循了普鲁士军人的一贯传统,对他人“赤诚相见,即使面对国王也要直言不讳”。这种传统自18世纪一直持续到20世纪。

古德里安相信这一传统,也相信他的上级同样尊重这个传统,当时的情况



也确实如此。在为新兵种挑选指挥员时，德军高层重视专业知识，慧眼识才。相比之下，英国的坦克专家就没有他这么幸运了。1938年初，古德里安被破格提升为德国首支装甲军团第十六集团军司令，级别一下子超过了不少原先的上司。他被任命的那天是1938年2月4日，与德国军方高层大变动的日子正好巧合，就在同一天布隆贝格和弗里奇将军被撤职。古德里安在回忆此事时说：“对德国军方来说，这是黑色的一天。”但从历史的角度看，从二战初期德军的赫赫战果看，任命古德里安为集团军司令与军方两员大将被撤职，所得远远大于所失。

那年夏天，古德里安甚至被考虑取代贝克成为总参谋长。不过此事引起了争议，最后不了了之。有些人不喜欢保守的哈尔德，他们竭力推荐古德里安当总参谋长，结果导致了激烈的争议，双方的敌意有增无减。反对派将古德里安描绘成一个纯“技术专家”，认为他不能胜任总参谋长这样的高官。他们恶意诋毁，说他“没有进过正规的军事院校”，说得多了，许多不明真相的人也就信以为真了。在与一些德军将领的交谈中，我发现他们也是这么认为的。其实古德里安在1913年曾考入军事学院，虽然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止了他的学业，但他在一战中多次担任过参谋职位，在1918年确切无疑地成为总参谋部的一员。战后，德国在斯德丁(Stettin)暗中成立规模很小的参谋学院，代替原来的军事学院，古德里安在那里担任过三年教员。“所以我熟悉总参谋部的运作规范，也知道它的局限所在。”如果说古德里安不宜担任总参谋长一职，那也是因为他脾气急躁，而不是他资历不够。即使如此，6年后，古德里安还是当上了总参谋长，但如果他在1938年就担任此职的话，作用肯定更大。

机械化部队包括装甲部队和摩托化部队，1938年，古德里安被任命为机械化部队总司令。他曾在这些部队当过监察长，如今他可以从心所欲了。在大战爆发的前9个月里，他加紧训练强化所属部队，但对军队总体的现代化进程毕竟影响有限。他发现即使在自己的职责范围内，来自总参谋部的阻力还是大于支持。回忆起这一时期，古德里安说：“战前，陆军元帅勃劳希契已经对装甲部队有相当的认识，他曾在莱比锡(Leipzig)担任过由机械化部队组成的第四集团军司令。他对机械化作战的战略战术有自己的认识，然而并没有充分将其付诸实践。他喜欢自己开车，所以他在总体上不会反对军队机械化。哈尔德与此相反，他是一个老派军人，办事墨守成规。他只做该做的事，别无他求。他根本不喜欢装甲师，在他的脑子里，步兵现在是，而且永远是最最重





要的。”<sup>①</sup>

战争爆发之时,古德里安自然更乐于驰骋疆场,因为入侵波兰的任务交给了博克指挥的“北路集团军”的装甲军团。但是大部分坦克却分配给了伦德施泰特的“南路集团军”。古德里安发现他的军团里仅有一个装甲师,师长是盖尔·冯·施韦朋堡(Geyr von Schweppenburg)。盖尔在1933年至1937年曾任德国驻英国大使馆武官,在古德里安于1938年被任命为德国首支装甲军团总司令之前,他的军衔高于古德里安。两人均个性鲜明,作风强硬,碰在一起难免势不两立。波兰之战伊始,两人的矛盾就开始升级。古德里安麾下仅有这么一个装甲师,他自然要通过它来实施自己的战略战术。在这种格局下,他难免要对装甲师的具体事务指手画脚,盖尔则毫不客气地提醒他,做你的司令员,不要来干涉我的权限。冲破波兰走廊后,古德里安又得到了一个装甲师。凭借着这两个装甲师,古德里安率军从东普鲁士直驱布列斯特—立陶夫斯克(Brest Litovsk),向南穿过波兰军队的后方,予以致命的一击,出色地完成了任务。

此战过后,大多数坦克官兵都希望古德里安能成为进攻法国的装甲部队总指挥。当克莱斯特(Kleist, Ewald von)被任命为主攻阿登高原的装甲军团的总指挥时,人们感到军方高层中的保守派势力的偏见还是略占上风。不过,古德里安还是被任命为指挥由三个装甲师组成的先头部队。他成功地突破敌阵,率领军队切入纵深,抢占战略要地,割断敌军联络,取得决定性的胜利,使自己的战略战术梦想成真。

这场辉煌的战役将在本书第二部分的第九章加以详述。不过在此有必要交待一下古德里安本人对两个顶头上司的看法。人们不仅可以由此了解一些伦德施泰特和克莱斯特的为人,也间接地说明了只要上司重才识货,古德里安并非像人们所描绘那样是一个“桀骜不驯”的下级。古德里安说:“陆军元帅伦德施泰特足智多谋,堪称军方一流人物。他喜欢骑兵,并不十分看好装甲部队,但他并不像其他人那样因此而阻挠装甲部队的发展。他那彬彬有礼的骑士风度使部下如沐春风。即使不同意部下的观点,他也会记下来,让大家讨论。在希特勒面前,他也是直陈己见。连希特勒都对他的为人刮目相看。陆军元帅克莱斯特也是个品德高尚的军人。战争刚开始时,他并不看好装甲部

---

<sup>①</sup> 需要指出,在1940年战役至关重要的敦刻尔克时期,哈尔德对充分利用装甲部队重要性的认识高于德国军方高层任何人。



队,但随着战役的进展,他改变了观点,学会了正确地指挥装甲部队作战。”

看来在处理人际关系和容纳不同意见方面,古德里安不如伦德施泰特和克萊斯特,后者更适宜身处高位。古德里安的不少部下也对我表达过相似的看法,尽管他们在其他方面对古德里安佩服得五体投地。他的一位部下曾说:“他不太善于体贴他人的想法,而这是一个总司令应该具备的领导素质。”“在下达命令和宣布决策前,如果部下或同僚与他意见相左,他往往没有耐心听人把话讲完。他是个强悍的‘骑手’,也常常马到成功,但是他并不擅长琢磨马的脾气和情绪,骑手的这种能力在传统的马赛中至关重要。然而,作为一个装甲部队的组织者和精于此道的指挥员,古德里安是个不可或缺的将才。”

说这些话的人固然不失公正,不过必须指出,这些人过去都曾当过骑兵。至于那些坦克部队出身的人,我从来没听到过类似的批评。古德里安可谓是受尽了这些偏爱骑兵者的气,所以他才会对那些老骑兵如此不耐烦。霍巴特在英国军队里的遭遇同样如此。

而且法国战役的有关证据均清楚地表明,正是在色当的突破给予法国以致命的一击,德国从而取得全面的战果。这主要应归功于古德里安,没有古德里安,德国也不可能坚持那个具有战略意义的决策。希特勒听从了古德里安建议,但甚至连他自己也曾胆战心惊、犹豫不决,考虑是否要中止该作战计划。但是古德里安“咬紧牙关”,决不动摇。虽然“暂停进攻”的命令最终对法国战役的结局没有直接的影响,但最后关头在敦刻尔克的止步不前毕竟让英国军队成功地渡海逃逸。

尽管古德里安脾气急躁,但他生性豪爽,为人坦诚,也理解上级有上级的难处,从他对伦德施泰特的高度评价就可看出这点。这种优点也表现在他对那些与他共同发展新兵种和新观念的同道的的评价。(他曾撰文声称自己从英国军事思想中获益匪浅,他本人只是一个“学徒”。在运用新战术取得辉煌战果之后,他已经成为一个“大人物”,但他还是坦然承认其思想源于外国,一个与德国敌对的国家。能做到这样,实在是难能可贵。)

对于侵苏战役,古德里安也几乎从不埋怨他人,有这般气度,实属不易。他的许多战友,包括那些不属于坦克部队的军人都认为1941年最致命的错误就是当时最高司令部没能听从古德里安的建议。古德里安主张采取一年前西线作战时相同的策略,一招制胜,长驱直入攻克莫斯科。本书第十六章对此事有详细记载。

尽管有种种烦恼,古德里安还是努力做到心平气和地与部下相处。曾经

与他有过节的盖尔的一席话就颇能说明问题。在谈到苏联之战时，盖尔说：“我的装甲兵团归古德里安军团管辖，充当进攻莫斯科的先锋。由于他的参谋长者练能干，加上古德里安的谨慎和善意，我们配合得有章有法。苦战六个月，两人之间没有发生过一次争吵。”盖尔详述了古德里安的“领导艺术越来越成熟”。参加1941年战役的其他部下也深有同感。

然而正当古德里安证明自己日益成熟，适宜担任更高领导之时，晋升的机会却被断然剥夺，那是因为他与希特勒的冲突。此事颇具讽刺意味，希特勒不听古德里安的建议，丧失了战胜苏联的良机后，又要命令部队在隆冬时节向莫斯科后方冒险进军。一向被人认为胆大妄为的古德里安此时却竭力反对，坚持要谨慎从事，两人的冲突由此而生。

我曾听其他德国将领讲过古德里安和希特勒的冲突，不过他本人讲得更直白。“1941年12月20日，我在东普鲁士司令部与希特勒谈了5个小时，向他汇报我指挥的第二装甲军团的情况。希特勒命令我们从南面和西南面包围莫斯科，然后向离莫斯科三百里外的戈尔基(Gorki)进军。考虑到部队的状态和给养问题，这个任务实在难以完成。”

“我力图让希特勒信服我的话有道理，无奈徒劳无功。我感到他收到的前线报告有违真相，建议他遣散原作战部的参谋，由来自前线的军官进行重组。希特勒接见我之后，对陆军元帅凯特尔说：‘此人不可信。’几天后，接替陆军元帅博克的中路集团军总司令陆军元帅克卢格(Kluge, Guenther Hans)指责我违抗希特勒的命令，不愿从图拉(Tula)向苏萨-奥克(Susha-Oka)一线撤退，那里有些防御工事，可以抗过严冬。克卢格讲得并不对，但他的报告足以让希特勒赶我回家。1941年12月25日，我被撤职。”对于曾为希特勒立下头功的古德里安，这可是一张冷冰冰的“圣诞贺卡”，希特勒将为此付出沉重的代价。

古德里安被解职后无所事事，直到1943年2月，希特勒将其召回，任命他为装甲部队督导，整顿在斯大林格勒(Stalingrad)遭到重创的德国装甲部队，实际上等于重新组建。到1943年6月，装甲师重组大功告成，重新装备的装甲师实力不亚于其前身。但不久，德军在库尔斯克(Kursk)的进攻受挫。希特勒的孤注一掷使重组的装甲部队再度遭受重创，这对抵抗苏联潮水般的进攻有着致命的影响。

一年以后，德军被逐出苏联，其防线处于全面崩溃的状态。1944年7月，希特勒召见古德里安，任命他为总参谋长。本书第七章将对古德里安军人生涯的最后一段故事和德军的垂死挣扎作详尽的描述。



在本章行将结束之时，不妨再引用两员大将对古德里安的评价，他们曾长期在他的部队服役，最有资格对他的才德和影响力作出公正的评判。我遇到过不少人，他们都毫无保留地对古德里安赞扬有加，但这两员大将平素从不人云亦云，凡事均有自己的见解。

一位是盖尔，他从不讳言自己与古德里安的矛盾。然而他的评判却颇为精到中肯。“德国装甲部队战绩的百分之六十应归功于古德里安。他抱负非凡，敢想敢干。体恤将士，也深得将士的钦佩和信任。但他性情暴躁，决策果断，对军官要求苛刻，个性太强，所以树敌甚多。甚至在希特勒面前也敢于直言不讳。作为一个带兵的长官，他为人善良，办事一丝不苟，思想开明进步。如果你提出一个革命化建议，他立马会说：‘好！’这种叫好可能性占百分之九十五。”

另一位是曼陀菲尔，德国装甲部队司令员中的后起之秀。他的评判是：“古德里安是独自将坦克引入德国军队，并作为实战武器的第一人，而决不是总参谋部。我曾作为装甲部队督察在国防部任职，清楚地知道古德里安为坦克战所作的种种努力。平心而论，这种新式武器带有他个人的印迹。坦克战的胜利应归功于古德里安。”

“他一贯坚持坦克战须先置两翼于不顾，强调突破，迅速深入重地。这种观点在和平时期显得有点孤掌难鸣。在数不清的场合和各种会议上，古德里安一直不倦地向人们灌输这种理念，让它们在坦克部队的指挥员的脑子里生根。”

“如果说在战争期间，坦克战理论并没能在每一个地方都获得成功，那也应该归咎于那些旧式军官的不信任，他们对坦克战几乎一窍不通。”

“古德里安是德国装甲部队的缔造者和坦克战的大师，我尤其要强调‘大师’这个词。”

## 第六章 “阳光下的战士”——隆美尔

从1941年起,埃尔温·隆美尔(Rommel, Erwin)声名鹊起,风头之健盖过德国众将。他从上校到陆军元帅,晋升之快令人瞠目。从双重意义上看,隆美尔堪称异数。他步步高升,却没有等级分明的总参谋部背景。而他一显身手的舞台向来是在欧洲以外的地区。

隆美尔的声名鹊起可以说是蓄意为之。除了他的才干,还得归因于希特勒的老谋深算。希特勒深知民众最崇拜战斗英雄,于是决定推出两个(仅此两个)对他有利无害的公众英雄。“一个是阳光下的英雄,另一个是雪地上的英雄”。在非洲的隆美尔是阳光下的英雄,在芬兰的迪特尔(Dietl, Brig. Edward)则是雪地上的英雄。

两位英雄的位置处于主舞台的两厢,中心舞台的聚光灯是要对准希特勒本人的。两位英雄都是悍将,其武功足以称雄一地,其谋略却无法与最高权力枢纽一争高下。两人无疑是希特勒的忠实工具。结果证明,被选中的两人中,隆美尔的表现更为出色,没有辜负希特勒的慧眼识才。但他对希特勒却没能做到忠贞不渝,在隆美尔的眼里,希特勒的兴亡与德国的前途不可同日而语。祖国利益高于一切,于是他向自己的恩人反戈相向。

隆美尔的出名固然得之希特勒的恩宠,但首先是他的精明强干引起了希特勒的注意。而战场上英国对手的刮目相看更使他声名大噪,这是希特勒所始料不及的。

第一次世界大战时,隆美尔虽然只是一个下级军官,在1917年对意大利的卡波雷托(Caporetto)进攻战后,却被授予代表德国军人最高荣誉的勋功奖章。不过作为一个职业军人,他的资历远远不如他的战功。一战后,他的军阶仍然不高,希特勒从没考虑过将他作为未来的总参谋部的合适人选。传说他曾当过冲锋队的头目,这是那些纳粹宣传报道虚构出来的,隆美尔成名后,他们便竭力将他扯成一伙,为自己的党派增光。



隆美尔是一位天才的军事教官和军事作家,从1929年起,他在德累斯顿(Dresden)陆军学校当了四年教官。他常以自己在战争中的亲身经历作为教案进行讲课,生动地再现实战的气氛和个人能动性的非凡魅力。他还特别擅长以图表和地图来突出重点。1937年,他把有关陆军战术的讲稿整理出版,该书在德国和其他国家行销甚广,也引起了希特勒的注意。希特勒好读军事著作,他将隆美尔提拔为营长,该营曾护送希特勒进入苏台德区(Sudetenland)。希特勒发现隆美尔是个思想新颖、不为传统观念束缚的军人。谈起新的军事观念,双方颇为投缘。战争爆发时,隆美尔受命掌管最高统帅部的事务,这样他就有机会与元首接触,得到重用。波兰战役后,隆美尔请求希特勒任命他为装甲师师长,并如愿以偿。看准机会,抓住不放,这就是隆美尔的性格。战前,他是步兵战的坚定拥护者,对鼓吹坦克战的言论持反对态度。在通向波兰的路途上,他亲眼目睹了坦克战的辉煌,便不失时机地“紧随着这道光芒”。

隆美尔被任命为第七装甲师师长,投入西线的进攻。他做足功课,研读坦克战的著述。他在非洲的军事笔记中盛赞英国军事家所阐述的坦克战理论,称其为“出色的方法”。他认为英军之所以打败仗,就是因为其指挥官没有遵从书中的教导。隆美尔的装甲师率先突破默兹河,直扑英吉利海岸。在下一阶段的战役中又冲破法国位于阿布维尔和亚眠(Abbeville and Amiens)之间的索姆河(Somme)防线,直驱鲁昂(Rouen)附近塞纳河(Seine)地区。后来有不少出版物描述隆美尔的辉煌战绩,还有人把他指挥的部队称为“幽灵师”。

1941年初,希特勒决定派一支装甲远征军去增援他的盟友意大利对埃及的侵略,他任命隆美尔来指挥这支“非洲军团”。部队到达的黎波里(Tripoli)时,意大利军队已经被打得抱头鼠窜,在英军的追击下陷于溃败的境地。隆美尔临危不惧,镇静自若。他料知英军规模有限,虽然得胜,其势已如强弩之末。部队刚到前线,隆美尔就立即发起进攻。他对坦克战术经验有限,但他对机动性的敏锐感觉超乎寻常,尤其擅长出其不意。他用自己装备不整的坦克将英军各个击破。进攻的神速加上漫天的沙尘使隆美尔如虎添翼,英国军队被一举逐出昔兰尼加(Cyrenaica),龟缩到埃及边界。

在接下来的18个月中,隆美尔名声日隆,这不仅是因为他成功地遏制了英军的连续进攻,更在于每当有人声称他发起歼灭战的时机尚不成熟时,他总能华丽转身,杀出个漂亮的回马枪,让世人为之瞠目。

在这个过程中,英国第八军的将士对其对手隆美尔的评价极高,甚至超过



自己的指挥官。隆美尔神出鬼没的把戏触发了英国人的幽默感,他们甚至都佩服得有点喜欢上这位德国将军了。1942年夏,隆美尔在加沙拉(Gazala)和图卜鲁格(Tobruk)一带击溃第八军,将其残部从西部大沙漠驱赶到尼罗河三角洲的边缘。此战使隆美尔达到了其军事生涯的巅峰。

英国驻中东部队总司令奥金莱克(Auchinleck)力挽狂澜,亲自出马收拾第八军残部,他将这些士气低落的部队集结起来,在阿拉曼(Alanmein)组成坚固防线。经过长途的追击,隆美尔的军队已经疲劳不堪,而且供给不济。德军接连发动两次进攻都被挫败,这对入侵者的前途有着致命的影响。

隆美尔表面上还显得信心十足,以为第三次进攻将会获得成功。但在等待供给的过程中,时光在悄然流逝,他内心的希望之光也日渐暗淡。在这段间歇的时间里,英国的增援部队也从本土赶来了,指挥官也作了更替。丘吉尔希望一俟增援部队到达非洲,就立刻发起进攻。奥金莱克更为高明,他坚持要等新来的部队适应非洲的情况后才有所动作。结果亚历山大(Alexander)取代奥金莱克成为英国驻中东总司令,蒙哥马利(Montgomery)出任第八军军长。8月底,隆美尔先出手进攻,但英军的新防卫计划再次挫败了德军的进攻。战场的主动权自此易手。经过一段时间的充分准备(比奥金莱克原先估计的时间更长),在10月的最后一个星期,蒙哥马利发起进攻,这次他拥有绝对的空中优势,足够的大炮和坦克。不过,因为没有侧翼部队的配合,这一周的交战仍是一场硬仗。德军防线过长难于兼顾,尤其致命的是德国油船在地中海被英国潜艇击沉,使其装甲部队陷入困境。问题的关键就在于,德军一旦进攻失势,就再也无力作出像样的防守,只能退守到上千里以外的利比亚(Libya)西部。

德军8月进攻的失败对隆美尔可谓是致命的打击。失望的情绪影响到他的身体,他染上了热带溃疡,回到维也纳(Vienna)去治病。听到蒙哥马利进攻的消息后,隆美尔不顾医生的反对,断然飞赴非洲战场。但后来几个月的日子,他过得并不顺心。虽然在长途后撤时,他多次巧妙地使蒙哥马利包围德军的计划落空,但他毕竟没能抓住时机遏制英军进攻的势头。3月,隆美尔离开非洲回国继续治病。一个月后,蒙哥马利在马莱(Mareth)之战中打败德军,打开了通往突尼斯(Tunisia)的大路,也打开了在非洲彻底打败德军的胜利之路。隆美尔的生病或许是这次失算的原因,但希特勒将其召回治病也是为了保全这位大将的名誉,以便后来还能为他服务。

阿拉曼战役之后,在谈及“隆美尔传奇”时,人们多少总会感到他的声名





有点言过其实。时运不利,对一个人的评价也自然会由褒到贬。但这里还有一个深层次的原因。在蒙哥马利接手第八军之前,隆美尔是英军心目中的英雄,他们打造了“一个隆美尔”作为任何成功举措的同义语,对他的高度崇敬可见一斑。蒙哥马利掌权后,特别有意制造出了“蒙哥马利神话”,来抵消“隆美尔神话”的影响。


这种宣传策略渐渐见效,隆美尔似乎又成了个名不副实的将军。然而,蒙哥马利内心还是十分敬佩这位德国将军的,他一直将隆美尔的照片置于座右。他还常以其他方式表示对隆美尔这个对手的敬仰。况且,在评价其人时,不可忘了这一事实,两军相争之时,隆美尔不仅身患疾病,德军的兵力也远不如人,汽油更是供不应求。

隆美尔的卓绝之处在于他曾经在没有空军的劣势下以弱胜强。在这样的条件下,双方任何一位指挥官都不曾取得过这样的战绩。英国的韦维尔(Wavell)曾指挥将士以少胜多,但那是打意大利人。隆美尔的失算是显而易见的,不过在以少敌多之时,任何失算都可能导致失败的结局,而有的将军坐拥重兵,占有绝对优势,他的许多错误往往会被轻而易举地掩饰过去。

隆美尔常常对后勤行政人员太不重视,这个错误是显而易见的,不过他的部下指出,随着经验的生长,他在这方面变得更为明智。最难改正的缺点是事必躬亲的办事作风,他的下属对此极为恼火。事无巨细,他都要亲自过问,而且必亲临现场。隆美尔喜欢在战场上到处巡视,有些重要的事情需要他来决定,但指挥部却常常联系不上他。另一方面,他又似乎具有某种诀窍,往往能在最关键的时刻突然现身,起到当机立断的作用。隆美尔还常常让年轻有为的军官放手一搏,证明自己的才干,而那些老迈的将军对此往往噤若寒蝉。那些年轻军官自然对隆美尔比较崇拜。意大利军队的将士对此也深有同感,他们感到隆美尔将军与自己那些老迈胆怯的上司简直有天壤之别。

在战术上,隆美尔善于虚虚实实,堪称足智多谋。在非洲发起第一次进攻时,隆美尔命令坦克不顾一切全速前进,以致一些坦克在沙漠中迷了路。到达主战场后,隆美尔为了不让英军知道自己没有多少坦克,就让卡车扬起沙尘,造成德军坦克从四面八方逼近的假象,使英军闻风丧胆,顷刻崩溃。

隆美尔不仅胆识过人,而且心细如发。他经常用坦克作为诱饵,将英军的坦克诱入由反坦克炮兵组成的埋伏圈,从而将防守与进攻巧妙地融为一体。随着战事的进展,这种“隆美尔战术”为各个部队所仿效。



当隆美尔离开非洲时,连他的英国对手也感到有点遗憾,他们对他们的人生和思想都不无影响。部分原因是隆美尔善待英军战俘,一些曾与他有过接触的英军战俘后来逃回部队,他们认为隆美尔讲究策略,又富有骑士精神。当然让英军印象最深的还是因为他用兵神出鬼没,尤其擅长在佯败之后突然杀个回马枪,打得敌人措手不及。

作为一个战略家,隆美尔堪称胆大心细,但有时也会失算。作为一个战术家,他的长处远远超过他的短处。作为一个指挥官,他具有超凡的能力,善于运筹决策,果断行动,同时他又过于喜怒无常,时而狂喜,时而沮丧。

1944年,隆美尔再度出山,担任集团军司令,在英吉利海峡抵御英美联军的进犯。他的顶头上司是陆军元帅、西线总司令伦德施泰特将军。在如何抵御英美联军和预料英美联军将从何处进攻的问题上两人意见相左。伦德施泰特倾向于纵深式防御,即让敌方全部进入后,再发起强有力的反攻。本来隆美尔自然会赞成这种方法,他在非洲就经常采取这样的战术。但此时他已经修正了自己的战略思想,因为敌方具有空中优势。他现在更为关注的是要在对方尚未在海岸站住脚跟时就全力出击。伦德施泰特还认为盟军将通过海峡,直接在索姆河和加来(Calais)之间的狭窄地段登陆。隆美尔则认为盟军的主攻方向很可能是在卡昂(Caen)和瑟堡(Cherbourg)之间的西诺曼底,希特勒也持相同的观点。

关于盟军的主攻方向,隆美尔和希特勒的预见是对的。大量的证据表明,在最后四个月里,隆美尔曾竭尽全力加强诺曼底海岸的防线。而当时德军十分注重加来的防守,对诺曼底则有所忽视。盟军有幸,由于资源短缺,隆美尔的努力没能成功,水下障碍和岸上的防御工事都没能完成。

至于遏制盟军进犯的方法,大多数人支持伦德施泰特的计划,即先退守,然后看准时机大举反攻。隆美尔主张在诺曼底桥头堡将盟军包围,但他们认为这会先行耗尽德军的实力。大多数属于总参谋部“种姓”的将领都瞧不起隆美尔,认为他的军事知识不过比门外汉希特勒略多一点而已。他们强调与俄罗斯之战相比,隆美尔的实战经验极为有限,对纵深布防的战略所知甚少。

伦德施泰特的计划虽然肯定更符合基本的战略理论。但考虑到盟军的强大实力,加上空中优势,开阔的战场又有利于调动大部队作战,一旦他们深入法国境内,德军要想依靠一次反攻就阻挡其前进谈何容易。在这种形势下,唯一的希望就在于不让盟军在海峡这边站住脚跟,筑成强大的桥头堡。在开头



的几天里,隆美尔差一点就达到了他的目的,后来之所以没能成功地抵御盟军不是他的错误,而是他的计划没能得到全力贯彻,没能及时从加来发来增援部队。那是因为德军最高指挥部始终认为,诺曼底登陆只是盟军总攻前的虚晃一枪,真正的大规模进攻将在勒阿弗尔(Le Havre)和加来那一带。除此以外,德军没有任何增援部队可供机动作战。伦德施泰特和隆美尔曾希望从法国南部调一支部队过来,但希特勒就是不批准。

希特勒坚决不准德军从诺曼底撤退,这对德军而言是致命的,伦德施泰特和隆美尔这时都已明白再也无法阻止盟军进犯了。如能及时撤退,德军还可以在塞纳河组建防线,随后就可以在德国边界筑起更长的防线。但希特勒坚持要他们死守,命令西线的指挥官没有他的同意不准后撤,后退几里路也不行。德军只得拼命死守,直到被打得七零八落。死守的结果是德军输得更惨,后撤的路线比伦德施泰特和隆美尔原先预计的更长。

认识到希特勒的政策决无前途,这使伦德施泰特和隆美尔的看法比以前更为一致。6月,在两人的强烈要求下,希特勒来到法国,这是他在1944年唯一的一次来到西线。伦德施泰特和隆美尔在苏瓦松(Soissons)与希特勒会见,他们仅要求将部队撤退到奥恩河(Orne)后面,重整装甲部队,准备新的反攻,但希特勒还是不同意。在接下来的一个星期里,前线战事更为吃紧,此时,伦德施泰特直言不讳地说,继续抵抗是徒劳无益的,战争应该结束了。他的建议尚未上达希特勒,元首已经决定更换指挥官,他从东线调来陆军元帅克卢格(Kluge)取代伦德施泰特。

希特勒既没有任命隆美尔,也没有将他撤职,这样的处置颇耐人寻味。隆美尔在苏瓦松的态度使希特勒非常反感,不过隆美尔对希特勒的看法变化更大。他对不止一个部下说过,德国唯一的希望就是尽快除掉希特勒,然后重开和谈。他肯定知道在国内有人密谋在7月20日暗杀希特勒。

在7月20日的前三天,隆美尔在靠近前线的公路上行驶时,遭到一架低飞的战机袭击。车子翻了,他被甩出车外,头骨破裂。巧的是出事地点名叫圣·弗伊·德·蒙哥马利(Sainte Foy de Montgomery)。他被送往巴黎的医院,略为康复后就回到了老家乌尔姆(Ulm)。此时,盖世太保已经开始调查反希特勒的阴谋。两个军官前来造访,将隆美尔带上车,他们告诉他,希特勒让他自己作出选择,要么服毒自杀,要么到柏林受审。隆美尔选择服毒,他的尸体被送到乌尔姆的医院,然后他们对外宣布隆美尔将军死于大脑栓塞,显然是因为上次事故中的脑外伤所引起的。希特勒为隆美尔举行了国葬。



一个军人的生涯就此告终。他足智多谋,勇猛善战,善于运用机动作战的新战术。他悟性过人,能敏感地预知何为生死之地,何为存亡之机。他经常激怒那些只会纸上谈兵的参谋,却深受前线将士的崇敬。隆美尔将军是一位名副其实的军事天才。

越深入了解他的事迹,就越能清楚地看到,在独立作战的舞台上,他天才的光辉显得更为耀眼。这位“伟大的上尉”将彪炳千古。



## 第七章 阴影下的军人

本书第四章在探讨德军的战争模式时，曾一直追溯到1941年底。第六章从另一条线索着手，讲述了隆美尔在非洲的战事，进而触及了1944年夏重开西线战场。但那样就使有关西线的战事不够连贯，在论及大战的最后阶段之前，最好还是重拾从1941年底开始的欧洲战事。在本书的第三部分将对德军将领作更为详细的描述，因此本章仅对主要的战事和主要的将领作粗线条的描述。称他们为“阴影下的军人”，包含两重意思，一是指希特勒对战事横加干涉的阴影，一是指笼罩在他们头上战败的阴云。

### 哈尔德的末路

1942年在俄罗斯的战事是由总参谋长哈尔德指挥的，不过他必须听命于希特勒的“最高指示”。哈尔德具有战略头脑，德军早期那些成功的作战计划与其说是出自总参谋部那些优秀助手的灵感，不如说是主要出自哈尔德之手。勃劳契克被撤职后，哈尔德主管陆军总司令部，但那时的陆总已经为最高统帅部牢牢控制，人们不无嘲讽地称其为“下士希特勒的军事处”。

在这种恶劣的环境下，哈尔德已经难有勃劳契克当年的权威和底气了。过去有陆军总司令的支持，总参谋长可以和国防军总司令一争高下，可现在由一人身兼二职，而且这个人又是希特勒所中意的，这种争论就不复存在了。勃劳契克与哈尔德的关系相当融洽，几乎从不产生分歧，这在高层是很少有的。熟悉他俩的将领曾说，虽然哈尔德主意多一点，但他们俩人凡事都共同商讨相互配合，几乎难分彼此。“哈尔德有什么主意，勃劳契克便呈示希特勒，没有勃劳契克的支持，哈尔德也从不独自去见希特勒。”可如今哈尔德只能孤身一人与希特勒周旋了。

1942年夏季攻势的开局相当成功，哈尔德的军事才能得到充分展示。一



开始德军巧妙地在主战场引而不发,先后两次突袭克里米亚半岛,引诱苏军先向哈尔科夫(Kharkov)进攻。等到苏军大部队深深陷入在那里,德军才向敌两翼发起总攻。德军一路猛进,攻克从顿河(Don)到顿尼茨河(Donetz)之间的走廊地带。可是通过顿河下游之后,在希特勒的干预下,德军开始分头行进。原先计划的主攻方向是高加索,占领那里的油田,指向斯大林格勒的德军的主要任务是从侧翼确保通往高加索大路的安全。可希特勒这时却想一雪前耻,顺便攻克斯大林格勒,从而改变了原先的计划。更糟的是,就像一年前的莫斯科之战,希特勒此时眼睛盯死在斯大林格勒,这个城市的名字尤其让他揪心。就这样,他的命令再度帮助苏军重新集中兵力,大败德军。

一旦明白希特勒这样做将使德军进攻的势头受到重挫,哈尔德马上提出异议。可此时的希特勒已经听不进任何反对意见。哈尔德的异议最终导致他自己在9月底被撤职。

## 蔡 茨 勒

哈尔德被才当上西线总参谋长不久的库尔特·蔡茨勒(Zeitler)取代。蔡茨勒对东线的战事所知甚微,在此紧要关头,他本来并不适合担此重任,但正因为如此,他才不会对希特勒的指令说三道四。

蔡茨勒年纪很轻,在战前不过是个陆军上校,后来成了克莱斯特(Kleist)装甲部队的参谋长。正是他着手解决了装甲部队发动突袭和长距离进军后的供给问题。他年轻有为,生气勃勃,属于最为纳粹头目所器重的“实干家”,而哈尔德则属于“思想者”。后者不仅是个出色的军事作家,也是一个数学家和植物学家。

若论战略思想,蔡茨勒的水平不如他的前任。但他擅长组织实施战略行动,深谙机械化部队的作战之道。1940年,德军装甲部队冲过阿登高原和法国时,参谋长蔡茨勒的组织和后勤工作就相当成功。1941年德军所进行的一系列运动战更为复杂,而蔡茨勒的表现也更为出色。当时为了阻止苏军布琼尼(Budenny)元帅通过布格河(Bug)和第聂伯河(Dnieper)后撤,克莱斯特的装甲部队首先从乌克兰向黑海地区迂回进军,然后转向朝北与古德里安会师,进而完成对基辅(Kiev)的包围,接着再度迅速南进,打击正在越过第聂伯河攻击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Dnepropetrovsk)的德军桥头堡的苏联新增援军。击溃那里的苏军后,蔡茨勒挥师穿过顿尼茨河流域(Donetz Basin),拦截亚述



海(Sea of Azov)附近的苏军。克莱斯特对我强调“把部队这样来回扯动”，最大的问题是保证供应，他对参谋长蔡茨勒赞不绝口。

蔡茨勒的出色表现引起了希特勒的注意，1942年初，希特勒亲自接见了蔡茨勒。蔡茨勒向希特勒讲述了他如何随机应变，采取紧急措施，帮助第一装甲军团安度严酷的冬季。这给希特勒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他最看不惯那些因循守旧，不会随机应变的职业军人。不久，蔡茨勒被派往西线，担任参谋长，负责重整那里的防守。9月，在迪耶普(Dieppe)登陆被击退以后，希特勒将蔡茨勒召回东线，亲自任命他为总参谋长。这对一个年轻的少将来说，这般破格提拔实在是令人受宠若惊。

希特勒喜欢提拔懂得机械化战争的年轻军官，蔡茨勒又有实战经验，这固然是他得到青睐的原因，但还不是全部的原因。希特勒希望这些年轻的军官对他感恩戴德，而不是一味效忠军方，希望他们像凯特尔和阿尔弗雷德·约德尔(Jodl, Alfred)那样成为自己的党羽。军方那些“烦人的说教者”好持异议，一直让他感到难以忍受，赶走了哈尔德，他就可以轻松地摆脱这种烦恼了。

得到擢升的蔡茨勒自然是风光一时，他也就默认了希特勒在进攻高加索的同时继续猛攻斯大林格勒。当时德军的后备力量尚未耗尽，但这种徒劳无益的进攻终将耗尽德军的增援部队。

但不久蔡茨勒就对希特勒的战略产生了怀疑。希特勒坚持要在冬季继续进攻斯大林格勒，蔡茨勒提出质疑。当俄军开始反攻时，蔡茨勒想让弗里德里希·保卢斯(Paulus, Friedrich)的军队立刻撤退。希特勒为此大怒，严词拒绝。从此两人之间的摩擦日趋频繁，保卢斯的军队被包围后，希特勒还是不同意让他向西突围。无可奈何的蔡茨勒只得正式提出辞呈，希特勒却置之不理。

在斯大林格勒的德军被迫投降后，蔡茨勒力图劝说希特勒批准让北向突进莫斯科和列宁格勒的德军各自后撤，因为他们的处境十分危险。这样不仅可以机动调配增援部队，还能加强正面防守，来抵御行将到来的进攻大潮。但是要让德军从苏联最大的两个城市面前公然后撤，希特勒感到太丢面子，他断然拒绝任何战略性的撤退。蔡茨勒不乏与希特勒抗争的勇气，无奈孤掌难鸣，凯特尔和约德尔总是站在希特勒一边。凯特尔和约德尔的办公室就在希特勒的指挥部内，而蔡茨勒的办公室则在别处，他俩与希特勒更为接近。当然这不仅仅是一个办公地点的距离问题，随着时间的推移，蔡茨勒与希特勒的分歧越演越烈，在每天的例行会议上，希特勒对蔡茨勒往往冷眼相对，两人之间的距离也渐行渐远了。



这就不得不谈到约德尔将军的影响力,从大战开始到结束,约德尔一直是希特勒的贴身参谋长。若不是他的言行“中规中矩”,从不敢越雷池一步,他也不可能在这个位置上呆这么久。约德尔真是个一流的办公室文员,蔡茨勒的脾气与约德尔完全相反。他性格冲动,做不到忍气吞声,在与希特勒争辩时常常大光其火。希特勒之所以迟迟没有撤掉他,主要是因为蔡茨勒擅长处理机械化部队的后勤工作,善于解救运动战中的各种燃眉之急,而凯特尔和约德尔根本没有这种能力。

1944年7月初,蔡茨勒与希特勒的关系终于走到了尽头。德军在第聂伯河上流被击溃后,蔡茨勒私下晋见希特勒,敦促他批准撤退波罗的诸国(Baltic States)的北路军团,否则将被包围。希特勒就是不同意,俩人大吵一场。因为几次辞职都被驳回,蔡茨勒再也不愿为这场战争负责了,干脆以病为由再递辞呈。希特勒刻意报复,剥夺了他这个级别本应享有的各种特权,下令开除他的军籍,无权再穿军装,以此来污辱蔡茨勒。

## 古德里安的末路

希特勒选中了古德里安这位早期的坦克战专家来顶替蔡茨勒总参谋长的位置。这次任命让总参的大多数成员大感意外。他们认为古德里安不具备总参谋长所需的战略眼光和平衡全局的能力,充其量不过是坦克战的狂热鼓吹者,战场上头鲁莽的“公牛”。希特勒选中古德里安反映了他本能地偏爱喜欢标新立异的人,也表明他十分赞赏古德里安所立的战功。<sup>①</sup>古德里安是德国装甲部队的创建者,是战功显赫的先锋,选中他当总参谋长表面上看来是升官加冕,实质上不过是装饰门面,后来事实也证明的确如此。

长期以来,希特勒就一直将战争的指挥权牢牢地抓在自己的手里,将陆军总司令部视为传达他命令的工具和东线战役的具体执行者而已。即便古德里安的性格和经验堪担总参谋长的重任,他也难以有所作为。何况对古德里安而言,下有参谋部同事的侧目而视,上有希特勒的多方掣肘,真是上下为难。

总参谋部的下属以屈尊俯就的口吻不无反感地称古德里安为“打仗出身的军人,没受过军事院校的训练”。这种评价虽然不完全符合事实,但客观上反映了双方观念的不同。有希特勒的撑腰,古德里安本来可以压得住同事的

<sup>①</sup> 参见第五章“古德里安将军——初期胜利的缔造者”和第十章“装甲部队的崛起”。



这种排斥,但他不久就发现,自己与希特勒也合不来。对他不利的是当时德国的力量已经开始由盛转衰,更为不利的是7月20日的反希特勒阴谋流产后,希特勒更加疑窦重重,他会将任何异议都视为背叛的迹象。一些年轻的军人善于投其所好,消解他的疑心,而古德里安却不会玩这一套。

而且,古德里安不仅为进行闪电战耗尽心血,多年来为了对付那些反对和怀疑新军事思想的人也花费了大量精力。这一年他忙得马不停蹄,却往往事倍功半,一直为希特勒那些无法挽回的错误而痛心疾首。1943年底,他累得心脏病发作,差点一命呜呼。再度被重用固然能使他为之振奋,但左右为难的境遇使他这回显得力不从心,反复的挫折使他的脾气变得更加暴躁。像他这种性格的免不了会变成这个样子。他在其他一些方面也很不顺。一位年轻军官曾对古德里安的坦克战能力十分崇拜,也比较了解他的为人,他说:“一个身处要职的军人必须要有敏感的政治头脑,我认为古德里安在这方面的视野和胸襟都略嫌不足。面对各种政治变数和机遇,他往往显得比较迟钝。”

古德里安是新进攻战福音的最初传道者,然而在面对必须防御的格局下,他的见解也要远远高于其上司。早在1944年古德里安还是装甲部队监察长时,他就曾敦促希特勒从东线进行战略撤退,以便沿着1940年时的前沿阵地构成牢固的防线。当他受命为总参谋长前不久,德军在北线的普里皮亚季沼泽(Pripet Marshes)大败,但苏军进攻势头受到遏制的地点就在古德里安当年建议设防的地带附近。德军损失了二十个师,在仓皇出逃的途中丢失了大部分武器装备,还是靠从罗马尼亚急速赶来的装甲师才堵住被攻破的缺口。不久,受到重创的前沿阵地再度崩溃,罗马尼亚的倒戈更是雪上加霜。苏军通过喀尔巴阡山脉(Carpathians),横扫中欧的大路已经大门洞开。

古德里安在秋季力图构筑东普鲁士到波兰中部的新防线,但受到多方牵制,后备力量枯竭,没法增援保加利亚军队,希特勒还企图在西线发起新的攻势。希特勒调集了所有的后备力量,欲从侧翼通过阿登高原向英军发起突然袭击,幻想让英国再度品尝一下“敦刻尔克”的败绩。然而即使在大战后期,希特勒仍不愿听从建议,不肯从波罗的诸国、巴尔干半岛和意大利撤兵,以保东线主战场有足够的后援。

阿登进攻以失败而告终,希特勒依然不听古德里安的劝告。尽管古德里安一再告诫,苏军的进攻迫在眉睫,前线的德军力量太弱,无法抵抗,希特勒还是仅向东线派出微不足道的增援部队。更糟的是连这么点援兵也等于没派,因为希特勒命令将波兰的三支精锐坦克师调到南方,企图让他们去冲破苏军

对布达佩斯(Budapest)的包围,结果又是铩羽而归。

1月12日苏军发动攻击时,古德里安负责800英里防线,手头只有十二个后备装甲师可供调配。更有甚者,三天前他向希特勒提出趁苏联人尚未动手,主动撤回处境危险的先头部队,但遭到希特勒的一口回绝。结果波兰的防线在苏军的攻击下顷刻瓦解。苏军势不可挡,深入德国境内,一口气进抵奥得河(Oder)。这时苏军供给不继,侧翼暴露,正是德军抓紧反击的好时机。这时希特勒虽然同意将第六装甲师调离西线,但他并没有派该部队投入东线的反攻,而让它前往布达佩斯解围,结果再次失败。此时此刻,希特勒已经远离现实,沉迷于梦呓之中。

走投无路的古德里安只能盯着另外几个纳粹头目,催促他们尽快求和。这些举动很快就传入希特勒的耳朵。3月,古德里安被撤职,此时离第三帝国最终崩溃恰好还有一个月。

## 曼 斯 坦 因

德国将领中最能干或许要数陆军元帅埃里希·冯·曼斯坦因(Erich von Manstein)了。从伦德施泰特到其他各级军官在与我谈论二战时,几乎无不异口同声对曼斯坦因作如此高的评价。曼斯坦因足智多谋,战略思想高人一筹。他不属于坦克学派,但他对坦克战的理解远远超过其他非坦克派的将领。与那些单向思维的人不同,他重视坦克攻坚战,也没有忽视其他常规武器的改进和防守战的重要性。战前,他负责研发重机枪,后来在实战中作用极大。

曼斯坦因出身于列维斯基家族,从小就被曼斯坦因家族收养。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前不久,曼斯坦因曾在步兵部队服役,当时他还太年轻,不能进入参谋学院。但他在冯·洛斯堡(von Lossberg)将军麾下当参谋时工作出色。洛斯堡在1917年创建了新的纵深防御体系。到1935年,曼斯坦因已经成为总参谋部作战科主任,次年成为总参谋长贝克的副官。1938年2月,弗里奇被撤职,曼斯坦因也被调离陆总,这是纳粹为了清除与最高统帅部抗衡的势力。曼斯坦因被派到西里西亚(Silesia)当师长。1939年,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的前夜,他被任命为伦德施泰特军团的参谋长,该军团在波兰战役中立下头功。此后,他就随着伦德施泰特一起来到西线。

以坦克突破阿登高原一举打败法国的主意就出自曼斯坦因,他是西线德军的主要智囊。但为了使自己的建议得到认可,曼斯坦因也付出了相当的代



价。最高军事当局认为他冲劲太足，他受到排挤，在1940年1月底被调离去指挥第三十八步兵团。他想为部队配备装甲兵团的要求遭到拒绝，理由是他缺乏这方面的经验。后来希特勒召见他，他抓住机会向希特勒陈述自己的看法，得到希特勒的首肯，一周后，陆总才修订了原计划。

在对法战役的第一阶段，曼斯坦因没法展示他的军事天才，因为他的部队只能给冲锋陷阵的装甲师殿后。但在第二阶段，沿索姆河一带进攻法国的新防线时，曼斯坦因的步兵团在亚眠一带的突击战中发挥了极大的作用。隆美尔的坦克首先突破，曼斯坦因指挥他的军团穷追猛打，用兵之神速不亚于机械化部队。6月10日那天，曼斯坦因的军团长驱40英里，最先到达并渡过塞纳河，然后便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直扑卢瓦尔河(Loire)。接下来所面临的的就是入侵英国了，分配给曼斯坦因兵团的任务是最吃重的先行登陆。

入侵苏联之前，曼斯坦因被派往指挥在东普鲁士的第五十六装甲军团。他就在那里率领部队突破苏军防线，在四天之内长途奔袭近200公里，占领通往德维纳河(Dvina)的大桥，以极快的速度到达德维纳河。他原本希望乘势向列宁格勒或莫斯科进发，但上级没有同意，反而命令他原地待命整整一周，直到其他装甲部队和第十六军抵达该地。这样一拖，苏军就有了足够的时间调集增援部队，等到7月15日，曼斯坦因率军赶到离列宁格勒不远的伊尔门湖(Lake Ilmen)，便受到俄军的阻击。9月，曼斯坦因被派往南部指挥第十一军团。他率领该部一举突破佩雷普地峡(Perekop Isthmus)狭窄且有重兵驻扎的防线，打开了通往克里米亚(Crimea)的门户，此战显示了曼斯坦因对攻坚战术运用自如的本领。

那年冬季，德军在通往莫斯科的路上为泥泞和大雪所困，希特勒将勃劳契克当做替罪羊，解除了他的职务。不少年轻的德国将领希望曼斯坦因能出任陆军总司令，但希特勒想大权独揽。希特勒曾打算让曼斯坦因当总参谋长，但感到他可能比哈尔德更难对付而作罢。

1942年夏，曼斯坦因负责进攻远近闻名的塞瓦斯托波尔(Sevastopol)要塞，此战是主攻的前奏。曼斯坦因出手不凡，一举成功，使苏方丧失了黑海最主要的海军基地。后来又任命他指挥进攻列宁格勒，由于目标的改变，他的部队往往从一个侧翼调向另一个侧翼。曼斯坦因擅长围城攻坚，看来这一特长反而限制了他在其他方面的发挥。

然而这次任务并没能如愿完成，因为等到他的部队向列宁格勒汇集时，又接到命令要去进攻斯大林格勒。希特勒军队在斯大林格勒遇到了困境，不久



僵局恶化为危机，德军被包围了。曼斯坦因临危受命，仓促组成一支临时部队，号称“顿河军团”，前往救援。

但是为时已晚，经过几番最为残酷的肉搏战后，德军还是失败了。在接下来的撤退中，曼斯坦因收拾残部，重整旗鼓，组成一道坚强的防线，阻止了苏军渡过第聂伯河。漂亮的反击战将苏军打得节节后退，1943年3月，曼斯坦因重新占领哈尔科夫（Kharkov）。此时，曼斯坦因指挥的是“南路”军团。那年夏季，在与克卢格的“中心”军团会合后，曼斯坦因在东线发起了德军的最后一次进攻。

曼斯坦因提出两套方案。一是在苏军尚未准备好的时候，在5月先向库尔斯克（Kursk）突出地带发起钳形攻势，打苏军措手不及。另一个方案是先按兵不动，等到苏军进攻时佯败后退，然后在基辅一带从侧翼包抄进攻。希特勒不敢冒险，否定了后一个方案，他对如此大胆的战略布局不无畏惧。希特勒采用前一个方案，却又迟迟不发动进攻，要等到准备充分才有所行动。结果一直拖到7月，这样一拖对苏军更为有利。进攻开始后，虽然曼斯坦因指挥的南路军长驱直入，北路军却遭到苏方坚强的抵抗，苏军从其侧翼打破缺口，进而演变成全面的防守反击，此时德军已经无力抵抗。

在危急之际，曼斯坦因显示了其不同凡响的军事才华。他指挥部队逐步退守波兰一线。他提出采取长距离后撤以摆脱苏军的压力，但希特勒置之不理。曼斯坦因一再坚持自己的观点，这使希特勒感到十分恼怒，干脆在1944年3月将他免职。既然认为步步为营的防守策略此时比机动作战的能力更为重要，希特勒便转而起用莫德尔（model）。他和希姆莱对曼斯坦因政治上的不信任才是其被罢免的深层原因。在战场上让盟军最为头痛的对手就这样结束了他的军事生涯，他善于将现代机动战的观念与经典的战略战术融为一体，他足智多谋、用兵如神，堪称一代军事大师。

布卢门特里特将军（Blumentritt）对曼斯坦因被免职深感遗憾，他对我说：“曼斯坦因不仅是一代德国将领中最出色的战略家，他还具有极强的政治敏感性。具有这种素质的人不可能为希特勒所长期容忍。他经常在讨论会上当着众人的面与希特勒唱反调，甚至胆敢声称希特勒的某些主张简直是胡说八道。”

## 克 卢 格

就在几个月前，克卢格将军在一次空难中受伤，这使希特勒一时失去了一



员悍将。1944年夏,克卢格康复后,希特勒早已虚位以待,他让克卢格取代伦德施泰特出任西线总司令。自从1939年发动战争以来,至今仍能与希特勒共事的司令员中,陆军元帅克卢格或许是唯一的幸存者。在波兰战役、法国战役和1941年的俄国战役中,克卢格指挥第四军。在波兰战役和俄国战役时,克卢格的军队隶属于博克的集团军。虽然他不像希特勒和博克那么乐观,他们还是将主攻莫斯科的任务委派给他。与博克打交道很难,克卢格个性颇强,但能够长期在博克麾下服役足见他有极强的忍耐力。除了一些过于敏感的问题,克卢格还是敢于向希特勒直陈己见。博克在1942年被解职后,克卢格出任中路集团军总司令。他创建了交织防御体系,在接下来的两年内,几度成功抵御了苏军的不断进攻。

伦德施泰特和隆美尔无法满足希特勒的奢望,并向他挑明颓势难挽,这使希特勒大为恼怒。此时,克卢格以他的成功抵抗加上忍耐力和忠诚自然更能得到希特勒的垂青。克卢格履职之时,盟军的大部队正如潮涌来,诺曼底桥头堡阵地得到大大扩展,已经形成摧枯拉朽之势。三周后,巴顿将军指挥美国第三军发起进攻,德军西边的防线顷刻土崩瓦解。但希特勒仍然不准德军后撤。

克卢格过于唯命是从,不敢越雷池一步。8月6日,他企图在曾被巴顿部队突破的阿夫朗什(Avranches)瓶颈地带发起反攻。这一招也够精明的,如果德军的装甲师还像以前那么拥有强大的坦克的话,本可给盟军以致命的一击。无奈此时的德军已经装备不整,即使在被盟军的空袭摧毁之前,胜利的希望就已十分渺茫。更糟的是,当德军的孤注一掷已经显然无望时,希特勒还是不准突围撤兵。其实撤退势在必行,而且也已经太晚了。此战以德军在法国的全面崩溃而告终。面对败局,希特勒将克卢格撤职,由陆军元帅莫德尔取而代之。

克卢格平静地接受撤职,他花了一天半时间向后任办妥移交,然后悄悄地驱车回家,在路上吞下了带毒的胶囊。克卢格的自尽并不是因为他对军人生涯的如此下场感到屈辱,而是他预感到自己一到家门就会被纳粹逮捕。早在1942年,他就与密谋推翻希特勒的人士有过密切来往,并对他们的行为不无同情。这些人准备在1944年7月20日发动政变。鉴于他的性格,克卢格并没有投身于反希特勒的活动,但他明白密谋失败后进行的调查中,自己的名字也曾出现在有关文件上。



## 莫 德 尔

陆军元帅莫德尔时年 54,比大多数德国高级将领年轻 10 岁左右,德国高级将领的平均年龄要比他们的对手高出好多。同时,他与大多数高级将领也不是同一社会阶层。虽然他得益于更扎实的军方背景,但在其他方面与隆美尔将军有很多共同的地方。希特勒政权开始大肆扩军时,莫德尔在勃劳契克的国防部培训处任职,与那里的纳粹头目建立了紧密的关系。戈培尔对他印象很好,将他推荐给希特勒。后来他负责技术发明处的工作,尽管他专业知识有限,但他精力充沛,富于想象力。他的激情虽然也曾浪费在一些无用功上,但毕竟也促进了一些新装备的研发。

在波兰战役时,莫德尔曾在第四集团军担任参谋长,在法国战役时,他是第十六集团军的参谋长,后来被任命为第三装甲师的司令。入侵俄国时,他率部猛攻,直逼第聂伯河,立下赫赫战功。这种非凡的干劲使他平步青云,先是被提拔为装甲集团军司令,到冬季又被任命为第九集团军总指挥。面对恶劣的形势,他表现出出色的防御能力。

1943 年,莫德尔在夏季攻势中担当主角,作为钳形攻势的北路主攻库尔斯克突出地带。与克卢格和曼斯坦因的意见相反,莫德尔说服希特勒延期进攻以蓄备更多的坦克和军力,以致坐失良机。延迟的结果是俄方得到充分时间备战,在他们坚韧的防守面前,莫德尔的进攻受到重挫。不过,在俄军反攻的时候,莫德尔临危不乱,总算力挽狂澜,止住了敌人的攻势。10 月,他被提拔为“北方”集团军总司令。1944 年 4 月,又被派去指挥“南方”集团军,以取代曼斯坦因。他率军挡住了俄军向喀尔巴阡山脉关隘的进攻。6 月下旬,俄军发起夏季攻势,德国的中路军迅速瓦解。莫德尔前往收拾残局,他刚在维斯瓦河一线挡住了苏军的进攻,便因战事吃紧被调到西线去救急。

6 月 20 日反希特勒密谋失败后,莫德尔率先从东线发来电报表示效忠,成为向元首重表忠心的第一人。希特勒本来对他的军事才干颇为器重,这一来就对莫德尔更加信任了。不过莫德尔也会无视希特勒的指令,按照自己的判断行事,敢这样做的德国将领屈指可数。

我曾与莫德尔的一些部下交谈,他们都承认他有出色的指挥能力,但同时也都强调,无论是作为上级还是下级,莫德尔都是一个难于对付的人物。曼陀菲尔将军曾对我说:“莫德尔是个优秀的战术家,尤其长于防守。他的独到之





处在于能精准地预测部队应该何去何从。他作风粗暴,他的策略也常常不为军方高层所接受,但希特勒就是喜欢他,几乎没人敢像他那样与希特勒唱反调。”

在西方盟国看来,主要就是因为莫德尔的作用,才使盟军在 1944 年秋获得全面胜利的预计没能成为现实。莫德尔再次展示了他非凡的能力,他竭尽全力从各个角落收罗德国的后援力量,重整残兵败将,进行顽强的抵抗。虽然后来“为德国而战”的战役是由伦德施泰特指挥的,在 12 月德国阿登高原反攻时,莫德尔还是充当了主角。在德国行将失败之时,希特勒召回了“老卫兵”。



## 第八章 “老卫兵”——伦德施泰特

希特勒对将帅的任免可谓周而复始。希特勒急于恢复士气，不得不请老将伦德施泰特再度出山。伦德施泰特比任何人都更能代表德国军界的传统——忠于职守、政治保守、军事事业至上、对军事一知半解的外行如希特勒之类不无鄙视。而且格尔德·冯·伦德施泰特的骨子里都渗透着绅士精神。他举止高雅、彬彬有礼，连那些与他观点相左的对立派也对他尊敬有加。一个十足的贵族，他自然对魏玛共和国的民主感到格格不入，但他对纳粹的勾当更为鄙夷。

如今伦德施泰特将军已年近 70，与战前当总司令的兴登堡年龄相差无几。年高望重的他自然也像当年的兴登堡一样成为民族的偶像。但作为一个军人，他的造诣更高一筹，他的才干也超过兴登堡，甚至可以说将兴登堡和鲁登道夫俩人加在一起都及不上他。他的脸容和身材也和他们迥然不同。他的脸庞棱角分明却不失优雅，身材修长，表情内敛，似在沉思。当然他的所思所想无非是军事事务。他忠于军队，忠于国家，这种责任感压倒一切，使他不得不忍受那些他本当唾弃的行为。这正是他内心冲突的根源所在，这种矛盾既反映在他的军事生涯中，也反映在这位军方泰斗的面容上。他鄙视政治，但政治却不断地强行骚扰着他的清高。

经过一次接一次的提拔，到 1932 年伦德施泰特位至第一集团军总司令，驻守柏林。上任伊始，他便不自觉地沾染上了政治的臭味。新总理弗朗茨·冯·巴本(Papen, Franz von)命令他派兵将拒绝离开办公室的普鲁士社会民主党的头目赶走。后来巴本弄巧成拙，被库特·冯·施莱歇(Schleicher, Kurt von)将军取代。施莱歇没能为保持总理的地位而得到足够的支持，这反而为希特勒的篡位打开了方便之门，希特勒废止了除纳粹外的一切政党。伦德施泰特并不乐意看到事态如此演变，他对纳粹头目的社会理想和举止相当反感，不过他对纳粹的大肆扩军颇感满意，对于 1934 年 6 月 30 日对冲锋队的清洗



更是大为赞许。以他那单纯的军人眼光看来,将那些觊觎军权的家伙逐出部队是一个健康的迹象,从此军队便可以摆脱他所谓的“褐衫垃圾”的威胁。

这样一来伦德施泰特就可以全心全意投身军队的发展,在军事领域,他最关心的是通过装备的更新和严格的训练来提升士气,重振步兵的军威。与此同时,他也乐意接受有关机械化战争的新观念,对英国在这方面的理论和经验颇感兴趣。他不是机械化战争的狂热追捧者,并没有把坦克当做未来战争的主导者,而只是将坦克视为辅助手段,在老派人物中他属于比较开明的人士。

他认为与其创建完全的机械化部队不如加强现有的多重火力的摩托化程度,这样做更有价值。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机枪故障曾给步兵造成惨重的损失,他采取切实的措施解决了这个问题。伦德施泰特发起一场宣传运动,旨在克服步兵的自卑情结。不过,他毕竟是一个尊重科学的军人,不至于像某些英国将军那样顽固。1934年一些英国将领居然还异想天开地认为,只要时机合适,步兵师应当能够击溃装甲师,结果导致英国延迟了整整3年多,才组建第一支装甲师。伦德施泰特认为只要不影响重振步兵,在适当的范围内组建一定的装甲师是可行的。总之,伦德施泰特那派军人对装甲部队的宽容态度正好说明了为什么德军能在1940年大胜法国,他们眼光的局限也同样说明了为什么在1941年对苏战争中,德军因技术优势不足以致失败的原因。

1938年初,另一次政治动荡又让伦德施泰特难以专心致志地重整军队。希姆莱的阴谋为希特勒提供了逐走弗里奇将军的借口,布隆贝格将军成为全军统帅。伦德施泰特就此事向希特勒提出抗议,弗里奇虽然洗清了对他的道德指控,但他职位却已经为人取代。几个月后伦德施泰特批准了总参谋长贝克将军起草的备忘录,企图阻止希特勒战争冒险。但抗议的结果是贝克被迫辞职。在占领苏台德地区那年的秋天,伦德施泰特以年事已高为由申请退休,得到了批准。

1939年8月,伦德施泰特被召回军队,负责指挥波兰前线的战斗。很难解释他此次服从召回的举动,因为他长期以来一直坚持的一条主要原则就是:德国必须避免与英国再度开战。

或许是爱国主义促使他参与指挥这场战争,可他曾经预言这场战争会给德国造成致命的后果,可见爱国主义一说未必站得住脚。要解释其中的原因,我们需要理解军人以服从为天职,而伦德施泰特是在这种气氛中长大的。此外,还有一个心理因素便是,面对驰骋疆场的机会,任何一位血气方刚的军人都会忍不住跃跃欲试。



伦德施泰特确实抓住了这个机会,也充分展示了他的军事才华,他指挥的军团连续攻克了波兰和法国。辉煌的战果和胜利的喜悦并不能打消伦德施泰特心头的隐忧,1941年对苏战役中,伦德施泰特再次证明了他的将才,他指挥军队在南路横扫苏军,攻克了拥有富饶的矿藏和良田的乌克兰。但局部的胜利不等于全局的成功,无法取得全局的胜利也就预示着最终的灾难。伦德施泰特很快就明白他的隐忧即将成为现实,他不惜拂逆希特勒的意愿,进言反对进攻苏联。是年秋季在商讨是否继续向莫斯科进军时,伦德施泰特不仅主张停止前进,甚至建议撤回到原起点。这自然使元首更为不快。与此同时,伦德施泰特越来越难以忍受“下士”希特勒对具体战事的横加干涉。结果到9月底,伦德施泰特在给希特勒有关命令的回电中摊牌说,如果元首不信任他,不能让他按照自己的判断行事,那就另请高明罢了。希特勒也爽快地接受了他的辞呈。希特勒本来就因为胜利的日趋渺茫而心情烦躁,伦德施泰特的质疑和反对意见使他的神经更加紧张。

但是伦德施泰特并没有长期被弃置不用,1942年初,希特勒以对国家负责为由说服犹豫不决的伦德施泰特,让他指挥西线的战事。美国的参战致使美军可能最终从英国进入欧洲大陆,伦德施泰特对这种危险有着充分的认识,他在接下来的两年里着手准备应对,同时又忙于应付法国、荷兰、比利时、卢森堡等占领区的反抗运动。到1944年6月,美军进入的时机终于成熟了,本书前章对此事已有所概述。

在生死攸关的7月20日事件发生之时,伦德施泰特已经退休,所以当密谋者将希特勒已被刺杀的第一份电报送达东线和西线的高级司令部时,他不可能领导军队起而反对纳粹政权。当有关希特勒还活着的消息传来后,不管原来的动机如何,大多数军官都一下子泄气了,很难说伦德施泰特如果在场的话会采取何种态度。伦德施泰特没有参与密谋,这一点关系重大。

许多军人知道伦德施泰特对纳粹深恶痛绝,曾经指望他挺身而出领导他们推翻希特勒,但真正了解伦德施泰特的人从不抱这样的奢望。首先伦德施泰特是个坦坦荡荡的正人君子,视军人的荣誉为至高无上的准则,这样的人不适合参与需要精心设局的密谋。其次伦德施泰特德高望重,人们也不想让他卷入多少有损军人名誉的密谋,即使这种密谋有其正当的理由。此外,所有的德国将领无不受到纳粹特务的暗中监视,伦德施泰特声名显赫,对他的监视也更为严密。

当时有不少德国将领希望伦德施泰特能与英国和美国达成停战协议,或



至少允诺英美不遭到任何抵抗进入德国以阻止苏军的西进,但由于伦德施泰特在7月初的去职而落空。9月伦德施泰特被召回,这种希望一度重燃。与此同时,克卢格在7月20日也曾打算采取同样的行动,但是他犹豫不决,不敢贸然行动。其原因首先是如果这样做就等于违背了曾经作过的忠于希特勒的誓言。其次是因为德国人民一直受蒙蔽,不了解事态真相,他们不会支持这种行动。其三是东线的德军会抱怨自己被人出卖。其四是恐怕自己以叛国者的恶名遗臭史册。这些因素对伦德施泰特的约束力更是有过之而无不及,且不谈他在9月危机被召回时实际上也不可能自作主张与英美停战,因为他的一举一动都在纳粹特务的严密监控下。自己的判断和军人的职责使伦德施泰特的心理一直处于矛盾状态,加上希特勒不时的干预,在秋季的几个月,伦德施泰特实际上处于无能为力的处境,而盟军当时却还以为伦德施泰特在指挥西线的战事呢。

德军12月在阿登高原发动的所谓“伦德施泰特攻势”其实有名无实,伦德施泰特至多不过是一个持怀疑态度的旁观者而已。除了第五装甲军的司令曼陀菲尔提出过一些技术性的改进建议外,这次战役的目的以及时间和地点的选择均出自希特勒本人。具体实施的则是莫德尔和他的左右手曼陀菲尔辽第六装甲军司令泽普·迪特里希(Sepp Dietrich)。

10月底,希特勒将亲手制定的作战方案让伦德施泰特过目。这个方案的基本框架与1940年的杰构(masterpiece)大同小异。它设想让盟军在通过比利时平原前往亚琛(Aachen)和科隆(Cologne)的途中耗尽军力,此时德军便在阿登高原发起出其不意的反攻。事实再次证明,这一招算得很准。其主攻方向由第五第六装甲军团分头突进,冲破美军在阿登较为脆弱的防线,然后向北迂回通过默兹河,在安特卫普(Antwerp)会师。第六装甲军沿着环形的内弧运动穿过列日(Liege)。第五装甲军沿着环形的外环运动,穿过那慕(Namur)。第五装甲军从侧翼向列日北突破,帮助第六装甲军团的进攻。与此同时第七装甲军从侧翼掩护第五装甲军的北进。

希特勒指望通过这种镰刀形的攻势将蒙哥马利的二十一军团与它的大本营和美国盟军切开,即使不能对其全歼,至少也打它个荷兰的“敦刻尔克”。英国本土隔海难及,英国的军队则被希特勒选中为最后一掷的目标。但希特勒的将领们却无不认为这个方案野心太大,德军的实力已今非昔比。

知道当面直谏不可能为希特勒所接受,伦德施泰特、莫德尔和曼陀菲尔于是提出一个较为折中的方案,先吃掉亚琛附近默兹河东的美军先头部队。但



希特勒对目标有限的方案一概加以拒绝,他只是接受了曼陀菲尔对进攻时间和战术的一些建议。希特勒对劝他谨慎行事的话总是充耳不闻,他更乐意听从年轻将领的独到之见。曼陀菲尔的修正增加突然袭击的成功率,但并没能提高最终成功的几率。

这次进攻无异于赌博,而且是一场赔率极高的赌博。军方高层人物无不明白德国已经日暮途穷,它已经没有资源来保证哪怕是一场小规模胜利,除非运从天降或者盟军的指挥官都愚不可及。认识到这一点对发动进攻可不是什么有利的因素。结果在实战中德军的突然袭击使盟军阵脚大乱,一度处于危险的境地。无奈德军毕竟实力有限,甚至于都没法有效地组织在进攻中常见的阻截和转移。曼陀菲尔的部队几乎打到了默兹河,但是兵力更强、目标更近的泽普·迪特里希部队却很快就遭到了麻烦。面对盟军迅速有力的反击,尽管后备部队急忙赶去增援曼陀菲尔,却已为时过晚。这次进攻远未达到原定目的,反而使德国耗尽了事关存亡的后备力量,它再也没有能力进行长期的抵抗。

## 第二部分 走向战争







## 第九章 希特勒的崛起

希特勒是如何攫取权力的,虽然人们早已从各个角度对此事作过描述,但尚未有人从德国军方的角度对此事加以论述。曾有人指责德国军方高层人物怂恿支持希特勒篡权,但显然又几乎没有什么证据能证实这种指控。

希特勒上台后扩军备战,军方前景看好,武装部队的军官显然也是获益者。而且布隆贝格和其他将领也承认,希特勒政权使德国摆脱凡尔赛和约的桎梏,在一开始受到军方的欢迎。对于军人而言,当时他们采取这种态度是很自然的,虽然很多人后来为之悔恨不已。另一些军人具有远见卓识,他们从一开始就对此深感忧虑。他们认为这是一帮带领冲锋队的“业余分子”或“被部队开除的士兵”,他们的政党一旦掌权决不会容忍一向保守的军方继续保持已有的特权。

尽管有相当一部分军人对希特勒的上台表示欢迎,这并不等于他们曾经助纣为虐,甘当纳粹的工具,整个军方更不可能充当希特勒篡权的工具,除非当时的军方要员全由希特勒一手指定,否则是绝对行不通的。就这点而言,对军人的指责与基本事实背道而驰。在这个关键时期,军内的政治领导是施莱歇将军。他是巴本内阁时的国防部长。比他军职略低的是国防部参谋总长冯·布雷多(von Bredow)上校。陆军最高首长是哈默施泰因将军。

希特勒上台不久,哈默施泰因就被解除了陆军总司令的职务。在1934年6月30日血腥清洗行动中,施莱歇和布雷多惨遭谋杀。三人的被清除证明了其他军人所言属实,他们曾企图阻止纳粹夺取政权。

施莱歇的助手勒里希特将军曾给我讲述过这一非常时期以及后来一段时间内将领们与希特勒冲突的内情,他的所述与外界所传大相径庭。那几个星期所发生的事情对德国生死攸关,作为幸存下来为数不多的内幕人物之一,他的证词值得考虑。

勒里希特首先描述了施莱歇和哈默施泰因的个性,他说:“施莱歇将军虽



然与任何党派都没有瓜葛,但他对政治比军事更在行。他非常同情工会运动,工会人士也对他颇有好感,由于他倾向于社会改革,以致保守派将他视为异己。他身上没有丝毫‘容克贵族’的习气。他精明能干,热衷于政治,但缺乏在这非常时期所需要的政治家的手腕。”谈到哈默施泰因,勒里希特说:“他是个天才,极其聪明,有政治头脑。不过他是一个懒散的军人。他强烈反对国家社会主义,遵循施莱歇的政治路线。”

勒里希特的叙述如下:

## 事件的前前后后

在与国社党斗争的时期,巴本和施莱歇领导的政府于1932年10月解散了德国国会,并宣告辞职。尽管国社党在选举中显然丧失了不少席位,但无论是巴本还是分裂为左右两派的反对派都没能在国会形成令人信服的绝对多数。一开始总统有意让巴本重新组建政府,但是他们与所有由革命派形成的反对党的关系都非常紧张。1932年11月,柏林运输工人大罢工,共产党和国社党合作的趋势已经十分明显。当局认为此事非同小可。

基于情况紧急,当局决定在11月20日左右在国防部以及内务部举行会谈并拟定相应措施,以审视国家武装部队是否有能力镇压极左派和极右派发动的革命暴动。如果巴本新政府绝对依靠保守的右派德意志民族党以及右翼退伍军人组成的钢盔队,很可能发生暴动。

会议达成共识认为运输工人的总罢工将导致整个国家机构和军队的瘫痪,因为国防军的机械化程度还很低,其紧急部队尚不能有效地执行任务。施莱歇认为尽量不可造成军队向同胞开火的局面。他可不愿“动刀动枪”。

尽管有违他本人的意愿,施莱歇还是被暂时推上总理的位置,因为他在人们眼里只是中立的军人,不像被视为代表保守反动势力的巴本。两害相权取其轻,中央党和社会民主党都同意接受施莱歇为总理。国社党也表示默许,认为施莱歇很可能成为国社党上台的垫脚石。11月底对施莱歇的任命没有引起任何激烈的反响,为各派政党提供了一个喘息的空间。

施莱歇企图利用国社党在国会的派别之争来遏制其势头。形势也似乎颇为有利,当时国社党员正为选举的受挫而深感失望,又为党内的财政困难而焦虑不安。施莱歇先游说格雷戈尔·施特拉塞尔(Strasser, Gregor)和其他80位国会议员,国会因此而延期开张。



前景似乎尚乐观,12月初德国取得一项外交成就,(可能是在德国国内的强大压力下)国际裁军会议作出让步,同意德国在原则上享有同等的军事权利。

但由于施莱歇打算进行深入的社会改革,从一开始他就遭到保守派德国民族人民党(Deutsch-Nationale)的激烈反对。于是施莱歇威胁要揭发东部救济基金分配使用的黑幕。总统兴登堡年事已迈,昏头昏脑,深受其保守党朋友的影响。这些人攻击施莱歇亲布尔什维克,传播谣言声称施莱歇企图篡军夺权。与此同时,巴本也开始蠢蠢欲动,与希特勒暗中勾结,妄图依靠国社党使自己重返权力中心,结果是自欺欺人。

施莱歇中断了开始时前景看好的会谈,企图分裂国社党人,这造成了“兴登堡—施莱歇危机”。既没有总统的支持,在国会中又不占多数,施莱歇陷入了困境。1月26日,也可能是27日,陆军总司令哈默施泰因试图说服总统,遭到兴登堡的严词拒绝。1月29日,施莱歇辞职,1月30日,希特勒被任命为德国总理。

施莱歇这位唯一由军方出身的总理就这样倒台了。1934年6月30日,施莱歇将军被纳粹特务在第一时间枪杀,同时被杀的还有布雷多上校(徒有虚名的政治家)和施特拉塞尔。

德国军方以前一直是政府最终起决定作用的工具,随着希特勒的上台,这种特权已经不复存在。100 000左右的军方人员被派往遍布全国的各个小型的单位,国社党控制了全部国家机器。所有的交通工具、公共联络方式、公用事业、街头舆论和大部分工人阶级都被国社党所掌控。军队已经失去了昔日举足轻重的地位。

纵观这一系列事件和史实,我敢斗胆说控告德国军方支持希特勒篡夺政权是个历史冤案,事实恰恰相反。

在这个问题上,我想探讨一下德国军队是否有可能公开起兵反对希特勒。

在纳粹国社党上台前后的非常时期,施莱歇和哈默施泰因周围的亲信也曾考虑过发动兵变的可能性,但因为估计没什么成功的希望而作罢。

客观原因不一而足。首先希特勒是作为最强大的政党领袖由总统根据宪法任命为总理的,走的是完全合法的程序。若要发动兵变,就得由施莱歇将军和哈默施泰因将军向部队发布命令,但俩人的军衔、名望都不够高,如果由他们挑头,不仅要反对希特勒—巴本—胡根贝格(一译胡根堡, Hugenberg, Alfred)内阁,还得反对德高望重的全军最高统帅总统兴登堡。其次与共产党联



盟是不可能的,与其他党派也没法仓促结盟。宣誓过忠于兴登堡的军队不会服从施莱歇和哈默施泰因的命令。而且此时力量对比更不如11月。最终他们还犯了严重的错误导致了一系列不幸的后果。

## 兴登堡去世前的时期

(从1933年1月到1934年8月)

横扫一切的革命行动导致了一系列的政治事件,德国的政治格局为之改观,德国军队却始终袖手旁观。军方就像一座孤岛,希特勒对它无可奈何,军队听命于兴登堡,可兴登堡已是老朽一个。兴登堡命令由弗里奇取代哈默施泰因。

## 新 人

1933年1月,布隆贝格被任命为国防部长。此前他一直作为德国代表出席日内瓦裁军会议,与希特勒素昧平生。布隆贝格是个有天赋的军人,他受过良好的教育,视野开阔,兴趣广泛。但是他个性不强,易受他人的影响。

赖歇瑙是国防军首领。他个性很强,极有进取心,注重实干,行事不多加思索,爱凭直觉。虽然他极有抱负,聪明能干,文化程度很高,还会吟诗弄文,但是体魄强健,就像一个运动员。多年来,他与希特勒过往甚密,自认为效忠于希特勒本人,而不是效忠于党派。

维尔纳·冯·弗里奇将军(后来成为陆军总司令)是个优秀的军人,但他的思想拘泥于军事领域。他是个纯粹的绅士,而且笃信宗教。

布隆贝格和赖歇瑙的任务是确保陆军在新政府中地位,他们一向认为陆军为国之栋梁是不容置疑的既成事实,他们还有一个任务是清除国社党中的革命分子,恢复正常的公共生活。

革命的冲锋队从一开始就是陆军的对头,他们当时的势力足以左右群众和国社党。冲锋队声称要按照他们的等级在新政府中重组军队。陆军决心为自己在新政府的地位进行斗争。尽管冲锋队曾经充当希特勒的禁卫队,扶植他上台,但免死狗烹,同任何独裁者一样,希特勒也不得不除掉这帮无法无天的家伙。希特勒站在陆军一边,在1934年6月30日血腥镇压了冲锋队(罗姆暴动,又称长刀之夜。德国纳粹党内针对冲锋队上层领导人的大屠杀——编者注),而且希特勒并没有动用正规军队的一兵一卒。



军方将6月30日的血腥镇压视为成功的一着,尽管不无过分之处(如谋杀施莱歇将军等人)。然而事实证明,对军方而言,这不过是一次得不偿失的皮鲁斯式(Pyrrhic Victory,比喻付出极大代价而获得的胜利——编者注)的胜利。从那天起,武装党卫队(Waffen-S. S.)迅速崛起,它对陆军构成的威胁远远超过冲锋队。

兴登堡死后,希特勒宣称自己为国家元首和所谓的武装部队总司令。

重整军备一开始的本意是要与邻国平起平坐,而此时已成为当务之急,同时也改变了军队力量在国家政治中的格局。每一个阶段重整军备的结果表明正规陆军众所公认的牢固地位受到削弱。4 000名职业军官原本是渐渐扩充的军队的核心,也是德国空军的骨干力量。如今来自各种职业和阶层的人士都进入了军官圈子,这些人往往拥护纳粹的政治观念,其中的年轻人思想尤其激进。军官团体的面目已今非昔比,国社党人在陆军中势力日盛。用不了多久,就没人能够指望军人能团结一致了。

重新启用义务征兵制后,陆军就失去了它在国内争斗中原有的作用,空军的组建进一步削弱了陆军的地位,从一开始空军就是以国社党的原则为指导的。让空军统领高射炮部队也是有意为之。这个决定旨在剥夺陆军的防空力量,陆军在国内争斗中的作用日趋式微。

尽管如此,当布隆贝格被撤职,1938年1月和2月又为所谓的弗里奇将军同性恋事件产生激烈冲突时,军方也曾再度考虑起兵推翻希特勒。希特勒取代布隆贝格,亲自担任武装部队总司令,让凯特尔(赖歇瑙的后任)留任,而凯特尔充其量不过是个唯命是从的首席办事员。

如此杰出的弗里奇将军居然遭到令人难以置信的不公正待遇,这使军界高层为之震怒。<sup>①</sup>其实早就有人在搅动开水壶了,卡尔·格德勒(Goerdeler, Carl)和沙赫特(Schacht, Hjalmar)等人组成的秘密组织主张“全力以赴”推翻希特勒。然而,将领们在关键时刻却做不到同仇敌忾,自泽克特将军以来,军方从来就没能做到步调一致。他们缺乏调动部队进行起义的权力机构,他们缺乏愿意采取行动接管政权的政治领袖,起义始终没能付诸实施。另一方面,希特勒早就在军队高层中“掺沙子”,在军方领导人中进行分裂活动,使军队丧失主心骨。将领们各有各的小算盘,再也不可能指望陆军同心同德采取共同的政治行动。

<sup>①</sup> 然而德国国内的反对派曾抱怨道,将领们的错误在于他们的愤怒如煮而不沸的温水。

## 第十章 装甲部队的崛起

希特勒的崛起改写了欧洲地图,速度之快,连拿破仑也难以望其项背。然而正是由于德军装甲部队的崛起才使希特勒得以一度所向披靡。若无装甲部队,希特勒的梦想难以成真。装甲部队才是他制胜的王牌,其作用远远大于德国空军和各国的叛国者。装甲部队速战速决,横扫千军如卷席,非其他手段所能比肩。希特勒有远见,支持发展装甲部队,然而他也没能倾其全力支持装甲部队,并最终为此付出沉重的代价。

“坦克”的故事是由托马将军在1945年告诉我的,他也是德军第一代坦克战指挥员中的佼佼者,其声望仅次于古德里安(当时古德里安是美军战俘,本书初版问世后我才得到古德里安的口述,现将他与托马所述相应的部分用括号插入)。托马将军为人强悍,却也不无和蔼可亲之处。他生性好战,堂堂正正,尊重有水平的对手,在一个坦克称雄的时代,像他这样富于激情的军人可谓生得其时。如果在中世纪,他肯定是个快乐的骑士,跃马横矛在十字路口,为了荣誉向南来北往的过客挑战。坦克的问世犹如上帝赐予他的礼物,使他可以重温盔甲骑士的旧梦。

他向我讲述了自从希特勒使德国摆脱凡尔赛和约束缚后德国装甲部队的发展概况。“多年来德国只能拿一些模拟坦克来进行演练,1934年当德国拥有自己真正的坦克兵时,我们感到无比惊喜。此前我们只能在苏联政府的协调下,在苏联的实验基地进行一些实战演习。基地靠近喀山(Kazan),主要在那里研究一些坦克战术问题。但到1934年,我们在奥尔德鲁夫(Ohrdruf)成立了第一支坦克营,名为‘摩托教导突击队’。由我负责该支部队,它是德国所有装甲部队的先驱。”

“后来又又在佐森(Zossen)组建了两个坦克营,我的那支部队也扩充为由两个营组成的团。这些部队的武器是根据工厂的产品逐步配备的。最早的是空气冷却的克虏伯Pz 1型坦克,它仅配备两支机枪。第二年来了Pz 2型,换成





了水冷式发动机,配备 20 mm 机枪。1937 年到 1938 年,来了 Pz3 型和 Pz5 型,这些坦克又大又好。与此同时,我们的组织也在发展。1935 年,组建了两个坦克纵队,每个纵队下辖两个新成立的装甲师。德国坦克部队的军官都遵循英国坦克战战术观念,尤其推崇你和富勒将军的坦克战思想(李德·哈特和富勒一起被认为是“现代装甲战之父”——编者注)。他们对英国最先组建的坦克旅的开创性行为极感兴趣。”英国坦克旅组建于 1931 年,当时还处于试验性质,其指挥官是布罗德(Broad)上校(现已晋升为将军),1934 年坦克旅成为永久性编制,当时的指挥官为旅长霍巴特(现已晋升为将军)。

我问他是否如通常所报道的那样,德国的坦克战术还受到戴高乐将军(General de Gaulle)那本有名的著作的影响(指戴高乐 1934 年发表的《未来的军队》一书。书中预见到装甲部队在新的世界战争中的重要作用,主张改造法国军队体制——编者注)。他的回答是:“不,当时那本书还没受到多大的注意,我们认为里面的主张有点想入非非。它缺乏足够的战术指导,过于虚幻,不切实际。而且这本书问世之前,英国人已经阐明了坦克战的可行性。”(古德里安说:“托马的叙述是正确的。我是在 1937 年才读到戴高乐将军的《未来的军队》的德译本,那时德国的装甲部队早已组建成功,戴高乐的书对德国装甲部队的发展没有什么影响。我读那本书也是出于兴趣和好奇,想知道法国人是否接受戴高乐的观点,有幸的是他们并没有。”)

托马继续说:“你可能会感到吃惊,像在英国一样,装甲部队的发展在德国也遭到高级将领的抵制。这些老家伙唯恐装甲部队迅速发展,因为他们对坦克战术一窍不通,对这种新式武器不无反感。至多他们也就是抱着怀疑和谨慎的态度对坦克略表兴趣而已。若不是他们的这种态度,德国的装甲部队将发展得更快更好。”

西班牙内战爆发时,托马受命带领一个德国坦克营到那里。“当时看来西班牙似乎可以成为‘欧洲的演兵场’。内战时期我负责指挥德国在西班牙的地面部队。媒体夸大了德军的人数,其实在那里的德国军队从来没超过 600 人。”(空军和文职人员未包括在内)“德军的任务是训练佛朗哥的坦克部队,同时也可以积累实战经验。”虽然德国陆军领导层反对直接干涉,但面对实战机会,托马这样的军人是不会满足于顾问的角色。瓦尔利蒙特(Warlimont)将军在 8 月作为德国军事特使被派往西班牙辅佐佛朗哥将军,他说过“托马将军自始至终是德国地面部队在西班牙内战中所有军事行动的灵魂和核心”。

托马继续说:“我们对佛朗哥的援助主要是武器装备,如飞机和坦克。开



始时他只有一些陈旧的武器。9月,第一批德国坦克到达西班牙。10月,又送去了一大批坦克,那些全是 Pz1 型坦克。”

苏军的坦克早在7月底就到达西班牙敌方阵营,他们的坦克装备更好,我们的坦克仅配备了机关枪。我开出重赏,每俘获一辆苏军坦克奖励500比塞塔(西班牙货币)。我当然乐意将这些为我军所用。沼泽地给部队的行动带来诸多不便。你听了肯定会有兴趣,我的对手正是科涅夫(Koniev, Ivan)元帅。

我精心组织了赴西班牙的人选,这些精干的德国军人可以训练大批的西班牙坦克兵。西班牙人学得快,忘得也快。到1938年,我手下已有4个坦克营,三个连组成一个营,一个连配备15辆坦克。有4个连配备苏式坦克。我还有30个反坦克连,每连配备6门37毫米的反坦克炮。

就像所有的老派将领一样,佛朗哥将军也曾想把这些坦克分派到各个步兵师,我一直坚持与他这种想法抗争,努力将坦克集中起来使用,佛朗哥的成功很大程度上就取决于这一着。

西班牙内战结束后,我于1939年6月回到德国,将自己的经验和教训整理成文。不久我被派去指挥在奥地利的坦克团。此前我曾受命要去指挥一个坦克旅,但我提出由于自己长期在国外,希望能先到一个坦克团工作,以熟悉国内德军的情况。勃劳希契将军同意了我的请求。但是为了波兰战役,在8月我就被派去指挥第二装甲师下属的一个坦克旅。

第二装甲师下属李斯特(List, Sigmund Willhem)将军的军队,驻扎在喀尔巴阡山脉的另一边,位于德军南翼的尽头。我受命向亚布伦卡关隘(Jablunka Pass)进军,但又有建议动用摩托旅。我带领坦克旅从侧翼穿过茂密的森林,翻过大山,到一片山谷中的村庄,发现村里的人都上教堂去了。当他们看到坦克出现在教堂门口时别提有多吃惊了。一个晚上急行50英里,没有损失一辆坦克,就这样穿越了敌军的防线。

波兰战役之后,我进入总参谋部,被提升为机动部队的参谋长。机动部队包括坦克部队、机械化部队、当时仅存的一个骑兵师和摩托车队。在波兰战役,我们有6个重型装甲师、4个轻型装甲师。每个重型装甲师下辖一个坦克旅,每个旅由两个团组成,每个团由两个营组成。起初一个团约有125辆坦克。在计算平均战斗力时,根据经验,战斗开始几天后,坦克总数就得减少四分之一,因为有些需要维修。



托马解释他所谓的战斗力仅包括在连队实际参战的坦克数量,如果包括用于侦察的轻型坦克,总数应为 160 辆。

轻型装甲师还处于实验阶段,其战斗力也各不相同。但其编制基本上下辖两个机动步兵团(每个团由三个营组成)和一个坦克营,此外与重型装甲师一样,轻型装甲师也还有一个装甲侦察营和一个摩托营,以及一个炮兵营。

波兰战役以后,我们就终止了这种实验,轻型装甲师全部改编为装甲师。到 1940 年发动西线攻势时,我们已经有 10 个装备齐全的装甲师。至那时中型坦克的比例也有所增加,即便如此,还是有不少轻型坦克。

托马透露了一个令人吃惊的事实,他说进攻时,德国总共才有 2 400 辆坦克,而不是像法国一开始所报道的有 6 000 辆。托马没算轻型坦克的数量,他说那不过是一些“沙丁鱼罐头”。“法国的坦克质量比我们的好,数量也胜过德国,但是他们行动的速度太慢。正是依靠速度,出其不意的速度,我们才战胜了法国。”(古德里安说:“法国的坦克在装甲、火炮和数量上超过德国,但在速度、无线电通信和指挥能力上不如我们。在重要的战区集中所有的装甲部队,速战速决以及发挥各级军官的主观能动性,这正是我们在 1940 年致胜的主要因素。”曼陀菲尔评论道:“在和平时期,我们都低估了坦克在战场上的速度。坦克速度的快慢要比装甲钢板的厚薄更为重要。”)

在谈到坦克的不同型号和质量的优劣时,托马说,如果要让他在“钢板厚”和“跑得快”之间作出选择,他肯定会选择后者。也就是说他更看重速度,他从实战经验中得出结论,总而言之,速度才是最令人称心的素质。他继续说,他认为最理想的坦克团应由三分之二的速度较快的大型坦克和三分之一速度极快的轻型坦克组成。

谈到 1940 年的攻势,托马说:“全体坦克军官希望由古德里安来负责装甲部队,指挥突破阿登高原的战斗。克莱斯特不像古德里安那样对坦克战有深刻的理解,他过去曾是反对发展坦克的主要人物之一。任命一个对坦克战持怀疑态度(即便怀疑的程度有所改变)的人为坦克战的最高指挥,这就是德国陆军当时典型的行事方式。无独有偶,在你们英国情况也如出一辙。人们认为古德里安个性太强,而只有希特勒拥有最后决定权,他批准了对克莱斯特的任命。不过,还是让古德里安来负责突破,他就按照在 1937 年陆军大演习时



所做的那样付诸实战。突破敌军防线后，古德里安率领军队直扑英吉利海峡。他全力以赴，以‘不顾一切’的姿态乘胜追击。这种突破方式堪称绝杀，它让法国根本没有时间集结兵力。”

“德国陆军经常有人说古德里安脾气暴躁，就像一头好斗的公牛。<sup>①</sup>我不同意那种说法。1941年我在斯摩棱斯克(Smolensk)服役时曾与他打过交道。当时敌方的防守十分顽强，在那样困难的格局下，古德里安将军并没有蛮干，而是心细如发以智取胜。”

我问托马，在二战初期德军装甲部队所向披靡的主要原因是什么。他列举了五个主要因素：

1. 在轰炸机的配合下，集中兵力攻其一点，突破深入。
2. 乘胜前进，通宵急行。常能做到出其不意、深入敌后。
3. 充分利用敌方反坦克力量的不足和我方的空中优势。
4. 装甲师备有的汽油足够坦克长驱 150—200 公里。如果先头部队急需汽油，就用飞机空投油箱。
5. 坦克备有足够三天的给养，装甲团备有三天以上的给养，装甲师备有三天以上的给养。

托马举了一些装甲部队长途奔袭的战例。他说波兰战役德军花了 7 天时间从波兰南部的上西里西亚进军到华沙，包括作战，日均行程约 30 英里。在法国战役的第二阶段，从马恩河(Marne)到里昂(Lyon)的进军速度也是如此。1941年俄罗斯战役，从洛斯劳尔(Rosslaw)到基辅以东，20天内日均行程 15 英里。期间从格鲁考夫(Glukov)到奥廖尔(Orel)的突袭，3天内每天要跑 40 英里。最高纪录是一天行军 60 英里。[古德里安曾给我演示他的装甲军团入侵俄罗斯的行军路线。进军的速度甚至比托马所说的还要快。古德里安的一支先行装甲师第一天就奔袭 50 英里。从前线到明斯克(Minsk)有 210 英里，他们花了 6 天时间就到达了目的地。其中有一天就行军 50 英里。]

托马强调了装甲部队指挥员身临一线的重要性，要“身处坦克群之中”，

---

<sup>①</sup> 我注意到有些德国高级将领在批评那些胆大出奇的军官时常用“公牛”一词来形容，因为那些军人作战不像老将军那样有板有眼循规蹈矩。其实“公牛”应该指面对坚固的防守死拼硬打的军官，而不是那些凭借胆略和速度来取胜的军人。



要像过去的骑兵将领那样在“在马鞍上发号施令”。“指挥员要深入战场来制定战术,他必须亲临现场。行政事务可以交付给参谋长。”

托马谈到了俄罗斯战役开始前德国对装甲部队的重组,他明确地表示这是一步极大的败着。“从每个装甲师抽调了两个坦克团,以便组成新的坦克师,让坦克师的总数达到 20 个之多。我不同意这个决定,向希特勒表示了自己的异议,因为希特勒对技术问题是比较关注的。”托马认为重组的最终结果将削弱德军的战斗力,因为那将增加参谋部的人员,还得配备相应后备部队,而装甲部队的攻击力却没有得到任何提升。“但是我没能说服希特勒,他热衷于装甲师数量上的壮大。装甲师在数量上的增加满足了他的妄想。(古德里安认为:“俄罗斯战役开始前,托马对德军重组的批评是完全正确的。装甲师的力量就在于坦克。我完全同意他的观点,我也赞成曼陀菲尔将军的一些观点,他是德军中最有进取心的坦克战将领之一。”)”

希特勒没有插手波兰战役,但公众对“他的谋略”的大肆吹捧,以及法国战役后这种吹捧的变本加厉使希特勒的脑袋大为膨胀。他对战略战术略知一二,但对如何具体实施却一窍不通。他常会有一些好点子,但往往像岩石一样顽固不化,结果那些好点在落实时也多半功亏一篑。

20 个装甲师听起来部队壮大了很多,其实坦克的数量并没有增加。我们可投入作战的坦克是 2 434 辆,而不是俄国人所说的 12 000 辆。此时中型坦克占三分之二,而第一次战役时,轻型坦克占三分之二。

在谈到侵苏战役时,托马说当时德国装甲部队发明了一种非常有效的战术。“装甲师在夜晚突破俄军的防线,然后埋伏在防线背后的森林里。俄军很快就会派兵来重守被攻破的阵地。第二天早上,德国步兵就向这些防线尚未巩固的阵地发起进攻,而埋伏在那里装甲部队则从背面向守军发起猛攻。”

在 1942 年的战役中,已被证明无用的骑兵师解散,新建 4 个装甲师。3 个步兵师进行了机械化重组,在 1941 年战役时,已经有 10 个步兵师进行了机械化改造。“但是在 20 个装甲师中仅有 10 个加强了装备。在希特勒的命令下,德国加强了 U 型战舰的制造,反而忽略了提高坦克的产量。”

托马对德军高级将领和希特勒严加抨击,指责他们没能充分认识到装甲部队的绝对重要性,没能及时发展装甲部队的规模和提升它的素质。



我们的力量足以打败波兰和法国，却没法征服俄罗斯。那里幅员辽阔，道路难行。我们装甲师的坦克本该增加一倍，而且我们机械化步兵的机动性也有所欠缺。

我军装甲师最初的模式十分理想——两个坦克团和一个机械化步兵团。但步兵师本应配备装甲车，尽管那需要更多的汽油。对苏战役的初始阶段，运载步兵的卡车还能及时抵达战场，他们通常被运到离火线四分之一英里的地方下车参战。但是当苏军投入更多的飞机后，我们的步兵就难以及时抵达战场了。运兵车队经不起飞机的轰炸，在远离战场的时候步兵就得下车疏散。只有乘装甲车的步兵才能符合机动战的需求，及时投入战斗。

更糟的是这些笨拙的卡车常常陷于泥沼。法国的地形最适宜装甲部队作战，而俄罗斯的地形则最糟，它幅员辽阔，到处是沼泽和沙地。有些地方的沙子有两三英尺深。一下大雨，沙地就成了泽国。

托马还说：“相比较而言，非洲简直是装甲师的天堂。那些曾参与侵苏战役的部队一到非洲就会感到行动自如。所以如果把非洲战役的经验应用到不同的国度就会铸成大错。对你们而言，未来的难题还是俄罗斯，非洲沙漠不成问题。”托马讲话就是这么直来直去。

托马指出侵苏战役另一个重大错误就是装甲部队和空军缺乏配合。“结果使我们在许多地方功亏一篑。原因是伞兵部队属于德国空军，而高层对于往哪里配置伞兵往往意见不一。尤其戈林老是要搅局。还有德军的自动推进式大炮也不行。这种武器本来极有威力，但我们的大炮都是些水货，底盘太笨重了。”

1942年秋，托马在阿拉曼被俘，所以他无法就二战最后阶段的战况提供证言。曼陀菲尔将军堪称那个时期的坦克战骁将，他的论断在总体上证实托马所言不虚，当然在某些方面也有所补充。曼陀菲尔对我详述了他的观点，在此我感到有必要向非专业读者介绍一些他的见解。“坦克就要快。我认为这是坦克设计中最重要教训。豹式坦克行动迅速，堪称典型。我们把虎式坦克谑称为‘大篷车’，虽然虎式坦克在发起进攻突破防线时算得上不错的机械，但速度实在太慢，在法国还算差强人意，到幅员辽阔的俄罗斯，它就成了一种累赘。”

在评论苏联的坦克时，曼陀菲尔说：“斯大林式坦克的重量在世界上首屈



一指,它履带结实,装甲坚硬。还有一个优点是个头不高,比豹式5型还低51厘米。作为攻坚的武器,它无疑还是不错的,但速度实在太慢。”

曼陀菲尔还谈到了德国装甲部队本可避免的两大失误。

装甲师的每一个单位都应配备紧随战术梯队的机动修配车间。我军将机动车间安置在后方,那是一个严重的错误。机动车间必须突前,随时待命,因为战术指挥官与车间没有无线电联系。这样,除了那些严重受损的坦克,其余的故障就可以当夜修复,这是事关重要的,它能减少损耗,避免意外的伤亡。前线指挥官没法等到坦克在后方修好后才行动,他们常常要完成力所难及的任务,因为作战方案根据正常的坦克数量来制定的,及时的修复可以弥补坦克受损所带来的恶果。


装甲师拥有自己的空中力量也至关重要。空中力量包括一个侦察机中队、一个战术轰炸机中队和一个飞行速度较慢的供指挥官和参谋使用的通信联络机中队。装甲师的指挥官本当经常在空中指挥作战。苏联战役之初,德国装甲师配备有直属空中小分队。但在1941年11月又被最高司令部以加强中央控制的名义收回了。那已经被证明是一个严重的错误。我还得强调,空中机队与装甲师的配合在和平时期就应当加强训练。

军火、汽油、食品和兵员的空中运输也非常重要。在未来的战争中装甲师的作战范围将更大。要有一天进军200英里的准备。战前我读过不少你的著述的德译本,我了解你对空中力量在装甲战的作用相当关注。装甲战与步兵战完全是两回事,步兵不懂装甲战。这就是我们在战争中遇到的一大麻烦。

在谈到坦克的设计和战术时,曼陀菲尔讲到设计自重较轻的坦克的价值,这种坦克行动灵活,不易被击中。但问题在于这种坦克在行进时必须清除路障,否则在通过凹凸不平的路面或碰到岩石和树桩时就会被“开膛破肚”。“不过只要善于观察地形,一些轻微的障碍是可以克服的。敏于观察是驾驶坦克必备的素质。”

曼陀菲尔以1944年5月在罗马尼亚雅西(Jassy)附近的塔古尔弗鲁摩斯(Targul Frumos)之战为例来说明他的观点。此战使苏军攻占普洛耶什蒂(Ploesti)油田的企图首次遭到挫败。500辆苏式坦克直扑曼陀菲尔指挥的





“大德意志”(Gross-Deutschland)精锐装甲师。该装甲师由160辆坦克组成,一支部队配备虎式坦克,另两支部队配备豹式坦克,还有一支部队配备老式的马克4型坦克。“这是我第一次与斯大林式坦克交手,我们的虎式坦克在3000米向它们开炮,炮弹击中它的外壳,却被弹了出去,直到在1500米距离时才能穿透它的甲板,这着实让我大吃一惊。但是我充分利用地面掩护,靠机动灵活的战术来战胜苏军强大的坦克。”甚至连体量相对较小的马克4型坦克也巧妙地绕到苏军坦克的后面,从1000米的地方向它们开火,炸坏了不少庞大的斯大林式坦克。曼陀菲尔说,俄军的攻势衰竭后,战场上留下了350辆被击毁的斯大林式坦克,在逃散的坦克中也有不少受到重创。德军仅损失了10辆坦克,但也有相当数量的坦克受到重创。

虽然对德国而言这是一场防守战,但在由两个步兵团精心选择的防守区域内,德军的装甲团却充分应用机动进攻的战术克敌制胜。曼陀菲尔德强调:“坦克战以动制胜,不动则败。”作为一个军人,回忆起这次成功的战例,他显然难掩得意之情,他说:“看到这场战斗真会让你感到赏心悦目。”

他还谈到在现代战争中,为了赢得先机,确保在战术上的主动,必须精心挑选坦克的机组人员。“满足了这个条件之后,在设计坦克时则需对外壳、火炮、速度等进行综合的考虑,尤其要对空袭、伞兵和火箭对坦克的威胁予以充分的考虑。”

接着曼陀菲尔向我全面讲述了他对坦克战的心得。“火力、装甲、速度和穿越国境长途跋涉的能力皆为坦克战的要素。坦克设计如能成功地将这些互为矛盾的要素结合起来,那就是最好的坦克。在我看来,德国造的豹式5型堪称此中翘楚,如能将其轮廓设计得再低一点就更为理想了。实战时坦克的速度最重要,对此重要性的认识应当超过战前乃至战时人们通常的认识,这是从我的作战经验中总结出来的主要教训。速度对于坦克具有生死攸关的作用,速度快就能迅速变化位置,就能躲避敌人致命的炮火。机动性由此可以演化为‘武器’,其作用通常不亚于火炮和装甲。”

曼陀菲尔和托马的观点可谓是英雄所见略同。他们都强调跨国作战时坦克的速度至关重要,且将其称之为“机动变位”。拜尔莱因(Bayerlein, Fritz)也对我表述过同样的看法,他是年轻一代的坦克骁将之一,坦克战的经验异常丰富。在入侵法国和俄国时,他曾是古德里安手下的一员大将。在非洲战役的后阶段,他出任隆美尔的总参谋长。后来在诺曼底和阿登高原指挥过利尔精锐装甲师,在莱茵兰(Rhineland)指挥过装甲军团进行最后的抵抗。拜尔莱



因将军说：“在未来的坦克设计中，最重要的因素是机动灵活和速度。其次是火力（射程和大炮的口径）。再次是装甲。‘机动性至高无上’，它是未来战争的決定因素。运动、开战、出其不意，越快越好。”

在另一次交谈中，曼陀菲尔对未来的军队编制谈了他的看法。“时代条件表明军队内部应分为两类。最佳选择是组成‘精锐’部队。为此须挑选出几个师，给予最好的装备，充足的训练资金和精选的人员。一个大国的军队中应当有三十个以上这样的精锐师。当然，没有一个国家能够给上百万人的军队配备精良的武器。一支庞大而平庸的大军，装备陈旧，训练水准低下，其战斗力远远抵不上一支精锐部队。精锐部队须加强空中支持、空降部队和火箭。当前装甲部队的炮兵规模不利于机动作战。目前受条件所限，只有榴弹炮才能俯射。但随着技术的发展，火箭将成为有效的替代物。”

曼陀菲尔继续说他赞成我著述中的观点，即当前基本的军事问题是亟待减少辅助部队及其车辆相对于一线部队的比例。

但是先得让最高司令部人员学会机械化战争的全新语言，才有可能取得这样的进展。

新的军队模式需要设计新的战略战术，而要让人们接受这些观念，重要的一点就在于要让所有的新型部队由一个有实权的领导统一指挥。与此同时，为了加强精锐部队的团队精神，不仅要给它配备最好的装备和训练设施，还得让它有独特的军装，着装越帅气越好。

经过一段时间对作战经历的反思，曼陀菲尔对未来的战争提出具体详尽的结论。其主要观点值得引荐。

军事领导必须掌握在 1945 年有效的战争新观念，有能力找到保证机动作战的手段。

像德国军队那样，在组建具有战略意义的坦克部队时，必须与陈旧的做法完全决裂。在实施新的作战技能时一开始不要着急，逐步加以巩固。德军在 1939—1941 年以及 1942 年在非洲的战例都清楚地证明了这一点。

事实上，这不仅仅是利用摩托化的机动武装进行运作和战斗，而是一种全新战术的应用，其最显著的特征便是以最快的速度识别目标，机动灵活速战速决，也就是最高程度的机动性。

空降部队配合快速装甲编队无疑将在未来的战争中起到极重要的作



用,因为这两大手段解决了时间和空间问题。

现代化的炮兵将与 1939—1945 年的炮兵截然不同。火箭和原子能武器是其发展方向。

不过曼陀菲尔还是陈述了改进火力控制的方法——以集中火力取得更猛烈更灵活的效果。“随着炮火威力和配合的增强,战场上面对面的肉搏战终将被淘汰。”

要不断加强侦察,也就是说,这样才能在进攻遇到抵抗时仍可达到自己的既定目的。加强侦察的原则在战时没能得到充分的强调……因缺乏有效的侦察,对战事就难以作出准确的预见,排兵布阵就经常受到挫折。

行军作战应当常在夜晚行动,首先这能尽量减少敌军空袭造成的损失,军队必须善于夜间作战……军训部队习惯了这种作战方式后,就不会在敌军进行大规模夜战时感到束手无策。如苏军进行强大的夜间攻势时,德军就曾感到十分紧张。

就本人的战争经验而言,我仍清楚地记得在进攻时人造烟雾非常有用。在未来的地空二维战争中,其重要性还会进一步提升。尤其是当我方空军无法在有限的区域和最佳时间给予地面有效支持时,人造烟雾的作用就更为显著。化学专家应当发明一种低沉难消可以覆盖大片区域的烟雾。

要在最佳时间和地点布置部队作战,确保武器发挥其最大的效用,这就是所谓的战争艺术。在我看来,现在还应扩大范围,将汽油也归入“战争手段”和“武力”的范畴……为了确保在战斗中有足够的汽油,所以必须把汽油供应的控制提升到战术高度。

在探讨未来的军队编制时,曼陀菲尔形象地描述了仍将继续存在的两大类战斗师:配备摩托车的步兵师和装甲师,他喜欢将装甲师称为“机动师”。战后一见面,他就和我探讨起装甲师的编制问题。他主张的编制(本书初版曾加以引述)与二战后阶段时流行的编制比较相像,只是增加了装甲师后备部队的半履带运输车的份额。但当他战争经验进行更多的反思后认为,应当大大增加坦克的规模,而如果能用全履带装甲车来运载步兵进行跨国作战,就可以削减步兵师的数量。原先每个坦克师有三个坦克团,每团有 60 辆坦克。他



认为应扩大到四个团,每团配备 100 辆坦克。步兵师由三个装甲营组成,而不是原先的四个仅有半履带车和卡车的步兵营。那样就回到了战前的装甲师建制,而当时坦克的自重和火炮比较轻。“有人认为随着坦克火力的加强,就不需要增加坦克的数量,这种看法完全错了。何况经过行军作战,能投入战斗的坦克就会迅速减少,减少的数量之多令人吃惊。”

德军在苏联战役之前重组军队,装甲师分出一半坦克,增加一个步兵团。曼陀菲尔赞同托马的观点,认为这次重组得不偿失。“本当全力加强坦克的攻击力,那样做却使装甲师元气大伤,丧失了以坦克为核心的突破能力。这下进攻的速率取决于步兵,无论是过去还是现在这种做法都是错的。在装甲战中,坦克的作用首屈一指,其余的一切都等而下之。唯有加强坦克的核心作用,才能增加装甲师的力量。”(后来我得知古德里安将军也倾向在装甲师中扩大坦克的规模,他认为比较理想的数量是 400 辆左右。)

“大批的坦克作为前锋是装甲师进攻的必要动力,步兵的任务是协助坦克作战,所以在主攻点上要尽量集结大量的坦克。将步兵作为装甲部队的主力的看法是绝对错误的,它使装甲部队的发展停滞不前。有人以为装甲部队的发展已经绰绰有余了,事实决非如此。”

至于后备力量,曼陀菲尔认为:“那些辅助坦克的武装,如装甲步兵、工程兵和炮兵都应配备军车,以便在战场上和坦克步调一致。在作战时,坦克炮是以底盘为依托的,以后应当做得更为实用,炮架可以设计得更为轻便。装甲兵和工程兵曾用过一种半履带式 SPW 型轻便装甲车,这种车擅长在乡间行驶,它在苏联战场上穿越沼泽的能力令人叹服。装甲师刚成立时,只有一个步兵营和一个工程兵连配备半履带式装甲车,随着战争的推进,能够配备装甲车的部队越来越多。有些装甲师中有一个装甲步兵团,还有些由半履带式装甲车运载的 AA 型大炮和一些越野炮,也就是说全都实现了机械化。将来常规步兵战斗梯队都可以配备这种装甲车,而装甲师的步兵则应配备全履带式的装甲车。装甲师内的所有战斗部队都应如此,军车必须是越野式的。火炮必须是自动控制、安装在坦克底盘上的,而不是靠拖车来运输。”



## 第三部分 德国将领眼中的战争





## 第十一章 希特勒如何打败法国和拯救英国

任何重大事件的内幕往往与其表面现象大相径庭，战时纷繁复杂的事件尤其如此。几百万人的命运因某人的决定而改变，他的决定得自其最为古怪的动机，而这却改变了历史的进程。唯有幕后寥寥数人才知道此人作出决定的实情，而这些人通常都缄默不语。事过境迁，有时某些真相会大白于天下，有时某些内情则可能永远石沉大海。

真相的显露往往再次证明常言所谓“事实比虚构更离奇”。小说家总想把虚构的情节描写得更为可信，他不可能写出历史上曾经发生过的极为荒诞的事情，正是一些非同寻常的事件和扭曲的心灵才导致了这幕荒诞的历史。

1940年发生了一系列决定性事件，其形成的过程最为不可思议。法国一战而亡，参战的德军高层原本对此战几乎毫无信心。进攻方后来改变计划，法方自恃作战计划严整过于自信，由此所造成的机缘巧合，从而使德军侥幸取胜。英军的成功逃脱则更为离奇，英国也因此免于遭到入侵。此书所要揭示的真相与通常的描述差异甚大，这在当时的英国人看来简直难以置信，大多数希特勒的狂热追随者也同样会感到难以置信。纽伦堡审判也未曾对这些内幕有所透露。

英国军队从法国的逃离通常被称为“敦刻尔克奇迹”。当时德军装甲部队已经尾随英军到达英吉利海峡，深入佛兰德（Flanders）内地。英军与其大本营和法国大部队的联系被切断，面临大海走投无路，成功撤离的英军连自己也不明白当时是如何死里逃生的。

希特勒的干预拯救了英军，这就是答案，舍此别无他因。敦刻尔克近在眼前之时，希特勒突然命令德军止步不前，眼睁睁地看着英军抵达港口，逃脱德军的利爪。

英军虽然逃离了法国，要守住本土也决非易事。英军大部分武器装备都丢弃在法国，国内的武器库几乎空空如也。在随后数月中，英国那些弱小且装





备不整的军队要面对的是从法国乘胜而来、装备精良的德军。而两军之间的屏障也不过是一水之隔。然而，德军的入侵就此戛然而止。我们一度相信“不列颠空战”中纳粹空军的失败拯救了英国。但这只是一个因素，而且是最不重要的因素。希特勒不打算攻占英国，这才是最主要、最深层的因素。他志不在此，几周来对入侵英国的准备工作不闻不问。虽然他也曾一度产生入侵英国的念头，但很快就改变主意，中止了准备工作。相反，此时他正在准备入侵苏联。

在叙述希特勒作出这些致命决定的内幕前，先得提一下入侵法国。二战早期的一系列事件充满戏剧性，时而高潮迭起，时而急转直下。希特勒放过了英国，却不顾麾下将领的意见，悍然占领了法国。

当法兰西匍匐在德军铁蹄之下时，众多德军将领并不知道当初德军最高层对胜利毫无信心，总参谋部迟疑不决，正是通过秘密的方式强迫其执行作战计划才取得胜利。如果德军将士知道真相的话，肯定会惊愕不已。如果六个月前他们接到的命令是向柏林进军，而不是向巴黎进军，大多数人肯定会被吓坏的。然而这正是隐藏在胜利表象背后的事实。

### 希特勒为何决定进攻法国

回首往事，虽然德国入侵西方似乎势所难免，但是入侵计划却是在充满恐惧和怀疑的氛围中形成的。美国评论家将二战初期西方盟国的不作为贬称为“假战争”。这多少有失公平，因为盟军缺乏发起进攻的武器装备，后来事件的发展证明了这一点。不过，在德国方面倒确实存在着一些“假”的因素。

德军占领波兰，并与苏联坐地分赃以后，希特勒便企图与西方列强媾和，但遭到断然拒绝。与此同时，他对自己一手挑起事端和对暂时盟友的担忧也与日俱增。他曾表示如果与英法陷入长期的战争冲突将逐渐耗尽德国有限的资源，俄国可能从其背后予以致命的一击。他曾告诫手下将领：“任何条约和协议都不能确保苏联保持长期的中立。”这种恐惧促使他在西线采取攻势压服法国。他指望一旦打败法国，英国就会知趣，从而接受德国的条件。他认为德国的一招一式都易快不易迟。

希特勒不敢冒险采取伺机等待的战术，以静观法国是否无意参战。他相信此时德国的军力和武器装备足以打败法国。“至于某些武器，如克敌制胜的武器，德国具有不容置疑的优势。”希特勒认为德国必须尽快发动进攻，否则将



坐失良机。他下令：“只要条件许可，今秋必须发起进攻。”

希特勒的这些想法和指示在1939年10月9日以一则冗长的备忘录形式发给部下。他对军事因素的分析堪称高明，但是他恰恰忽略了一个致命的政治因素——英国人被激怒后“全像公牛那样执拗”。

这看起来似乎有点奇怪，因为希特勒在《我的奋斗》中曾详述英国人在战争中“坚忍不拔的决心”，并告诫德国人对此切不可自欺欺人，“如果我们掉以轻心，必将因此受到严厉打击的惩罚”。难道希特勒被战争开局的胜利冲昏了头脑，忘记了自己曾经的告诫？更大的可能性是，由于认识到这一点，就更促使他一旦将英国卷入战争后，就会采取更为极端的步骤，尽管他内心仍希望英国善于妥协的习惯会最终克服其固执的牛脾气。何况英国政府对外发言人的表态也使他感到即便他有意讲和，也不可能与英国达成立竿见影的妥协。

9月末，波兰的抵抗土崩瓦解，希特勒便打算先向西方发起进攻。当时曾在最高统帅部负责国防部工作的瓦尔利蒙特将军告诉我说：“在波兰战役的最后阶段，我曾造访希特勒在波罗的海边佐波特（Zoppot）的司令部，在那里第一次听到希特勒决心进攻西方。连通知我此事的凯特尔元帅也为之心惊胆战。因为无论在心理上还是行动上，德国军队根本对此毫无准备，更谈不上有什么计划。”9月底，前线军官得知希特勒的意图，并受命筹备作战计划时，他们更是感到忧心忡忡。他们原本以为希特勒会按兵不动，让西方诸国有足够的时间消消火气，掂量一下长期战争的代价。或者让西方向德国前沿进行一次徒劳无益的进攻，从而使其气焰有所收敛。既然德国已经将大部队从波兰转移到西线，也就足以击退英法的进攻。

但是希特勒已经急不可待，他认为必须发起进攻，以保证与比利时毗邻的鲁尔和莱茵工业区的安全。他认为比利时所谓的中立并非出自内心，指出最近比利时在与德国边界接壤处加强了布防，在与法国的交界处却不设防。希特勒引用了有关法国和比利时军方人员秘密会谈的情报，会议谈及让英法军队进入比利时的可能性，强调比德边界须重兵布防。希特勒声称必须先发制人，以免英法军队先行入驻德比边界，威胁鲁尔工业区，“从而将战火直指德国军事工业的中心”。[希特勒的担心不无道理，法军总司令甘末林（Gamelin, Maurice）在9月1日的提议正是这样，法方的档案和甘末林的回忆录对此都有所披露。]

由于上述原因，德国的进攻本来会首先对准比利时，然后指向法国，以取得决定性的胜利。希特勒继续说，他无意进攻荷兰，而打算就介于比利时和德



国之间的马斯特里赫特(Maastricht)地带问题与荷兰达成一个政治协议。(但是由于德国空军的建议,到了10月,希特勒又倾向于占领荷兰。)

## 领导层的分歧

希特勒的将领同他有着一样的远忧,却没有他对近期立刻行动的自信。他们认为德军的力量尚不足以打败法国。

从人数对比上看,将领们的担忧不无道理。按照惯例来评估,双方力量之悬殊显而易见,德军师团的数量并不具备确保胜利的优势。法国已经动员了110个师,其中85个师用来防备德国(后来增加到101个师)。法国有500万受过军训的人员,还可以组建更多的战斗部队。英国派遣了5个师,还准备派遣更多的部队(后来在冬季又增加了8个师)。比利时可动员23个师。相比之下,德国仅可动用98个师,其中只有62个师进入战备状态,其余的是后备军。预备军装备不整,主要由曾经参加过第一次世界大战的老兵组成,这些人已经四十出头,若要参战的话还得好好进行训练。而且,德国相当一部分兵力驻扎在东线,负责占领波兰和防备俄国。

经过这般对比,也就不难理解为何当时德军高级将领对贸然进攻的前景不看好。希特勒认为坦克飞机这些新的机械化武器可以打败在兵员上占据优势的敌人,但将领们并不这么认为。(而且,贝克将军在1938年备忘录中清楚地表示了对引发另一次世界大战的担忧,将军们对此有着强烈的同感。)

包括伦德施泰特和他的主要智囊布卢门特里特将军,与我交谈过的大多数德国将军均坦然承认他们都未曾预想到进攻会大获全胜。在描述军方高层的主要观点时,布卢门特里特说:“只有希特勒一个人相信可能取得决定性的胜利。”但是在年轻的将领中有两位与众不同,那就是曼斯坦因和古德里安。他们坚信只要运用新的战术,就可以取得决定性的胜利。由于希特勒的支持,他们得以证明自己的观点,从而改变了历史的进程。

西韦特(Siewert, Curt)将军曾于1939年到1941年担任勃劳希契元帅的私人助理,他说在波兰战役之前,从没考虑过向西方开战的任何计划,并向我详述了勃劳希契对希特勒指令的反应,“陆军元帅勃劳希契拼命反对希特勒进攻西方的命令,有关档案文件都可以证明他几度劝诫希特勒不要进攻西方。他亲自会见元首,向他说明进攻西方乃不智之举。当他明白自己无法说服元首时,他便开始考虑辞职。”我问勃劳希契反对的理由。西韦特回答道:“陆军



元帅勃劳希契认为德军实力不够,难以攻克法国。并强调如果德国入侵法国,英国就会全面参战。元首对此加以驳斥,勃劳希契便警告说:‘我们已经在上次大战中领教过英国的力量,知道他们有多么厉害。’”

这次争论发生在11月5日。结果希特勒对勃劳希契的反对意见置之不理,下令军队准备在11月12日发起进攻。但是由于气象学家预报天气不好,7日便撤销了进攻命令。进攻日期被延迟到17日,后来又延迟了一次。天时不利让希特勒大为光火,当他得知将军们希望用天气来推迟进攻时,更是火冒三丈。他感到将领们正在寻找任何理由来证明他们的畏战是有道理的。

面对军方高层的普遍质疑,希特勒于11月23日在柏林召开会议,目的是用他的看法来说服大家。我有一份勒里希特将军的陈述,他当时是总参训练部的负责人,后来负责整理1940年战役的经验教训。勒里希特将军说:“元首花了整整两个小时详述战争格局,目的是要说服军方领导,让他们明白进攻西方的必要性。他严词驳斥了勃劳希契此前的种种反对意见。”当晚在与勃劳希契私下会谈时,希特勒重申了他的立场。勃劳希契提交了辞呈,希特勒将辞呈扔到一边,告诉他必须服从命令。

勒里希特还说哈尔德和勃劳希契一样,对进攻持怀疑态度。“两人都强调德军实力不济,这是有可能阻止希特勒贸然出击的唯一理由。希特勒坚持己见,声称他的意志将战胜一切。这次会议后,部队进行了一些新的编整,陆军的实力有所加强。元首就更有理由来驳斥反对派的意见。”(到1940年5月,西线增至130个师。更为重要的是装甲师的数量从原先的6个增至10个。)

希特勒在对军方上层的谈话中表露了他的忧虑,他认为最终的威胁来自苏联,因此必须先摆平西线。但是西方盟国对他的和平建议置之不理,远远地躲藏在防御工事背后,只要他们愿意,随时可以进攻德国。对于这种格局,德国又能忍受多久呢?此刻,德国尚有先发制人的优势,6个月后这样的优势很可能不复存在。“越往后拖对我们越不利。”西线自有令人不安的隐忧。“鲁尔是我们的阿基里斯之踵……如果英法通过比利时和荷兰进军鲁尔,我们将危在旦夕。那将导致德国防线的瘫痪。”只有先发制人才能消解这种威胁。

不过希特勒这时对取胜亦非信心十足。他将进攻描绘为一场“赌博”,是“胜利或毁灭”之间的抉择。而且他以忧郁和先知般的语调来结束这次训诫,“此战将决定我的存亡,如果我的人民蒙受失败,我也决不苟活。”

德国战败后,这份讲稿是在最高司令部的档案里被找到的,并在纽伦堡审判时向法庭出示。但是里面并没有提到这次会谈时反对希特勒的意见,更没



有提及由此可能导致希特勒在二战第一个秋季便被推翻的事情。

将领们预感到希特勒将执迷不悟，考虑要采取极端措施。勒里希特告诉我：“勃劳希契和哈尔德曾在陆军总司令部讨论过，如果元首固执己见，一意孤行，将德国拖入一场与英法全面对抗的战争，他们将命令西线的军队转而向柏林进军，推翻希特勒和纳粹政权。”

“但是对这次行动至关重要的某人却拒绝合作。此人就是德国国内武装部队总司令弗罗姆(Fromm, Friedrich)。弗罗姆认为如果军队反戈，大多数将士不会响应，因为他们太相信希特勒。弗罗姆所言不虚，他拒绝合作并非是因为喜欢希特勒。他像其他将领一样讨厌纳粹政权，并最终为希特勒所害，不过那是发生在1945年3月的事情。”

勒里希特还说：“即便弗罗姆没有不同意合作，我认为该计划仍会失败。因为德国空军极其崇拜纳粹政权，空军有高射炮，它会粉碎陆军任何倒戈的企图。早先让戈林的空军负责陆军防空力量这一招相当精明，它削弱了陆军的实力。”

弗罗姆对军队反应的估算大致正确。对他拒绝合作而深感不快的将军们也承认这一点。我们知道在二战后期德国遍体鳞伤大势已去之时，德国人仍不愿放弃对希特勒的信任，这也能证实弗罗姆的看法。但是，军方的密谋即便不能马上达到推翻希特勒的目的，也自有其价值。至少它能震惊整个国家，使希特勒进攻法国的计划付诸东流。如果那样的话，欧洲人民就能免受因那次虚幻的胜利所带来劫难。甚至德国人民也能免遭频受空袭和长期战乱之苦。

虽然这次密谋胎死腹中，希特勒还是没能如愿在1939年发起进攻。恶劣的天气比将军们更有力地阻止了希特勒的行动。12月上半月出乎意料的严寒使进攻的计划一拖再拖。于是希特勒决定等到新年再说，便下令圣诞放假。过了圣诞，天气还是不好，但希特勒在1月10日决定于17日发起进攻。

## 一次决定性的事故

就是在这一天，希特勒出人意料地决定进行干预。德国空降部队总指挥施图登特(Student)将军向我讲述了事件的整个过程：“1月10日，我派遣一位少校作为前往第二航空队的联络员从明斯特(Munster)飞往波恩，任务是与空军商讨进攻方案中一些并不十分重要的细节。但是他随身携带了进攻西线的全部作战方案。冰天雪地，狂风乱作，飞机在莱茵上空迷失了方向，飞向了比



利时,并在那里迫降。他来不及烧毁全部重要文件。关键部分文件涵盖了西线进攻方案大体内容,就此落入比利时人手中。德国驻海牙大使馆的空军军官汇报,当天晚上比利时国王与荷兰女王进行了长时间的电话交谈。”

德国人当然没法知道这些文件的确切情况,但他们自然会作出最坏的设计,研究应对的策略。危机当头,与他人的惶恐相比,希特勒保持着清醒的头脑。施图登特将军继续说:“观察德国高层领导人对事件的反应颇为有趣。戈林暴跳如雷,希特勒却不慌不忙,平静自若……开始时他想立即发起进攻,有幸的是总算忍而未发。他决定全部抛弃原先的作战方案。这个方案后来被曼斯坦因将军的方案取代。”

这对同盟国来说可谓是极大的不幸,虽然盟国因此可以得到几个月的时间备战,因为德国为了重新制定计划往后推迟了进攻日期,直到5月10日。但德国一发起进攻,就将盟国打得落花流水,法国军队顷刻土崩瓦解,英国军队从敦刻尔克侥幸越海逃脱。一个少校使德国原定的作战计划误入敌手,这一离奇的故事却导致了德军在西线摧枯拉朽连连告捷。

人们自然会问难道这真是一次偶然的故事吗?战后我曾向许多德军将领询问过此事。可以想象,为了取悦于胜利者,作为战俘他们会更乐意声称是自己有意将情报透露出去,让西方有所警惕。可事实是没人这样说,所有人都确信这的确是一次偶然的故事。但是我们知道德国谍报局局长海军上将卡纳里斯(Canaris, Wilhelm)曾采取多种隐蔽的步骤企图挫败希特勒的目的。在春季进攻挪威、荷兰和比利时之前,他曾向这些受威胁的国家发出过一系列警示,只是没有受到应有的重视。我们知道卡纳里斯向来行踪诡秘,难以捉摸。所以说1月10日这一生死攸关的事件仍将是一个悬而未解的历史之谜。

这次空中事故导致德国改变了进攻方案,希特勒由此大大获益,盟国却因此而吃足苦头。整个故事最令人费解的是面对送上门的警示,盟国却无所作为。德国少校携带的文件并没有被完全烧毁,可以清晰地勾勒出进攻方案的纲要,比利时人立马将抄本递交给了法英政府。可是同比利时的军事参谋一样,英法也倾向于认定这是德国人虚张声势的诡计。这样的判断有违常理,德国人不会使出如此愚蠢的诡计,这将致使比利时人提高警惕,并促使他们与英法加强合作!他们完全可能在德国发动进攻之前开放边界,让英法军队进入以加强防御。

更奇怪的是盟国最高指挥部根本没有改变自己的计划,也没有采取任何预防措施以应对德军入侵的可能性,因为如果进攻方案真实可信,德军最高指



挥部肯定会对进攻力量的布置有所变更。

## 方案的重大变更

最初的进攻方案是以哈尔德将军为首的总参谋部拟定的,其内容与1914年时德军的作战方案大同小异,只是预定目的不如那时远大。进攻重心集中在右翼,由陆军元帅博克指挥的B集团军穿过比利时的平原地带进行突击。陆军元帅伦德施泰特领导的A集团军作为第二步指向阿登高原。陆军元帅莱布(Leeb, Wilhelm Ritter)负责的C集团军在左翼面对法国,其任务只是威胁和牵制在马其诺防线(Maginot Line,一译骑诺防线)一带的法军。博克的麾下第18师、第6师和第4师,从右到左布阵待命。伦德施泰特麾下第12师和第16师。莱布麾下为第1师和第7师。更重要的是大部分坦克属于博克部队,伦德施泰特手下一辆也没有,他的任务只是向默兹河进军,掩护博克的左翼。

到1月,伦德施泰特的军力有所加强,分配给他一个装甲军团,计划中的进攻范围也有所延伸,他可以越过默兹河,建立宽阔的前沿阵地,与博克的侧翼连为一线,以便更好地掩护主力部队。这样安排仅仅是对作战方案的局部修正,谈不上彻底改变,进攻的重点还是放在右翼。

现在回头来看十分清楚,如果实施该方案,必将难以取得决定性的胜利。因为那将在途中遭遇英国军队和法国装备精良的部队。德军将遭到这些军队的迎头痛击。即使德军突破比利时的防线,那也只能将他们赶到法国北部的防线,那里离他们的后勤供应基地很近。

方案改变的内幕非同寻常,我也是一步步地追踪才渐渐获知真相。从一开始德国将领就十分乐意与我谈论军事问题,他们具有实事求是的军人职业操守。我发现他们大多数人过去都读过我的军事著述,这些人更愿意和我交谈切磋。他们也能直言不讳地议论纳粹领导人物,对他们的胡作非为表露出由衷的厌恶。谈到希特勒,他们一开始往往有所保留。显然不少人曾经受过希特勒的迷惑,对他仍心存畏惧,不愿提及他的名字。直到渐渐确信希特勒已经死了,这种畏惧才真正消退。他们开始比较放松地批评希特勒的行为,伦德施泰特就一直看不惯希特勒的做派。但他们仍然对军方内部的分歧遮遮掩掩,这也是很自然的事。所以在经过很多次的交谈后,我才得知德军智囊人物打败法国的真相。



新的作战方案出自曼斯坦因将军的灵感,他当时是伦德施泰特元帅的参谋长。他认为原先的方案太直露,过于因循守旧,盟国最高指挥部对这些招数了如指掌。

如原先所料,盟军一旦进入比利时,就会与德军发生正面冲突。用曼斯坦因的话来说:“或许我们可以在比利时打败盟军,也可能占领英吉利海峡地带。但我们的攻势很可能在索姆河受到扼制。战况就会演变成如 1914 年那样,我们唯一的优势就是占领了英吉利海峡,没有任何求和的机会。”

该方案另一个缺欠是德军将与英军决战,曼斯坦因认为英国军队比法国军队更难对付。坦克部队是德军取胜的法宝,但按照该方案,德军坦克将穿过虽然比较平坦的田野,但那里河渠纵横,这将造成严重的阻碍,因为胜败所系取决于速度。

有鉴于此,曼斯坦因大胆设想,将进攻的重点转向阿登高原。他认为敌方料不到德军坦克会出现在如此险恶的地带。那里防守不严,有利于德军坦克在战役关键之际迅速挺进。德军坦克一旦在阿登高原出现,便可穿过默兹河,进而席卷法国北部平原,那里的地形适于坦克运动,然后直扑英吉利海峡。

曼斯坦因向我详述了他的作战方案:“我的方案还考虑到另一个方面。我料想法国可能会动用在凡尔登(Verdun)和默兹河与瓦兹河(Oise)之间的后备部队来组织反攻,便建议我方强大的后备军必须先发制人,不仅要在沿埃纳河(Aisne)和索姆河一带构筑坚固的防线,还要断然阻止法国组织任何反攻的企图。这个建议后来为希特勒和陆总所采纳。我感到决不能让法国构筑一条新的防线,否则我们将重蹈 1914 年的覆辙。”

曼斯坦因在酝酿作战方案时曾及时向古德里安咨询,让后者从坦克战的角度来探讨其方案的可行性,那是在 11 月。古德里安告诉我:“曼斯坦因问我,坦克是否能够穿过阿登高原,通向色当(Sedan)。他谋划在色当附近突破马其诺防线。这样就能避免与史里芬(Schlieffen)计划雷同,方能出乎敌人的意料。我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时就对那里的地形比较熟悉,在参考了军用地图后,我肯定了曼斯坦因的观点。然后曼斯坦因说服了伦德施泰特将军。12 月 4 日,有关备忘录上呈陆总,陆总拒绝接受曼斯坦因的观点。不过后来曼斯坦因成功地将他的观点告知了希特勒。”

总参谋部认为阿登高原不利坦克行进,不适于作为主攻点。很难使他们信服坦克可以在那里作战。若不是坦克专家古德里安的权威论说,恐怕永远说服不了这些人。法国总参谋部也持同样的观点,他们甚至比德国人更顽固





不化,结果给法国带来巨大的灾难。<sup>①</sup>瓦尔利蒙特提供了证据链的另一环。他告诉我曼斯坦因是如何向他说明新作战方案的,“大约在1939年12月中旬,我曾造访伦德施泰特在科布伦茨(Coblenz)的司令部。当时大家围着餐桌,我就坐在曼斯坦因的旁边……回到柏林后,我向约德尔将军提及此事,他对曼斯坦因的观点毫无兴趣。然而我相信,正是因为我这次谈话,曼斯坦因的计谋开始得到最高层的注意。”

几个星期后,空降部队一位官员因迷路而将原作战方案落入比利时人手中,德国高层这才开始对曼斯坦因的方案产生强烈的兴趣。正是由于1月10日的“失误”,曼斯坦因的方案才被推向前台。然而希特勒还是不太愿意改变原方案,他怕因此拖延发起进攻的时间。12日,预报天气仍无好转,希特勒也只是将进攻日期“A日”从17日推迟到20日。那已经是第11次延期了。到16日,预报还是说天气不好,情报部门也已确定原作战方案已经落入比利时手中,希特勒这才无限期地延迟进攻日期。

瓦尔利蒙特说:“就是在1月16日这天,希特勒才决定要对原方案的时间和内容作出彻底的改变。即便在这个时候,改变方案主要还是因为迫降事件和有情报说比利时已经于15日下令全面进入一级战备状态,荷兰的部分地区也已经加强了备战。”

过了一个月后,曼斯坦因的方案才得到希特勒的首肯。约德尔的日记表明,在2月13日,他向希特勒进呈备忘录,提到将军队的重心转向南方。不过他最后的语气又表露出对这种改变不无疑虑:“我提请他注意,向色当进军是一条可供选择的‘秘密通道’,但也可能会在那里陷入战神的手掌。”

最后终于敲定采用新的作战方案,决策的过程比较离奇。曼斯坦因针对勃劳契克和哈尔德的原方案提出新“计谋”的方式令俩人颇为不快。于是他们决定将曼斯坦因调离原岗位,派他去指挥一个步兵军团。远离主渠道,他就不易推介其新方案。但是曼斯坦因被调离一个月后,在1月底,曼斯坦因受到希特勒的亲自召见,便借此机会全面详述了新作战方案。这次会见是由施蒙特(Schmundt, Rudolf)将军一手安排的。施蒙特是希特勒的贴身副官,他十分

---

<sup>①</sup> 英国总参谋部也盛行这种观点。我在自己的一些著述中曾严厉驳斥这种长期流行的看法,我指出“所谓阿登高原难以逾越是夸大其词”,但是人们听不进。1933年11月,当时英国国防部着手组建坦克部队,军方曾向我咨询如何布置我军的快速坦克部队,以便更好地用于未来的战争。我建议如果德国入侵法国,我们应当用坦克在阿登高原进行反击。他们告诉我“坦克没法通过阿登高原”,我回答道,根据我对那里地形的研究,那样的看法是一种错觉。



崇拜曼斯坦因的军事天赋,认为曼斯坦因受到了莫大的委屈。根据他的回忆,15日举行会见后,事情就有了很快的进展。

瓦尔利蒙特说:“几天后,希特勒便要求军队按新方案进行部署。凯特尔和约德尔不得不尽力说服陆军高级将领和总参谋长遵循新的路线。尽管陆军高层极不情愿,但还是批准了新方案。参谋长们奉命贯彻落实,总参谋部的经典案例之一由此诞生。”

曼斯坦因的方案大胆出奇,本当受到希特勒的青睐,可奇怪的是希特勒并没有马上全面接受这个方案。最可信的理由是因为他不愿延迟西线的进攻日期。但希特勒一旦决定推迟进攻日期,采用新方案后,他便立刻自觉或不自觉地认为这个方案是他本人设计的。他表扬曼斯坦因只是因为后者与他看法一致!在谈到这次会见情况时,他随口便说:“在与我探讨西线新方案的所有将领中,唯有曼斯坦因最能理解我的意图。”

总参谋部没能认识到新方案的价值,希特勒慧眼识货,迫使总参谋部执行了这一克敌制胜的方案,但希特勒并不以此为满足。与曼斯坦因分享新方案的荣耀有可能降低希特勒作为最高战略制定者的威望,他可不愿这样。再说他不会忘记曼斯坦因曾经是弗里奇将军和贝克将军的得力助手,属于反纳粹的阵营。引人注目的是他对陆总将曼斯坦因边缘化的做法听之任之。

一个提出制胜计谋的将军却无法参与该方案的实施,这实在具有典型的讽刺意味。曼斯坦因善于捕捉机动战的战机,其谋略远远高于总参谋部的其他高级将领。当全新的机动战术行将创造辉煌之际,这样一个良将却被派往指挥步兵,在发起进攻时,只能跑跑龙套,岂非莫大的讽刺。

有幸的是古德里安将军直接参与了进攻方案的实施,他在实战中走得比曼斯坦因方案更远。不过如果当时曼斯坦因仍在伦德施泰特身边的话,古德里安会打得更加得心应手。

古德里安向我讲述了新作战方案进展的情况:“为了检验曼斯坦因方案,2月7日由哈尔德将军负责在科布伦茨举行了一次军事演习。我建议不必等待步兵跟进,由坦克部队独自以最快的速度攻过默兹河。这个建议遭到哈尔德的严厉批评。他认为在战役打响后的第9天或第10天部队才可能有组织地冲过默兹河。”

“由李斯特将军指挥的第十二集团军进行的第二次军事演习也得出否定的结论。李斯特将军主张在装甲部队抵达默兹河后原地待命,等到步兵上来后再渡河。我和十四集团军司令维特斯海姆(Wietersheim, Gustav)将军提出



异议。但伦德施泰特最终决定坦克师可以在渡河时打头阵,此外不可有非分之举。那是3月6日。伦德施泰特将军显然尚未充分了解装甲部队的能力。进攻总指挥舍曼斯坦因其谁!”

“3月15日,克莱斯特将军和我,还有伦德施泰特和他部下将领在柏林会见希特勒。每个人陈述自己的工作,发表自己对进攻方式的看法。希特勒问我渡过默兹河占据桥头堡后,我军该如何行动。我说应当继续迅速挺进直指亚眠和英吉利海峡的港口。希特勒点头赞许,没有人反对。”这样古德里安认为到时候他就可以一马当先如愿以偿,将进攻方案付诸实施。他看到了将战略深入的理论付诸实践的可能,决心全力以赴。他的那些谨慎保守的上司可能还会加以阻挠,但此时他们已经无法捆住古德里安将军的手脚了。

在探讨进攻方案时,古德里安始终强调要尽一切可能将重兵部署在阿登高原的突破点。陆总主张在那里部署少量的装甲师,这看似较为保险,其实在部队突破深入时带来的风险更大,会因此而丧失一战制胜的机会。正如古德里安对我所说的:“一两个师难以独立作战,打好战役需要整个装甲军团。集结大量的坦克是装甲部队独立作战的先决条件。1940年我要求集中所有的坦克向英吉利海峡方向进军,顺利地调集大部分坦克,成功地实现了自己的战略目的。”

## 法国的作战方案

德军在阿登高原突袭战中以摧枯拉朽之势大获全胜,这也要归因于法国的作战部署正中德军下怀,正好让德军新的作战方案大展宏图。事实证明让法国受到致命伤的并非通常所谓防守失误或“马其诺防线情结”,而是他们作战方案中的进攻设想。法军将左翼部队深入比利时,正好是让自己被敌方控制,突进的法军陷入困境,重蹈1914年覆辙,当年法军的第十七号作战计划使自己差点遭到灭顶之灾。这次的情况更为险恶,因为敌方是机械化部队而非靠两条腿行军。盟国在左翼突进比利时的军队包括法国的第1师、第7师、第9师和英国远征军,这些部队装备精良,是最先进的机械化部队,他们陷入战场后,法军最高指挥部就失去了可供调度的机动力量,结果受到更严重的惩罚。

德军新方案最大的优点在于盟军越往前进一步,对伦德施泰特在阿登高原的侧翼突破越有利。这在该方案草拟阶段就已经可以预见,伦德施泰特告



诉我说：“我们预料盟军会通过比利时和荷兰南部向鲁尔进攻，这样我军先发制人的进攻就会产生反攻的效果，我们就自然而然占得先手。”这个计谋出乎盟国的意料，但还不止于这一步。德军的右翼在比利时和荷兰边界发起进攻，刺激盟军冲进比利时和荷兰，以实施盟国在秋季拟定的 D 作战方案。博克的突进诱使盟军冲出自己的防守阵地，向前进入开阔地带，使其侧翼和后方暴露在伦德施泰特的迂回突破面前。

## 斗牛士的斗篷

希特勒向西方的突袭在朝海的一侧取得了惊人成功。这就像斗牛士的斗篷，吸引了全部注意力，人们因此忽视了阿登高原方面正在进行的突破，其矛头直指法国的核心。

5月10日凌晨，德国空降兵向荷兰首都和荷兰通信联络中心鹿特丹发起进攻。与此同时德军向其东面100英里的边防前线发动猛攻。前后两边夹攻，加上德国空军的狂轰滥炸，荷兰全国恐慌万状。德国装甲部队乘乱从南侧打开缺口，在第三天就与空降部队在鹿特丹会师。法国第7师匆匆赶来援助，可德军就在它的鼻子底下抄近路到达了目的地。第五天，荷兰就投降了。

德军的突袭强行打开了入侵比利时的大门，撬开门锁的正是空降兵，他们抢占了马斯特里赫特附近横跨艾伯特运河（Albert Canal）的大桥。第二天，装甲部队冲进开阔地带，从侧翼包围列日（Liege）防守森严的桥头堡。当天傍晚比利时军队全线溃败，丢弃了工事坚固的前沿阵地，向西方狼狈逃窜，因为此时盟军正按计划向代尔河一线进军。

德军对荷兰和比利时的正面进攻势不可挡，给人们的印象似乎是投入了重兵。值得注意的是德军并未投入重兵，对荷兰的进攻尤其如此。屈希勒尔（Kuchler）将军率领的第十八军负责进攻荷兰，它的兵力远不如对手，而且沿路河渠交错难攻易守。德军主要依靠空降兵的突袭来掌握主动。不过这支新型的空降部队规模之小出乎人们的意料。

空降部队总司令施图登特将军对我讲了详细情况。“1940年春，我们的伞兵部队总共才4500名受过训练的军人。进攻荷兰要一举获胜必须动用大部分伞兵。于是我们出动了5个营，共4000名伞兵。另外又空运一个师，也就是第二十二师，该师共有12000人。”

“有限的兵力迫使我们把进攻对准两个目标，这两个地方对入侵的成功至



关重要。由我直接指挥的主攻点是鹿特丹、多德雷赫特(Dordrecht)和穆尔代克(Moerdijk)的桥梁,从这些桥延伸的大路向南通往莱茵河。我们的任务是在荷兰人将这些大桥炸毁之前占领它们,等待地面机动部队的到来。我的部队有四个伞兵营和一个由三个营组成的空运团。我们出色地完成了任务,仅仅伤亡180人。我们可输不起,如果我们没能完成任务,整个入侵将以失败告终。”施图登特将军本人也是伤亡人员之一,他的头部被狙击手的子弹打伤,离开战场养伤花了8个月。

“第二个进攻目标是海牙。目的是占领荷兰的首都,尤其是要占领荷兰政府的办公机构,由施波内克(Sponeck, Count Hans Von)将军负责指挥,他的部队只有一个伞兵营和两个空运团。进攻没有成功,我军伤亡数百,还有许多人成为俘虏。”

施图登特将军被释放后向我透露了更多的详情。他告诉我,5月2日他和施波内克突然被召回柏林会见希特勒。“我们是最早得知西线进攻日的司令员,希特勒事先就告诉我们打算在5月6日发起进攻。由于天气因素后来改为5月10日。”施图登特将军还提到在会见时希特勒特意关照他们“要保证不可伤害荷兰女王和王室成员。”希特勒最后说:“女王威廉敏娜(Wilhelmina)深得荷兰人民和全世界的爱戴,只要不伤害女王,一切后果由我负责!”

与装甲部队的迅速突进不同,空降兵的突袭完全是来自希特勒的灵感,虽然施图登特将军的想象力也足以与希特勒相匹配,而且也是空降突袭的积极执行者。但施图登特将军坦然承认大多数空降突袭的方案均出于希特勒的亲自谋划。此前希特勒还策划过两次空降突袭方案,只是没有实行罢了。第一次是计划让空降兵占领比利时根特(Ghent)西南的“国家防御堡垒”,从而切断前方比利时军队的退路。

希特勒亲自拟定了这个计划。该计划吸取了1914年的教训,当时比利时军队凭借着坚固的防御工事顺利撤退,使盟军的防线延伸到海岸。10月底,希特勒将这个任务交给我,并花了不少时间和我探讨如何实施和如何取胜。然后我将计划进行细化……要实施这个计划困难不少,但我相信能够成功。一个远离敌方前沿、工事坚固的阵地不再有守军掌握,而是被敌军占领,这在军事史上将是史无前例的。



圣诞前几天施图登特接到新的命令。让他拟定另一个备用方案,该方案的目的是占领位于那慕尔(Namur)和迪南(Dinant)之间默兹河上的桥头堡,为克卢格的第四军打开通道。在总攻开始之前,两个空降突袭方案都备案待用。

空中事故导致泄密之后,整个进攻方案全部改变。装甲部队的主攻方向转为朝南,空降部队的主攻方向则转而朝北,对准“堡垒般的荷兰”。

施图登特将军告诉我,为了完成突袭荷兰这个重要任务,仅给进攻比利时的部队分派了500名伞兵。这些空降兵要占领艾伯特运河上的两座大桥和埃本·埃马尔(Eben Emael)要塞,这是比利时武器装备最先进的要塞,它确保了侧翼水上防线的安全。那支空降特遣部队规模虽小,却改变了整个格局。因为要接近比利时边界须先通过荷兰边界上那块凸出的地带,也就是所谓的“马斯特里赫特盲肠”(Maastricht Appendix)。而德军一旦经过荷兰边界,比利时前线艾伯特运河桥梁上的守军就有充分的时间得到警报,他们可以在德军地面部队通过15英里狭长地带之前就炸毁那些桥梁。空降兵在夜幕下悄无声息地从天而降等于开辟了一条新捷径,这也是确保那些大桥要道安然无恙的唯一方法。

入侵比利时的空降兵规模极小,离奇的是当时有关报道却说数千德国伞兵空投到比利时几十个地点。施图登特告诉我其中的奥秘。他说由于兵力有限,就在比利时各地空投了许多伞兵模型来迷惑敌方。加上谣诼纷传夸大了进攻人数,这个诡计极为成功。

施图登特接着说:

艾伯特运河这步险棋也是希特勒亲自谋划的,此人足智多谋,这一招堪称一绝。他召见我,向我征求意见。我考虑了整整一天,肯定此计可行,受命着手准备。我任命上校科赫(Koch)指挥500名伞兵。能征善战的第六军司令赖歇瑙将军和他的参谋长弗里德里希·保卢斯(Paulus, Friedrich)将军都认为这个方案风险太大,感到信心不足。

突袭埃本·埃马尔要塞的任务是由维齐希(Witzig)中尉带领78名伞兵组成的微型特遣队完成的。阵亡仅6人。这支微型特遣队出其不意地降落在要塞的屋顶上,制服了那里的空防人员,用新发明的烈性炸药炸毁了所有的炮楼和工事。这种炸药以前一直是保密的。

这种新型炸药的威力堪比第一次世界大战时42公分榴弹炮,这种榴弹炮曾将列日的碉堡和法国坚固的工事炸得粉碎。对埃本·埃马尔要塞



的突袭就是靠这种新型武器,而将这种炸药悄悄运往目的地的则是另一种新型武器——货运滑翔机。

维齐希中尉的特遣队在屋顶上将1200名守军牢牢控制了24个小时,直到我们的地面部队到达。

值得注意的是在比利时和荷兰战区,只有那些遭到伞兵突袭的桥梁没有被守军炸毁,其余的桥梁都按原先计划遭到彻底破坏。

贝希托尔斯海姆(Bechtolsheim)将军向我讲述了入侵的全过程,他是负责主攻的第六军司令赖歇瑙的手下干将。战前他曾出任德国驻伦敦大使馆的武官,我和他是老相识。

第六军的主力冲过马斯特里赫特,直趋布鲁塞尔,其右翼从鲁尔蒙德(Roermond)出发,经过蒂伦豪特(Turnhout)攻向梅赫伦(Malines),其左翼从亚琛(Aachen)出发,经过列日,直趋那穆尔。在战役的第一阶段,马斯特里赫特至关重要,或者更正确地说,马斯特里赫特西面艾伯特运河上的两座大桥是事关生死的要地。滑翔机将士兵运到西岸,在大桥可能被炸毁之前占领了它们。占领埃本·埃马尔要塞也是用同样的方法,只是不如前者那么迅速。第一天最令人遗憾的是马斯特里赫特地区默兹河上的桥梁被荷兰人炸毁了,这一来就使支援占领艾伯特运河地区空降兵的部队难以及时赶到。

不过默兹河上刚架起浮桥,赫普纳(Hoepfner, Erich)将军就率领第十六装甲军团迅速冲过河,向纵深进军。只是他深入的距离有点太远,只有一座桥可以通过,那里就成了一个瓶颈。一旦通过这个瓶颈,军队就能迅速扑向尼韦勒(Nivelles)。进军的速度就会越来越快。

最初的方案并没准备进攻列日,而是打算绕过这个防备森严的城市。左翼在北方作掩护,第四军的右翼负责南边。但是实战时我们的左翼直扑列日,没遭遇到什么强烈的抵抗就从后面冲进了城。

我军主力部队向西挺进,在代尔河(Dyle)一线与英国军队有过接触。我方暂时停止进军,集结部队准备进攻,与此同时从南方迂回进击,但是我军还没充分展开,英军就败退到了安特卫普。

在向布鲁塞尔进攻的过程中,我军一直准备盟军会在安特卫普向我右翼发起反攻。



与此同时,我方第十六装甲军团在南侧一路猛攻。他们在汉纳特(Hannut)和让布卢(Gembloux)与法国机械化骑兵军团交战。起初我方坦克数量不如对方,但是法国的坦克部队行动消极,从而丧失了优势。他们的驻足不前致使赫普纳军团其余的部队有时间赶到战场。到14日,我方在让布卢之战中开始占有优势。可是我们没能抓住机会一举获胜,因为赫普纳的部队又被召回,去增援在阿登高原已为我军占领的默兹河南的突破口。最高指挥部的这个决定让第六军在让布卢没有任何装甲部队可供调遣。

这个命令引起极大的不满,赖歇瑙发出强烈抗议。但是总攻的得失高于一切,他必须服从大局。第六军表现出色,它成功地吸引了法国最高指挥部的注意力,使他们忽略了在阿登高原正在形成的更大的威胁。在那些生死攸关的日子里,第六军牵制了盟军左翼的机械化部队。到13日那天,伦德施泰特装甲部队的前锋渡过默兹河,包围色当,冲进了法国北方绵延起伏的旷野。当德军从色当如潮水般地涌入时,法国统帅甘末林急忙打算调动其左翼的机械化部队加以阻挡,但他被告知机械化部队都被困在让布卢出不来了。

为了实现这个目的,削减赖歇瑙部队的攻击力也就显得合情合理了,因为在伦德施泰特的大网尚未撤到法国的后方时,硬逼盟军的右翼迅速后撤决非上策。

赖歇瑙的装甲部队被调走前,对他的空中支持就已经削减了。贝希托尔斯海姆说:“进攻的第一阶段,在渡过让布卢附近的默兹河和艾伯特运河时,空军给第六军以强有力的空中支持。但是轰炸机很快便被调集到南方攻击色当附近的默兹河渡口。”我问贝希托尔斯海姆英国远征军向代尔河进军时没有遭到空中的轰炸,是否是有意引诱它向前。他回答道:“至少第六军司令部没有这个意图,但也可能是上级部门的安排。”

伦德施泰特的军队从阿登高原突破,向英吉利海峡迅速进军,盟军的右翼全部陷入困境。在讲述此战役之前,有必要先提一下贝希托尔斯海姆有关第六军作战概述,第六军接着便向后来从代尔防线迟迟撤退的盟军发起追击。

这时,我们进攻的轴心直指里尔(Lille),我军右翼向根特进发,左翼指向蒙斯(Mons)和孔代(Conde)。在斯凯尔特河(Scheldt)首次与英军打





了一场恶战。本想往北迂回包围里尔,但是陆总下令将重点放在另一侧,以声援克卢格将军的第四军。第四军位于伦德施泰特集团军的右翼,此时他们正在鲁贝和康布雷(Roubaix-Cambrai)一带与盟军大战。我们第四军在图尔奈(Tournai)打了一场恶战,没能成功地突破英军的防线。

从康布雷传来了好消息,赖歇瑙将军终于说服陆总同意他的方案,从里尔北向迂回,直奔伊普尔(Ypres)。十一集团军以强有力的攻势在科特赖克(Courtrai)附近的利斯河(Lys)突破比利时军的防线。我们随即集中一切可以集中的力量直扑鲁莱斯(Roulers)和伊普尔。最终第六军彻底摆平了比利时军队。

“5月27日,从十一军方面传来消息,一位比利时将军来到德军司令部商谈停战事宜。此事上呈最高统帅部后,上面下令比利时必须无条件投降。”比利时人认输投降,第二天一早就放下了武器。“第二天,我在布鲁日(Bruges)召见比利时国王利奥波德三世(Leopold),他不太愿意到莱肯(Laeken)的城堡过幽禁的生活,他希望能到自己的乡间寓所去。我将他的要求汇报上去,但是没有被批准。”

我问贝希托尔斯海姆他是否认为比利时军队本可以抵抗更长的时间。他答道:“我看可以,因为比利时的军队损失并不严重。可当我驱车从排成长列的比利时军队前经过时,我发现他们中大多数人都显得很轻松,因为战争已经结束了。”

我提的另一个问题是此时有没有得到英军正准备撤退的消息。他说:“有报告说大量船只正在向敦刻尔克集结,我们因此猜测他们可能会从那里撤退。此前我们预测英军会向南退却。”

总结这次简短的战役,他认为:“我们遇到唯一真正的困难是穿过纵横密布的河渠,而不是比利时军的抵抗。第十六装甲军团被调离时带走了许多造桥的工兵,以致我们后来推进时困难重重。”

他还列举了这次战役的四大教训:

首先,最大的教训是在实战中必须加强空军和陆军的联络配合。这在马斯特里赫特和色当的主战场做得不错。但并不是所有的战役都配合得这么好。在马斯特里赫特之战中,里希特霍芬(Richtofen)的斯图卡式(Stukas)俯冲轰炸机给第六军以有力的支持。但随后这些轰炸机便被派



往色当去增援克莱斯特将军的进攻。空军必须与地面部队紧密配合,及时出击,这需要极大的灵活性。

第二,实战证明,在装甲部队被调离后,没有坦克的支持仍可由步兵发起进攻,这是因为步兵受过良好的训练,善于控制火力,精通突破深入的战术。大面积的威慑可以为集中突进打开缺口创造条件。

第三,当双方的坦克数量相当,又没有腾挪的空间,战斗就会陷入僵局。

第四,部队在进军时与敌交战必须要灵活机动。

## 斗牛士的猛刺

5月10日凌晨,前所未有的大量坦克集结在卢森堡公国(Luxembourg)边界对面,它们如箭在弦上,准备冲过卢森堡、比利时直趋70英里外色当附近的法国边界。攻击部队由三个装甲集团军组成,它们构成三个方阵,分为三个梯队,前面两个是装甲师,第三梯队为机械化步兵师。德国首屈一指的坦克专家古德里安将军负责指挥坦克部队,克莱斯特将军统领全军。

布卢门特里特将军描述道:“三个梯队相互尾随紧密配合,犹如一个巨型的方阵。”装甲战车的队列从头到尾可长达100多英里,在莱茵以东的50英里内布满了军队。克莱斯特将军也对我作过形象的描述:“如果装甲部队行进在一条道上,那么如果它的头在特里尔(Trier),它的尾巴就可以拖到东普鲁士的柯尼斯堡(Koenigsberg)。”

霍特(Hoth, Hermann)将军率领的一个独立装甲军团在克莱斯特集团军的右面,准备冲过阿登高原北部,直逼位于纪韦(Givet)和迪南之间的默兹河一带。

不过这些装甲部队组成的方阵只是集结在德国边界准备攻入阿登高原的大部队中的一小部分。按照布卢门特里特将军的说法:“A集团军已经有兵种齐全的86个师在窄而深的边界地带集结待命。”<sup>①</sup>他继续说:“从战术意义上看,穿越阿登高原不能算是一场真正的战役,而是一次逼近敌方的大进军。在筹备时我们就预计在抵达默兹河之前,不太可能遇到强有力的抵抗。后来证明这个预计正确无误。我们在卢森堡公国没有遭遇任何抵抗,只是在比利时

---

<sup>①</sup> 他是根据记忆说的,好像在数字上有误差。资料显示进攻之前A集团军由46个师组成,陆总还在那里布置了27个后备师。



的卢森堡省遇到轻微的抵抗,碰到过一些阿登轻骑兵(Chasseurs Ardennais)和法国的骑兵师。这些抵抗微不足道,一攻即破。”

主要的问题不是在战术上,而是在行政后勤方面,如行军中各种复杂的情况和供应的安排等等。关键是要充分利用所有可通行的大路和小道。在地图上制定行军路线要尽最大可能做到精确无误,要规定好前进时的章程,对来自陆路或空中的干预要有事先的准备。装甲师走大路,步兵师大多走分散的田野小路。参谋部最棘手的工作是要为连续出发的装甲部队制定出精准的出发路线,每个师行进的起点和终点都规定得精确无误。山路崎岖难行,林木纵横交错,地形十分险恶。大路的表面看似不错,其实陡峭不平,时常忽高忽低,弯弯曲曲。最糟的事情还在后面,当这些密集的坦克和步兵通过默兹河时,那里的河谷非常陡峭,致使进军部队步履维艰吃足苦头。

胜利的机会取决于进军的速度,克莱斯特的部队可以迅速冲过阿登高原,渡过色当附近的默兹河。只有过了河,他们的坦克才有用武之地。他们必须尽快渡河,否则一旦法国人明白过来,就会集结后备部队阻止他们过河。但是德国空军的照片显示在色当附近的河岸上有一个很大的桥头堡,上面工事坚固。有不少人原先就对希特勒—曼斯坦因作战方案有所质疑,这一来那些人的怀疑更是有增无减了。他们认为坦克无法冲破那些坚固的工事,要拿下那个桥头堡至少得好几天。

在进攻开始前的某一天,这些照片交给了一位擅长解读空中照片的奥地利军官,他果然独具慧眼,指出照片显示的法国防御工事刚刚动工不久,还没完工呢。他的报告立马被送到克莱斯特将军手中,德军的疑惧心理顿时烟消云散。克莱斯特将军十分清楚他必须让装甲部队和步兵同时推进,而不必等步兵清除前进障碍后再行动。向默兹河的进军就像一场赛跑,而不像一次通常意义上的军事行动。

虽然只是险胜,赛跑终于赢了。如果守军能够按照预先的计划破坏部分交通要道,以此来阻挡德军的前进,此战很可能会有不同的结果。“比利时人破坏了许多道路,致使我军的前进受到很大的延误。”古德里安曾经这么说过。

然而,幸运往往眷顾大胆者,却会严惩反应迟钝、战术陈旧的一方。古德



里安向我描绘了先头部队进攻的情况：

我们一举冲破比利时的卢森堡边界防线，那里防守单薄，守军只是一些阿登轻骑兵。随后我们在讷沙托(Neufchateau)与驻守在防御工事内的法国轻骑兵打了一场遭遇战。在坦克师面前，这些轻骑兵根本不堪一击！他们被驱散后，在我军坦克的穷追猛打下逃往瑟穆瓦河边(Semois)的布永(Bouillon)。他们企图守住布永，炸毁了通往布永防区的桥梁。但是第二天，也就是5月12日，德军第一装甲师攻克了布永。法国人随后沿着国界组成新的防线，那里原来就备有铁丝网路障和混凝土碉堡。这是通往默兹河的最后一道障碍，可在同一天就被我追击部队攻破。如果法军在那里有更多的守军，就不会这么轻易地一攻即破。那里的法国守军缺乏足够的反坦克武器和地雷。

如果敌方在瑟穆瓦河谷或边界前沿组织好有效的防御，德军就难以如此进军神速。盟军的密集轰炸也能阻延我们的进军。但是我看一开始盟军并没有认识到德军的进攻会对他们构成致命的打击。

在这个阶段，如果盟军的装甲部队对德军的侧翼发动反攻，很可能会影响到德军高层的决策，从而使这次进军止步不前。即便没有发动反攻，德军也曾一度对克莱斯特左翼可能遭到来自蒙梅迪(Montmedy)的进攻而感到惊慌。古德里安在谈到这一点时说：“5月11日，克莱斯特得到情报，说是法国机动部队正从蒙梅迪向我军挺进。他马上下令让我的左翼第十装甲师停止前进，准备调头抗击法军。如果我服从这个命令，我们就不可能攻克色当，尽早突破法国的防线。于是我命令第十装甲师师长沙尔(Schaal)将军沿着先前的路线以北几英里处继续向色当进军。与此同时，我要求克莱斯特派维特斯海姆的装甲军团和随我军进攻的步兵加强我的右翼。”

盟军可能在侧翼进行反攻，还有其他各种潜在的危险，伦德施泰特和布卢门特里特并不讳言当时他们的这些恐惧。回忆起当时的情景，布卢门特里特对我说：“当时我们很害怕盟国的空军，德军成群结队，如果你们前来轰炸，肯定会引起可怕的混乱。在没有抵抗的情况下，我军曾堵在瑟穆瓦河达24小时之久。军官要在飞机上才可能发现并解决这个问题。（古德里安的第一装甲师虽然已经通过，他在右翼的第二装甲师却滞留在那里。）我们部队才组建不久，行军作战并不如1914年时的德军那么训练有素。不过法英的空中威胁并



没有显示多少作用。这是第一大奇迹!”

布卢门特里特也详述了法国在防守上所犯的错误,指出他们防御不力。

敌方本来有几个月的时间在默兹河集结兵力。至少他们可以在那里构筑一些野外工事使马其诺防线得到有效的延伸。这样的话,一旦德军越过边界,他们便可以在同一时间进入防御工事,在那里静静地等待三到四天,以逸待劳,迎战德军。我们设想法国人会那么干,准备在默兹河进行一场恶战。我们以为法军的防御工作会准备得十分充分,并能得到炮火的支援。

针对这个设想,我们也拟定了一个应对的方案。该方案准备先让步兵团进攻默兹河,打开一个缺口后,再让装甲兵团随即通过。但这样得花将近一个星期时间。因为必须先调步兵上来排兵布阵,还有诸多的准备工作。进攻之前,所有的大炮必须赶往阵地,还要备足火药炮弹。

接着又发生了第二大奇迹。得知装甲师已经抵达色当北面默兹河岸边高地上的密林后,我和克莱斯特驱车前往察看,集团军司令伦德施泰特将军也亲临现场。我们一起驱车来到默兹河畔,装甲部队的工兵已经开始在那里造桥。默兹河西岸的混凝土炮台造型滑稽,规模很小,里面不时传出法国机枪稀稀拉拉的发射声。我们简直难以相信这个奇迹,还以为那是法国人的诡计。可我们所担忧的默兹河边顽强的抵抗事实上并不存在,那里的防御力量非常单薄。于是我们的坦克便争先恐后地过河了。

德军高层曾对这次进攻持谨慎和怀疑的态度,根据一般的战争经验,他们的这种反应也情有可原。轻敌自大通常不是取胜之道。但在这个战例中,法国方面仍死抱步兵时代的观念,而德军参战的将帅却已经具有坦克时代的观念,两相比较就产生了惊人的、具有决定性的结果。然而,若不是古德里安将军亲临战场,没有他自始至终对此战强有力的影响,德军能否取得如此辉煌的战绩也是令人怀疑的。

克莱斯特将军对我谈了他本人对此战的看法:

我的先头部队横越阿登高原之后,于5月12日跨过法国边界。那天早上,元首的副官施蒙特来了,他问我是愿意立刻继续前进,进攻默兹河,还是原地待命,让步兵团先上。我决定抓住时机马上行动。施蒙特将军



便说,明天,也就是13日,元首授权将德国空军包括里希特霍芬空中军团和俯冲式轰炸机全部归我指挥。当时我的指挥部在贝尔特里(Bertrix)附近,施佩勒尔(Sperle, Hugo)将军为此事特意飞来见我,12日傍晚,我们共同敲定了此次行动的具体安排。

就在那一天,我的先头部队已经冲过了默兹河以北茂密的森林地带,抵达河的南端,与对面隔岸相望。当晚,增援部队也上来了,准备强攻。13日早上,装甲师的步兵团也来到河边。下午,空军上千架飞机出现在天空。古德里安将军的部队在色当附近成功渡河。赖因哈特(Reinhardt, Georg-Hans)将军的部队在蒙丹梅(Montherme)附近渡河。蒙丹梅那里地势险要,河岸十分陡峭,进军相当艰难。

守军的抵抗并不厉害,真是幸运,因为我的炮弹仅剩50组了,而运送弹药的部队被堵在通过阿登高原的路上。到13日晚上,古德里安的军团已经在默兹河对岸建起了强大的桥头堡。步兵的先头部队直到14日才赶到。(古德里安说,步兵是在15日之后才赶到的。)

我向克莱斯特将军询问法国方面防守的情况。他答道:“沿着默兹河的防守并不十分严密,有一些碉堡,但没能配备与之相当的武器装备。如果法国军队在那里配备了反坦克炮,我们就不得不正视它了。因为我们大部分坦克都是早期的马克1型,这种坦克不经打!防守在那里的法军装备不整,战斗力较低。好多次在遭到我军的空袭和炮火轰炸不久,他们就放弃战斗了。”

法军4个由老兵组成的二级后备师驻守着40英里长的防线。他们布阵稀松,连最基本的反坦克炮也没有,也没配备防空高射炮。德军强行渡河时,先派出成群结队的飞机狂轰滥炸,坦克接着蜂拥而来,无怪乎那些不堪一击的法国步兵顷刻之间便土崩瓦解了。

古德里安将军对色当突破的描述更为详尽,他也为克莱斯特将军的一些说法提供了言之有据的例证。“克莱斯特将军和施佩勒尔将军拟定了作战计划,其中有关空军和我的坦克之间配合却难以实施,有幸的是我和勒尔策(Loerzer)将军制定的方案没被他们否决。我们的方案拟定从进攻开始到入夜,不断地对法军的炮兵阵地进行俯冲式轰炸。克莱斯特将军却突然下令进行短时间的集中轰炸。我的计划是要将法国炮兵压在防空掩体内,直到天黑。如果照克莱斯特的命令办,空中威胁最多只能持续20分钟。法国炮兵就能回过神来,在我军渡河时进行炮击。”在色当战区,德军投入了12个



空军轰炸机中队。

古德里安说,当时他的第二装甲师滞留在瑟穆瓦河边,他本来宁可等3个装甲师全部到齐后,在14日再发动进攻,但是克莱斯特下令当天下午就动手。进攻的重点集中在色当西面到圣芒日(St. Menges)之间一个半英里左右的默兹河上。由第一装甲师担任主攻,党卫军的机械化“大德意志军团”为助攻。这时第十装甲师已经抵达色当以东巴泽耶(Bazeilles)附近的默兹河畔,正在发起进攻。但是古德里安将他的火力集中在第一装甲师的主攻方向,准备在下午2时先开始轰炸。他发现对方的抵抗并不十分强烈,于是便将A. A. 军团88毫米的大炮调到河岸边,直接向对岸进行近距离的轰击,炸毁敌方在先行轰炸中幸存下来的混凝土碉堡。

古德里安选择的突破口为进攻打开了一条完美的通道。在那里默兹河向北急转弯流向圣芒日,然后又朝南转,形成一个口袋状的凸角。北岸的高地上丛林密布,可以掩护进攻的准备工作,也有利于架设大炮,瞄准目标。我曾亲临现场,发现在圣芒日附近可以俯瞰这个口袋状的凸角,穿过马尔费森林(Bois de Marfée)的高地则从背后构成了一道屏障。

下午4时,突袭开始。装甲师的步兵用橡皮艇和木筏强行渡河,迅速控制渡口,将一些轻型的军车运送过河。部队很快便占领了河湾的凸角地带,进而攻克马尔费森林和南部的高地。到午夜时分,先头部队已经深入5英里,与此同时工兵在色当和圣芒日之间的格莱尔(Glaire)架起了一座桥,德军坦克蜂拥而入。

即便如此,在14日那天德军仍未能完全站稳脚跟,只有一个师成功渡河,只有一座桥梁可以让增援和给养通过。盟军的飞机猛轰这座桥,德国空军的主力被调往别处后,盟国的空军一度占了上风。但是古德里安的A. A. 军团在桥上布下了一个强大的火力网,盟军的飞机损失惨重,无功而返。在中午之前,法军并没在地面上组织强有力的反攻。此后,古德里安的军力得到补充,他也不怕法国人发动反攻了。下午,当反攻的压力有所减轻时,古德里安的军队向右急转,第一和第二装甲师向西挺进,第十装甲师攻占朝南的阵地,成为向西挺进的大部队的侧翼。出其不意的转向,使德军的先头部队拿下了阿登运河上两座完好无损的大桥。夜幕降临之时,他的部队已经在10英里的纵深地带建立了前沿阵地。

15日一早,古德里安又开始向西突进。第一装甲师一度遭到有力的阻击,于是它便向北迂回,寻找防守薄弱的突破点。在与第二装甲师会合后,他



们一举攻破普克斯-泰隆(Poix-Terron),随后便扩大突破口,再向南从背后进攻曾经阻击他们的法军。法军的后防线顷刻崩溃,通往西线的道路就此洞开。此后在前往英吉利海峡的进军中再也没有遇到任何有力的抵抗。

然而,这天晚上古德里安却如坐针毡,不是因为敌人的抵抗,而是“装甲部队最高司令部下令部队暂停前进,原地待命。我实在不愿也根本无法接受这个命令,因为那将使我们的突袭前功尽弃。我给装甲军团的总参谋长蔡茨勒打电话,但无济于事。于是我就直接致电克莱斯特将军,要求取消这个命令。谈话进行得相当激烈,我们交换了各自的看法……克莱斯特终于同意在后24小时内我的装甲部队可以继续前进,巩固已经占领的地区,并扩大战果,让步兵紧随其后。”

古德里安充分利用了这次好不容易争来的机会,装甲师终于可以行动自如了。古德里安西进的三个装甲师和赖因哈特将军从蒙丹梅隘口过来的两个师,以及霍特将军从迪南附近赶来的两个师会合。大部队横扫万里,法国的防御全线崩溃。到16日晚,西线的进攻深入50英里之远,德军到达瓦兹河,直指英吉利海峡。然而急速前进的部队又一次被踩了刹车——踩刹车的不是敌人,而是自己的上司。

## 第一次止步

默兹河竟被如此轻易地攻克,德军高级指挥官无不感到惊讶,简直不敢相信会有这么幸运。更让他们感到惊讶的是居然没有遇到像样的反击。古德里安曾经担心在突破阿登高原时,部队的左翼会受到猛攻。“我在战前就认识甘末林,我力图猜测他的心思,料想他会让后备军从凡尔登向侧翼运动。我们估计为了达到这个目的,他可以动用30到40个师,但并没有发生这种情况。”

希特勒也有同样的担忧。结果他就下令暂停进军。这是他第一次插手干预,第二次干预的后果更加严重。西韦特(Siewert, Curt)从陆总的角度讲述了希特勒第一次干预的情况,“元首唯恐法军主力向西进攻,他希望等到步兵大部队到达,在埃纳河沿线对侧翼形成保障后,再发起进攻。”勒里希特当时担任陆总和第十二军司令部之间的联络官,他的表述更为清晰:“跟随克莱斯特装甲部队前进的第十二军渡过默兹河后正向西迂回,直奔英吉利海峡,突然接到命令要他们向南朝埃纳河方向迂回。魏克斯(Weichs)的第二军上来作为步兵后盾,跟随向海峡进军的部队。我当时认为这个命令是极大的错误,它会浪费





两天时间。最好让第二军向埃纳河迂回，第十二军则继续作为装甲部队的后盾向海峡进发。”

然而克莱斯特则持如下的看法：“我的部队其实只是停了一天。接到命令时，我们的先头部队已经抵达吉斯（Guise）和拉费尔（La Fere）之间的瓦兹河。有人告诉我命令直接来自元首，不过我认为这个命令还不至于直接导致让第二军取代第十二军来作为我们的后援。主要因为元首担心我军的左翼遭到反击。形势明朗之前，他并不在乎我们向纵深进军。”

古德里安的陈述更说明问题，他身处前线，认为犹豫不决的并非希特勒一个人。“5月16日大捷之后，我根本没有想到上级部门还会持原来的观点，即满足于在默兹河对岸建立前沿阵地，然后等待步兵军团的到来。我希望立即乘胜进军，突破之后就直扑英吉利海峡。我曾向希特勒详细讲述过这个观点。希特勒同意了曼斯坦因将军大胆的方案，对我深入敌方的建议也无异议，很难想象他会变得胆怯，下令让部队立刻暂时停止前进。不过，我犯了个大错，第二天一早，事情就变得明朗了。”

“17日一早，装甲部队总指挥部通知我停止进军，早上7时在机场等待会见克莱斯特将军。他准时到达，一见面就指责我无视最高指挥部的安排。”古德里安坚持认为自己贯彻了作战方案的精神，强调如果停止前进就会失去主动，功亏一篑。“我要求解除我的职务。克莱斯特将军略显吃惊，然后便点头同意，让我准备向接班的指挥官移交权力。”

但是集团军司令部在商讨之后，又命令古德里安暂不离职，等候跟随装甲部队之后的第十二军司令李斯特将军的到达。李斯特到达后，古德里安向他汇报了整个事情。“他以伦德施泰特将军的名义废止了将我撤职的命令。并向我解释，暂停前进的命令来自最高层，必须服从。但是他理解我要求继续进军的理由，并代表军团同意我展开强有力的军事侦察。”

在古德里安看来，“强有力的军事侦察”这句话的含意富有弹性，在第十二步兵军团于埃纳河一带形成强大的侧翼之前，他可以有两三天时间采取攻势，全速向英吉利海峡推进。在此战的初期，德军已经赢得了很多时间，攻克了敌方许多据点，所以在瓦兹河的暂停并没有对德军产生严重的后果。不过毕竟暴露了德军在时间把握上存在重大分歧。新派与老派之间的思想鸿沟要比德法两国之间的差距更大。

甘末林在二战结束时谈到德军渡过默兹河的战略应用时说：“这是一场出色的运动战。但事先是否就完全预见战事将如此发展呢？我看未必。正如拿



破仑当年也不曾完全预见耶拿(Jena)之战的过程。毛奇(Moltke)也没能完全料到1870年色当之战的结果。这是随机应变的杰作。它显示了一个指挥官灵活多变的作战能力,他善于组织军队快速行动,而坦克、飞机和无线电更使他如虎添翼。没有动用大部队就能拿下决定性的战役,这或许是首开先例吧。”

根据前线指挥官乔治斯(Georges)将军的说法,按照比利时卢森堡省的阻击方案,本来很可能让德军“拖后4天”才能到默兹河。法国总参谋长杜芒克(Doumenc)将军说:“我们自以为敌方会照我方的预料行事。我们以为德军要等大部分步兵上来后才会试图渡过默兹河,这样他们至少需要5到6天时间,我们就会有足够的时间收复失地。”

值得注意的是法国军方的预料与“山的那一边”的德军上层的想法何其相似。法国军事领导的运筹决策自有其理由,他们对德军进攻的基本预想也不无道理,尤其是在战斗打响后情况更为明显。但是他们忽略了这个人因素——古德里安。古德里安将军深谙装甲部队独立作战纵深突破战术,对这种战术的可行性深信不疑。法国军方高层以为德国将领无不对上司唯命是从,古德里安则偏偏不唯上,以他的特立独行使法国人一再失算。古德里安和他的坦克兵带领着德军勇往直前,取得了历史上最辉煌的战果。

随着战役的深入,时间因素显得越发重要。法国的反攻一再贻误战机,就是因为他们的时间观念跟不上战局的进展,还有一个原因就是德国坦克的行进速度要比德军最高指挥部快得多。

## 奔向大海

德军高层的不安是可以理解的,更何况他们的指挥部远离前线。法国在默兹河防线的迅速崩溃,又没能组织有效的反攻,胜利似乎来得太容易了,简直让人难以置信。战事的发展证明了德军高层的错误估计,但并没能驱散他们心中的恐惧。机械化部队的闪电战一举打垮了法军,因为他们无论在精神上和物质上都难以适应这种战术。希特勒下令德军暂停进攻,使法军得到片刻的喘息机会,但处于瘫痪的法军仍难以由此获利。

渡过默兹河,德军向西挺进,一路上几乎没遇到什么抵抗。坦克沿着敞开的走廊轰隆向前,将盟军在比利时的左翼抛在后面。军事评论员将所谓“凸出地带战役”描绘得活龙活现,那纯属子虚乌有,事实上只是一路顺风的前行。



侧翼部队偶尔会受到一些零星和随意的攻击。第一次是在色当以南的斯敦尼(Stonne),法军的第三装甲师一度阻击德军,但很快就被击退,因为它的侧翼受到德军重创。第二次是在拉昂(Laon)附近,发起阻击的是戴高乐将军新组建的第四装甲师。克莱斯特评论道:“并不像外界所大肆渲染的那样,这次阻击并没有给我军带来多大的麻烦。古德里安没告诉我,就自己解决了,我是第二天才得知此事的。”至于法国另外两个装甲师,第一装甲师耗尽了汽油,束手无策地被德军包围,第二装甲师则被派去分散驻守各个桥梁而实力殆尽。

德国的装甲部队在瓦兹河稍作停顿后便向西挺进,他们前进的速度是如此之快,敌方完全乱了套。克莱斯特举例说:“在前往海边的途中,一个参谋递上一份从法国电台截获的消息,内容是法国驻守默兹河的第六军司令已经被解职,任命吉劳德(Giraud)将军负责处理该地战事。我还在看电报,手下人带了一个英俊的法国军官进来。那人自我介绍道,‘我是吉劳德将军’。他告诉我,他乘着一辆装甲车去视察部队,不料却发现周围全是德国士兵,他根本没料到德军会来得这么快。我第一次碰到英国人也是在路上,我们的坦克追上了一营英军步兵,他们身上还带着模拟的弹药筒,正在搞演习呢。这也间接说明了他们显然没料到我们会来得这么快。”德军如洪水般地涌入英国远征军的后方,而此刻英军的大部队还在比利时内地磨蹭。

克莱斯特继续说:“总之,突破之后,我们就再没有遇到强烈的抵抗。赖因哈特的装甲部队在勒加托(Le Cateau)附近打了几仗,那不过是一些引人注目的插曲而已。古德里安的装甲部队向南方挺进,一路所向披靡,在20日就到达阿布维尔,这样就将盟军的部队一切为二。维特斯海姆的机械化师紧随其后,迅速攻占了佩罗讷(Peronne)到阿布维尔之间索姆河沿岸的防线。与此同时,古德里安在第二天挥师向北。”<sup>①</sup>他已经切断英国远征军与基地的联络,现在他要切断英军向海边逃离的退路。

克莱斯特的坦克群进入法国后,负责掩护的侧翼部队实行轮班制,以保持前进的动力。步兵军团紧随装甲军团,在战争的各个阶段听从克莱斯特的命令在侧翼布防。但后来因为装甲部队前进的速度太快了,与步兵之间拉开了一个危险的空隙。一小支英国部队突然发起反攻,插入这个空隙。

伦德施泰特告诉我:“我的部队抵达海峡后,一度险遭不测。5月21日,

---

<sup>①</sup> 但是古德里安说22日才真正开始向北进军,“为了整顿队伍,在21日就暂停了一天”。不过他的先头部队已经指向欧蒂河(Authie)一线,准备向北进军。



一支英国部队从阿拉斯(Arras)朝南向康布雷发起反攻。我们曾经十分担忧那将切断我军装甲部队与后继步兵师的联络。法国军队的反攻都无损大局,但这次反攻却对我军构成严重的威胁。”[这次反攻确实让德军大吃一惊,险些造成这次进军中途夭折。幸亏这只是一支小部队,它属于马特尔(Martel)将军第五十诺森伯兰(Northumbrian)师。该师有第四和第七营组成的皇家坦克团。假设英军当时不是只有几个营,而有两个装甲师的话,德军的进攻方案很可能就此泡汤。]

这次反攻是冲破德军包围的最后一次努力。德军从后方向驻扎比利时的盟军撒开了一张大网,并很快就开始将这张网越收越紧。法军左翼的大部队和比利时军队全部陷入重围,只有英军靠“敦刻尔克奇迹”才死里逃生。战后重新检视当时英军逃跑的情形,令人感到简直不可思议。那全是因为希特勒的插手。

直到那时,事实证明希特勒要比他的那些高级将领更为高明。但是从战争的或然性看,那些将领的担忧也不无道理。任何理性的思考都不会料到法国总指挥会铸成如此大错,让德军的左路公然深入比利时的平原地带。若不是法军这一重大的失算和古德里安超乎寻常的勇猛突进,希特勒的进攻至多只能得到有限的成功。如果德军只是短距离进入法国边境,在那里停滞不前的话,二战的历史乃至世界的格局都将有所不同。

布卢门特里特将军说(也得到其他将军的首肯):“希特勒的判断被证实后,他在将领面前更为如痴如狂,将领们也比过去更难与他争辩或对他的决策有所制约。”到5月13日发生的事情证明,较之法国,这样的结果对德军将领、对德国更为不幸。

仅仅一个星期后,幸运的天平便开始转向。

## 希特勒下令“暂停进军”

向北挺进,古德里安的装甲军团直奔加来,而赖因哈特则率领军队横扫阿拉斯西部地区,向圣奥梅尔(St. Omer)和敦刻尔克进军。22日,古德里安切断了布伦涅(Boulogne)与外界的联络,次日包围了加来。就这样大踏步地前进到了格腊夫林(Gravelines)的阿运河(Aa Canal),那里离敦刻尔克只有10英里之遥。敦刻尔克是英国远征军出逃的唯一港口,而英军的大部队此时还呆在比利时呢。赖因哈特的军团也到达了艾尔(Aire)—圣奥梅尔—格腊夫林一带



的运河沿岸。当时只有一营英国军队驻守在格腊夫林和圣奥梅尔之间 20 英里长的阿运河一线。有 60 英里长的运河沿线几乎没有有什么像样的防守。许多桥梁没有遭到破坏,甚至都没做炸毁它们的准备。在 5 月 23 日那天,德军装甲部队轻而易举地在运河对岸不少地方建立了前沿阵地。正如戈特(Gort)在急电中所言,“河流就是这边唯一的反坦克障碍。”一旦过河,就没有任何东西可以阻止坦克前进的步伐,也再也没法阻止德军将逃往敦刻尔克的英国远征军置于胯下。

在这关键时刻,克莱斯特接到命令,让他的部队在运河一线暂时停止前进。最初是由谁发出这个命令的?对此说法不一,但正是这个命令迫使部队止步不前则是毋庸置疑的事实,有大量的档案和当事人可以见证。正是敌方高层的命令使走投无路的英军得以死里逃生。

克莱斯特说当他得到命令时简直感到不可思议。“我决定无视这个命令,越过阿运河继续前进。实际上我的坦克已经进入阿兹布鲁克(Hazebrouck),将撤退的英军切割开来了。事后我得知当时英军司令戈特勋爵已经在阿兹布鲁克。然而这时又接到口气更为强烈的命令,令我军撤回阿运河,致使我的坦克在那里滞留了三天。”

古德里安说:“我再三反对,他们就是听而不闻,相反,还不断强调那个该诅咒的命令。法国战役后,我问陆军元帅勃劳希契将军他为何同意让装甲部队止步于敦刻尔克。他说那是希特勒的命令,并说他曾希望有人会不听从这个命令。”但是,在渡过默兹河后,在前进的途中发生了太多的事情,暂停的命令措词严厉,即便是古德里安也不敢再冒被撤职的风险而违抗命令。

曾在总参谋部主管坦克战的托马将军对我说,当时他正和古德里安的坦克部队挺进到贝尔格(Bergues)附近,敦刻尔克镇就在眼皮底下了。他直接向陆总发了多次电报,苦苦请求让坦克继续进军。但这些请求如石沉大海。谈及希特勒的态度,他不无尖刻地说:“跟这种白痴有什么好说的?希特勒这家伙让唾手可得的胜利毁于一旦。”

与此同时,英国军队不断地撤往敦刻尔克,并加强防御以掩护士兵上船渡海。德国坦克部队的众将就这样眼睁睁地看着英国人从自己鼻尖下溜之大吉。

“三天以后才取消禁令,”克莱斯特说,“部队重新开始前进,但此时就遇到了强硬的抵抗。我的部队刚刚开始前进,可是希特勒又命令我们后撤,转而向南去收拾法国临时布置在索姆河一线的残部。在英国人逃走,让从比利



时下来的步兵去占领敦刻尔克”。

几天后,克莱斯特在康布雷的战地遇见希特勒,他斗胆指出英军全身而退,德军在敦刻尔克丧失了一次极好的机会。希特勒回答道:“可能是的,但我不想让德国的坦克陷在佛兰德的沼泽地带,英国人不会再回来参战了。”

对其他人,希特勒也给出各种理由,比如许多坦克出了故障,部队需要休整,进攻之前还必须加强侦察。他还解释说要确保有足够的坦克对法军残部进行攻击。

那些将领被迫止步不前,眼看着就要到手的胜利功亏一篑,希特勒的这些解释并不能让他们心服口服。那些装甲部队的指挥官对我说,当时每天有新的坦克运来取代废弃的坦克。他们对陷入沼泽的说法更感到可笑,当时他们身处战场,对情况的判断要比希特勒更高明。然而希特勒的解释亦非虚言,当时这三个理由一直盘旋在他的脑海中,他不得不为之再三思量。但这些还不是他做出致命决策的全部原因。



## 第十二章 兵临敦刻尔克时下令“暂停进军”

敦刻尔克是英军出逃唯一的港口,上级却命令德军装甲部队在敦刻尔克外围暂时停止前进,此事堪称二战史上一个难解之谜。

战后陆军元帅勃劳希契的副官西韦特将军最早对我谈起此事,他十分肯定地说阻止德军装甲部队前进的命令来自希特勒本人。他还讲起勃劳希契和哈尔德持反对意见,他们力图取消这个命令,这个说法得到有关档案的证实。后来陆军元帅伦德施泰特和布卢门特里特将军也对我讲了,这个命令是如何通知 A 集团军的。伦德施泰特说是由陆总的格赖芬贝格(Greifenberg)上校打电话通知的,上校还表示哈尔德持反对意见。布卢门特里特将军说是他亲自打的电话。

但是丘吉尔先生在他写的战争回忆录中说,让装甲部队暂时停止前进的命令“最早是由伦德施泰特提出来的,不是希特勒”。他的根据是伦德施泰特部队的战时日志,日志记载了 5 月 24 日上午希特勒在沙勒维尔(Charleville)造访伦德施泰特司令部时俩人交谈的情况。

但是在具有识见的历史学家看来,丘吉尔所谓有力的证据未免言之过当。史学家最清楚这些战时日志是如何编纂的,也明白其中不乏错谬之处。战时日志通常是由一些低级军官搞的,他们并未亲自参与那些重要的会议。在实施重大举措的非常时期,日志的记录和核实往往与真实的情况相距甚远。对于任何孤证都必须小心处理,何况日志本身的记录并不像丘吉尔由此得出的结论那么清晰。丘吉尔将日志的记录归纳如下:

23 日午夜,勃劳希契从陆总发来有关“包围战最后作战”的命令。次日上午,希特勒会见伦德施泰特,伦德施泰特表示快速深入敌方的装甲部队已经力有不济,需要暂停修整,以便养精蓄锐进行最后的攻击……而且伦德施泰特预料他的部队从北到南过于分散,可能会受到攻击……希特



勒“完全同意”对阿拉斯东面的进攻交由步兵来完成,机动部队应当继续固守朗斯—贝蒂讷—艾尔—圣奥梅尔—格腊夫林(Lens-Bethune-Aire-St Omer-Gravelines)一线,以便拦截被B集团军在东北方阻击的敌军。他还考虑到当务之急是保存装甲部队的实力以便后续的作战行动。

然而从这些叙述中看不出最先提出停止前进的是伦德施泰特。含糊其词的日志至多表明伦德施泰特在评判战局时所表示的忧虑与希特勒的观点相符。史学家不可能仅凭这一点就否定其他军官的见证,他们众口一词认定命令出自希特勒本人,是从他的司令部发下来的。而且哈尔德在陆总的日记也更清楚地证实了这些军官的陈述。

将这些记录和其他证据联系起来研究就能让事件的脉络显得更为清晰。德军渡过默兹河后,哈尔德最初的想法是伦德施泰特的军团应当向西南进军。进攻的轴心将通往贡比涅(Compiègne),指向鲁昂(Rouen)附近的塞纳河下游(虽然在通过贡比涅后,哈尔德曾想转向东南经过巴黎)。进军将采取梯形阵式,其左翼后退一步,当部队前进时就能与右翼互为屏障,以防侧翼受到攻击。部队进军时,右翼克卢格的军队转向博克的集团军,帮助它包围在比利时的盟军。

但是希特勒对向西南进军的看法并不当回事,他有自己不同的打算。他想让装甲部队停止脚步,等到增援的步兵沿埃纳河筑起一道防线来掩护南翼,然后再派装甲部队向西北开到在比利时与博克军团对峙的盟军正后方。哈尔德17日中午的日记中记载,当天上午古德里安就被迫停止前进。提到与希特勒的会见,哈尔德写道:“双方没有任何商讨的余地。元首固执己见,认为主要的威胁来自南方(我看根本不存在什么威胁)。”接着日记对新的指令进行了归纳。后面又写道:“极不愉快的一天。元首紧张得要命。被他自己的胜利吓坏了,他不敢再去冒险,要给我们套上笼头。其理由无非是要顾及南翼。”(然而希特勒的理由要比哈尔德所想的更好,比如说是因为伦德施泰特仍然担心甘末林会从东南方发起反攻。)

哈尔德为耽误时间和坐失战机而忧心忡忡,第二天早上,也就是18日的日记中到处可见这种担忧:“每个小时都十分珍贵,可是元首的最高统帅部却看法迥异。元首老是担心南翼,他狂怒尖叫,指责我们会毁了整个战役。他再也不想谈什么继续向西挺进,更不要说向西南方向了。一心只想着向西北进军的计划。”经过一次“最不愉快的会谈后”,希特勒才同意装甲部队应当西





进,但并没有立刻下达命令。

不过当天晚上哈尔德向希特勒汇报第十二军的步兵团正在迂回进入埃纳河一线,总算得到希特勒的同意让装甲部队向海边进发。

哈尔德的另一个忧虑是在比利时的盟军是否会迅速插入南方,“博克的军队是否能赶走敌军,追上克莱斯特。考虑到大胆的博克敢冲敢打,很可能造成这样的结局。”哈尔德有点过虑了,就在那天,也就是20日,克莱斯特的先头部队在古德里安的率领下到达了索姆河口,切断了敌军供应线和退路,随即便挥师北上。从日记看,哈尔德原来打算只是让博克军团咬住敌军,伦德施泰特的部队“切入敌人的后方,发起致命一击……我想把A集团军作为铁锤,B集团军作为铁砧”。

事情变得有点复杂,因为两个集团军并不是齐头并进,而是越来越靠拢。伦德施泰特左翼的装甲部队正朝博克的右翼直线挺进。为了避免混乱,勃劳希契打算把围攻的最后阶段交由博克来完成,这就需要调整一下两个集团军之间的布阵,让克莱斯特的装甲部队连同克卢格的部队从伦德施泰特那里移交给博克。23日傍晚,他就此下达了一系列命令。

哈尔德原本希望在最后阶段勃劳希契能与自己协调一致,但没能说服他这样做。他在日记中不无尖刻地批评勃劳希契:“刻意逃避责任。他总是声辩自己无法作出抉择,只能在自己和博克之间协调。但作为一个男人,从道理上说,他本来应该有所担当,有所抉择。我没在命令上签名,表示我的态度就是不同意。”

哈尔德对我详述了他的理由:“面对如此艰巨的任务,各种意见都汇集到了陆总。从心理层面看,采取这样的措施会显得能干的伦德施泰特似乎缺乏信心,尽管他并非有意这样。博克野心勃勃,他的参谋长扎尔穆特(Salmuth)向来态度强硬,由此可见要贯彻执行这个命令势必会引起两大集团军之间的严重冲突。”

且不管个人意见如何,不难猜测这个命令对伦德施泰特的影响。他自然会更多地关注下一阶段的战役,即向南进军。而不再为完成北方的包围而费心,因为这个任务将移交给博克。这肯定会影响他对形势的看法,而第二天早上希特勒来到伦德施泰特的司令部召开军事会议。在会议上,伦德施泰特强调了在下个阶段战役中确保装甲部队实力的重要性,这与希特勒的观点不谋而合。可以理解23日傍晚勃劳希契发出的“移交”命令与伦德施泰特次日上午在司令部的会谈纪要有相当重要的因果关系,也势必影响到当天下午希特



勒下达暂停前进的命令。

早在 22 日,古德里安的军队开始从阿布维尔地区向北挺进之时,希特勒在当晚与勃劳希契交谈时就表示了他的疑虑。他指责哈尔德刚刚发出的包围令,哈尔德命令 A 集团军的坦克部队尽快向北进攻,切断盟军通往海边的退路。希特勒说他认为坦克在佛兰德沿海低地作战风险太大,他还考虑到已经损坏的坦克,强调他可不愿失去更多的坦克,因为在法国第二阶段的战役还需要大量的坦克。

希特勒观点是 A 集团军的职能应当从铁锤转为铁砧,从后面挡住被 B 集团军从南方驱赶过来的盟军。克莱斯特和约德尔与希特勒观点一致。但希特勒感到仅有他们俩人的支持还不足以否决勃劳希契和哈尔德的决策。在战略问题上伦德施泰特的意见分量不轻,他对形势的判断以及对第二阶段战役的重视深得希特勒之心。希特勒善于利用一方军事专家的观点去压另一方的观点,从而达到自己的目的。看来很可能那天希特勒见伦德施泰特的目的就是借助对方的观点来证明自己的看法,进而实施自己改变过的作战方案。

与伦德施泰特会晤后,希特勒采取的第一步措施是马上取消“移交”令。命令要到晚上才能生效,但在早上可以起到一些先期的遏制作用,因为那些将转归博克指挥的部队军官自然会等待新的军团所发来的指令。[丘吉尔先生本人也提到“5 月 24 日上午 11 点 42 分,我们截获德军电报,内容是暂停对敦刻尔克—阿兹布鲁克—梅维尔(Merville)一线的进攻。”]

下午希特勒召见勃劳希契,哈尔德也在场。哈尔德日记写道:“与元首的会见极不愉快”,元首断然发出新的命令“取消昨天的命令……尽管前方没有敌军抗击,我军由装甲机械化部队组成的左翼必须服从元首的命令停止前进。消灭被围困敌军的任务将由空军完成!”

第二天部队仍旧原地不动,哈尔德 26 日日记中有些记录值得一看:

8 时:情况依旧。博克损兵折将,进展缓慢……我们的装甲部队已经停止前进,好像瘫痪在贝蒂讷(Bethune)和圣奥梅尔之间的高地上,他们这样只是为了服从上级的命令,不许进攻。这样搞的话,清除被围敌军可能要花几个星期。

11 时:整个上午(勃劳契克)都十分紧张。我很同情他,上面那些命令毫无道理。在一个战区,撤退的敌军阵容严整,上面命令我们进攻。在另一个战区,敌军的后防不堪一击,上面却命令部队原地不动。伦德施泰



特也感到难以容忍,他跑到霍特和克莱斯特那里去视察地形,准备装甲部队的下一步行动。

12时:电话通知我们说元首已经批准左翼部队向敦刻尔克炮火射程范围内行动。

13时30分:元首召见勃劳契克。勃劳契克回来时脸带微笑。元首终于批准向敦刻尔克进军,以阻止更多的敌军逃跑。

但此时松开刹车已经太晚了,盟军利用这段宝贵的喘息时间在敦刻尔克周围筑起了牢固的防守阵地。哈尔德27日的日记不无沮丧地写道:“左翼的克莱斯特似乎遭遇到比料想更顽强的抵抗。进攻进展缓慢。”因为英国远征军的主力已经成功回撤,加强了前沿阵地的防守力量,抵抗自然也就更为顽强了。从5月26日到6月4日敦刻尔克陷落,338 000名(包括114 000名法军)盟军成功地从海滩和港口撤回英国。

希特勒惯于将错误归咎于他人,如果他认为是伦德施泰特怂恿他阻止装甲部队进军,在英军逃逸后他所给出的理由中肯定会提到这一点。但在他后来的种种解释中从来没有提及伦德施泰特的意见是促成停止进军的因素。这是一个充分有力的反证。

布卢门特里特的证词也值得注意,他指出24日会议上伦德施泰特确实提出让部队休整,养精蓄锐发起最后一击,但伦德施泰特不是说当下的敦刻尔克和完成第一阶段战役,而是指在下一个阶段消灭残余的法军之后。这样的解释合情合理,与伦德施泰特说话的原意更相吻合。一个优秀的战略家决不会在包围行将大功告成之时主张推迟行动,但是他会发起新的攻势前主张休整一下部队。北面的战役一结束,就要尽快整顿部队,准备向南发起攻击。哈尔德日记表明26日上午伦德施泰特显得焦躁不安。

伦德施泰特错就错在他的焦躁来得太晚,或者说错在停止进军的命令刚下达时没能立刻提出抗议。布卢门特里特回忆道,当他用电话将命令传达给伦德施泰特和他的参谋长索旦斯登时,“俩人情绪稳定,没有表露出任何愤懑。相反,情绪激动的质疑均来自前线的指挥官”。布卢门特里特还告诉我,从第一阶段的战役开始到结束,“伦德施泰特一直担心法国人会从南方向色当朝我军在埃纳河薄弱的侧翼发起大反攻,因为他一向不敢小觑法国军方的指挥才能。在这个阶段,他对南方的关注要大于英吉利海峡。”值得注意的是此时伦德施泰特的司令部还远在沙勒维尔,那里靠近色当,紧贴着埃纳河,面朝南方,



位于整个德军前沿阵地的中央。从这个位置可见他的战略重点所在,同时也说明他对似乎胜券在握的右翼并不十分在意。伦德施泰特的眼睛并没有盯死在敦刻尔克。

至于敦刻尔克的坐失良机,克卢格和克莱斯特的责任比伦德施泰特更大。哈尔德日记 23 日下午记载了陆总联络官汇报装甲军团司令部的情况:“17 时:吉尔顿菲尔特(Gyldenfeldt)传达了克莱斯特的忧虑。克莱斯特感到如果仍然没法解决阿拉斯附近的危机,他就难以完成任务。装甲部队的损失已达百分之五十。我向他指出,48 小时内可以解决那里的危机。我了解派给他任务的分量。他必须顶住。索姆河一线没有什么危险。”古德里安也说:“由于克莱斯特从装甲军团发来的命令,从亚眠到海岸的进军一路上可谓小心翼翼。从欧蒂河(Authie)到康什河(Canche),克莱斯特将军亲自指挥先头部队的一举一动。他的命令具体到何时渡河。这样就使部队在没有遭遇敌军的情况下毫无理由地走走停停,进军的速度本来可以快得多。”古德里安部队的拜尔莱因将军也说道,一开始时走时停,后来又下令停止前进,这使他的上司古德里安“极为恼火”。

其他好几位将军谈到,英军坦克曾在阿拉斯发起反击,虽然这些反攻规模不大,还是让第四军司令部深感不安。克卢格曾认真考虑过要全面中止进军。伦德施泰特在叙述那次危机时也证实了这一点。

## 希特勒的理由

至于希特勒颁布暂停进军的命令理由何在,我从瓦尔利蒙特那里得到的证词尤其能说明问题,因为他当时正在最高统帅部。当他得知有这么个命令后曾向约德尔询问确切的情况。“约德尔证实命令已经下达,并对我的询问表示很不耐烦。他的立场与希特勒一致,并强调希特勒和凯特尔还有他本人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时都曾亲临佛兰德低地,确知坦克在沼泽地带难以施展,硬上必然会蒙受重大损失。装甲部队的实力已经有所削弱,在法国发动第二阶段进攻的任务又迫在眉睫,所以再也经不起折腾了。”(瓦尔利蒙特还说,如果暂停前进的命令最早来自伦德施泰特,他和最高统帅部的其他人员肯定早就得知此事,为命令辩护的约德尔也肯定不会不提到陆军元帅伦德施泰特最早提出或至少是支持这个决定的。这样就可以让那些批评者闭口,因为“论及军事行动,伦德施泰特在总参高级将领中具有不容置疑的威信”。)



瓦尔利蒙特继续说：“另一大理由在于，当我得知暂停前进的命令时，戈林出现了，他向元首打包票说空军可以从空中收紧海边的袋口，最终完成围歼英军的任务。他肯定夸大了空军的能力。”瓦尔利蒙特的说法与前引 24 日哈尔德日记中最后一句话可相互印证。古德里安说，克莱斯特向他下达命令时说：“敦刻尔克就让空军去处理吧。攻克加来如果遇到困难，也可以让空军去对付那些堡垒。”古德里安指出：“我认为正是戈林的狂妄自大促使希特勒作出那个致命的决定。”他还说：“我没有等待空军的支援就率领第十装甲师在 5 月 26 日攻克加来。再说空中轰炸对摧毁老将沃邦（Vauban）的地堡要塞（1698—1701 年法国军事工程师沃邦在阿尔萨斯堡建设的新布里扎克建筑的要塞长久被认为是欧洲最好的要塞——编者注）起不了多大的作用。”

## 加来问题

鉴于外界盛传加来防守战对整个战局至关重要，古德里安的有关陈述也就显得意义非同寻常。一个英国步兵旅和坦克营赶到加来增援法国驻军。24 日那天，丘吉尔亲自出面干预，他取消了让这些英军再上船撤退的命令，坚持要“加来驻军决一死战，不得从海上撤退”。

1941 年公布的官方报告就加来防御战一事声称，虽然驻军被全歼，“但在这生死攸关的四天里，驻军殊死拼杀，牵制了德军至少两个装甲师，否则英军退往海边的道路就可能被切断。德军装甲师如长镰横扫所向披靡，却在加来打了个磕绊……刀刃碰上了顽石”。

丘吉尔甚至在战后还声称：“加来一战至关重要。其他许多原因也可能阻碍敦刻尔克撤退，但是加来防守战赢得了三天时间，这就确保格腊夫林水路的安然无恙。否则哪怕有希特勒的犹豫不决和伦德施泰特的命令，盟军还是难免被切断退路，遭到全歼。”

丘吉尔自然要为他牺牲加来守军的决定辩解，令人费解的是他现在居然还要声称这个决策是如何有效。当时德军在该地区有七个装甲师，进攻加来的只是其中的一个。因为希特勒下达中止前进的命令后无事可干，这个师才被派往加来。否则在德军装甲部队主力冲向敦刻尔克时，一小支特遣部队就可以围住这个小镇。其实早在 23 日，德军已经绕过了加来，并封锁了它通往外界的道路。

古德里安在评论此事时曾说：“英军保卫加来之战对敦刻尔克的战役没起



多大作用。我们延迟进军并不是因为那里的抵抗。”即使没有古德里安的证词,只要不带偏见,实事求是,显然都会得出相同的结论。英军的确在加来英勇奋战,但这并不能掩饰派他们去作出的牺牲于事无补这个事实。

## 关于希特勒的动机

中止向敦刻尔克进军命令背后的动机到底是什么,有关将领始终感到这是个难解之谜。装甲部队的指挥员尤为困惑,因为他们当时已经兵临城下,感到没有丝毫理由停止前进。于是他们纷纷愤而上书,吁请上级司令部批准部队继续进军。然而与我交谈过这个问题的大多数德国将领认为,希特勒作出这个决定有其军事上的理由,虽然他们不知道希特勒最迫切的理由到底是什么。

然而有些人具有不同的看法,他们认为希特勒的决定是由其他动机促成的,或者说至少受到其他因素的影响。哈尔德就曾怀疑希特勒的决定出于政治目的,他的日记当时就是这么说的。在5月25日上午的日记中,哈尔德强调希特勒的新命令颠覆了原先的作战方案,并指出“政治头目固执己见,认定决战的地点必须在法国北部,而不应在佛兰德的土地上。为了掩饰其政治动机,他们便断言佛兰德沟渠纵横,不适合坦克作战”。

布卢门特里特也确信希特勒的命令有其政治动机,不过他认为并不像哈尔德所言。他说希特勒在沙勒维尔突然造访伦德施泰特司令部时讲过一番惊世之言,中止进军的命令与此不无因果关系。

只有一位参谋随同希特勒前来,参与密谈的还有伦德施泰特和他参谋部的两个要员——索旦斯登和布卢门特里特。布卢门特里特告诉我:“希特勒兴致颇高,他承认战役的进程‘堪称奇迹’,他认为六个星期就可以结束这场战争。他希望随后就能与法国达成合情合理的和平,然后再与英国人达成协议就无甚大碍了。”

接下来的一席话语惊四座,他以钦慕的语气谈起大英帝国,谈到英国存在的必要性,英国对世界文明的贡献。他耸耸肩评论道,创建帝国几乎无不依仗强硬的手段,“欲打造称心的木器,免不了刨花飞溅”。他将大英帝国与天主教会相比,声称它们是稳定世界的两大要素。他说他对英国所要求的无非是承认德国在欧洲大陆的地位。能归还德国失去的海外



殖民地固然最好,但也不是非得如此不可。他甚至说如果英国在海外遇到麻烦,德国可以派兵援助。他认为殖民地不过是事关一国的威望而已,在战争时期根本守不住,何况德国人也不愿意到热带非洲去安家落户。

他最后总结道,他的目的无非是为了让英国能在无损其尊严的情况下与德国媾和。

陆军元帅伦德施泰特一直希望与英法媾和,听了希特勒这番话后连连称是。希特勒离开后,伦德施泰特如释重负地感叹:“好呀,如果他别无他求,我们总算可以求得和平了。”

布卢门特里特在反思战争的过程时经常会追溯到希特勒的这次谈话。他认为下令“中止进军”不仅仅出于军事上的考虑,还有为更易谋求和平的政治用意。如果在敦刻尔克的英军全军覆没,英国人脸面丧尽,会下决心报仇雪恨。希特勒希望放英军一条生路,可以平息一下英国人的怒气。

此后在准备入侵英国的作战方案时,希特勒总是拖拖拉拉,这种态度令人感到奇怪,其实也印证了他内心深处的想法。布卢门特里特说:“他对作战方案似乎不感兴趣,也不急于准备工作,这与他一贯的做派大相径庭。”在入侵波兰、法国以及后来的苏联他都急不可耐地反复催促,可这次他却坐视不理。

有关希特勒与沙勒维尔的谈话和他后来不急于入侵英国的这些说法均来自那些长期以来对希特勒决策不满的将领,随着战争的持续,他们对希特勒的仇视有增无减,这就使他们在这个问题上的证词更引人注目。人们按照常理总以为,在战后的氛围中,这些德国将领自然会倾向于将希特勒描绘成入侵英国的罪魁,而他们自己则总是加以阻挠。可他们的证词恰恰相反。这些德国将领坦然承认,作为军人,他们希望一举获胜。对于阻挠他们速战速决的做法非常反感。有意思的是,他们所述希特勒在兵临敦刻尔克时有关大英帝国的议论与其早年所作《我的奋斗》中的许多言论正相吻合。值得注意的是,在其他方面,希特勒的行为也与这部自撰圣经中的言论并无二致。

长期以来希特勒一直想与英国联盟,是这个政治观念导致他对英国的暧昧态度吗?还是他内心深处的某种情结在这关键时刻起了作用呢?希特勒性格中某些复杂的情结表明他对英国和对德皇一样,怀有爱恨交加的情感。

某些历史学家将希特勒下令中止前进归因于他对英国的感情,这尚无充分的证据。不过尽管不可能评估出感情因素究竟起多大作用,这个因素毕竟



还是值得考虑的。

希特勒的性格相当复杂,简单的图解和评价都可能失之片面。他之所以下令中止进军很可能是多重因素造成的。有三个因素是清晰可辨的:希特勒希望保存坦克的实力以备战下一次进攻、他对佛兰德沼泽地一直怀有恐惧感、戈林吹嘘空军的力量对他的影响。不过此人向来嗜好玩弄政治谋略,思路多变难以捉摸,当他在盘算军事问题时,某些政治考量也极可能掺杂其间。

且不管希特勒真正的动机何在,至少结局令人满意。正是由于他的犹豫不决才使英国在这历史的关键时刻得以死里逃生。





## 第十三章 法国战事的终结和德军首次受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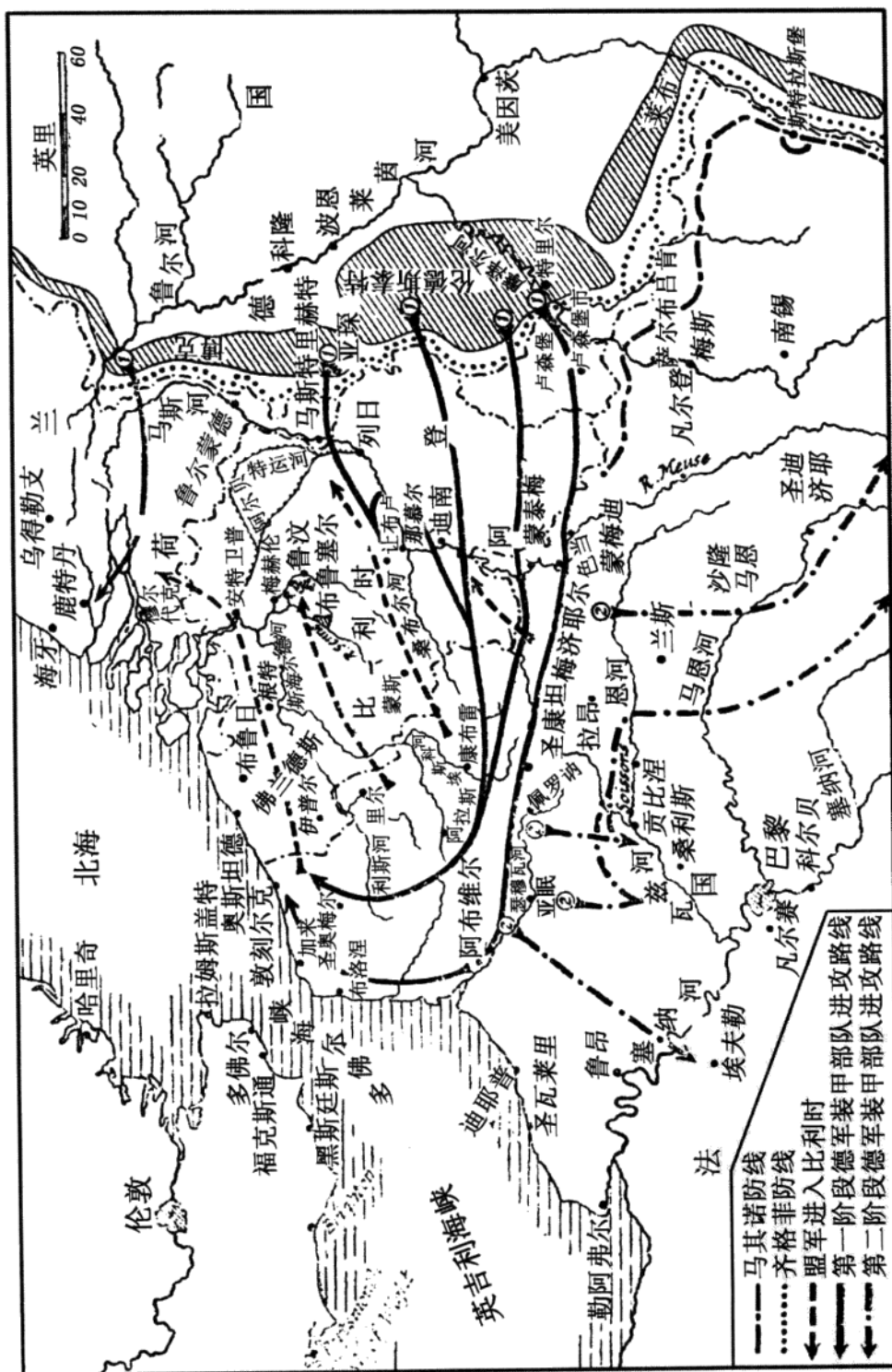
6月5日,德军向索姆河以南发起新的攻势,在法国的第二阶段也是最后阶段战役就此打响。此时距英国远征军大部队开始撤离敦刻尔克才一个星期,最后一艘船刚好在那天驶离港口。

法军左翼被切断,损失达30个师,占法军总数的近三分之一,还包括他们为数不多的机械化师的精锐部队。法国还失去了英国12个师的增援,英军仅留下两个师在法国,德军发起进攻时,这两个师没有和英国远征军的大部队在一起。马克西姆·魏刚(Weygand, Maxime)将军此时已经取代甘末林,统帅残留的66个师,这些部队要么损兵折将,要么军事素养极低,却要去守卫比原先更长的防线。相反,德军现在有足够的的时间聚集大量的师团发起攻击,这些部队大多没有参与第一阶段的战役。

新攻势的序曲最引人注目,原先在西面英吉利海峡方向追击英军的德国装甲师迅速转向南面和东面,准备发起新的攻势。能如此迅速地重新集结部队转向新的目标证明机械化运动战已经改变了老一套的战略战术。

伦德施泰特的部队在这场新的攻势中再次发挥决定性的作用。这肯定不是事先部署好的。伦德施泰特所要应对的战线更长,部队也更多,但战斗伊始,却将总共10个装甲师中的6个分配给了博克的集团军。好在作战方案是灵活可变的,作战模式也随着战斗的进程而演变。作战模式的改变再一次证明了机械化运动战的力量所在。

伦德施泰特与我第一次交谈时对这场战役的总结极为精炼。“有几天情况比较棘手,但并不构成大碍。进攻最早是由博克的集团军在右翼打响的。我先是按兵不动,等到博克的攻击有所进展,德军渡过索姆河后,我才开始进攻。我军在渡过埃纳河(Aisne)时遇到顽强的抵抗,此后便轻松多了。攻克朗格勒高地(Plateau de Langres)后直趋贝桑松(Besancon)和瑞士边界,这样就打到了马其诺防线法军右翼的背后,此战是制胜的关键。”





虽然在困难更多的次要战场上德军取得了出乎意料的战绩,但右翼发起的首攻却并不如意,在原本最希望成功的地方偏偏没能取得预期的成果。

在右翼的尽头,克卢格率领第四集团军向位于亚眠和大海之间的地带发起进攻,而原先在右边的第十八军则留下来负责在敦刻尔克打扫战场。一个装甲军团增派给克卢格,由于隆美尔率领的第7装甲师的迅速切入,克卢格的军队很快就挺进到鲁昂附近的塞纳河一带。法军顿时陷入混乱,无心守卫渡口,德军就这样紧随着法军的脚后跟冲过了塞纳河。

不过德方原先并没有将那里视为决战的地点,那里河床宽阔难攻易守,计划在这种地形展开决战有违常理。博克集团军将主攻方向放在亚眠的东部,指望在那里赢得决定性的战果,这个重任交给了赖歇瑙的第六军。

赖歇瑙麾下的大将贝希托尔斯海姆给我讲述了战事的经过,“为了这次进攻,上面将克莱斯特的装甲军团划归第六军指挥。此次部队的编制与第一次进攻时有所不同,因为古德里安被调到香槟(Champagne)的A集团军。取而代之的是赫普纳的第十六装甲军团。我们采取钳形攻势。维特斯海姆的第十四装甲军团自亚眠之战已从我军占领的索姆河对岸的桥头堡出击。赫普纳的部队则从佩罗纳的桥头堡出发。当时打算两军应当在圣·加斯特到乔塞(St. Just-en-Chaussee)那边的瓦兹河会师,此后就要决定追击的方向是朝巴黎以东还是巴黎以西。

在筹备进攻方案时对采取何种战术有些争议。我个人主张将两个装甲部队的兵力集中起来,朝同一方向突破。但赖歇瑙将军最终决定以两个桥头堡为起点,采取钳形攻势。如果集中兵力,进攻的速度可以更快一点。

发动攻势的头三四天里,进攻在“魏刚防线”面前遭遇到顽强的抵抗。与预计的结果相反,我们的战区并没能赢得决定性的突破,倒是在苏瓦松以东的埃纳河那里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于是陆总决定将克莱斯特将军的装甲军团从我们这里撤走,调到东面的突破口去扩大战果。我们自然感到很沮丧,这等于是比利时之战的再度重演。

克莱斯特继续讲述了战争的经过:“维特斯海姆的军团已经实际控制蓬圣马克桑斯(Pont Sainte Maxence)附近瓦兹河上的桥头堡。但是努瓦永(Noyon)西部的激战拖延了赫普纳部队的进军速度。这时进攻香槟的德军已经打开缺



口。虽然直到9日才开始进攻,但很快就在埃纳河那里强行打开一条通道。古德里安的部队从兰斯(Reims)东面第十二集团军打开的缺口冲了过去。第九军集团军和第二集团军也从兰斯西面成功突破,此时我接到命令马上退出正在进行的战斗,将部队向后迂回取道这个缺口。我们退出前线,从后面香槟北面绕了一个大圈,接着通过苏瓦松一带的埃纳河,然后穿过蒂瑞堡(Chateau Thierry)的马恩河,直趋特鲁瓦(Troyes)。这时,混乱不堪的法军已经濒临崩溃,所以我军越过第戎(Dijon),直下罗讷河(Rhone)河谷,一路顺风奔向里昂。这次战斗尚未结束时,我军在另一路又发起了巨大的攻势,维特斯海姆的军团转头绕向西南,直趋波尔多(Bordeaux),进而向比亚里茨(Biarritz)以外的西班牙边境挺进。”

布卢门特里特讲述了突破埃纳河的经过:“此次进攻期间,仅做出过一次重大的战略决策。古德里安的装甲部队突破法军前沿阵地,抵达圣迪济耶(St. Dizier)和肖蒙(Chaumont)之间的马恩河上游地区,此时需要解决的问题就是必须在三条路中选择走哪一条。是否应当向东转,越过朗格勒高地,朝瑞士边境进军,以便在阿尔萨斯(Alsace)将法军分割包围?还是应当向东南越过高原,向第戎和里昂进军,以便直抵地中海,帮助意大利军队翻过阿尔卑斯山脉?或者是应当调头向西南,向波尔多挺进,以便切断从巴黎逃往卢瓦尔河或其他地区的法军的退路。为此目的,事先就准备好了三份无线电报。”

古德里安最终决定选择第一种方案,克莱斯特的装甲部队则在其右侧急速前进,通过埃纳河的突破口后,再实施第二和第三种方案。因为到那时法军已经被打得七零八落,德军分兵出击就不会有很大的风险。

6月14日,莱布的C军团加入战斗,向著名的马其诺防线发起进攻,此时古德里安的部队已经以席卷之势闯入马其诺防线的后方。法国后防被破之前,德军不敢贸然进攻马其诺防线。即使在古德里安突破之后,德军对马其诺防线的进攻实质上还是试探性的。在萨尔布吕肯(Saarbrücken)以南的皮特林根(Püttlingen)附近的狭窄地带,第一集团军属下由海因里希(Heinrici)将军率领的第十二军团发起主攻。与此同时,在南面100英里的第七军前沿阵地发起副攻,德军在科尔马(Colmar)附近越过了莱茵河。

海因里希告诉我他在12小时之内就攻破了马其诺防线。但后来他也承认,直到法军的防守已经松动,并开始后撤时,突破才得以成功。“14日那天,经过激战我的部队向两个方向深入。从截获的法军电报中得知马其诺防线的守军已经受命撤退时,我已经下令在15日继续进攻。所以第二天的战斗与其



说是攻击不如说是追击。”

贝希托尔斯海姆讲述了另一侧进攻的情况。他先讲到克莱斯特的装甲军团攻占瓦兹河的蓬圣马克桑斯桥头堡后，便受命撤出，转向埃纳河。“步兵随即顶上来取代装甲部队，但是步兵渡过瓦兹河后却碰到了一个棘手的问题，法军在外线靠近桑利斯（Senlis）筑起了一道防御工事，挡住了通往巴黎的道路。赖歇瑙将军感到没有把握轻易清除这个障碍，于是向东侧绕道而行。然而法军的后撤帮我们解决了这个问题。法军放弃巴黎后，我们的右翼军团转归第十八集团军。第十八集团军刚刚从北方赶来，准备进入巴黎。我的部队则继续向南挺进，在科尔贝（Corbeil）和蒙特罗（Montereau）一带渡过塞纳河后，直趋卢瓦尔河。我们发现在萨利（Sully）和日安（Gien）的大桥已经被炸毁。我军在奥尔良（Orleans）发起突袭，完好无损地占领了那里的桥梁。从马恩河到谢尔河（Cher）的进军，一路上以追击为主，没有打过几次大仗。”

布卢门特里特总结了这次进攻的大致过程：“唯一的一次激战是在渡过埃纳河的时候，法军在那里的防守相当严密。先由步兵打开一个通道，装甲部队才发起攻击。即便如此，在全面突破之前，他们还是遭到河对岸顽强的抵抗。此后的战斗就越打越轻松了。装甲师马不停蹄长驱直入，也用不着担心暴露自己的两翼，势如潮水般地席卷了法国南部。德军步兵紧随其后，一天急行军40到60公里，肃清那些在坦克碾过之后还在负隅顽抗的游兵散勇。在许多大道上，我们的装甲部队所向披靡，急速前进，甚至超过了正朝同一方向后撤的法军纵队。”

在战斗中，空军和装甲部队以新创的“巷战战术”协同作战。遇到抵抗时，就先叫空军进行轰炸，先头部队随后冲上去攻克该地。与此同时，战斗师的主力部队以纵队的形式（长达100英里左右）等在大路上，直到前方的路障被清除。能够做到这一点，是因为我军有空中优势而敌方的反坦克力量相当薄弱，也没埋过多少地雷。

在1940年的战役中，虽然法国人打得也很勇敢，但已经不能与1914—1918年的凡尔登之战和索姆河之战同日而语。英国人打得更为顽强，较之1914—1918年，他们的表现毫不逊色。有些比利时人也打得很勇敢，荷兰人仅坚持了几天。我们拥有空中优势，加上比法国更先进的坦克。最主要的是德国的坦克机动性更强、速度更快、更善于实战，能够遵照指挥员的要求在运动战中来去自如。法国军队在当时根本无法做到



这一点。他们的军事思想和军事行动仍拘泥于第一次世界大战时的老套。无论是指挥系统还是无线电控制,他们都大大落伍了。他们要改变行军方向时,先得停下脚步原地待命,然后才重新起步。他们的坦克战术根本不合时宜——不过他们确实很勇敢!

德国将领的这番权威性的评论有助于纠正世人对法国守军的草率论断。低落的士气迅速蔓延固然加快了最终的崩溃,但显而易见的是,第二次攻势还未打响德军已经胜券在握,从一开始,法军就注定必败无疑,尽管这种失败或许可以往后拖延一点时间。

考虑一下法军的布防与空间之间的关系,就能看出魏刚面临着一个难以解决的问题,因为这个空间的范围包括从索姆河到瑞士边界。再综合考虑一下军队的数量和技术装备的质量,就可以看出法军毫无希望。更令人吃惊的是,在敦刻尔克溃退之后,英国政府和法国政府中的一部分人还抱有胜利的幻想,而魏刚这样的军人则更为现实。索姆河—埃纳河一带的防线刚刚开始崩溃,贝当就彻底灰心丧气了。然而令人费解的是,德军将领确信能在比利时切断盟军的左翼,却没能料到法国的抵抗会因此而全线崩溃,虽说这是原本可以计算出来的必然结果。所以法军的崩溃降临之时,德方显然根本没有料到这种可能性,也没能做好相应的准备。

## 引而未发的“海狮计划”

法国崩溃后,德军上下顿感轻松,大家兴高采烈,以为战争就要结束,可以从容地品尝胜利的果实了。布卢门特里特生动地描述了当时普遍乐观的情绪。“与法国达成停战协议后,陆总立刻下令组成专门人员筹备在巴黎举行胜利阅兵式,调遣参加阅兵式的部队。我们为此准备了整整两个星期,大家兴致勃勃,以为天下太平指日可待。开始着手复员工作,我们还收到一份名单,列有行将解甲归田的各师番号。”

然而几个星期过去了,英国人没有表示出任何愿意媾和的迹象,胜利带来的兴奋开始消退,不安的情绪渐渐滋生。一厢情愿的谣传在落寞的氛围下颇有市场:“一会儿说正在通过瑞典与英国人谈判和平事宜。一会儿又说从中斡旋的是阿尔巴公爵(Duke of Alba)。”但始终没有得到证实。6月29日,哈尔德飞回柏林,去看了牙医。第二天是他的生日,他呆在家里,便抽空到外交部



与魏茨泽克公爵(Weizsaecker, Ernst)会面。哈尔德的战时日记记下了当时谈话的要点,“看来我们还得展示一下军事实力才会让英国人作出让步,这样我们在东方的进攻才不会有后顾之忧”。次日早上,在飞回法国之前,哈尔德会见海军参谋长施尼温德上将(Schniewind, Otto),进行了简短的交谈——“商讨了对英作战的基本问题,先决条件是要掌握空中优势(这样或许就可以不必依靠陆战)”。施尼温德就入侵英国提出一些注意事项——天气状况、进攻路线和能够征集的船只。

海军总司令雷德尔(Raeder, Erich)上将早就考虑过这些问题,他在5月21日的会议上向希特勒提出过此事,6月20日又再度提出,但希特勒没当回事,他显然并不认为入侵是迫使英国人接受和议的必要手段。

听完施尼温德的意见后,哈尔德又与军械署的莱布进行了交谈——“他被告知并没有打算入侵英国。我告诉他并非没有这种可能性,还得有所准备,因为一旦当局要求登陆作战,就会催你以最快的速度搞定一切”。

希特勒第一次表露出入侵英国的意向是在7月2日,当时他召集三军首脑开会,商讨入侵英国事宜,让他们一起出谋划策。不过最后他强调“入侵方案还仅为初始阶段”,并说:“到目前为止,它只是为了以防万一。”直到两个星期后,事情才有所进展。此时,哈尔德和格赖芬贝格以及在枫丹白露(Fontainebleau)的参谋们正在忙于制定临时方案,日期大致定为8月。

7月16日,在法国投降近一个月后,希特勒发出指令:“尽管在军事上已处于穷途末路,英国仍未表示出妥协的意向,我决定要准备一个登陆英格兰的计划,若有必要,就付诸实施……备战工作必须在8月中旬前全部完成。”不过这个命令听起来还是非常“含糊”。

希特勒内心不愿入侵英国,这一点在他7月11日会见海军总司令雷德尔上将时表露无遗。战后缴获的档案中有这次会谈纪要。一开始他们没有谈入侵英国的事情,而是大谈挪威的情况,希特勒对挪威更感兴趣。他表示打算在挪威特隆赫姆(Trondheim)附近的海湾建一座“漂亮的德国城市”,并已指示部下递交有关规划。后来他们才谈到入侵英国。雷德尔认为“入侵只能作为迫使英国求和的最后手段”。他详解了入侵行动将会遇到的许多困难,指出不仅要拥有制空权、漫长的运输线,还需要大量的筹备工作。雷德尔讲完后,希特勒发表了自己的看法,会谈记录归纳道:“元首也认为入侵是最后的手段,制空权是先决条件。”

13日,哈尔德从枫丹白露飞往贝希特斯加登(Berchtesgaden),递交有关军



事方案的报告。他的日记中写道：“英国坚决不与德国媾和，这让元首大为困惑。他认为（我们也抱有同感）原因是英国人寄望于苏联，所以只能靠武力才能迫使它同意求和。”实际上，这与希特勒的真实意愿背道而驰。原因就在于英国的失败将导致大英帝国解体，这对德国没有任何好处，德国人以鲜血换来的一切只会让日本、美国和其他国家坐享其成。

虽然16日发出了对英作战的命令，但只是试探性地引而未发，三天后在德国国会大厦举行的对法胜利庆功会的演讲中，希特勒还是吁请英国与德媾和。演讲的语气格外温和，他痛陈死拼到底，结局将是两败俱伤。这番话甚至让玩世不恭的意大利外长齐亚诺（Ciano）伯爵也为之动容，他在日记中写道：“我相信希特勒是诚心诚意地在求和。事实上，当天傍晚有关英国反应冷淡的消息传来后，德国人大都难以掩饰失望的情绪……他们正在祈望和平的吁求不会被拒之门外。”

第二天，齐亚诺拜访了希特勒，他在日记中写道：“希特勒证实了我昨天的印象，他愿意与英国达成谅解，他知道与英国交战将会艰辛万分，血流遍野。他也明白当今之世各国人民都厌恶流血。”然而，回到罗马后，齐亚诺却发现墨索里尼对希特勒的讲话深感不安，他担心英国人会作出回应，同意和谈。“这对墨索里尼来讲大为不妙，此刻他最想开战。”

21日，希特勒召集高级军官开会。他一开始就毫不掩饰地表示对英国为何宁战不和大为不解。他只能猜想英国希望美苏参战，但看来可能性不大，虽然苏联参战“对德国尤为不利，尤其是考虑到来自空中的威胁”。接着他谈到入侵英国，指出“那将是一次充满危险的非常之举，征战的距离虽然不长，但那是跨海作战而不是渡河，何况敌方掌握着制海权。无法实施出其不意的闪电战术，德国面对的是防备森严，欲与我决一死战的顽敌。然后他又强调了登陆后增援和给养方面的困难。他坚信开战前至关重要是“全面的制空权”，登陆行动的成功与否取决于持续的空中支持。而空军的行动又取决于天气状况，9月下半月通常好天不多，所以必须在15日之前完成入侵的主要任务。分析完局势后，希特勒声称：“如果不能确保在9月之前全部准备就绪，那就得考虑其他方案了。”他的整篇讲话充满着迟疑，最后的结语则暗示他又在打别的什么主意了。

哈尔德的日记记录了勃劳希契转述的希特勒在那次会议上的讲话，那反映出希特勒对入侵能否成功将信将疑的复杂心态——“英国人毫无希望，我们必将取胜，胜利的前景不可逆转。”但是他强调：“如果所有手段全都用完还是





无法与英国达成妥协,只有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才会诉诸武力。”抛出这些试探性的和平信号后,希特勒又不无乐观地寄望于那些英国舆论正在倾向求和的迹象。希特勒最终的结论是和议主要的障碍来自苏联。“斯大林正在向英国人抛媚眼,诱使英国人打到底,拖死我们。这样他就可以争取时间,谋求他想要的东西。斯大林知道,一旦德英媾和,他就会两手空空。”希特勒由此得出结论:“当务之急是将注意力转向如何对付苏联,要做到有备无患”。

于是德国便立马开始筹划如何对付苏联。确定无疑的目的是“给苏联的军队以粉碎性的打击,将其领土打得千疮百孔,从而使它难以空袭柏林和西里西亚工业区。最理想的做法是尽量向纵深进攻,从而使我空军能摧毁苏联的战略要地”。于是便开始拟定针对苏联的“秋季攻势”方案,在那种情况下“施加于英国的空战压力将会有所减轻”。拜尔莱因将军告诉我,几天后,他带着古德里安装甲部队的作战参谋回到柏林,“为装甲部队布置侵苏战役的作战计划”,该计划拟定四支装甲部队沿着同一条轴线向苏联境内深入突破,一年后的实战正是按照这个方案进行的。

当希特勒看到入侵苏联要做大量的准备工作,他便改变了秋季进攻苏联的原计划。他也向外交部和陆总的要求做出让步,以损害英国的利益来迁就苏联的领土要求,进而阻挠英苏联手。不过入侵苏联的方案仍在继续酝酿,较之跨海侵英,希特勒更热衷于侵苏。在这关键时刻,希特勒的一己之见还是倾向于亲英。

瞧一瞧英国此时对局势的反应也很有意思。皇家海军不敢确保能及时干预英吉利海峡的战事,正如德国海军恐怕皇家海军参战,英国海军将领也对德国空军的威胁感到忧心忡忡。不过就在希特勒下达指令的同一天,我得到可靠的消息称,为掩护敦刻尔克大撤退而受到重创的皇家空军经过重建,已经恢复元气,战斗力达到原来的水准,57个中队拥有上千架战机和后备力量。

敦刻尔克大撤退后的六个星期时间里,能够阻止入侵的英国陆军兵力严重不足,德军区区几个师就可以将它击溃。撤回国内的陆军需要重组并重新装备,尽管其进程不快,但皇家空军实力的恢复首先确立了人们抗击入侵的信心,德军胜利所造成的威胁也与日俱减。假设能作为希特勒的军事会议的一个即席旁观者偷窥一眼“山的那一边”的情况,英国人就会更加振奋了。看一眼德国情报机构的报告也能产生同样的效果。他们显然高估了英国陆军的实力,怪不得希特勒和他的军师们在琢磨这个问题时会感到越



来越头痛。

戈林扬言空军可以保证可以完成遏制皇家空军和阻止皇家海军参战的双重任务,入侵英国的方案因此得以维系。不过空军将领并不全像戈林那样充满自信,俯冲式轰炸机指挥官里希特霍芬尤其持怀疑态度。

德国陆军和海军将领都不相信戈林的承诺,但是他们内部也存在分歧。最初建议登陆部队有40个师,后来被削减到13个师,因为海军总司令部声称军舰的运送能力仅限于此。如果条件允许,余下的部队只能分三批渡海。坦克的威胁并没有英国估计的那么严重,只有一小部分坦克加入登陆部队,大部分坦克要到战役的后阶段才上前线。陆军最高指挥部坚决主张登陆的战线要拉开宽度,至少要从拉姆斯盖特(Ramsgate)到莱姆湾(Lyme Bay),从而分散英国后备军的兵力。但是海军最高指挥部则坚持认为他们只能掩护一条航道和狭窄的登陆地带,向西最远不可超过伊斯特本(Eastbourne)。激烈的争论持续了两三个星期。哈尔德声称海军的方案等于让陆军“干脆自杀——‘我等于把登陆部队直接送入敌方的绞肉机’”。海军参谋长的报告则认为,从宽阔的海峡拉开战线进攻无异于自杀。

最后这场争论以希特勒强令妥协而收场,结果双方都不满意。此时已进入8月中旬,入侵准备工作的完成被拖到了9月中旬。因为戈林在13日揭开了空袭的序幕,陆军和海军的将领更倾向于坐观其效,看德国空军能否摆平皇家空军,如果不行,入侵英国的问题也就没什么好争了。

我与伦德施泰特谈起入侵英国方案时问他取消方案的理由和时间问题。他回答:“法国投降后就开始准备入侵英国,方案在草拟期间没有确定具体的行动日期。这取决于需要多少时间来召集运兵船舰,改装船舰来运输坦克,部队上船下船还得花时间训练。如果顺利的话可能在8月发起进攻,最迟不过9月。取消该方案有多种军事上的原因。本来要求德国海军不仅能控制英吉利海峡,还得控制北海,但它实力不济。仅靠德国空军的力量也难以确保渡海部队的安全。先头部队登陆后很可被切断供给和后援,陷入困境。”我问伦德施泰特是否有可能通过空运为登陆部队提供给养,1941年冬在苏联的德军就曾依靠大规模的空中补给。他说1940年时,德国的空中运输体系还没有这么发达,所以也不会去考虑到这种可能性。

伦德施泰特接着概述了海狮计划的军事部署。“由我负责指挥入侵行动,任务派给了我的集团军。右翼是布施(Busch, Ernst)将军的十六军,施特劳斯(Strauss)将军的部队位于左翼。他们得从荷兰到勒阿弗尔(Le Havre)地区一



线的港口出发。十六军从安特卫普到布伦涅的港口出发。第九集团军则要利用索姆河到塞纳河之间的港口。没在泰晤士河(Thames)以北设定登陆地点。”伦德施泰特指着地图上从多佛尔(Dover)到朴次茅斯(Portsmouth)的登陆地点说,“登陆后,我们就要向前猛冲,沿着伦敦以南的弧形地带构筑一个较大的前沿阵地。其范围从泰晤士河南岸到伦敦近郊,西南方向到南安普顿水域。”在回答我进一步的提问时,他说:“最初设想派博克集团军属下的赖歇瑙的第六军在怀特岛(Wight)以西的海岸和韦茅斯(Weymouth)两侧登陆,截断德文郡-康沃尔(Devon-Cornwall)半岛,向北推进到布里斯托尔(Bristol)。但是没有采用这个方案,只是将它作为以后见机行事的备案。”

他还谈到自己对战胜英国一直没有信心,经常会想到拿破仑是如何受挫的。可见,回首历史,往往会使德国将领缩手缩脚,这与即将到来的秋季中他们在苏联的感受如出一辙。

西韦特将军当时是陆军元帅勃劳希契的副官,他的谈话给我的印象是勃劳希契似乎比伦德施泰特乐观。我问西韦特对于海狮计划的可行性勃劳希契持什么观点。他答道:“陆军元帅勃劳希契认为鉴于英军在敦刻尔克已经受到重创,只要天气适宜,有足够的时间准备,海狮计划是可行的。”不过据我推断,那是因为丘吉尔先生断然拒绝任何和平建议,勃劳希契看到求和无望,才会产生这种想法。“我们希望尽快结束这场战争,为了实现这个目的,我们不得不跨海作战。”我问:“那么为什么又没有实施海狮计划呢?”“准备工作头绪纷繁,天气也不见好转。本来准备在9月实施计划,但希特勒认为难以付诸实施,就取消了一切准备工作。海军方面也信心不足,他们的实力难以保障两侧的安全。德国空军也没有力量来阻止皇家海军的参战。”

这些军人对我讲述了有关海军的消极态度,许多海军上将的看法也充分证明了这一点,持相同观点的有福斯(Voss)、布林克曼(Brinkmann)、布鲁宁(Breuning)和恩格尔(Engel)。有一个说法典型地反映了他们共同的观点:“德国海军根本没有准备阻击皇家海军,甚至于都没打算在短时间去干它一下。而且,从莱茵河、易北河(Elbe)和荷兰运河征集来的驳船完全不适合运兵渡海。”在交谈中,有些人说他们不相信征集这些驳船真的是为了渡海,怀疑是否真的打算入侵英国。他们感觉这就像是在演戏,大多数高级将领内心并不以为然,表面上却都装着认真对待的样子。“从后来了解到有关英国的情况看,如果德国情报部门工作更为出色的话,德国原本在1940年7月就能赢得这场战争。但多数海军高级将领早在1939年9月3日就认定德国注定会输



掉这场战争。”就是在那一天，英国正式向德宣战。

施图登特将军向我详谈了德国伞兵部队本来要在入侵英国时担当的任务，还谈了他原本希望伞兵该怎样作战，他的看法颇有意思。当时施图登特正在住院养伤，在鹿特丹之战中他的头部受伤。此时伞兵部队由波泽尔(Putzier)负责指挥，计划动用两个师<sup>①</sup>的力量，包括300架滑翔机，每架飞机上一个飞行员和八个伞兵，总共3000人。这支空降部队的任务是占领福克斯通(Folkestone)附近宽20英里、长12英里的桥头前沿阵地。空军对预定的空降区域一直进行严密的侦察。看来英国人正在急急忙忙地设置各种障碍，在适于空降的地点，尖尖的木桩朝天而立，可想而知，那里很可能也布满了地雷。波泽尔向上司反映了这种种情况，有鉴于此，到8月底，伞兵空降行动便无疾而终了。

“如果当时我在现场，我肯定会敦促上级在英军忙于敦刻尔克撤退时动用伞兵入侵英国，占领英军上岸的港口。要知道当时撤离敦刻尔克的大部分英军都已经丢弃了重武器。”

“即便这个计划被否决，我的伞兵入侵计划也会与实际制定的方案不同。我要用伞兵去占领比预设的桥头阵地更远的内地机场。占领机场后，将步兵师空运过来，用不着运坦克和大炮，步兵转而从后面向守卫海岸的英军进攻，另一部分步兵向伦敦进发。我估计一天半到两天的时间就可以空运一个步兵师，可以保持这种速度来增派后援部队。”在我看来，波泽尔的计划好像颇为乐观，用这种方法运送的部队不多，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就会积少成多。

施图登特强调指出：“但最佳战机还是在敦刻尔克撤退刚刚结束时，那时你们还来不及加强防御措施。后来我们听说英国人有一种降落伞过敏症。挺逗人的，不过这无疑是最佳防御之道，很有针对性。”

从决定放弃伞兵入侵计划时众人的态度可以看出某种症状。准备工作虽然仍在继续，但工作越深入，人们入侵的意愿越加消沉。空军攻击的效果也未能如愿以偿，这使海军和陆军方面的怀疑论者更加强调戈林的承诺难以立刻兑现。“英伦上空之战”对守军所造成的压力也因此而大打折扣。与此同时，德国情报部门的报告又过于强调和夸大了英军的地面防御能力，有理由怀疑这是情报部门故意夸大其词，多少有点蓄意阻挠的动机。希特勒本人不仅强调入侵英国的种种困难，更担心入侵失败所带来的恶果。暂定的进攻日期离得越近，“静观待变”的论调叫得越响。希特勒不断推迟确定入侵的具体日

<sup>①</sup> 伞兵师和来自第十一空军军团的第二十二空降师。



期,到9月17日干脆决定“无限期推迟‘海狮计划’”。

10月12日,希特勒明确指出取消海狮计划,虽然他的措词似乎还留有些许余地:“如果1941年春季或者初夏重启入侵行动,将会随即颁布实施有关行动备案。”

希特勒有关入侵英国的军事会议不仅每时每刻都弥漫着怀疑的气氛,甚至极度的抵触情绪。这些都证实了布卢门特里特告诉我的一切。“虽然下令制定‘海狮计划’,也作了准备,此事并没有被视为当务之急。希特勒一反常态,对计划漠不关心。参谋人员在制定计划时也显得心不在焉。大家都视其为一场‘战争游戏’。陆军元帅伦德施泰特根本没把它当回事,对计划几乎是不闻不问。他的参谋长索旦斯登将军则三天两头请假。到8月中旬左右,没人相信还会实施这个计划。到9月中,那些征集来准备渡海的运输工具又被悄悄地遣散了,这些车船本来也不够用。到9月底,大家都心知肚明不必将这个计划真当回事,它已经被终止了。我们谈起这个计划时无不认为那是在虚张声势,大家都期待与英国达成谅解的消息。”

布卢门特里特所述有关将领们的看法与哈尔德日记的内容并不完全吻合。哈尔德8月6日日记中的议论值得注意:“我们处于两难的境地,海军疑虑重重,空军一开始自诩能独自担当,如今却对入侵行动犹豫不决缩手缩脚。本来负责指挥三军协同作战的最高统帅部如今却显得麻木不仁。只有我们还对此事比较起劲,可仅靠我们难以推动事情的进展。”

然而一线的将领似乎都不太情愿去攻打英国,海军将领显然更不愿意去冒这个险。他们非常悲观,对皇家海军所能造成的困难做了最坏的估计。德国空军没能将皇家空军逐出蓝天,这使反对入侵的意见更显得理直气壮。不过最根本的原因是希特勒的内心总是偏向于推迟入侵的种种借口。在这种情况下,也就不知道会推迟到何年何月,因为希特勒的脑子里入侵东方的念头正在与日俱增。

当希特勒在7月提议入侵苏联时,他的军事首领大都持怀疑态度,尽管他们对入侵英国的前景也不看好。哈尔德日记记录了他与勃劳希契在30日的长谈。他俩都认为“海军不可能为陆军成功入侵英国提供有效的帮助”。但他们也一致认为应当尽量避免“两线作战”,他们倾向于力求与“与苏联搞好关系”。迁就斯大林的某些扩张野心或许能克服“英苏联盟带来的威胁”。“苏联觊觎黑海海峡和波斯湾,对此我们不必过于担心。至于巴尔干地区,虽然牵涉到德国经济利益,我们还是能够各行其是,互不干扰。”



第二天是7月31日,三军首脑飞往贝希特斯加登与希特勒会晤。会议伊始,海军上将雷德尔详述了海上入侵英国的种种困难,他说进攻日期最早也要到9月中旬,进而建议最好是在来年春季。希特勒指出还有其他不少难处,他强调潜水艇和空战得花上一两年时间才能产生决定性的效果。“如果不打英国,我们也要采取行动根除能让英国指望改变形势的一切因素……英国寄希望于苏联和美国。如果能干掉苏联,英国对美国出手也就死了心。苏联一旦战败,日本在远东的势力就会大增,苏联是英美在远东指向日本的利剑。”希特勒列举了截获的电话记录证明由于苏联暗示会出手干预,致使英国士气大增。“苏联一旦战败,英国最后的希望必然随之破灭。”希特勒接着宣布他的决定:“这场斗争必须包括摧毁苏联。”要打败苏联关键在于“一锤定音”,为了养精蓄锐一举成功,进攻的日期将后延至来年春季。

在接下来的几个星期里,出现了一股反对侵苏的意见,这些言论主要来自一些害怕与苏联交战的军官和外交人员。哈尔德9月30日的日记对此有所记载——“元首在德日协议签署的24小时前将情况通知了斯大林。大英帝国已经奄奄一息,寄去的信件旨在激起斯大林对分享其遗产的兴趣,诱使他与德国联手。如果这个计谋成功,我们就可以全力以赴对付英国。”可见,此时德国在外交上做了两手准备。11月初,莫洛托夫(Molotov)应邀抵达柏林,德国官方极其希望苏联同意加入三国同盟条约。莫洛托夫在会谈中有所保留,德方颇感失望。但他们表示对其总体上的态度还是感到满意。但希特勒的猜疑则有增无减,决心按他现在既定的方针一意孤行。

瓦尔利蒙特从最高统帅部的角度对我讲述的情况说明了这段时期希特勒思想转变的原因。谈到入侵英国计划,瓦尔利蒙特证实了“希特勒对入侵表现出一反常态的冷漠”。布卢门特里特等人认为入侵英国计划只是虚张声势,瓦尔利蒙特持不同观点。他认为由于希特勒接连三次改变主意给人造成了虚张声势的印象。第一次,他打算不采取任何行动来刺激英国拒绝求和。第二次,希望落后后,他决定入侵英国,迫使其求和。第三次,担心入侵的成功性不大,就迅速改变主意,采用别的手段让英国就范。

瓦尔利蒙特是入侵计划的倡导者之一,他的言谈值得详细引证。

我向来毫不怀疑希特勒长期奉行的政治原则就是与英国在世界范围内达成持久的谅解。我也相信法国崩溃后,希特勒倾向这个计划,但这只是一时,也是最后一次。1940年6月底到7月初,就是在这短短一段时间



里,他起先表示根本不愿入侵英国,后来对入侵的态度也十分勉强。后来元首的一位外交随员告诉我,希特勒打算通过公开的和平诉求来拉拢英国,直到此时,我才明白他那不同寻常的反应。希特勒7月19日在国会大厦的演说令我失望,但他本人肯定更加失望,因为英国方面对他的示好就是不理不睬。

与英媾和的希望幻灭后,希特勒的所作所为就不再受政治考量的左右。相反,在我看来此后所发生的一系列事件说明他内心只想尽快以最有效的方法打败英国。他试图以四个不同的方式来达到这个目的:从海上和空中打击英国的贸易和工业;以空袭作为入侵英伦三岛的前期准备;准备攻击英国在地中海各地的据点;为最终入侵苏联做好先期准备,因为苏联是英国在大陆最后的希望所在。

显然希特勒的想法与当年拿破仑的思路如出一辙,他臆测英俄正在暗中勾结,这纯属子虚乌有,双方甚至连互惠关系都不存在。显然希特勒执意以最后一种方式来解决——他对苏联布尔什维克的敌意根深蒂固,远远压倒对英国的一时之愤。

瓦尔利蒙特认为只要海军和空军能够履行各自的职责,勃劳希契和哈尔德为代表的陆军最高司令部起初是支持入侵英国的。“我所在的最高统帅部的国防委员会力挺入侵计划,委员会的成员来自三军各部门,在各方备战工作行将完成之际,大家尽量在有争议的问题上相互协调。”(瓦尔利蒙特就此补充道:“对入侵英国所需船只的计算非常精细,与实际需求相差无几。准备动用运输船和7000吨位的货船,在数量和质量上都有所考虑。第一梯队的登陆艇的配备比较简便。”)

瓦尔利蒙特继续说:

然而希特勒和他的随从依然犹豫不决,部分原因是空军出战不利,没能将皇家空军逐出蓝天。希特勒显然不能也不会相信该计划最终会大获全胜,至少难以立竿见影。所以他一直举棋不定。

在我看来,这与19世纪初的情况何其相似。正如施特格曼(Stegemann)在评论拿破仑战争时所言,苏联早就开始“小心提防”。难道希特勒没有足够的理由去怀疑苏联和1939年协议的诚意?难道他会不担心苏联难以默许德国的势力东山再起,坐视德军在西欧为所欲为吗?我个



人并不认为入侵苏联以先发制人是德国摆脱困境的唯一途径,但我仍然记得约德尔在1940年7月底对他的参谋说过,从长期看德苏之战势所难免,要做到有备无患——这话反映了希特勒对战局的估计。

也正是这个约德尔对“海狮计划”的天折起过很大的作用。那年夏末,他在给希特勒的备忘录中阐述了自己的观点。他写道,入侵英国风险甚大,由于天气不好,空军出师不利更增加了这种风险。万一登陆遇挫,将导致德国前功尽弃。因此除非穷尽所有使英国屈服的手段,决不可轻易寻衅。他提出的手段是攻击抢夺英国在地中海的据点——如直布罗陀(Gibraltar)、马耳他(Malta)和苏伊士运河(Suez Canal)。他断言英国丧失这些地区后,战争自然就会结束。

希特勒显然乐于认可这些反对入侵英国的说法。<sup>①</sup>从那时起就没再认真把它当回事,到12月初,入侵计划被彻底放弃——“海狮计划”至此无疾而终。

然而,海狮计划终止之后,一度又以不同的形式复活,或者更正确地说,先后以两种形式出现。在海狮计划尚未真正被埋葬之前,第一种形式就已经开始酝酿。该计划企图占领爱尔兰,以此断绝英国的海上供应线,而不是直接入侵英国。最早想出这个主意的很可能是戈林。

在12月3日的会议上,希特勒主持讨论了占领爱尔兰问题,他说:“除非爱尔兰要求德国出兵,我们才能进驻爱尔兰。当务之急是让我们的特使搞清楚德·瓦勒拉(De Valera)是否希望我们出兵相助……作为攻击英国西北港口的基地,爱尔兰对空军总司令十分重要……占领爱尔兰有可能结束战争。必须就此开展调查研究。”但是海军参谋部的报告对此大泼冷水,他们尤其反对从海上出兵。

这就使希特勒把注意力又转回海狮计划,只是与过去有所不同。施图登特曾对我讲过此事。他自西线战事开始之日受重伤后一直在养伤,1941年1月初,他康复归队,被任命为由伞兵部队组成的第十一航空军团总指挥。上任不久,他就和戈林一起被希特勒召到贝希特斯加登。这是施图登

---

<sup>①</sup> 但是有关证据表明希特勒固然愿意放弃入侵计划,但也未必喜欢约德尔备忘录所建议的替代之策。他一边不时玩弄着进攻地中海英国据点的计谋,内心却越来越倾向入侵苏联。雷德尔和戈林是攻击地中海据点的主要倡导者,相当重要的原因是他们急于劝止希特勒入侵苏联,约德尔也赞同攻击地中海据点,尽管他和希特勒一样担心来自苏联的威胁。





特第一次造访这座山中要塞。希特勒关照他要为伞兵部队未来作战部署拟定一份方案。

这次在贝希特斯加登与希特勒和戈林会谈是在1月下旬,大约是在20日到25日之间,我想应该是25日。希特勒一开口就大谈他对政治、战略和如何继续与主要的敌人作战等的总体提法。他还提及进攻地中海据点问题。然后他便说到入侵英国。希特勒表示前几年他感到入侵英国风险太大胜率不高,而且为了诱其和谈,他也不想过于激怒英国。但英国人毫无和谈意向,那就只能兵戎相见了。

接着商讨在入侵英国时如何部署第十一航空军团的作战行动。我质疑将伞兵部队直接投入英南部海岸为登陆部队开辟桥头堡的主张,因为海岸后面的地带已经设下重重障碍。对于这些质疑,希特勒表示首肯。我随即提出,如果一定要在南部海岸动用第十一航空军团,那么首先必须占领离海岸25至30英里处的内陆机场,让步兵师在那里降落。

突然,希特勒用手指向德文郡-康沃尔半岛的中部,在地图上沿着汤顿(Taunton)和布莱克当丘陵(Blackdown Hills)画了一个大圈,他说:“你的伞兵部队可以在这里掩护侧翼。该区域非同小可,这个重要的隘道非打开不可。”他然后又指向普利茅斯,详解了这个大型港口城市对德英双方的重要性。这时我有点跟不上他的思路,就问南部海岸的具体登陆点在什么地方。希特勒曾下令入侵行动须严守秘密,他倒是身体力行,只是说了句:“我现在还不能告诉你。”

施图登特接着推出他自己看好的方案,他拟定的方案是——空中突袭北爱尔兰。他认为作为助攻,该行动应与入侵英国南部的主攻同时进行。他强调指出该行动“不会比空降到英国南部海岸更难,而且更容易发挥我部伞兵的特长”。他的目的是首先占据一个牢固的作战基地,然后加以扩张。他将这种战术称之为“如纸上泼墨,先点后化”。伞兵从布列塔尼(Brittany)机场出发,空投到蒂维斯山(Divis Mountain)、贝尔法斯特(Belfast)西部和内伊湖(Lough Neagh)之间的三角区,抢占那里的三个机场。在利斯本(Lisburn)也空降伞兵进行助攻,封锁那里的公路和铁路枢纽。在莫恩山(Mourne Mountain)和斯佩林山(Sperrin Mountain)这些不易着陆的地方空投大量模拟伞兵,以分散守军的兵力。因行程太远,滑翔机部队派不上用处。歼击机中队将随行,并从占领



的机场起降作战。施图登特推算万一行动失败，他的部队至少可以推进到爱尔兰(Eire)，最多被暂扣在那里，而不会沦为俘虏或被歼灭。

希特勒认真听取了施图登特的方案，但是他“遵循的是‘坐观其变’的策略，便说此事当三思而后行。然后他谈了在地中海占领直布罗陀、马耳他和在埃及进攻苏伊士运河的可行性”。施图登特退场后，戈林继续和希特勒会谈。次日晚上，施图登特和戈林一起回柏林，在分手时，戈林说：“不要再为爱尔兰的阿尔斯特(Ulster)自找麻烦了，元首不打算入侵英国，从今以后，直布罗陀才是你的当务之急。”

在入侵英国问题上，施图登特最后向我谈了他本人对希特勒的印象和看法。

哪怕拥有优势的兵力，希特勒还是迟疑不决，不敢跨海进攻对岸严阵以待的强敌。在他看来，跨海作战凶多吉少。后来的格雷特(Grete)和马耳他事件尤其反映了他的这种心态，从相反的意义看，也是如此，他长期以来一直认为“欧洲堡垒”(Fortress Europe)固若金汤。他低估了进攻方攻破海岸防线的能力，高估了凭借大海进行防守一方的实力。(挪威只不过是个“弱小的敌人”。只要下手去占领就是了，可希特勒还是要“鼓足勇气”才敢动手。)他首先考虑的是“供给和联络”，所思所虑无不为此左右。在所有空降行动和其他特殊行动中，希特勒最关切的就是确保以最快的速度组建陆上和水上联络体系。遵循这个原则本来无可非议，可是希特勒做得太过分了，在乘胜作战时尤其如此。那些日子里，在希特勒看来，若不能建立绝对切实可靠的联络通信系统，任何行动都显得风险太大。1940年第一次危机爆发时，他就想放弃纳尔维克。

施图登特继续说：

因此他挑选最短的路径入侵英国。他从来不曾计划在多佛尔的海岸地带以外的地点登陆。1941年1月会议给出一个确切的印象，希特勒决定在更为广阔的前沿进行最终的登陆行动，而不再仅仅局限于多佛尔-普利茅斯地区，主攻区域将进一步向西延伸，也就是伯恩茅斯-布里德波特(Bournemouth-Bridport)一带。第十一航空军团将被派往德文郡-康沃尔半岛最狭窄的地带掩护侧翼，抢占半岛的交通要道。或许希特勒想要到



英国最南端登陆,第十一航空军团的主要任务是建立联络交通线。也可能他计划的登陆区域仅限于半岛地区。

至少有一点我看得很清楚,在1941年1月,希特勒尚未放弃“海狮计划”,而只是将计划推迟罢了。他还在“海狮计划”、直布罗陀和苏联三者之间举棋不定。戈林倾向于“海狮计划”和直布罗陀,而不是苏联。



## 第十四章 哑火于地中海

与德国将领的交流令人在总体上对非洲战役和地中海战事的诸多方面有了全新的认识。以下略举其要。

当英国军队战斗力最为薄弱之时,埃及和苏伊士运河能够免遭德军蹂躏的原因是意大利人嫉妒德国,加上希特勒忽视了抢夺这些中东战略要地的良机。

德国人在夺取克里特岛时受到英军的重创,塞浦路斯因此幸免于德军的蹂躏。

直布罗陀能幸免于难是因为佛朗哥不愿让德军开进西班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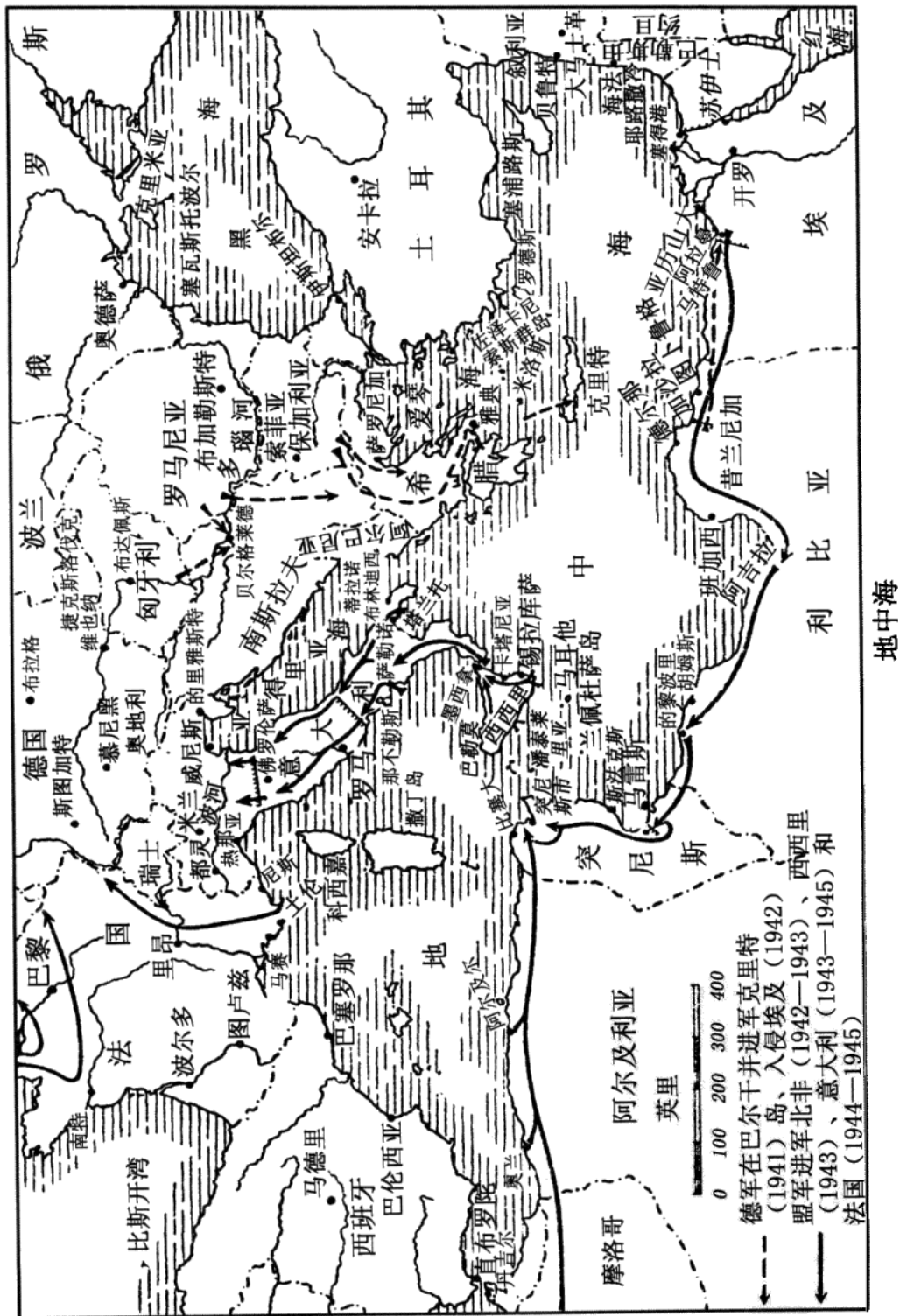
马耳他能逃过战争的浩劫是因为希特勒瞧不起意大利海军。

这一切都发生在 1941 年,正值英国霉运连连之时。战争胜负的命运如潮起伏,它在 1942 年开始发生逆转。那是因为苏联人顽强地顶住了德军的入侵,日本的偷袭又让美国卷入了这场大战,英国自身的实力也在与日俱增。但毕竟还有很长的路要走,若非希特勒出手“帮忙”,这段路程将更为漫长。

正是希特勒的失算,让英国人抓住战机,在北非阿拉曼赢得决定性的胜利。若非希特勒不准德军将领在蒙哥马利发起进攻之前及时后撤,本来德军很可能不会遭此惨败。

希特勒被拖入地中海战事是比较勉强的。海军上将雷德尔强烈主张开辟地中海战线,他清楚地看到,如能将英国的势力逐出地中海战略要地,德国将获得主动,进而影响战争全局。在这个问题上,雷德尔居然得到他最不信任和鄙视的人物的支持,此人就是戈林。希特勒在与英国交战的同时又想攻打苏联,雷德尔和戈林都急于想劝他改变主意。在这件事上,海军司令和空军司令这两个死对头居然握手言和了。

虽然希特勒开始着手部署地中海战事,但他并没有放弃入侵苏联的企图。他决定这么干主要不是因为雷德尔的力争,而是另外两个不利事态的压力





所致。

首先是墨索里尼在没有事先告知德国盟友的情况下,突然在10月28日入侵希腊,其目的是为了往自己脸上添光。消息传来,希特勒极为恼火,他马上察觉到这将危及他自己的计划。他原本打算让希腊保持中立,利用希腊来作为抵御英国干涉巴尔干地区的屏障,以免危及罗马尼亚的石油供应。希特勒深知意大利人虚张声势外强中干,所以只能分散兵力,积极采取措施以防英国在这一侧出兵干预。墨索里尼自行其是贸然兴兵给希特勒带来极大的麻烦,他不得不违心地投入巴尔干战役,派兵扑向克里特岛。

第二个不利事件是12月初英军从埃及向意大利军队发起反攻,北非的意大利军队全线崩溃。

托马对我生动地描述了德军进入北非战场之前的情况。

1940年10月,我被派到北非实地调查,了解一下德国是否应该出兵帮助意大利人将英军逐出埃及。我见了格拉齐亚尼(Graziani, Rodolfo)元帅,对当地的情况作了一番调研后写出报告。报告强调部队供给问题至关重要,困难不仅在于地处沙漠,还因为皇家海军控制了地中海海路。我认为不可能同时维持意大利军队和一支庞大德国军队的供给。

我的结论是,如果要派部队去北非,就得派出一支装甲部队。至少要有四个装甲师才能确保胜利。我估算要维持从穿越沙漠到达尼罗河谷的有效供给,最多不能超过四个师。我还指出,必须让德军取代意大利军队才能做到这一点。有限的供给无法维持庞大的兵员,所以必须派出精兵强将。

但是巴多利奥(Badoglio, Pietro)和格拉齐亚尼(Graziani, Rodolfo)反对德军取代意大利人。当时他们根本就反对德国向北非派出一兵一卒,希望靠自己的力量赢得占领埃及的荣耀。墨索里尼(Mussolini)在后面给他们撑腰。不同的是墨索里尼希望德国能助上一臂之力,但是他也不想让德军唱主角。

不要忘记托马前往北非两个月后,在韦维尔(Wavell, Archibald)将军的指挥下,奥康纳(O'Connor)率领英军打了一场漂亮的反击战,由此能更好地认识到托马所披露的内幕十分重要。当时那支英军人数不多,装备不整,却能以少胜多,将一支装备更糟、兵员庞大的意大利军队打得人仰马翻溃不成军。假设



当时在场的是一支德国装甲部队，英军战胜的机会就微乎其微了。

要是真如托马所建议的派出四个装甲师的精兵，那年冬天他们随时可以横扫埃及。当时奥康纳手下只有一个装甲师和一个步兵师，而且两个师的武器装备都很差。

现在可以揭开另一个内幕。墨索里尼之所以自作主张进兵埃及，部分原因就是将被英国人逐出埃及这个主意没能激发希特勒的兴趣。这与英国方面当时的预料也大相径庭，不过倒是可以与希特勒在入侵英国问题上令人吃惊的态度互为印证。虽然托马不是那种惯于揣摩他人心机的人，希特勒冷漠的态度还是让他惊愕不已。

“我呈上报告后，希特勒说他最多只能派出一个装甲师。听他这样说，我回答道，那还不如干脆放弃出兵计划。希特勒闻言大怒，他出兵北非是出于政治上的考虑。他担心如果德国不出兵表示一下支持，墨索里尼会因此倒戈。但他派出的部队能少则少。”（需要指出此时希特勒已经中止入侵英国计划，正在谋划入侵苏联。）

托马继续说：“希特勒以为只要德国略加援手，意大利人就能在非洲应对自如。他们对他们期望过高。我在西班牙见过他们，曾与他们在同一条战线‘作战’。希特勒似乎对意大利军官在餐桌边的夸夸其谈信以为真。他问我如何看意大利人，我不以为然地说：‘我和他们打交道是在战场上，可不是在军官餐厅。’”（托马居然用这种态度对希特勒说话，无怪乎这次谈话后，他就失宠了。）“我告诉希特勒：‘一个英国士兵胜过一打意大利人。’我还说：‘意大利人是好工人，但不是好战士，他们讨厌打仗。’”

德国总参谋部也反对出兵非洲，无论派大部队还是一支小部队。在托马看来，勃劳希契和哈尔德压根就不愿卷入地中海战事。“哈尔德告诉我，他曾竭力向希特勒表明战线过长的危险。并尖锐地指出：‘我们的危险在于——赢得所有的战斗，输掉最后的决战。’”

对于地中海战场，希特勒虽然不愿全力以赴，却也不甘无所作为。格拉齐亚尼吃了败仗后，希特勒派了一支特遣部队，交由隆美尔指挥，以便收拾局面。这支部队的实力足以挫败英军占领利比亚的计划，至少在两年多时间里让英军感到左支右绌，十分头痛，但还不足以给英军以致命的打击。从1941年春到1942秋，战斗一直处于拉锯状态。

与此同时，英国在地中海的各个据点无不显得岌岌可危，只是来自德军的威胁最终功亏一篑。这个结果也容易让人看不清这些威胁本来是何等致命。



德军攻打直布罗陀海峡的计划构成的威胁最为严重,它可以将英国的势力挡在西地中海区域以外。瓦尔利蒙特告诉我:“攻占直布罗陀海峡计划被取消了。该计划原本是1940年10月希特勒与佛朗哥在昂代(Hendaye)会谈的主题。12月中旬,佛朗哥将军却通知德国海军上将卡纳里斯,他不同意攻占直布罗陀海峡计划。这突如其来的变化让希特勒大吃一惊,因根据先前达成的共识,他已经派卡纳里斯到西班牙去商定1941年1月初德军进入西班牙的具体日期。”佛朗哥并没有一口拒绝,而是故意拖拖拉拉,说什么“西班牙不可能在德国指定的日子参战”。其理由是“英国军队不断地威胁,国内的军备工作尚不完善,西班牙的军需储备绝对不足”。

由于佛朗哥不愿德军借道西班牙,希特勒就打主意企图从空中越过。施图登特告诉我,在1月他受命拟定一份由空降兵占领直布罗陀海峡的计划。但经过仔细研究,他的结论是仅靠伞兵单干,难以完成这项重任。他总结道:“如果德国同意西班牙保持中立,就没法占领直布罗陀海峡。”他的观点得到认可,计划就此被搁置。

从此希特勒就全力以赴准备入侵苏联,他首先得占领希腊以防英国趁机作梗。结果事态发展到还得对付南斯拉夫问题,希特勒十分恼怒。更糟的是,虽然德军在4月迅速占领希腊和南斯拉夫,成功击退已在希腊登陆的英国军队,但还是不能确保这个侧翼安然无恙,该区域安全的有效性甚至还不如中立状态。希特勒一边诅咒墨索里尼目光短浅从中搅局,一边不得不采取措施扩大安全屏障,以防英国出手干涉。

瓦尔利蒙特从最高统帅部的角度谈了他的看法:“占领大功告成后,按照希特勒的旨意,约德尔命令国防部从战略角度研究是否应当占领克里特岛和马耳他。我们倾向于占领马耳他,但在希特勒看来克里特似乎更为重要,因为这个岛靠近爱琴海,便于进而出兵苏伊士地区。”在评论占领克里特岛(Crete)所带来的后果时,瓦尔利蒙特又说:“没多久大家就明白了,德国空军没有足够的能力充分利用克里特岛作为东地中海的主要空军基地。而且,由于通往雅典铁路的运力连希腊国内的需求都无法满足,也找不到可供使用的船只,显然通过克里特岛向隆美尔的部队提供给养是行不通的。”

施图登特就该计划的源起披露了更多的内幕,令人吃惊的是希特勒一开始并不热衷于攻占克里特岛,在东地中海给英国人当头一棒。

“德军进入希腊南部后,希特勒打算突然停止巴尔干战役。得知此事,我就乘飞机去见戈林,我向他提出由伞兵部队独自攻占克里特岛的计划。生性





好事的戈林马上看出此事可行,送我去见希特勒。4月21日,我见到希特勒。我先向他解释这个方案,希特勒说:“这听起来不错,但行不通。”不过最终我还是说服了他。”

“这场战斗,我们动用了—个伞兵师,一个滑翔机团和从没空运经历的第—五山地师。第二十二空降师曾参加过挪威战役,它在3月份被派往普洛耶什蒂去保护罗马尼亚的油田,元首担心那里的油田遭到破坏,他拒绝让该师参加克里特岛之战。”(不过瓦尔利蒙特说:“真正的原因是我们没有运输工具能及时将这个师送到希腊南部参加进攻。”) ”

提供空中支持的是里希特霍芬第八航空军团的俯冲式轰炸机和歼击机,在进攻比利时和法国时,这支部队曾大显身手。施图登特说:“我要求将这支部队和伞兵部队都由我来指挥,但遭到拒绝。该战役的指挥权授予洛尔(Lohr),他是巴尔干战役所有空军部队的总指挥。但全部的作战计划都是由我拟定的,我可以全权处理此事。第八航空军团打得不错,但若是由我来亲自指挥,战果将更为辉煌。”

“没有从海上运输军队。最初曾考虑过用这种方式派遣增援部队,但只有—些希腊的轻帆船可供使用。于是便给这些小船安排护航,为这次远征运送重武器——高射炮、反坦克炮、火炮和—些坦克,还有第五山地师的两个营。在意大利鱼雷快艇的护送下,船队开往米洛斯(Melos),准备在那里原地待命,等我们找到英国舰队的踪迹后再行动。船队抵达米洛斯后,他们被告知英国舰队还在亚历山大。实际上恰恰相反,英国舰队此刻正在赶往克里特岛的途中。船队便驶往克里特岛,结果正好撞上英国军舰,被打得七零八碎。德国空军赶来把英国海军打得够呛,也算为我们报了仇。但是原本指望的重武器没能及时送到,我军在克里特岛的陆上战斗出师不利。”

施图登特详细阐述—年前那次不幸事件造成的恶果。“在攻击“荷兰堡垒”的伞兵行动中,—支德国部队携带着我的作战条令,在海牙(Hague)附近的伊彭堡(Ypenburg)被敌人俘获。英国人立刻从这些价值不菲的文件中探知了我新建的伞兵部队的作战准则、战术和训练方法。他们利用从这些情报归纳出来的模式,部署了针对性的防御。不幸的是在我们缴获了克里特岛上的有关文件之前,我对此—无所知。这是我军在克里特岛蒙受重创的重要原因之—。假如我事先知道敌人已经掌握这些情报,我在攻击机场时就会采取不同的战术,让英国人的防御能力难以发挥。”

他接着又说,主要文件是1940年颁布的英军防伞兵战手册,里面复制了



德军伞兵部队袭击“荷兰堡垒”行动时的作战条令中重要部分,尤其是关于奇袭机场的指令。手册是在“弗赖贝格(Freyberg)将军的司令部所在地干尼亚(Canea)靠近阿柯蒂里半岛(Akortiri Peninsula)附近的一个山洞里发现的。”但发现手册时“战斗已经结束。因为情报的丢失没有及时告知,所以在此之前,施图登特根本就不知道1940年5月制定的作战条令早已落入敌手”。

施图登特可能高估了情报丢失对英军反伞兵战术的影响,因为还有许多来自不同途径的情报,而且战术的制定毕竟是基于一些常识性的原理。言之有理的地方是如果早知条令泄密,他肯定会改变战术。“5月初制定计划时,我最先想到的是在马莱迈(Maleme)和伊拉克利翁(Heraklion)的南部空降伞兵,或者将伞兵全部空降在马莱迈西南和南部,在空军的帮助下,对机场进行常规性的地面攻击。敌方外围地区是适合空降的大片高原。如果战前就看到敌方的防御手册,我就会采取这种战术展开进攻。”

施图登特谈起实战的情况:

5月20日那天,我们还没能完全成功地占领机场。最大的进展是占领马莱迈机场,骁勇善战的突击团在那里与新西兰精锐部队干了一仗。5月20日夜晚到21日夜晚这段时间对德军指挥员至关重要。我必须作出一个重大决定。我决定动用手下的伞兵机动部队攻克马莱迈机场。假如敌方在当天晚上或5月21日上午向我军发起有组织的反攻,他们肯定能击溃已经伤亡惨重、筋疲力尽的突击团,尤其严重的是这支德军已经因为武器弹药匮乏而实力大减。

但是新西兰人的反攻零零落落不成规模。事后我听说英军指挥官预料除了伞兵外,德军还将从马莱迈和干尼亚之间的海岸登陆,于是派了不少部队驻守海岸。在此关键时刻,英军指挥官不敢冒险派这些部队到马莱迈进行反攻。21日,德国机动部队成功占领机场和马莱迈的村庄。到晚上,最先空运过来的第一山地营成功着陆,克里特岛之战以德军胜利而告终。(到27日,英军全撤退到南部海岸,其残余部队从那里逃往埃及。)

虽然我们成功地占领了克里特岛,但伤亡惨重。除了受伤的,阵亡和失踪人数高达4000人。我们一共向岛上空投了22000人,其中伞兵为14000人,其余属于山地师。大多数损失是由降落不顺造成的,克里特岛上适于跳伞的着陆点很少,风从内地吹往海边。因为担心空降兵被吹到海上,飞行员将空投点尽量靠近内陆,有些伞兵正好空降到英军的阵地



上。成箱的武器空投得过于分散，增加了我军的伤亡。一开始英军仅有的几辆坦克打得我们够呛。好在他们的坦克数量还不到 24 辆。英军的步兵中多数是新西兰人，虽然遭到突袭，却打得十分顽强。

伞兵部队受到重创让元首感到十分恼怒，他由此得出结论，伞兵的突袭已经失效。此后他常对我说：“伞兵大显身手的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了。”

他不相信有关英美正在发展伞兵部队的报道。而盟军在圣纳泽尔 (St. Nazaire) 和迪耶普之战中没有动用伞兵更使他确信自己的看法。他对我说：“你瞧，他们根本没有组建伞兵部队。我没错吧。”直到 1943 年盟军攻克西西里时，希特勒才改变主意。那次战役盟军动用了大量伞兵，希特勒深受触动，下令扩充德国伞兵部队。但等他醒悟过来，无奈为时已晚，此时你们盟军已经掌握了制空权。面对敌方强大的空军，德国伞兵已无用武之地。

回想 1941 年的战事，施图登特说：

在说服希特勒同意进行克里特岛之战时，我还建议让空降兵占领塞浦路斯，以此为跳板，进而占领苏伊士运河。希特勒对这个建议似乎并不反感，但又不愿加以充分肯定。他满脑子想的都是如何入侵苏联。我军在克里特岛蒙受重创后，他断然拒绝再派伞兵进行一场大战。我反复向他进言，但还是没用。

然而一年以后，他却同意了攻占马耳他的方案。意大利也参与这次行动。我的伞兵部队和意大利的伞兵一起空降到岛上，占领桥头堡，然后意大利约六到八个师的大部队从海上登陆，加强桥头堡阵地。我指挥的部队包括一个伞兵师、三个尚未整编为师的预备团和一个意大利伞兵师。

我希望在 8 月前实施该作战方案，这还得取决于老天帮忙。我在罗马花了几个月的时间筹划作战事宜。6 月，希特勒将我召到司令部就这次行动举行最后的商谈。不幸的是，就在我到那里的前一天，希特勒召见了刚从非洲回来的克鲁威尔 (Cruwell) 将军。克鲁威尔告诉希特勒意大利军队实力不济，士气极为低落。

希特勒大吃一惊，他认为如果英国舰队在海上出现，所有的意大利军舰都会龟缩回意大利港口，德国的空降部队就会变得孤立无援。于是他



就决定放弃进攻马耳他的计划。

这个决策事关重大,因为当时隆美尔在北非大胜英军,英军被逐出加沙拉的据点,德军占领了图卜鲁格。趁英军混乱,隆美尔通过西部沙漠乘胜追击,打得英军狼狈不堪。到7月初,在被阻于阿拉曼一线之前,隆美尔已经兵临尼罗河谷。

这是英军在中东处境最为危急的时期。与此同时,苏联南方军队在希特勒发起的高加索攻势中全线崩溃,这使整个战场的形势更为严峻。在阿拉曼,隆美尔正在锤击着中东的前门;在高加索,克莱斯特大兵压境威胁着后门。

然而,托马却声称这种险境只是偶然的巧合,并非德军刻意为之。“并非像你们所认为的那样,针对中东的钳形攻势从未形成过严谨的计划。希特勒的随从曾经含糊糊地谈过此事,但我们总参谋部从来没有同意过,我们认为这个计划没有可行性。”

甚至连对埃及造成的威胁也是靠运气,英国军队出人意料地在加沙拉-图卜鲁格之战中溃败。隆美尔部队的实力尚不足以征服埃及,但他经不起诱惑,还要乘胜前进,终于铸成沙场败笔。

我问托马,隆美尔是否真的有信心攻到苏伊士运河,据说他曾对部下夸过口。托马回答:

我肯定他不会这样。他说这种话至多也是为了鼓鼓士气,尤其是要给意大利军队打打气。在阿拉曼遭到敌军阻击后,隆美尔马上冷静下来了。他深知得依靠突然袭击才能打乱英军的阵脚。面对阿拉曼严正的防线,他看不到任何可乘之机。何况他也知道英国的增援部队正在源源不断地开往阿拉曼。

因为兵力有限,供给渠道不畅,隆美尔明白自己已经走得太远了。但他的煌煌战果已经引起轰动,他难以急流勇退。希特勒也不会让他后退。结果他只好在那里硬撑,直到英军大兵云集,将他彻底打垮。

托马说,他主要是从隆美尔本人和他的部将那里了解到这些情况的。托马自己是在9月份从苏联前往北非的。“我接到命令去顶替生黄疸病的隆美尔。我打电话表示不想沾手,我说:‘看看我两年前写的东西吧。’回电说那是希特勒亲自下的命令,他坚持要派我去北非,我别无选择。我大约在9月20



日到达北非,花了几天时间和隆美尔共商军情。然后隆美尔就去了维也纳附近的维也纳新城(Wiener Neustadt)接受治疗。两星期后,施图姆(Stumm)将军来到北非,他被任命为非洲战区总指挥。这就意味着我的权力仅限于指挥阿拉曼前线部队,这样我就没法继续进行部队组织管理体系的改进工作。没过多久,施图姆中风死了。我们要面对英军的进攻,而所发生的这一切却使我方的运筹决策大受干扰。”

在此危难之际,由于任何有关在英军发动进攻之前我方先行撤退的建议均遭否决,我只能尽量改进部队的部署。若非我们在托卜鲁克仓库中缴获的英军给养可以用来维持部队的生存,我们肯定会不管希特勒的命令自行后撤。全靠这些物资才使我们能继续撑下去。

听他这么说,我就问,如此看来图卜鲁格之战的失利在当时对英军似乎是灾难性的,可事实上却促成了英军在北非战场的胜利。如果德军在蒙哥马利发起进攻前撤出阿拉曼,就可免遭灭顶之灾。托马似乎没想到这一点。

这场战斗发生在1942年10月23日,托马向我谈了他的看法。他说英第八军武器精良,拥有绝对的优势,还没开战,胜利就非它莫属。

我算了一下,当时你们可动用1200架飞机,而我们的飞机打得仅剩12架了。开战三天后,隆美尔才从维也纳回到北非战场,他就是想改变部署也为时已晚。他尚未痊愈,情绪紧张,老是拿不定主意。英军的压力与日俱增,逼得我们走投无路。

当我们明白根本无法阻挡英军的突破,就决定分两步撤退到向西50英里的达巴(Daba)附近。这样或许能让我们免于灾难。我们准备在11月3日晚实施第一阶段的撤退。撤退开始后,希特勒拍来电报命令禁止任何后撤行动,坚持要我们必须不惜任何代价在原地死守。也就意味着要让我们的部队继续向前推进,去打一场无望获胜、自取灭亡的战斗。

托马接着对我讲了他是怎样被捕的。在战斗中,他乘着坦克奔驰于各个情况紧要的阵地,坦克被多次击中,终于起火被困,他被英军活捉。“我看这也是命该如此。”他给我看自己的军帽,上面有好几个弹洞,表明他侥幸大难不死。他不无遗憾地说,战争期间他在波兰、法国、苏联和非洲总共仅参加过24



次坦克战。“西班牙内战期间,我参加过 192 次坦克战。”

拜尔莱因将军接替托马指挥北非军团,他带领德军成功地摆脱英军的追击,按照隆美尔将军的谋划,将部队巧妙地撤退到的黎波里塔尼亚(Tripolitania)。

托马被俘后,曾被带去见蒙哥马利,俩人在餐桌上探讨这次战斗的情况。“他不但没有问我德军的情况,反而表示由他来告诉我德军的兵力部署供给情况。让我大为惊讶的是,他洞悉我军的状态,尤其了解我军供给不济和海运受损的情况。他对德军了解之深入似乎不亚于我本人。”

托马在谈到胜利者是如何掌控这场战斗时说:“鉴于英军拥有压倒性的优势,我认为蒙哥马利还是十分谨慎的。但是”——托马停顿了片刻,加重语气说:“他是这场战争中唯一做到每战必胜的陆军元帅。”

他总结道:“现代机动战争,主要不是靠战术。决定因素在于组织好自己的资源,以确保胜利的势头。”



## 第十五章 希特勒入侵苏联

希特勒将赌注压在苏联战场,结果输得一败涂地,原因是他还不够大胆,而且还因为德军高级将领对进攻方向始终存有异议。生死攸关之际,胜利的机会稍纵即逝。希特勒无法走出失败的阴影,从此以后,他走向自我毁灭之路,也毁了德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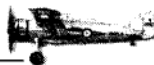
这是拿破仑故事的重演,却也有着很大的不同之处。希特勒坐失占领莫斯科的良机,此时他离决定性的胜利仅有咫尺之遥。在苏联,德军占领的土地比拿破仑更大,坚持的时间比拿破仑更久,蒙受的失败也比拿破仑更惨。

1941年7月,希特勒发动侵苏战争,此时他的如意算盘是在到达第聂伯河之前摧毁苏联红军的大部分主力。但希望没有成为现实,苏联红军远比预想的强悍。下一步该怎么办?希特勒和他的将领产生了分歧。勃劳希契和哈尔德主张继续向莫斯科推进,希特勒倾向先了结南方的战事。于是德军按希特勒的主张向南进军。基辅包围战取得重大胜利后,希特勒颇为得意,继续按自己的打算行事。向莫斯科的进军一拖再拖,刚开始时还取得了一场重大的胜利,随后德军便陷入了秋季的泥淖,最终在冬季的大雪中一败涂地。向莫斯科的进军拖得太晚了。

但德军将领与我交谈的内容表明这并非是失败的唯一因素。因为“人在森林反而看不清树木”。有时他们的结论也不一定正确。但是可以从他们提供的事实中推导出一些结论。

最令人吃惊的是拯救苏联的不是它现代化水平有多高,而恰恰是因为它太落后。如果苏联当局将其道路系统修建得像西方国家一样发达,那么它可能很快就会遭到入侵者的大肆蹂躏。正是它那坑坑洼洼的破路搞得德军机械化部队举步维艰。

不过也有与这个结论相反的论点。德军之所以失去胜利的机会是因为他们的机动性是凭借车轮而不是履带。在那些泥泞的道路上,车轮打滑难行,履



带式坦克则可继续前进。

尽管路况糟糕,依靠履带前进的装甲部队原本可以早在秋季之前就能在苏联的心脏地带所向披靡。对于任何一个善于观察并富有想象力的人而言,第一次世界大战早已昭示了履带式装甲战车的重要性。坦克的诞生地是英国,1914—1918年战争后,我们这些倡导机械化作战的人曾一再敦促新型军队应当配备具有越野能力的战车。在发展机械化部队上,德国军队比英国和其他国家的军队做得更好。但在发展履带越野运输战车这个至关重要的方面它却做得还不够。简言之,在1914—1941年,德军的现代化程度高于其他国家,但由于它没能遵行这个20年前的军事观点,以致坐失制胜良机。

德军将领年轻时期就全心全意地致力于军事专业,专注于军事技能,对政治几乎是不闻不问,更谈不上关心外部世界所发生的事情了。这种类型的人通常精明强干,但缺乏想象力。只是到二战后期,坦克学派的大胆思想才被允许自由发挥,无奈为时已晚。这对其他国家来说倒是称得上幸运。

下面是被俘德军将领谈及侵苏战争时的主要观点。

## 巴尔干战役的影响

在谈到侵苏战役问题之前,先得探讨一下希腊战役是否延迟了对苏开战,从而导致了致命后果。英国政府发言人声称,虽然威森(Wison)将军的部队最终仓皇逃离希腊,但当初派遣这支部队出战希腊的行为无可非议,因为它使德国入侵苏联的行动延迟了六个星期。但是这种说法受到许多军人的质疑,他们熟知地中海战场的形势,将这次行动斥之为政治赌博。其中就有著名的德·甘刚(de Guingand)将军,他当时在埃及的盟军联合参谋部,后来成为蒙哥马利的参谋长。

他们当时就质疑这次行动,现在更是坚持自己的观点。他们认为向希腊派出一支兵力不足的部队并没能使它摆脱德军的入侵,反而丧失了利用意大利军队在昔兰尼加的失败,在德军尚未到达之前占领的黎波里的良机。<sup>①</sup>他们强调指出希腊领导人原本对英国派兵干预持怀疑态度,只是在艾登先生(Eden)的劝诱下,以为英国会派出大部队前来助战,这才同意英国出兵干预。

---

<sup>①</sup> 瓦尔利蒙特曾言:“我们最高统帅部当时都无法理解英军为何不利用意大利在昔兰尼加的困境,向的黎波里推进。那里没有任何力量能够阻止他们进军。”





历史学家必须承认事件的发展证实了这个军事观点。仅仅三周时间,德军就占领了希腊,英军被逐出巴尔干(Balkan)。此时在昔兰尼加的英军由于兵力不足也被隆美尔打得落荒而逃,本来英军是可以的黎波里登陆的。这次行动不仅使希腊人民蒙受苦难,也让英国大丢面子,前途堪忧。即使出兵希腊真的推迟了德军入侵苏联的日期,也不能等于英国政府出兵希腊的决策是正确的,因为他们出兵希腊的目的并不是为了延迟德军入侵苏联的行动。

然而,探讨一下希腊战役是否间接地或无意中延迟了德国入侵苏联的时机也不无历史价值。支持这种观点最确切的证据是希特勒最初下令在5月15日之前完成入侵苏联的准备工作。但到3月底,预设的日期又被推迟了一个月,改为6月22日。陆军元帅伦德施泰特告诉我,由于参加巴尔干战役,一些装甲师推迟了集结的时间,他的集团军入侵苏联的准备工作也因此受到延误,加上天气因素,这是造成推迟侵苏的主要原因。

在伦德施泰特麾下指挥装甲部队的陆军元帅克莱斯特讲得还要明确,他说:“与全部兵力相比,在巴尔干的部队规模的确算不上很大,不过那里的坦克占了很大的比例。我手下原本准备从波兰入侵苏联的大部分坦克都参加了巴尔干战役,这些坦克需要修整,坦克部队的将士也需要休息。许多坦克朝南一直打到伯罗奔尼撒(Peloponnese)半岛,还得从那里赶回来。”

陆军元帅伦德施泰特和克莱斯特的看法自然受到他们当时所处条件的制约,因为他们发动进攻的力量主要取决于这些回归的装甲师。我发现其他德军将领并不认为巴尔干战役对入侵苏联的影响有多大。他们强调指出进攻苏联的主要任务分派给了驻扎在波兰北部的陆军元帅博克将军的中央集团军。胜利主要取决于博克这一路军队的进展情况。

伦德施泰特的部队对进攻起次要作用,兵力不足并不会对整个战役产生决定性的影响,因为苏联军队不会轻易就被撼动。兵力不足甚至原本有可能让希特勒打消在侵苏战役的第二阶段向南进军的念头。正如我们将会看到的那样,向南进军产生的致命后果就是它延误了战机,致使德军在冬季前没能及时抵达莫斯科。其实在紧急状态下,不等巴尔干的部队赶回来增援,原本也可以发起进攻。但结果还是延迟进攻的观点占了上风,而担心地面不够干燥的忧虑更是加强了这种观点。哈尔德将军说,在进攻实际发动之前,天气情况仍然很不理想。

不过并不能根据将领们事后的看法,来确定如果没有巴尔干战役的麻烦,当时又会作出什么决策。暂定的进攻日期一旦因巴尔干战役而被推迟,任何



在部队从巴尔干回来之前就发起进攻的主张都无从谈起了。

不过,并不是希腊战役导致了侵苏日期的延迟。早在1941年的作战计划中,希特勒就已经将入侵希腊考虑在内,以此作为入侵苏联的先期步骤。推迟入侵苏联的决定因素在于3月27日南斯拉夫突然发生政变,西莫维奇(Simovich)将军及其同谋推翻了刚与轴心国签订协议的政府。消息传来,希特勒怒不可遏,当天就决定要以压倒性优势征服南斯拉夫。要进行这样一场更大规模的战争,所需的陆军和空军已非希腊战役那些兵力能够承担。这就迫使希特勒作出更为致命的决定,推迟原定对苏联的进攻日期。

不是因为英军出兵希腊这一事实,而是因为担心英军会出兵希腊,希特勒才决定进军希腊,希腊战役的结果让他感到宽心。英军在希腊登陆甚至都没能阻止南斯拉夫现任政府与希特勒联盟,反倒是鼓励了西莫维奇成功地发动政变推翻政府,促使西莫维奇无视希特勒的淫威——尽管不算十分成功。

在询问了哈尔德和格赖芬贝格后,布卢门特里特就入侵苏联之前的事件提供了更多的情况。格赖芬贝格曾任陆总作战部部长,后来成为李斯特第十二集团军的总参谋长,指挥过巴尔干战役。

希特勒忘不了盟军在1915—1918年曾占领萨洛尼卡(Salonica),他唯恐英军故伎重演,再次从萨洛尼卡或色雷斯(Thrace)南部海岸登陆。这样英军就会出现在从东向苏联南部进攻的德军后方。希特勒猜测英军会如一战时那样挺进保加利亚、罗马尼亚和南斯拉夫。他清楚地记得,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末,巴尔干的盟军曾对大战的胜负起过举足轻重的作用。

作为入侵苏联之前的防范措施,希特勒决定占领萨洛尼卡和杰贾加赫(Dedeagach)[即亚历山德鲁波利斯(Alexandropolis)之间的色雷斯南部海岸]。特派李斯特的第十二军团和克莱斯特的装甲军团担任此项作战任务。德军在罗马尼亚集结,穿过多瑙河,进入保加利亚,从那里突破迈塔克瑟(Metaxas)防线。其右翼向萨洛尼卡进军,左翼向杰贾加赫挺进。抵达海岸,仅留下少数德军,防守海岸的任务主要将由保加利亚人负责。第十二军的大部队,尤其是克莱斯特的装甲军团全部掉头向北,经过罗马尼亚,参加东线战场南部的战斗。最初的计划并没有设想占领希腊的大部分领土。

当保加利亚国王鲍里斯三世(Boris)被告知这个计划时,他显示了对南斯拉夫方面的担忧。他担心南斯拉夫可能会对第十二军的右翼构成威



胁。但是德国代表向鲍里斯国王保证,鉴于1939年德国和南斯拉夫已经签订的协议,不会形成来自南斯拉夫方面的威胁。德国代表感到鲍里斯国王的態度有点将信将疑。

事实证明国王的怀疑没错。当第十二军按照计划准备从保加利亚发起军事行动时,贝尔格莱德突然发生的政变迫使摄政王保罗王子退位,此时德军刚刚要开始行动。显然在贝尔格莱德的政坛上,有人反对保罗王子的亲德政策,希望与西方列强结成联盟。作为军人,我们无法猜测政变事先是否得到西方列强或苏联的支持。但无论如何,这决不是希特勒一手导演的。恰恰相反,这突如其来的政变让人非常不快,它几乎使第十二军在保加利亚的整个作战计划毁于一旦。如克莱斯特的装甲师不得不立刻从保加利亚西北向贝尔格莱德(Belgrade)进军。另一个随机行动则是魏克斯的第二军急忙在克恩滕州(Carinthia)和施蒂里亚(Styria)集结,向南面进军南斯拉夫。巴尔干的战火迫使入侵苏联的行动从5月推迟到6月。所以从这一点看,贝尔格莱德的政变对侵苏战役具有实质性的影响。

天气状况对1941年的战事也有相当的影响,不过那具有偶然性。5月之前,在波兰的布格河至桑河防线东部的地面作战相当困难,那里大多数道路泥泞难行,田野沼泽密布。许多河流无人管理,致使洪水泛滥成灾。越朝东走,地势越加险恶,普里皮亚季河(Pripet)和别列津纳河(Beresina)的湿地森林情况尤其恶劣。在5月中旬之前,即使气候正常,这些地区的交通也是非常不便。而1941年又是不同寻常的年份,那年冬季特别漫长。直到6月初,横亘在我军面前的布格河仍河水漫堤,绵延数英里。

北方的情况也同样不妙。曼斯坦因当时在东普鲁士装甲尖兵团,他告诉我说,从5月末到6月初,那里一直大雨滂沱。显然,如果提早发动侵苏战役情况可能会更糟。即使排除巴尔干战役的干扰,提早侵苏日期是否可行也是令人怀疑的。德军在1940年入侵西方时可谓大得天时,但在1941年入侵东线时,老天却偏要和他们作对了。

## 侵苏冲动

接下来我与德军将领的交谈将探究希特勒为什么要入侵苏联。事情的原



委有点扑朔迷离。虽然从1940年7月起,希特勒就开始盘算入侵苏联,在年末已经形成确切的入侵计划,这个决策对德国的前途生死攸关,但值得注意的是大多数德军将领对其中的原因却依然是一头雾水。当他们被告知决定侵苏时,多数人感到不胜惶恐。但是他们所知甚少,而且很晚才通知他们。希特勒相当狡黠,他让这些将领处于互不通气的“隔离舱”内。每一个将官仅仅被告知希特勒要他去完成的任务有关的情况。他们就像一排牢房里相互隔离,各自干着计件工的囚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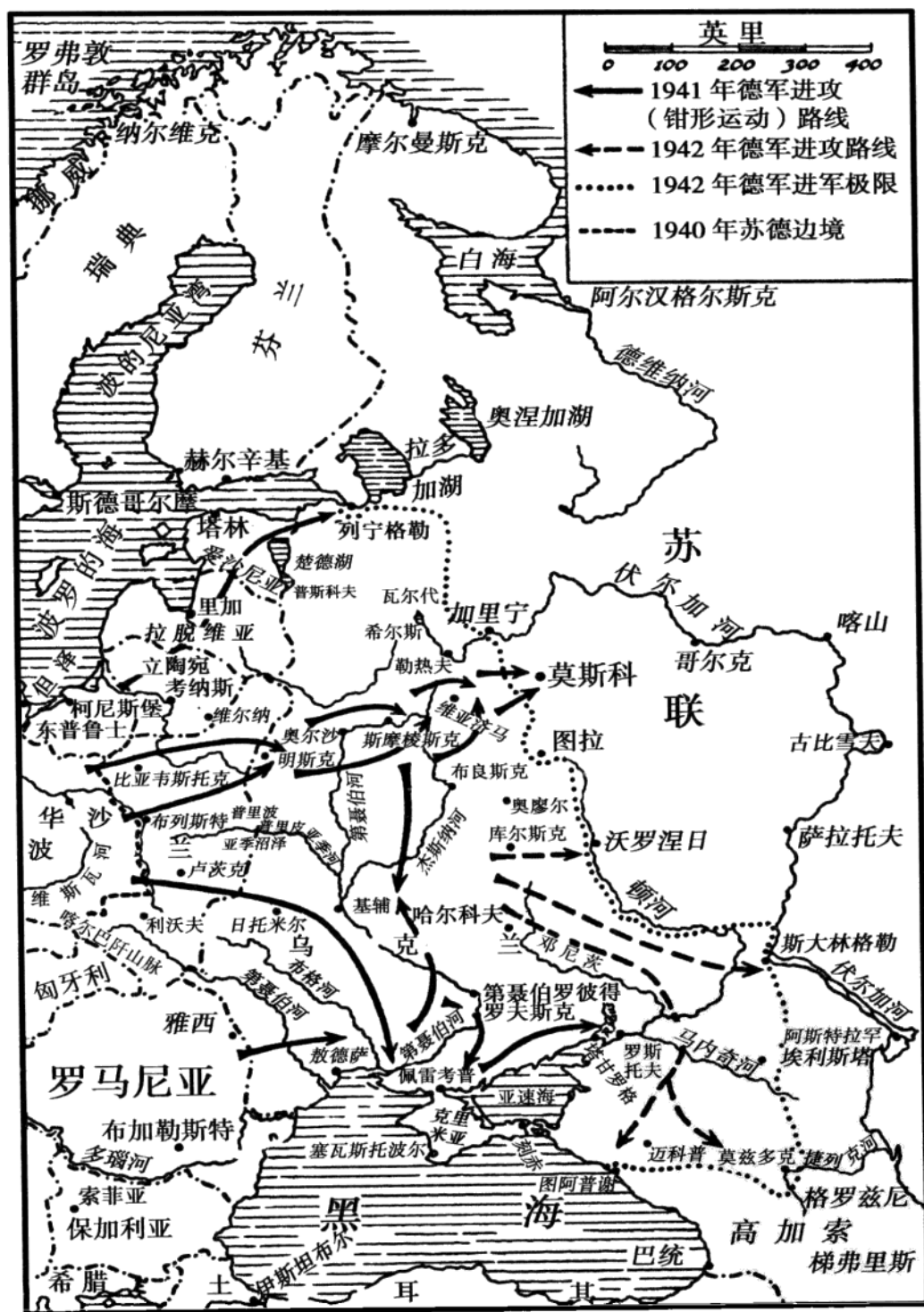
我从他们那里得知伦德施泰特一直是入侵苏联最强硬的反对者,也是他最早提出放弃入侵苏联的计划。所以我急于想知道伦德施泰特对这个问题的看法。他告诉我:“希特勒固执己见,认为苏联远比我们所想象的更富有攻击性,我们必须在苏联变得强大之前先发制人。他提供给我们的情报说苏联正准备在1941年夏发起进攻。我对这种说法持怀疑态度,我们越过苏联边境时,根本没有看到任何他们准备进攻的迹象。1940年我军忙于西线战事无暇他顾之时,苏联那边却毫无动静,这使不少曾担心苏联发动进攻的德国人放下了心。我认为德国对付苏联威胁最好的办法很简单,无非就是加强边界的防御能力罢了。如果苏联人愿意,让他来进攻好了。这种态势最便于测试他们的动向,也大大减少了贸然入侵苏联的风险。”

我进一步问他为什么不相信希特勒所谓苏联即将发起进攻的说法。他回答:“首先是我军侵入苏联边界后,他们大为吃惊。我在前沿阵地没有发现他们有任何准备进攻的迹象,只是在更远的地方略有动作。他们在喀尔巴阡山脉面对匈牙利边界一带有25个师,我原来预料他们会掉头进攻我的右翼。相反,他们却全线后撤了。我由此推断,他们根本没有进攻的准备,苏联指挥官根本没有打算早日向德国发起进攻。”

我接着询问了布卢门特里特将军,当时他是担任主攻的克卢格第四集团军参谋长,年底又成为陆总副总参谋长,他在那里直接处理作战文件,并对入侵苏联的战况进行战后评析。

布卢门特里特将军告诉我,伦德施泰特将军、总司令勃劳希契和总参谋长哈尔德都反对入侵苏联。“三个人都参加过1914—1918年的大战,经验告诉他们入侵俄国决非易事,交通、增援和供给是最大的难题。陆军元帅伦德施泰特直言不讳地质问希特勒:‘入侵苏联决非儿戏,你可曾考虑清楚?’”

希特勒依然固执己见,不过他被迫承认德苏之战必须决胜于第聂伯河以西。希特勒事先也承认,如果遭到顽强的抵抗,战线被迫拉长,德军将面临调



东线



动、供给和增援等诸多困难。当主攻路线上的装甲部队受命越过第聂伯河，向斯摩棱斯克和杰斯纳河（Desna）进军时，希特勒的如意算盘是造成苏军的恐慌，并切断缓慢行进的苏联大军的联络，以便德国步兵从后面加以包围。当希特勒发现苏联军队并没有在第聂伯河以西被围歼，他就像拿破仑一样被引入苏联的腹地。此举事关整个战役的胜负，正是希特勒在最佳路线选择上的举棋不定导致了致命的后果。

陆军元帅克莱斯特也提供了一些旁证。他说自己只是在侵苏战争即将发动时，才被告知希特勒要入侵苏联。“和其他高级军官一样，我们被告知苏联军队将进攻德国，消除这个威胁对德国至关重要。我们得到的解释是，由于这个威胁日益逼近，东线的防御将牵制大批德军，元首就没法落实其他作战方案。要消除苏联的威胁，唯一的解救之道便是主动。”

克莱斯特继续说：“我们并没有像通常所想象的那样低估了苏联红军的实力。德国驻莫斯科最后一任武官是精明强干的考斯林（Kostring）将军，他一直向我方通报苏军的状况。但是希特勒对他的情报不予认可。”

“胜利的希望很大程度上寄托在入侵会引起苏联政治动荡的前景上。我们大多数将领早就明白，如果苏联人主动后撤，没有政治动荡的作用，德军胜利的希望将十分渺茫。我们过于指望一旦苏军受到重挫，斯大林就会被他的人民推翻。元首的政治顾问助长了这种一厢情愿的奢望。作为军人，我们没有足够的政治水平来驳斥它。”

“我们没有长期作战的准备，一切都基于在秋季前决胜的设想上。”冬天降临了，德国人为自己的短见付出了惨重的代价。

至于希特勒入侵苏联的动机，瓦尔利蒙特将军后来的一番话对我颇有启发。对希特勒在入侵决策尚未最终定型之前几个月的所思所想，当时在最高统帅部工作的瓦尔利蒙特有着更贴切的阐述：

在我看来，希特勒入侵苏联的原因在于他发现自己正处于与拿破仑相同的处境。希特勒和拿破仑两人都将英国视为最强大、最危险的对手。两人都下不了入侵英伦三岛推翻英国政府的决心。然而两人都相信只要英国放弃大陆盟国在军事上对其施予援手的希望，大英帝国就不得不与主宰欧洲的势力妥协。两人都推测俄国将成为英国的盟友。两人都承认随着战争的延长，英俄联盟的危险将与日俱增。两人都确信在欧洲占主导地位的实力决不能坐视周边地区的列强（英俄）等到最佳时机来遏止



位于英俄之间的中欧强国的崛起。所以无论是出自自觉还是不自觉的认识,希特勒和拿破仑一样,都认为从战略防御的角度出发,必须抓住时机,先发制人。

希特勒低估了苏联的军事力量和作战潜力,这种想法至少在他的随从中间颇占上风,这一点是致命的,而正是这种想法加强了他要对苏联先发制人的决心。德国的一个声明证实了我的这种看法,侵苏战役之前,在与意大利人和芬兰人交往时,凯特尔和约德尔先后声称:“战争已经取得胜利,余下的只是扫尾工作而已。”这种看法很可能出自希特勒本人。瓦尔利蒙特还说约德尔在他的小圈子里也常常散布类似的言论。

瓦尔利蒙特继续说,“有关苏联军事实力的情报工作一直做得极差”,他指出往往先是由总参谋部开会对接报进行评估,据此制定作战方案。凯特尔和约德尔并不插手此事。“只有陆总通过总参对接报进行评估,而且从不允许凯特尔公布其结果。”

从瓦尔利蒙特的陈述中可以看出,与克莱斯特的说法相反(我发现克莱斯特本人对苏联红军的评价总是要比他的同僚更高),低估苏军实力的倾向并不局限于希特勒或他的随从。总参谋部可能并没有低估侵苏战役的困难,但他们肯定低估了苏联能够迎战德军的部队数量。有关文件清楚地证明了这一点。侵苏战役开始两个月后,哈尔德的一则日记颇能说明问题:“我们低估了苏联,原以为他们有 200 个师,可现在发现他们至少有 360 个师。”

德国情报机构低估了苏军的实力,而与此同时它的报告又增加了人们对苏联随时会发起进攻的恐惧心理。在 1941 年上半年,苏军在苏联西部和苏联占领的波兰集结的兵力有所上升,到 5 月,其兵力已经增至苏波战争爆发前的两倍。苏联空军的集结和机场的扩建也十分明显。所有这些无不增加了希特勒的担忧。当他向将领和其他人谈到苏联很可能正计划在夏末进攻德国时,无疑是在表达其内心真正的担忧,他的军事顾问也抱有同感。但这并不表明他的这种担忧是对的。德国人总是忽视自己的行为自然会使对方产生反应这一点,希特勒尤其如此。另一方面,有关苏联在边境地区增兵的情报接连不断,希特勒感到时间越来越紧迫,这也是可以理解的。

即便如此,令人吃惊的是希特勒明知自己的兵力原来就不如对手,而且万一战争延续,德苏力量对比必将更为悬殊,他还贸然发动战争。侵苏之战堪称近代史无前例的一场赌博。2 月,希特勒向德军将领公开了他的侵苏方案,哈



尔德陈述了双方的兵力对比,这令将领们无不感到忧心忡忡。因为即便按照哈尔德列举的数字,苏联西部的红军也有相当 155 个师的兵力,而德方可征召的部队仅 121 个师。(事实上德国真正能立即动用的部队还低于这个数字。)唯一可以壮胆的是所谓德军的素质远远高于苏军,但这尚不足以打消众将的疑虑。

主动出击使德军在其选定的重点战场——普里皮亚李河沼泽地带的北部——略显优势。博克的中央集团军从那里出发,以钳形阵势沿明斯克—莫斯科公路挺进。其先头部队为两个装甲军团(9 个装甲师和 7 个摩托化师),总共有 51 个师。但是在波罗的海附近莱布的北方集团军仅有一个装甲军团(3 个装甲师和 3 个摩托化师),总共为 30 个师,与敌方的兵力刚刚不相上下。分配给伦德施泰特的南路集团军只有一个装甲军团(5 个装甲师和 3 个摩托化师),总共为 37 个师。他们受命要以显然劣势的兵力(尤其是在最关键的坦克数量上)完成作战任务。克莱斯特告诉我,作为伦德施泰特的先锋,他的装甲部队只有 600 辆坦克。“在你看来,这可能难以置信,但那确实是我们从希腊回来后所能征集的全部兵力。我们在南方面对的苏联布琼尼集团军拥有的坦克达 2 400 辆之多。除了依靠出其不意的战术,我军主要依靠优良的训练和作战技能。在苏联人汲取经验之前,这些是我军取胜的决定因素。”

后来的战事表明,希特勒以技术优势克服数量上劣势的信念在战争之初显然要比后来更为行之有效。希特勒以质量战胜数量的信念在战场上得到了检验,他的冒险一搏几近成功。如果事先德军的目的更为具体明确,其成功的机会将会更大。德方的分歧致使苏联在防守时受益匪浅,最终导致德军侵苏战役的天折。





## 第十六章 何以兵败莫斯科

“战争迷雾”一词通常指战局的变幻莫测。在1941年,却有一层不同寻常的迷雾对战争进程产生了致命的影响。令人惊讶的是,在侵略军的最高司令部里,有关此战的目的始终处于云遮雾障的氛围。从最初制定作战方案开始,希特勒就和陆军将领存在着意见分歧,双方的分歧一直没能得到妥善的解决。

希特勒希望首先占领列宁格勒,这样就能确保德军波罗的海侧翼的安全,与芬兰联为一线,从而降低莫斯科的重要性。然而出于谋求经济利益的迫切心情,他又想夺取乌克兰的农业资源和第聂伯河下游的工业区。这两大目标相距甚远,结果就形成了两条互不关联的作战路线。集中兵力,目标单一,具有内在的机动性,能给敌方造成巨大的威慑力。两线作战则在本质上与之相悖。

勃劳希契和哈尔德希望集中兵力于莫斯科一线,这不是为了占领苏联首都,而是因为他们“预料将会在通往莫斯科的路上发现苏军”,抓住最佳战机消灭苏联红军的主力。希特勒认为这样风险太大,那会促使红军向东全线撤退,让德军扑空。勃劳希契和哈尔德同意希特勒要避免扑空的看法非常重要,希特勒也认为他们趁早“围歼”敌军主力的主张不无价值。于是双方就先着力于完成入侵第一阶段的任务,至于长远的目标就束之高阁以后再定了。

在与希特勒打交道的过程中,勃劳希契倾向于尽量避免在“半路上纠缠”,这样做的结果却是给后来埋下了更大的隐患。在这件事上,因为他要暂时避免与希特勒冲突,结果在战役的中途就遇上了麻烦。1940年12月18日,希特勒批准并颁布了“巴巴罗萨”(Barbarossa)计划,该计划显然清楚地反映了希特勒的想法,也表明勃劳希契遵从了希特勒旨意。

该计划如此规定作战目的:

普里皮亚季河沼泽地带分南北两大战区,重点放在北区,拟派出两个



集团军。

两个集团军靠南,前线中央的军团以强大的装甲和摩托化部队从周围地区和华沙北部出发,其主要任务是歼灭在白俄罗斯的苏军部队。这样就能与北方的集团军配合形成强大而机动的阵形,北方集团军从东普鲁士向列宁格勒一线进发,一举歼灭在波罗的诸国作战的敌军。只有在完成这个最重要的任务,并随即占领列宁格勒和喀琅施塔得(Kronstadt)之后,才能继续发起攻势占领交通和军事工业中心莫斯科。

只有出其不意地迅速打垮苏联的防御才能保证我们同时完成两大任务。

普里皮亚季河沼泽地带南部的集团军的主要任务是从波兰的卢布林(Lublin)向基辅进军,迅速突破,深入苏军的侧翼和后方,沿第聂伯河将敌军包抄围歼。

在2月3日的军事会议上,哈尔德再次详述了陆总的作战方案,在结束会议时,希特勒最后强调:“为了完成任务,必须牢记主要目的是占领波罗的诸国和列宁格勒。”

## 侵苏战役的夭折

我要探究的下一个问题是入侵计划是如何出错的。克莱斯特的回答是:“失败的主要原因是那年冬季来得太早,加上苏联人不断弃地后撤,没有如我所愿进行决战。”

伦德施泰特也认同这个“决定因素”。“但是在冬天来临之前,由于道路泥泞难行致使我军行动迟缓,丧失了许多战机。10分钟的雨量就会让乌克兰的‘黑土’化为泥浆,在地面干燥之前简直寸步难行。时不我待,路况却拖住了我军的脚步。更糟糕的是苏联境内铁路稀少,没法及时将给养送达先头部队。另一个不利因素是随着苏军的后撤,他们的增援部队却源源不断地从后方赶来。我们好像刚刚打掉一支敌军,又会出现一支新的部队在前面阻击。”

布卢门特里特将军也认同这些看法,但不认为苏军主动弃地后撤。在通往莫斯科的主要道路上,苏军不断地进行抵抗的时间并不短,这足以让他们陷入包围。但是由于德军丧失了机动能力,一再错失包围敌军的机会。“道路难行是最主要的障碍,其次是铁路运力即便修复后还是严重不足。我们的情报



机构在这两方面都犯了大错,严重低估了两大因素会造成的影响。加上苏联境内的铁路轨距与德国不同,又耽搁了恢复铁路运输的时间。苏联战役中的供给问题一直很严重,地方上的复杂情况更使之雪上加霜。”然而,布卢门特里特还是认为,如果采纳古德里安别出心裁的作战方案,如果不是希特勒的犹豫不决浪费了极为宝贵的时间,德军原本是可以攻克莫斯科的。布卢门特里特有关这方面的议论以后再谈。

克莱斯特强调的另一个原因是,此时德军已经不再享有1940年入侵西欧时绝对的空中优势。虽然德军重创苏联空军使自己占有数量上的优势,这种优势却随着德军的深入,空中掩护路线拉长而日趋抵消。地面进军越快,战线就拉得越长。谈到这点,克莱斯特说:“在进攻的好几个阶段,我的装甲部队都因为缺乏空中掩护而受到牵制,机场离得太远了。而且我们在开始几个月里所享受的空中优势仅限于局部地区,而非全部战场。这得归功于飞行员的高超技能,而非数量上的优势。”苏联空军取得经验重整旗鼓后,德军的空中优势就随即消失了。

伦德施泰特认为,除了这些最基本的原因外,德方另一个失误是最初的部署使部队在突破后的攻势有所延迟。按照陆军最高司令部的方案,在伦德施泰特的左翼和博克的右翼之间有一个空当,正对着普里皮亚季河沼泽地带的西头。当时认为那里地处沼泽,不必担心部队的安全。于是决定倾其全力沿沼泽南北迅速推进。伦德施泰特在讨论该作战方案时就对此提出质疑,“根据我1914—1918年在东部前线作战的经验,苏联的骑兵可以在普里皮亚季河沼泽地带作战。所以我对进军时的这个空当感到担忧,因为苏军可以轻而易举地从那个地方威胁我军的侧翼。”

在侵苏战役的第一阶段,伦德施泰特的担心并没有成为现实。赖歇瑙的第六军强行占领沼泽南部布格河的渡口后,克莱斯特的装甲部队迅速通过该地,直取卢克(Luck)和里夫内(Rovno)。但是在部队穿过俄国旧边界,向基辅进军途中,苏联的骑兵团突然从普里皮亚季河沼泽地带出现,向德军发起猛烈的反攻。形势一度十分危急,虽然经过苦战总算转危为安,却拖延了进军速度,致使德军没能及时抵达第聂伯河。

不难看出,骑兵的骚扰让伦德施泰特感到压力很大,不过这对整个战役最终结局的影响并不那么明显。因为在普里皮亚季河沼泽地带北部的博克的进军没有受到类似的干扰,而博克军团才是主攻的重心所在。

正是在这里,在这直趋莫斯科的大路上,德军重兵云集,准备与苏军一决



雌雄。但随着战事的进展,伦德施泰特和克莱斯特在南线遭遇的困境在这里有过之而无不及,那还得归咎于人为因素——判断失策。

海因里希将军通过地图向我清晰地演示了德军进攻计划的全景。此人个头不高,举止彬彬有礼,颇有牧师风度,说起话来好像在做祷告。虽然他看似不像军人,却颇具军事才干。他从特种兵指挥起家,最终当上了集团军司令,指挥过保卫柏林的奥德河之战。他在概述战役模式时经常引用布卢门特里特将军对战役背景的详述来加以补充。从布列斯特-立陶夫斯克(Brest-Litovsk,布列斯特的旧称)到莫斯科的时候,在进军过程中,布卢门特里特将军一直担任克莱斯特集团军的参谋长。后来其他在这一战线作战过的将军对他的叙述有所补充,并作过几点更正。

简言之,该作战方案就是要围歼苏军的主力部队。通过机动作战形成一个极大的包围圈,内圈由步兵组成,两个庞大的装甲集团军则在外围运动作战。

这两大装甲部队分别由古德里安和霍特指挥。古德里安的部队由三个装甲军团组成,还有一个步兵军团也归他指挥,准备用来包围布列斯特-立陶夫斯克前线的要塞。另外两个步兵师分配给作为先锋的两个装甲军团,准备攻占布格河的渡口。一个装甲军团实际上等于是一个装甲军,后来确实也是这么重新命名的。但是在刚开始和后来时会将将其置于后继的步兵军指挥。组织隶属关系的不明确结果导致不少麻烦。

德军的进攻打得苏联边防军完全措手不及,他们轻而易举地渡过了布格河。古德里安部队中许多水陆两用坦克,适于从水底过河,它可以通过一个长长的管子在水中“呼吸”,就像后来参战的长鼻式潜水艇。苏联漫长的防线在很多地方几乎无人防守,德军装甲部队在空旷的原野上长驱直入。到傍晚时分,有些装甲师向前推进了 50 英里。越往内地深入,遇到的阻击就越多,不过德军通常还能战而胜之。

24 日,勒梅尔森(Lemelsen)的第四十七集团军与苏联大军在斯洛尼姆(Slonim)展开激战,苏军试图冲破德军对比亚韦斯托克(Bialystok)地区日益收紧的包围圈。

德军的装甲部队以钳形攻势推进,终点是明斯克。霍特的右翼部队从东普鲁士出发,在 26 日抵达明斯克的北郊。勒梅尔森装甲部队的行程更长,用五天半时间走了二百多英里,在 27 日才与霍特的部队会师。次日,德军攻陷明斯克。与此同时,盖尔·冯·施韦朋堡的第二十四装甲军团急速进军,在同



一天到达别列津纳河，一举占领这条具有历史意义的河上的桥头堡。然后他们向第聂伯河进军，结果发现苏联已经急调增援部队加强了沿河一线的防守。

远在后方，德军步兵的钳形攻势已经在斯洛尼姆完成了对苏军的合围。但并没能及时拦截从亚韦斯托克撤离的苏军大部队。结果试图在明斯克再次将其包围，这次干得比较成功，虽然在合围完成前不少苏军零星部队分别成功逃脱，但毕竟围歼了近 30 万苏军。大围歼的成功使德军上下乐观情绪高涨，连那些原先对希特勒决定入侵苏联感到十分担心的将领也转忧为喜。哈尔德在 7 月 3 日说：“要在 14 天之内赢得对苏战争看来并非夸夸其谈。”

然而这些战况却使德军指挥员对下一步行动产生了严重的战术分歧。古德里安和霍特已经按照原先的指令从明斯克继续向前进发，仅留下一些小分队帮助后续的步兵收紧包围圈。克卢格则主张部队停止前进，先全力完成围歼战，投入全体装甲部队来完成这个任务。但装甲部队已经向前挺进，克卢格的这些不受欢迎的异议下达得并不顺畅。于是克卢格就吁请博克配合，后者同意将部队调回来。要不是希特勒支持克卢格和博克的主张，勃劳希契原本是赞同装甲部队继续突进的。7 月 3 日，古德里安和霍特的装甲部队划归克卢格指挥。就在同一天，明斯克以西的苏联大军缴械投降，两支装甲部队又可以放手行动了。

古德里安决定立刻抓紧时机，强渡第聂伯河，因为如果花一两个星期等待第四军的步兵赶上来，那么苏军也就有时间调上增援部队。古德里安决定在夜幕的掩护下强行渡河，苏军的防线十分开阔，德军集中兵力专攻三个无人防守的地点。得知古德里安的意图后，克卢格赶来见他，企图再次加以阻止。但是他看到进攻已经万事俱备箭在弦上，于是便同意试一试。此战打得相当漂亮，7 月 10 日渡过第聂伯河后，古德里安向斯摩棱斯克推进，苏军从突破口侧翼发起的强大反攻并没能阻止德军的前进。古德里安的左路在 16 日抵达斯摩棱斯克，中路到达杰斯纳河，并在 20 日占领艾尔雅（Elnya）。右路部队的进展有所迟缓，那是因为遭遇到从戈梅利（Gomel）向第聂伯河以北进行反攻的大批苏军。

侵苏部队已经深入苏联境内 400 英里，离莫斯科仅 200 英里之遥。虽然第二阶段战役从明斯克到斯摩棱斯克花了近三个星期，比第一阶段五天结束战斗要长很多，但是如此深入敌后，达到这般速度已经是相当快了。

霍特的部队抵达斯摩棱斯克北部，形成一个新的包围圈来分割位于第聂伯河和杰斯纳河之间的苏军大部队，德军的装甲部队已经追上他们。包围几



乎就要大功告成,但是泥泞难行的乡村道路致使德军行动困难,苏联军队成功地逃脱了一大批。即便如此,在斯摩棱斯克地区,德军还是俘获了18万苏军。

布卢门特里特向我生动地描述了德军从明斯克出发后的情况。过了第聂伯河和德维纳河后,路况越来越糟。“广袤的原始森林、密布的沼泽、糟透的路况、无法承载坦克重量的桥梁,我军的坦克简直寸步难行。苏军的阻击也日趋顽强,他们开始在前线布上地雷阵。由于可行的道路屈指可数,他们很容易封锁这些道路。”

“从边界通往莫斯科的高速公路尚未完工——这是一条西方人所谓的‘路’。我们没有防到情况会这么糟,因为我们的地图与实际不符。在这些地图上红线标志着所有的大路,看似不少,可其实只是些沙泥小径。德国情报机构有关波兰苏占区的情报相当精准,可有关苏联境内地形的情报却错得离谱。”

“这样的乡间道路让坦克吃尽苦头,而伴随坦克的运输大队日子还要难过,车队装着坦克燃料油、给养和后备部队。运输车队只能在公路上行进,沙质道路变得泥泞不堪后,这些车辆就开不动了。一两个小时的雨就足以让装甲部队停滞不前。成群结队的车辆坦克一线排开,长达上百英里,在太阳出来晒干地面之前,它们都没法动弹,这种场面真是非同寻常。霍特的部队从奥尔沙-涅韦尔(Orsha-Nevel)出发,沼泽和暴雨使他们进军速度大大降低。古德里安的部队迅速向斯摩棱斯克推进,但也遇到同样的麻烦。”

古德里安证实了布卢门特里特所说的地图错谬,他也提到了沼泽地带造成的麻烦,不过他强调,开始进攻的几个星期天气不错。“部队行动迟缓的最主要原因是陆军元帅克卢格的迟疑。后方一出现问题,他就想阻止装甲部队向前推进。”

克卢格对阻止部队前进有其特别的作用,布卢门特里特没说这一点很可能是出于对前上司的忠诚。但正是布卢门特里特首先披露从一开始就存在着战术思想的分歧。他对我详述了此事,他说希特勒和大多数高级将领都同意按照正规的战略准则打包围战。“但是古德里安独树一帜,他主张以最快的速度长驱直入,由后续的步兵来包围敌军。他强调要让苏军疲于奔命,没有时间进行集结。他要直奔莫斯科,并坚信只要不浪费时间,他能达到目的。只要德军突进到斯大林势力的中心,苏联的抵抗就可能全线瘫痪。”

“古德里安的方案可谓十分大胆,同时也意味着在保证增援部队和给养方面得冒很大的风险。但是如果拖延时间则风险更大,让装甲部队频频调头,追



上敌军就得加以围歼,这样将耗费更多的时间。”

“我们抵达斯摩棱斯克后在那里耗了好几个星期,因为需要补充给养和增援部队,但更大的原因是德军将领就未来的战略又产生了新的分歧,这种争论总是没完没了。”

博克主张向莫斯科推进,他同意古德里安和霍特的观点,表示他坚信用坦克部队再次长驱直入,能够成功到达莫斯科。但是希特勒认为应该是实行他当初制定的主要任务的时候了,即占领列宁格勒和乌克兰。希特勒强调列宁格勒和乌克兰要比莫斯科更重要,但他并不是如许多持批评态度的将领所想的那样仅仅是出于经济和政治的考虑。他似乎在设想进行一场类似坎尼战役(Cannae,一译坎奈战役。第二次布匿战争中的重要战役。坎尼战役显示了汉尼拔的将才,并树立了军事史上以少胜多的战例典范——编者注)那样特大规模的战役。德军对莫斯科业已造成的威胁将苏联的后备部队吸引到那一线,德军的两翼就能轻而易举地实现自己的目标——占领列宁格勒和乌克兰。再从那里分两路进军,在莫斯科会师,此时莫斯科就如成熟的果子那样唾手可得。这是一个精致而宏大的构想,但由于时间因素而最终破产。苏联人的抵抗远比预想的要顽强,天气恶劣的程度也超乎预料,而且希特勒也不曾料到此战会拖到下一年。显然,将领们的意见分歧终究还是于事无补。

7月19日,希特勒发布下一阶段的作战指令——围歼第聂伯河和杰斯纳河之间苏军的战斗一旦结束立刻执行。博克的一部分机动部队开往南方,去帮助伦德施泰特歼灭与之对阵的苏军。另一部分向北进军,切断列宁格勒与莫斯科的联络,帮助莱布攻占莫斯科。博克则带领其余部队步行前进,尽全力向莫斯科正面进攻。

勃劳希契再次表现出见风使舵的态度,他没有马上提出不同的作战方案,而是表示在下一阶段作战开始之前,装甲部队必须先休息一下,坦克装备也要修整,更换零件。希特勒同意有必要暂缓进攻。但是苏联的抵抗和反攻使德军难以一下肃清杰斯纳河以西的苏军,直到8月初,装甲部队才得以略加喘息。在4日的会议上,博克催促要尽快向莫斯科进军,古德里安说他已经准备好在15日发起进攻。然而希特勒强调他的主要目标仍是列宁格勒,并表示拿下列宁格勒后,他将在莫斯科和乌克兰之间作出取舍。希特勒倾向于先攻乌克兰,这样就可以为占领克里米亚和那里的苏联空军基地打开道路。他认为克里米亚空军基地对罗马尼亚油田具有潜在的威胁。



## 转战南方——基辅合围战

在接下来的两个星期里，德军高层依然是争论不休。勃劳希契企图劝诱希特勒批准向莫斯科进军，但是他的态度过于温和，没能打动希特勒。到8月15日，在哈尔德起草的备忘录中更加强烈地提出进军莫斯科，但是希特勒在21日否定了哈尔德的建议，并发出了新的指令。这个新指令只是重复了他一个月前的主张，只是不再那么强调列宁格勒的重要性，而更重视在伦德施泰特作战的基辅地区围歼苏军。此后博克才可能继续向莫斯科进军，而伦德施泰特则南下切断苏联来自高加索的石油供应线。

当陆总收到希特勒的这个命令后，哈尔德建议勃劳希契一起提交他们的辞呈，但勃劳希契认为这样做没用，希特勒肯定会断然拒绝。

在争论不休的这段时间里，战局的种种演变促使希特勒更加坚持己见。伦德施泰特部队左侧的赖歇瑙的第六军被苏军挡在基辅城外，藏在普里皮亚季河沼泽东头的苏军不断地威胁着其左翼和博克的右翼。另一方面，克莱斯特的装甲部队在一次斜线运动战中取得了辉煌的战果。它突然转向东南，直插德涅斯特河（Denister）与第聂伯河之间的走廊地带，向黑海和第聂伯河弯斜向进军，切断面向罗马尼亚人的苏军。这一系列举措强化了有利的态势，如果克莱斯特挥师向北，博克方面向南派出一支精锐部队，从两翼发起攻势，不仅可以瓦解基辅周围苏军的顽强抵抗，而且能够将其团团围住。这样一来就能彻底消除进攻莫斯科时可能遭遇第聂伯河以南苏军反击的威胁。正是所有这些有利的态势促使希特勒下决心在基辅开战，以此作为进军莫斯科的前奏。赞同这样做的并非只有希特勒一人。

有关这个重要决策，布卢门特里特提起过的一件事颇有意思。他说：“虽然陆军元帅博克希望继续向莫斯科进军，克卢格将军却并不认同。克卢格强烈支持围歼基辅苏军的替代方案，按照他的想法，他的第四军就可以向南迂回，与古德里安的装甲部队一起完成钳形攻势。在力推这个方案时，他特意对我说：‘这样一来，我们会归陆军元帅伦德施泰特指挥，而不是陆军元帅博克。’与博克打交道极不容易，克卢格自然不愿和他沾边。人际关系影响到战略决策，这倒是个有趣的例子。”

伦德施泰特自然乐意北方的援军来帮助他解决眼前的燃眉之急，也希望能够摘取围歼战的辉煌胜利，这可是军人梦寐以求的赫赫战功。由于博克麾





下的主将与希特勒意见一致,自恃有将领的支持,希特勒便决定与陆总的建议背道而驰。确实可以列举很多理由来表明,在向莫斯科进军之前,先得消除苏军从侧翼反攻的威胁,解决南面的后顾之忧。况且,苏军大部队行动相对迟缓,这增加了德军机动性的战略优势,德军机动部队集中兵力不断地从一个地方向另一地点灵活作战,频频取得决定性的战果。但要落实这个方案,时间已经非常紧迫,尤其是德军对冬季战役并没有做好充分的准备。

这里可以提一下,克卢格并没能如愿摆脱博克的控制。虽然他和参谋们已经从前线撤出,准备对基辅的钳形攻势,但不久克卢格部队参战一事便被取消了。(虽然这会使古德里安南进时的步兵实力有所减弱,但古德里安对此并不感到遗憾,他对我说:“克卢格比博克还要难以相处。”)克卢格一气之下就干脆请假乘飞机打道回府了。在莫斯科战役打响之前的几个星期里,他就一直在看管家产。

希特勒坚持要发动基辅战役,但在其他方面,他对陆总和博克作了一定的让步。除了将第四军留归博克指挥,他放弃了从霍特的装甲部队抽调至少两个军团去助攻列宁格勒的打算。他还同意一旦基辅战役结束,就从其他军团调动装甲部队,帮助中路集团军准备主攻莫斯科。9月6日下达的新命令中包含了这个决定。希特勒的如意算盘是在9月中旬开始向莫斯科进军,但是根据以往的经验,看似合乎逻辑的计算未必就能得出必然如此的结论。

就基辅合围战本身而言,德军大获全胜,煌煌战果堪称空前。赖歇瑙和魏克斯率领的德军在正面战场咬住苏军,古德里安从苏军的后方插入,克莱斯特则从第聂伯河湾向北突进。这两支装甲部队在距基辅东面150英里处会师,从后方将苏军团团围住。这次逃脱的苏军寥寥无几,总共有60万苏军沦为战俘。但是战斗尚未结束,时间已经是9月下旬了,道路破败、天气恶劣,这虽然没能阻止德军完成围歼,但却大大延迟了合围的速度。

秋季来临,路途日渐难行。冬季步步逼近,致命的威胁将再度降临到侵苏大军的头上。

## 功败垂成列宁格勒

希特勒认为当务之急是占领列宁格勒,虽然这个想法与勃劳希契、哈尔德以及博克的观点相左,但支持他的高级将领也不乏其人。他们中间不少人当时就支持希特勒的决策,至今仍认为那是正确可行的。1945年伦德施泰特谈



起这次战役时说：“在我看来，1941年在苏联的行动应当首先集中力量进攻列宁格勒，而不是莫斯科。这样就能与芬兰人联手，然后从北向莫斯科推进，与由西而来的陆军元帅博克的军队配合作战。”

但随着战役的展开，该方案不仅受挫于来自正面的抵抗，还改变了原定的目标，转向了乌克兰。伦德施泰特本人也对目标的转变起到过促进作用，因为他自然更关注自己南路军的战况。伦德施泰特的意见举足轻重，如果当初让他来指挥北方的战事，战争演变的格局可能就会迥然不同了。

集中兵力南向基辅“合围”与北上攻克列宁格勒很难同时协调进行。陆总和博克则力主早日进军莫斯科，三个方向的分歧使事情更为难办。希特勒决定实施基辅合围，这势必使之成为“当务之急”，列宁格勒也就退而成为次要目标了。

不少德国将领对我说过，正是由于希特勒的横加干预，致使德军丧失了早日占领列宁格勒的机会。瓦尔利蒙特说：“正当北方集团军的装甲先锋队兵临列宁格勒市郊时，希特勒却又一次下达了致命的暂停进攻命令。他显然是想避免德军人员和物资受到重创，因为要与苏联这个大城市里愤怒的人民进行巷战，其惨烈的程度可想而知。他希望切断外界与市内所有的供应线，不战而屈人之兵。”布卢门特里特的看法是：“本来拿下列宁格勒费不了多少事，可是由于1939年攻占华沙时德军伤亡惨重，希特勒从此对攻占大城市总是感到神经过敏。我军的坦克行将发起进攻之际，希特勒却下令停止进攻——1941年发生在敦刻尔克的一幕再度重演。进攻本已万事俱备，连从法国运来的远程大炮也架好了，但实际情况与表面现象恰恰相反，德军并没对列宁格勒发起过真正的进攻。”

想通过包围和封锁来降服列宁格勒的目的并没达到，随着机动部队在秋季被调往莫斯科方面，攻克列宁格勒的希望已日趋渺茫。赫普纳的装甲部队一直是北线战场的前锋，却被调往中路克卢格的第四军。7月，希特勒还在反对陆总集中兵力攻克莫斯科的方案，此刻为了加强对莫斯科为时已晚的攻势，他却舍弃了自己原定的目标列宁格勒。看来如果德军一直坚持无论是最高统帅部还是陆总的决策都可能获得更好的结果，但他们却力图兼顾两者，致使前路多难。

## 秋季攻势

基辅围歼的辉煌战果淡化了在列宁格勒的失意。大多数德国人为这次大



胜而欣喜若狂,以为可以在维亚兹马(Vyasma)周围杰斯纳河地区同样再取得一次围歼战的胜利,从而打开大路迅速向莫斯科挺进。虽然即将秋去冬来,那些原来就主张进攻莫斯科的将领此刻更加求战心切,而那些原来持异议的将领现在也认可攻占莫斯科的时机已经成熟。

战后,伦德施泰特对我谈了他的观点,他说:“占领基辅后,我们应当在第聂伯河停止前进。我曾为此力辩,陆军元帅勃劳希契也同意我的看法。但是被基辅胜利冲昏头脑的希特勒却自以为稳操胜券,执意要向前推进,攻占莫斯科。陆军元帅博克自然是何乐而不为,他的鼻子早就对准莫斯科了。哈尔德将军也同样如此。”然而根据现存的有关档案,由于身边的将领几乎无不跃跃欲试,勃劳希契未必真的像伦德施泰特那样谨慎从事。档案表明伦德施泰特首先提出停止进军,然而在11月初之前,即便是他也没有竭力主张停止行动。

在当时的格局下,可以理解为什么乐观自信的情绪能占上风,大多数将领主张发起进军莫斯科的秋季攻势。然而苏联人赢得了两个月的时间,留给德军的机会日渐渺茫,如今他们更加指望秋高气爽老天帮忙了。但是事与愿违,那年秋季异常潮湿。布卢门特里特沮丧地说:“我们在8月和9月耽搁了,这可是一年中天气最好的两个月份。后果是致命的。”

希特勒决定发起秋季攻势的同时,还想发动另一场战役,他禁不住来自南方的诱惑,妄图既攻占莫斯科,又能品尝南方胜利的战果,这就使事态更为复杂,德军的兵力难以集中。

## 受挫“高加索门户”

希特勒决定进军,他命令伦德施泰特肃清黑海沿线敌军,直抵高加索。这个新任务奢望太高过于贪婪。伦德施泰特在地图上给我作了演示,德军的目标是夺取沃罗涅日(Voronezh)以东至顿河一线到罗斯托夫(Rostov)附近的河口,其右翼长驱直入占领迈科普(Maikop)油田,其左翼进攻位于伏尔加河(Volga)的斯大林格勒(Stalingrad)。伦德施泰特向希特勒指出,越过第聂伯河向前推进400英里决非易事,而且风险太大,长距离的奔袭会使部队的左翼暴露目标,受到打击。希特勒则信心十足地断言,苏联人不会进行认真的抵抗,冰冻的道路能让德军迅速抵达目的地。

伦德施泰特向我描述了事情的经过,他说:“由于要分兵到莫斯科,这个方案一开始就显得很不顺。我的许多机动部队被调往东北,准备越过奥廖尔,开



往莫斯科南郊。此行徒劳无功,反而坐失良机。我原来希望博克的右翼向东南转头,向在库尔斯克与我对阵的苏军后方发起猛攻,将其分割围歼。我认为将进攻重心转向东北铸成大错,因为那里有通往莫斯科的铁路,苏军占据着有利的地势,足以抗击德军的进攻。”(可见伦德施泰特依然和陆总观点相左。)

由于我的第六军被挡在库尔斯克以外,没能到达顿河边上的沃罗涅日,原定目标落空。这次阻击也影响到友邻部队第十七军的进展,使我方向高加索进军的范围变得更为狭窄。第十七军在顿涅茨河一线遭到顽强的阻击。它没法继续前进去掩护克莱斯特第一装甲军的侧翼。苏军朝南向黑海一线发起强大的反攻,克莱斯特的侧翼岌岌可危。

曼斯坦因的第十一军在另一侧突破了佩雷奇普地峡(Perekop Isthmus)的苏军防线,攻入克里米亚,迅速横扫除了萨瓦斯托普(Savastopol)要塞和刻赤(Kerch)高地以外的整个半岛。但是希特勒下令的这次分兵行动削弱了我在主战场的实力。

用克莱斯特的话来描述高加索行动最为合适,他说:“我军还没到达顿河下游之前,事态已经十分明朗。已经没有时间和机会抵达高加索了。虽然我们包围了第聂伯河以西的大部分苏军,撕开了前进的通道,苏联大军还是通过东方的铁路和公路源源不断地涌来。恶劣的天气又雪上加霜,在紧要时刻,我们不时陷入泥泞,而且我的先头部队又偏偏汽油短缺。”

“我当时的想法是攻入罗斯托夫,摧毁那里顿河上的桥梁,而非不断推进。我在米乌斯河(Mius)边找到一处极为有利的防御点,采取措施部署一条冬季防线。但是戈培尔的宣传机器却对我军进入罗斯托夫大肆鼓噪,说什么“打开了进军高加索的门户”,致使我的想法难以落实。我的部队被迫在罗斯托夫耽搁了过长的时间,结果在11月末,苏军向我发起反攻,我军遭到重创。不过我军退守米乌斯河防线后就顶住了苏军的追击。虽然敌军从内侧耳向外大力推进,整个冬季,我军还是成功地守住了这条防线,那里离罗斯托夫以西仅50英里。这是德军向东方推进的最远点。”

克莱斯特补充道:“在第一个冬季,德军的处境非常危险。他们几乎被冻僵了,举步维艰,那是阻截苏军包围的一大障碍。”

伦德施泰特的叙述证实了克莱斯特的话,他也谈了自己是如何第一次被撤去总司令职务的。“我想摆脱与苏军的纠缠,退守米乌斯河一线。陆军元帅



勃劳希契开始时也是同意的,但是元首横加否决,希特勒下令不准后撤。我回电声称,死守不退简直是胡来,并说:‘如果你不同意我的建议,就另请高明来指挥吧。’当天晚上,元首回电接受我的辞呈。12月1日,我离开东部前线,从此一去不返。希特勒随后飞到那里,视察了战场的形势后,他改变主意,同意后撤。值得注意的是,从1941年到1942年,米乌斯是我军唯一未被撼动的防线。”

我从其他方面得知两个重要的补充。伦德施泰特建议退守米乌斯河时,勃劳希契先是赞同,后来又转变态度,屈服于希特勒的主张,不同意后撤。不过希特勒当即接受伦德施泰特的辞呈时,勃劳希契还是表示了异议。希特勒任命赖歇瑙接替伦德施泰特,为了表示对元首的顺从,赖歇瑙起先对是否后撤不置可否。苏军的反攻迫使希特勒改变主意。事实毕竟强于雄辩。

## 兵败莫斯科

10月2日,德军开始向东面的莫斯科进军。由三个集团军执行该项任务,右路为第二集团军,赫普纳装甲部队所隶属的第四集团军位于中路,第九集团军加上霍特的装甲军团位于左路。与此同时,古德里安的装甲军团独自行动,从南方起程直扑位于杰斯纳河对岸苏军防线的后方。9月30日,古德里安率领的部队直趋奥廖尔和图拉(Tula)以及莫斯科南郊。

布卢门特里特对这次进攻的过程作了生动的描述:

第一阶段的战斗是包围维亚兹马和布良斯克(Bryansk)。这次包围战打得非常完美,俘获60万苏军。这就如一个现代版的坎尼战役,只是规模更大。坦克集群作战对胜利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苏军猝不及防,他们没料到德军会在深秋时节发起如此强大的攻势。然而,德军要依靠突然袭击的战术扩大战果为时已晚。

围歼苏军后,我们继续向莫斯科挺进。一路上并没有遭遇多少抵抗,但是道路泥泞,进军速度极慢,部队疲惫不堪。而且我军在纳拉河(Nara River)遭到苏军阻击,那里易守难攻,防备森严,苏联的增援部队挡住了德军前进的步伐。

此刻,大多数德军指挥官都在问:‘何时才会停止进军?’他们忘不了拿破仑军队在俄国全军覆没的经历。许多军官开始重温科兰古侯爵



(Caulaincourt)有关1812年战争的惨烈描述。在1941年这个紧要关头,该书对德军影响匪浅。当时的情景至今历历在目,记得克卢格将军淌过泥泞的道路,从寝室走到办公室,手里拿着科兰古的书,呆呆地站在军事地图面前。就这样日复一日。

我对这一点特别感兴趣,因为在1941年8月德军的进攻似乎势不可挡之时,我曾在10月份的《河滨》(Strand)杂志上发表过一篇文章,从科兰古的书中摘取大量的引证,比较了拿破仑侵俄和希特勒的侵苏战役,并暗示了同样的结局。我说虽然德军将领想起科兰古已为时稍晚,看来我们还是所见略同。布卢门特里特面带苦笑表示认同。

他继续说:“士兵们不像将领那么悲观,他们可以在夜晚看到莫斯科上空高射炮的火光,这激起他们的斗志——莫斯科近在咫尺。他们还以为能在城内的房屋里避寒取暖度过严冬。但是指挥官却明白已经无力向前推进这最后的40英里。”

然而在德军上层一个不同的观点却占了上风。有关资料表明,博克比希特勒更热衷于进攻莫斯科。博克声称德苏双方都已经打得筋疲力尽,胜负取决于谁具有超强的意志。勃劳希契和哈尔德赞同博克的观点。伦德施泰特和莱布希望停止进攻,但是他们没有直接参与进攻莫斯科,所以他俩的意见影响甚微。

布卢门特里特和我讨论了11月初发生的事情,他说:

我们在奥尔沙开了一次重要的会议,讨论未来的作战方案。通知所有军团和集团军的参谋长务必参加会议与哈尔德将军共商大计。会议就在哈尔德的专列上举行。陆军元帅勃劳希契和其他指挥官没有出席会议,会议的目的是让与会者“感受一下各种意见的动向”,商讨是应当再发起一次全线进攻,还是在冬季暂停进攻。

南路集团军总参谋长索坦斯登态度最为坚决,他反对发起任何新的攻势。北路军参谋长也持相同的看法。中路军参谋长格赖芬贝格态度暧昧,他指出进攻的风险,但没有明确反对继续进攻。他的处境有点为难,陆军元帅博克能征善战,但野心勃勃,他的眼睛早就盯上了莫斯科,而莫斯科已近在咫尺。

接着哈尔德开始发言,他表示元首和他本人都希望继续进攻。他说



有理由相信苏联人的抵抗已接近崩溃的边缘。他还告诉我们,元首的计划是先绕过莫斯科,占领城外的铁路枢纽。因为陆总的情报表明大量的苏联后备军正从西伯利亚乘火车赶来增援莫斯科的守军。

会后不久,我们就接到命令攻占莫斯科,这可是生死攸关的命令。不过方案已经略作修改。因为陆军元帅克卢格坚决反对攻占莫斯科城外的铁路枢纽,他认为在这个季节深入重地无疑是“发疯”。方案强调正面进攻,占领莫斯科,因为它是苏联抗击入侵的“伟大象征”。方案命令炸毁克里姆林宫,向世界宣告布尔什维克的垮台。

虽然德军指挥官都明白要攻克莫斯科决非易事,但是他们都没料到在如此严酷的冬季敌方能够集结如此强大的军队。

发起进攻之前,德军进行了重新部署。南翼为克卢格的第四军和第一装甲军团;北翼为赫普纳的装甲军团和第九军的一些步兵师。克卢格为总攻的最高指挥。克卢格必须去完成一项他认为难以完成的任务,这颇具讽刺意味。

布卢门特里特继续说:

赫普纳的装甲部队最先从左路发起进攻。道路泥泞不堪,加上苏军的阻击,部队行进的速度十分缓慢。我军损失惨重,老天也和我们作对,大雪纷纷洒落在湿滑的路上。苏军通过冰冻的莫斯克瓦(Moskwa)从侧翼不断向我发起反攻,赫普纳不得不分散兵力来对付这些反击。第二装甲师成功地冲入纵深,已经可以看到克里姆林宫了,但最远也就是到此为止了。

情况很不乐观,这就将是否要派第四军参加进攻这个问题放到了台面上。每天晚上赫普纳都打电话催促尽快出动第四军。每天晚上我和克卢格都会谈到深夜,商讨是否同意赫普纳的一再请求。克卢格决定亲自下去听一下前线将士的意见。克卢格是个精力充沛、敢作敢为的司令员,他喜欢亲临战场,于是他来到前线,征询下级军官和军士的意见。前线指挥员求战心切,表示有信心打进莫斯科。经过五到六天的商议和调查后,克卢格决定用第四军进行最后一搏。地面积雪皑皑,冰冻厚达几英寸。较之泥泞的道路,冻硬的路面倒是有利炮兵部队的推进。

12月2日,德军开始攻城,但到下午就传来进攻受阻的战报,苏军在莫斯科周围森林地带的防守十分坚固。苏联人十分擅长森林作战,下午



三点就会入夜的时令更让他们的防守如虎添翼。

第 258 步兵师的几支部队确实打进了莫斯科的近郊。但是苏联的工人从工厂涌出,手握锤子和其他工具来保卫他们的城市。

一到夜晚,苏军便猛攻那些孤军突入其防线的德军。第二天,前方指挥员上报说他们认为不可能突破苏军防线。那天晚上克卢格和我进行了一次长谈,最后他决定撤回前方的部队。有幸的是苏军没有察觉到我们在后撤,撤退非常成功,我们有条不紊地将部队重新调回到原先的位置。但是两天的苦战已使我军伤亡惨重。

后撤的决定还算及时,否则苏军的全线大反攻将让我们败得更惨,朱可夫元帅投入了一百个师进行反击。苏军多支部队汇聚在一起向我猛攻,我军危在旦夕。希特勒终于明白德军挡不住苏军的进攻,极不情愿地同意德军尽快退到后面一道防线。有关苏联后备军的数量,我们大为失算。他们将自己的实力隐藏得可是够好的。

希特勒攻占莫斯科的赌局就此告终,这也是他在苏联首都投下的最后一笔赌注。打那以后,除了德国战俘,德军将士再也见不到克里姆林宫了。





## 第十七章 兵败斯大林格勒和高加索

莫斯科已经遥不可及,严冬施虐,德军上下弥漫着恐惧的气氛。战局每况愈下,拿破仑大军溃败的悲惨命运似乎离他们越来越近。

在这黑暗的时刻,正是希特勒“决不后退”的决定稳住了部队的军心。这反映了希特勒钢铁般的意志,尽管也可能出自他执拗的性格,因为大多数将领和他意见相左。

但是这次成功的转危为安并没能让他逃脱最终毁灭的命运。首先这让他 在 1942 年的夏季在苏联战场陷得更深。他开局不错,但随即便误入迷途。因为他的眼睛只盯着高加索,结果坐失拿下斯大林格勒的良机。然后为了发动为时已晚的斯大林格勒战役又使高加索之战前功尽弃。

冬季来临后,希特勒又异想天开,欲将赌注再次押在“莫斯科”上。这次灾难性的结局使德军大伤元气,从此一蹶不振。不过即便在这个时候,他还是可以在德军占领的缓冲地带进行灵活多变的防御战,以拖延战术搞得苏军精疲力竭。无奈此人固执己见,“决不后退”,从而加速了第三帝国的覆灭。

### 冬季危机

从德军将领与我交谈的内容可以清楚地看出,1941 年 12 月兵败莫斯科后,德军的处境岌岌可危。将领们纷纷敦促希特勒大踏步地后退,以确保冬季防线的安全,他们指出部队装备不整,无法抵御冬季战役的严酷。希特勒置之不理,下令:“军队必须寸土不让,人人都要原地固守。”

他的决策看似会带来灾难性的后果,然而事态的演变再次证明他是 对的。蒂佩尔斯基希(Tippelskirch, Werner)将军的一番话道出了其中的原委。蒂佩尔斯基希将军身材修长,举止儒雅,先后担任过军团和集团军司令。他说:“二战时的阵地防守甚至比 1914—1918 第一次世界大战时还要坚固。虽然苏军



绕到我方的侧翼,却总是没法攻破我军的前沿阵地,他们没有能力来充分发挥其优势,而且也没法保证足够的供给。在那些位居交通要道的城镇,我军集中兵力严防死守,按照希特勒的主意,像刺猬一样将其团团围住,牢牢地守住了那些城镇。局势转危为安。”

许多德军将领现在都承认,在那样的格局下,希特勒的决定堪称上策,尽管他们当时并不认可这样的做法。“这是希特勒的一大成就,”蒂佩尔斯基希说,“在危急时刻,我军不禁想起拿破仑兵败莫斯科的往事,重蹈覆辙的阴云挥之不去。一旦阵脚松动,开始后撤,很可能形成仓皇出逃的局面。”

其他一些将领赞同这个说法,但是伦德施泰特却尖刻地指出:“首先,正是希特勒下令死守才造成了危险的局面。如果他及时同意后撤,德军就不会陷入困境。”

布卢门特里特和我谈过12月莫斯科之战的情况,他也间接地表示赞同伦德施泰特的意见。他认为希特勒过于强调严防死守,出尔反尔,取消自己已经承诺的后撤行动,这才给德军带来了不必要的危险。

德军在莫斯科遭到阻击后,克卢格将军曾向最高指挥部建议最好全面后撤至卡卢加(Kaluga)和维亚兹马之间的乌格拉河(Ugra)一线,德军已经在那里构筑了部分防御工事。元首的最高指挥部就此权衡了不少时日后才勉强同意。与此同时,苏军的反攻已经给德军造成极大的威胁,尤其是德军的侧翼岌岌可危。德军刚刚开始后撤,元首又下达了新的命令:“第四集团军不准后退一步。”

我们的处境越来越糟,因为古德里安的装甲部队在图拉附近,远离我军右翼,这支部队已濒于弹尽粮绝,在第四军大部队撤出前必须先让他们撤退。时间的延误马上就带来了新的麻烦,苏军猛攻古德里安的薄弱环节,一下子将它驱赶到奥卡河(Oka)对岸。与此同时,赫普纳的装甲部队也遭到苏军的猛烈攻击,面临着被包抄的险境。

结果第四集团军就处于孤立无援的突前位置,随时可能被苏军围歼。河面已经冻得严严实实,无法阻挡苏军的突进。情况万分火急,因为苏联骑兵团正包抄到我军右侧,从后面向我进攻。这支部队由骑兵和架雪橇的步兵组成,在苏军收复的村庄里,无论老少,只要扛得动枪,所有的男人都必须参战。

12月24日这天,第四集团军面临着严酷的险境,正是希特勒拒绝及



时撤退的建议才造成眼下这种局面。我的上司克卢格已于15日去顶替生病的博克,留下我来负责第四集团军。我们的司令部设在小雅罗斯拉韦茨(Malo Yaroslavets),我和参谋们待在小木屋内度过那年的圣诞。冲锋枪搁在桌上,四周枪声不绝于耳,似乎我们已经难以逃脱任人宰割的命运。此时我们却发现苏军没有朝北来夹击我军的后方,而是向西面进发。他们确实是错过了一次极好的机会。

形势依然十分严峻,希特勒还是举棋不定,直到1月4日,他才终于同意全线撤至乌格拉河。此前我刚刚离开第四集团军,出任副总参谋长,屈布勒(Kuebler, Ludwig)将军前来担任第四军总指挥。不久,他就发现自己难以担此重任,被海因里希将军取而代之。虽然第四集团军的两翼被团团围住,海因里希还是尽力将新的防线维持到春季以及后来一段时间。

布卢门特里特谈到部队撤离时状况,他说:“路上积雪很深,直到战马的下腹部。大部队撤离时,先得派一部分战士在白天扫雪清路,晚上车队才能行驶。当时的气温低达华氏零下28度,你可以想象得出部队面临的考验何等艰难。”

虽然希特勒的决定可能使德军免于在莫斯科战役后的全面溃败,但还是付出了沉重的代价。“在莫斯科战役总攻前,我军的损失并不十分严重,”布卢门特里特告诉我,“但是在冬季无论是人员还是物资都损失相当惨重,很多人死于严寒”。(然而有关资料表明德军每周的平均损失仅是第一阶段战役时的一半。不过产生这般印象是不难理解的,因为在胜利进军的途中,人们对伤亡不那么在乎。而在战败和严冬的双重打击下,就会感到蒙受的损失特别惨烈。从入侵开始到2月底,德军伤亡总计为100多万。由于部队减员,又迟迟得不到新征的兵员的补充,损失过重的感觉就进一步放大了。)

蒂佩尔斯基希的谈话提供了更多的细节,那年冬天他在第二集团军担任师级指挥官,当时该部队正位于列宁格勒和莫斯科之间的瓦尔代高地(Valdai Hills)地区。他告诉我,他的部队已经减员至原编制的三分之一。“冬季结束之前,每个师的兵员已减至5000人,一个连只有50人。”

他还阐述了自己对希特勒“固守”策略长期影响的看法。“对德国空军来说,那年冬季简直是灾祸连连。德军固守的那些‘刺猬’位置突前,侧翼又被苏军包围,处于孤立无援的境地,空军必须给他们空投给养。第二集团军一天



需要 200 吨给养,这就必须保证平均每天空运一百架次。由于恶劣的天气居多,所以不得不利用好天加倍空投量,为这么一个集团军的供给,一天就得出动 350 架飞机。恶劣的天气致使许多飞机坠毁。那些据点漫布在开阔的前线,要通过长距离的空投来保证供给,空军真是不堪重负,这对德国空军后来的发展有致命的影响。”

我向德军将领询问了有关 1941 到 1942 年苏军冬季攻势的情况和后果。所有的人都证明苏军深入侧翼造成的威胁让德军非常紧张,德军被分割包围,没法互通信息。布卢门特里特概括道,由此造成的直接后果远甚于所构成的威胁。“苏军冬季攻势主要结果是打乱了德军在 1942 年的作战部署。天气所造成的危害和威胁要比苏军的进攻更大。德军士气低落,伤亡很大部分是由严寒所致,那年冬季严寒给德军造成的伤亡并不亚于苏军的攻击。”

他还认为德军战线过长,不堪重负。“每个师的战线长达 20 到 25 英里,甚至在莫斯科附近那样关键的地区也长达 10 到 15 英里。修筑公路和铁路难度很大,给各个据点分送给养相当困难,这就使本已薄弱的前沿阵地更加险象环生。”

德军每个师防线的延伸度远远大于一战时的上限,这么薄弱的防线居然在总体上顶住了苏军的进攻,我问布卢门特里特原因何在。他回答:“在一战时,战斗师切入纵深,其前沿阵地相对较窄。如今新式武器和小型自动武器的改进也有助于我们守住较宽阔的防线。防御手段的机动性也大为加强,这是另一个重要因素。如果防线被攻破,在缺口扩大之前,只要调动一些坦克和机动部队就能击退攻入防线的敌军。”

德军利用这种优势在防守上一再转危为安,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这反而给希特勒壮了胆,促使他将更多的赌注押到进攻上。他认为事实证明他的决策要比德军将领更高明,从此以后,他就更听不进将领们的意见了。

勃劳希契不善于与希特勒打交道,他的体弱多病则使情况变得更糟。与希特勒的争辩让他感到压力很大,对战役进展的不满则更令他心情沮丧,结果他的身体越来越差。11 月,正当德军作出生死攸关的决策时,勃劳希契心脏病发作。进攻莫斯科失利后没几天,他就提出辞去总指挥一职。过了两周,直到 12 月 19 日,德国公开宣布勃劳希契退休。希特勒原来就是国防军总指挥,最高统帅部掌管全军。此时他决定利用这个机会,亲自担任陆军总司令。宣布勃劳希契退休也就自然向公众表示他是因军事错误而去职,从而将军事上的失利全都归咎于军方将领。对勃劳希契去职的这种解释正中希特勒下怀,



他的亲信也为之鼓噪。指挥一职的易手不仅增强了希特勒的权力,也使德国将领与他抗衡的能力大为削弱。布卢门特里特一针见血地指出:“这次战争中只有海军将领最为舒心,因为希特勒对海战一窍不通。但他自以为精通陆战。”

然而,即便是海军将领也有他们头痛的事情。就像拿破仑的海军将领一样,德国海军将领也得和一个一心只知陆战的领导人打交道,提醒他注意英国海军制造的麻烦,而且将间接影响到德国的大陆战略。他们想让希特勒明白,首先必须切断英国海上基地与大陆的联系,然后再采取下一步行动。但是他们的努力没有成功。

另一方面,陆军将领的视野过于局限在大陆和军事范围,所以也没能制止希特勒的胡作非为。狭窄的视野抵消了他们谨慎从事的优点。克莱斯特在与我的一次谈话中对此提出过有益的反思。他说:“这一代军人并不重视克劳塞维茨的教导,我在军事院校和总参谋部时情况就是如此。人们会引用几句克劳塞维茨的名言,但是并没有认真研读过他的著作。人们将他视为军事哲学家,而不是实战导师。史里芬的著作受到更多的推崇,他的著述似乎更实用。德国的敌人总是互为联手,军事实力超过我们。史里芬的著述告诉我们如何以弱胜强。然而克劳塞维茨的理论更切中要害,尤其是他有关‘战争是政治以另一种手段的继续’这一格言,它揭示政治因素比军事因素更为重要。德国错就错在以为军事上的成功可以解决政治问题。在纳粹的统治下,我们把克劳塞维茨的名言颠倒了过来,竟把和平视为战争的继续。克劳塞维茨有关俄国难以征服的预言也居然一语成谶。”

## 1942 年的作战方案

德国高层在冬季就一直在为春季该如何作战争辩不休。早在总攻莫斯科之前就已经开始探讨这个问题。谈及当时的情况,布卢门特里特对我说:“许多将领认为不可能在 1942 年策划新的攻势。固守现有的阵地才是上策。哈尔德对继续进攻持极其怀疑的态度。伦德施泰特依然强调并敦促德军撤回到波兰的原有防线。莱布将军也赞同伦德施泰特的观点。其他将领并不主张退得这么远,但大多数人对战役的走向还是十分茫然。自从伦德施泰特和勃劳希契辞职后,军方与希特勒抗衡的力量日渐削弱,如今希特勒又要压军方恢复攻势。”



布卢门特里特在1月初出任副总参谋长,成为总参谋长哈尔德的副手。他最了解希特勒决策背后的动机和打算。

他总结道:“首先,希特勒希望在1942年赢得他在1941年没能成功获取的战果。他根本不相信苏军实力的增强,对这方面的消息置若罔闻。他和哈尔德为此而‘斗嘴’。有关情报表明,在苏联乌拉尔山脉(Ural)等地的工厂月产坦克达600到700辆。当哈尔德将此事告诉希特勒时,他拍桌大怒,说那是不可能的。他不愿意相信他不情愿相信的事实。其次,他自己也不明白该怎么办,所以听不进任何撤退的建议。他感到必须有所行动,而他所谓的行动就是进攻。再次,来自德国经济部门的压力太大。有关部门告诫希特勒,继续进攻至关重要,如果没有来自高加索的石油和乌克兰的小麦,这场战争将难以为继。”

我问布卢门特里特,总参谋部是否调查过这种说法有何根据。我还问他,位于第聂伯河湾地带尼科波尔(Nikopol)的锰矿是否对德国的钢铁业至关重要。在回答后一个问题时,布卢门特里特说,他也搞不清楚,他对战时经济所知甚少。在我看来,这一点非常重要,德国军事战略家对与战略部署息息相关的其他因素往往一无所知。他还说,参谋部没法对经济学家的诊断提出质疑,因为参谋人员从不出席有关经济问题的会议。可见,希特勒是有意让军方蒙在鼓里。

希特勒决定向苏联纵深进军,生死在此一搏,但此时他却发现已经没有足够的力量像一年前那样发动全线进攻。希特勒拿不定主意是否应该再次向莫斯科挺进,他必须作出抉择。于是他决定向南方发起攻势,以攫取高加索的油田。但是这样做就像伸缩式望远镜,在绕过苏军主力部队时,会拉长自己的侧翼,当德军到达高加索时,在长达近1000英里的任何一点上,都容易遭到苏军的反击。

波罗的海一侧是德军即将发起进攻的另一个目标。原定的1942年作战方案包括在夏季占领列宁格勒,以确保与芬兰的联络,使芬兰方面免除边界一侧被分割的隐忧。这样一来,北路和中路的集团军就还得保持防御的态势,只不过情况略为改善而已。

为了向高加索挺进,还特别组建了一支“A”集团军,归陆军元帅李斯特指挥,同时兵员已被削减的南路集团军则作为其左翼,由赖歇瑙取代伦德施泰特担任指挥。但是赖歇瑙在1月突然死于心脏病,博克被再次召回指挥这支部队,1942年战役第一阶段结束后,博克又被解职。克卢格继续担任中路集团



军指挥,但是屈布勒取代莱布为北路集团军指挥。瓦尔利蒙特告诉我:“陆军元帅莱布在一番争议后辞职不干了,因为希特勒硬要他固守丹姆杨斯克(Damyansk)凸出地带,而莱布坚持认为只有拉直防线,得到急需的增援,才有可能守住该地。”布卢门特里特说,莱布一向对侵苏战役持有异议,所以他宁肯早日辞职。“他心不在此,他认为入侵苏联在军事上毫无取胜的希望,而且他厌恶纳粹政权,所以有个借口可以辞职岂非正中下怀。若无一个让希特勒认可的理由,要辞职是不可能的。”

在谈到1942年作战方案形成过程时,布卢门特里特提出的一些看法颇有见地。

在军方高层的经历让我认识到,战争胜负的关键取决于政治因素而非军事战略,取决于帷幄之中的思想交锋,而非前方战场的刀兵相见。而且从成文的作战命令中是看不出这些思想交锋的。文件档案未必是历史研究最好的线索,签署这些命令的人其内心的真实想法很可能与纸上的东西截然不同。历史学家如果以那些档案中发现的文件为依据,以为这反映了指挥员真实的想法,那真是愚不可及。

多年前,我在冯·哈夫登(Haeften)将军手下从事1914—1918年战争史研究时,就已经意识到这一点。哈夫登是个相当严谨耿直的历史学家,他教我历史研究的方法,告诉我这项工作的难度。但是,在这次大战时,我在纳粹政权的最高指挥部的近距离观察才使我对历史研究有了更清晰的认识。

纳粹体制会产生一些怪异的副产品。德国人讲究有组织、有纪律,习惯将要办的事情形诸文字,在这场大战中,德国人产出了比以往更多的“文件”。过去训练军人主张命令要简明扼要,让执行者有更多自由发挥的余地。可在这次战争中,对思想的禁锢越来越严,与过去的做法大相径庭。在能够想象到的范围内将命令规定得死死的,一举一动都严格按照命令的细则亦步亦趋,以免事后被追究。因此命令写得繁琐而冗长,与传统的训导背道而驰。现在命令的语言往往夸夸其谈,好用“最最”之类的词语,一反过去简明扼要的文风。而且命令还要写得像宣传品那样富有“鼓动性”。许多发自元首和最高统帅部的命令都必须逐字逐句层层下达,否则一旦出事,有关人员就会受到惩罚,理由就是未能正确传达元首的旨意。



德国纳粹体制下的粗暴专横与苏联不相上下。我的亲身经历表明两者何其相似。比如在侵苏战役初期,我参与审问两个在斯摩棱斯克被俘的苏联军官。他们明白地表示对上级制定的作战方案持完全不同的意见,但又必须不折不扣地执行上级的命令,否则就会掉脑袋。他们只能在被俘的情况下才能自由表达自己真实的想法。在冷酷的体制下,他们只能唯命是从,决不敢口出异议。

国家社会主义体制与布尔什维克体制相似之处甚多。希特勒有一次和身边的亲信谈话,哈尔德将军也在场,希特勒说他实在羡慕斯大林,因为他还不能像斯大林那样用极端的手段对付那些坚持己见的将领。他还谈到战前斯大林对红军将领的大清洗。苏联的军队和将领全心全意忠于布尔什维克主义,全军上下如同一人无条件地服从领袖,对此他表示羡慕不已。而德国的将领和参谋长则对国家社会主义缺乏狂热的信仰。“他们遇事顾虑重重,爱提意见,对我做不到彻彻底底的同心同德。”

随着战事的演变,希特勒越发沉溺于发表这种连篇累牍满口脏话的演说。希特勒瞧不起手下的将领,但又离不开他们,否则他的作战方案无从实施,但是他对这些人的控制越来越严。许多战时命令和报告都具有两面性。签名同意经常未必表示本人真心认可,但他又不得不签,否则后果可想而知。未来的历史学家和心理学家应当对这些现象多加关注。

## 进军高加索

1942年的攻势有点不同寻常,其最初的计划就是如此。发起攻势的起点是塔甘罗格(Taganrog)到库尔斯克反向的斜线,其右翼位于亚述海,紧靠罗斯托夫附近的顿河,其左翼则位于西面100英里以外的库尔斯克。强有力的进攻将从后侧发起,其目的不是很明确。希特勒和总参再次就战略目标产生分歧,在发起进攻之前,双方的分歧既没有达成妥协,各自的看法也没有得以澄清。正如在1941年曾经发生过的情况一样,由于意见分歧,结果产生了很多麻烦,而这一次后果更为严重。

希特勒不顾哈尔德的质疑,执意重新发起攻势,他最初计划向伏尔加河附近的斯大林格勒挺进。在准备作战方案时,哈尔德以此为主要目标,德军右翼的主要任务是助攻,向前挺进给南侧以强有力的掩护。希特勒攻占莫斯科的目标不仅仅是为提高士气,更在于保障德军北侧的安全,这样他就可以放心深





入东南,占领高加索。

克莱斯特曾在李斯特的指挥下率领装甲部队挺进高加索,他告诉我,希特勒曾向他面授机宜。诚如克莱斯特所理解的:“占领斯大林格勒是为了完成主要目标的辅助性行动。斯大林格勒处于顿河和伏尔加河之间的瓶颈地带,其重要性就在于它有利的地理位置。在那里可以有效地阻击东面苏军对我侧翼的进攻。战役伊始,斯大林格勒对我们而言只不过是地图上的一个地名而已。”但是布卢门特里特告诉我:“希特勒原本打算从斯大林格勒向北推进,从后方钳制莫斯科的苏军。经过反复商讨,他才被说服,承认这个大胆的计划难以实现。他的一些亲信甚至还奢谈进军乌拉尔,那更是痴人说梦。”

即便是后来的作战方案也还是风险过大,而且随着方案的实施,这种风险有增无减。

克莱斯特说希特勒在4月1日召见他,那是一个不吉利的日期。“希特勒说我们必须在秋季之前占领高加索油田,否则战争将难以为继。我指出暴露如此长的侧翼,危险太大,希特勒表示他将调动罗马尼亚、匈牙利和意大利的军队来作掩护。我和其他人都提醒他用这种军队过于轻率,但他根本就听不进。他告诉我这些同盟军只用来防守沿沃罗涅日到南部顿河一线。他说从斯大林格勒到里海(Caspian)一带最容易防守。”

随着事件的进展,当时人们提出的质疑最终得到证实。然而,必须承认第二年的这场赌博也并非完全没有成功的希望。1942年夏季,苏军正处于最低潮,多亏此时德军的有生力量也已消耗了不少。否则只要德军再稍加冲击就可能使苏联许多局部地区的溃败恶化为全线崩溃。

夏季攻势旗开得胜。因为苏军在1941年人员和装备均损失惨重,新招募的军队尚未准备好上战场。德军左翼从库尔斯克迅速挺进到沃罗涅日。进军如此神速也是因为苏联的后备军严重不足,而且大部分远在北方的莫斯科地区。另一个原因是5月份苏军向哈尔科夫发起持续的进攻。布卢门特里特谈及此事时说:“这次行动消耗了苏军很多兵力,本来他们可以用这些兵力来阻击我们的进攻。”他继续说:“从库尔斯克到顿河和沃罗涅日的进攻中,第四装甲军担当先头部队。匈牙利的第二军随后接管了这个地区,我们的装甲部队调头沿着顿河的右岸向东南方推进。”

记得当年前方曾传来激动人心的消息,报道苏军在沃罗涅日进行了顽强的抵抗,成功地阻止德军在该地区的继续深入,于是我进一步询问当时的情况。布卢门特里特回答道:“德军从来没有打算要越过沃罗涅日直接向东推



进,我们接到的命令是在沃罗涅日附近的顿河流域中止前进,就地布防,从侧面掩护第四装甲军朝东南方向进军,保卢斯的第六军为其殿后。”

德军从斜线插入顿河和顿尼茨河之间的走廊地带,从而掩护了克莱斯特的第一装甲军,为其突进肃清了道路。第一装甲军不久又将重新成为战场的主角。它从哈尔科夫附近出发,迅速越过切尔特科沃(Chertkovo)和米列罗沃(Millerovo),直指罗斯托夫。当克莱斯特的部队逼近罗斯托夫时,顿尼茨河南边的第十七军才参与这次进攻。谈到这次闪电战的经过时,克莱斯特告诉我,他的部队在罗斯托夫以北跨过顿河下游,然后沿着马内奇河(Manych)河谷向东面挺进。苏军炸毁了那里的大坝,洪水直泻,德军的计划差点因此而夭折。好在克莱斯特的装甲部队仅被耽搁了两天,便成功渡过了河,然后以三个纵队的阵势迅速向南挺进。克莱斯特本人随右路纵队早在8月9日就抵达迈科普(Maikop)。与此同时,他的左路和中路纵队向东南挺进150英里,正朝高加索山脉的山脚下逼近。装甲部队的扇形攻势由跑步前进的第十七军殿后。

进攻开始六个星期后,德军抵达并占领了西部的许多油田,但它从来没能成功抵达位于山脉那边的主要油田区。克莱斯特说:

汽油短缺是失败的主要因素。我军的大部分供给依赖罗斯托夫瓶颈地带的铁路运输,黑海通道没有安全保障。相当一部分汽油得靠空运,但是其总量不足以维持进军的动力,正当前景看好之时,部队却不得不中止前进。

不过那还不是导致失败的最终原因。如果我的部队没有被不断调拨出去助攻斯大林格勒,我们还是可以努力达到既定目的。不光调拨我的机动部队,还从我这里调走了高射炮部队和除了侦察机中队外的全部空军。

在我看来,这般调拨我的部队是导致失败的深层原因。苏军突然集结了800架轰炸机,它们从格罗兹尼(Grozny)附近的机场起飞,向我前沿阵地发起攻势。虽然只有三分之一的战机可以用于实战,但已经足以阻止我再度组织进攻,由于我没有战斗机和高射炮,敌人的轰炸机效率更高。

克莱斯特承认苏军的阻击战打得非常顽强,他指出了有一个有趣的心理因素。“在战役初期,我军推进时几乎没遇到多少有组织的抵抗。苏军一旦被追



上后,大多数部队都无心恋战,似乎只想快点逃回去。这与1941年的情况截然不同。但是当我军进入高加索后,与我交战的地方部队打得十分顽强,因为他们是在保卫家乡。加上乡村的路况不利我军前进,他们的阻击就打得更为顺手了。”

克莱斯特详述了占领迈科普以后的军事行动。他的首要任务是控制从罗斯托夫穿过高加索山脉到梯弗里斯(Tiflis,第比利斯的旧称)的公路,第二个目标是巴库(Baku)。德军最先在捷列克河(Terek)遭到顽强的阻击。克莱斯特便向东迂回,成功渡过了河。但过了河后,险恶的地形和茂密的丛林再次卡住了前进的道路。德军的左翼被暴露在斯大林格勒和里海之间的草原地带,这使部队的进军难上加难。

苏军从南高加索和西伯利亚调来的增援部队对我进行围攻。我军侧翼的战线拉得太长,苏联骑兵随时随地可以突破我军的前沿阵地,对我侧翼构成严重的威胁。从阿斯特拉罕(Astrakhan)以南通过大草原的铁路也有助于苏军集结部队。这些铁路造得十分粗糙,就是将铁轨铺在平坦的草原上,也没有什么路基。我们企图破坏这些铁路,无奈劳而无功。刚刚毁坏一段铁轨,他们很快就会重新铺上铁轨,连接在一起。我的侦察部队已经抵达里海莫兹多克(Mozdok)海岸,但这无济于事。因为对手神出鬼没,我们不知该向何处进军。随着时间流逝,苏军在该地区的力量越来越大,对我侧翼的威胁也日趋严重。

在11月之前,克莱斯特还企图通过向各个点发起突袭来达到自己的目的。从莫兹多克突破失败以后,他便在西侧的纳尔奇克(Nalchik)改变进军方向,与来自普罗赫拉德纳亚(Prokhladnaya)的德军合力进攻,成功地抵达奥尔忠尼启则(Ordzhonikidze)。他在地图上向我演示了这一系列运动战的过程,作为一个职业军人,他不无得意地称其为“相当漂亮的一仗”。此战克莱斯特终于得到所需的空中增援,但是恶劣的天气拖住了德军前进的步伐。没隔多久,苏军便发起了反攻。“在这次反攻中,我原以为一个相当精干的罗马尼亚师突然溃败,这彻底打乱了我的计划。此后,战局又陷入僵持状态。”

其他德军将领也认同克莱斯特分析的失败原因,尤其是汽油短缺,致使装甲部队连续几个星期没法动弹,干等着恢复供应。由于汽油不够,连运输卡车也开不了,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只能依靠传统的“沙漠之舟”——骆驼来运油。



苏军在高加索山地的阻击使德军胜利的希望日趋渺茫,对此,布卢门特里特作了一些补充,他说那是因为德军大部分训练有素的山地部队没能上来增援克莱斯特,而是被调去增援沿着黑海向巴统(Batum)进军的第十七军了。“沿黑海进军的重要性远不如克莱斯特的突破,错就错在不该将重兵派到那里。当黑海那边的德军受阻于图阿普谢(Tuapse)要求增援时,我们一些人提出异议。争论十分激烈。我们对那些坚持黑海进军的人说:‘你讲得对,伙计,但是要知道石油可是在那边。’我们指的是巴库。但是嚷着要支援图阿普谢的人还是占了上风,高加索方面的兵力受到削弱,等到要补救时已经来不及了。”

高加索地区分兵出击的一幕又在更大范围内重演,这次分兵是为了攻打高加索和斯大林格勒。布卢门特里特对这个问题的看法与众不同。“面对强敌的阻击,想要同时攻占高加索和斯大林格勒是十分荒唐的。我认为消灭敌人的有生力量比占领油田更加重要,我当时就表示态度,主张先集中兵力攻占斯大林格勒。经济学家声称如果拿不下油田,战争将难以为继。对此我们也很难提出异议。但战事的进展证明他们的观点未必正确,因为虽然没能拿下高加索油田,德国还是坚持将战争打到了1945年。”

## 兵败斯大林格勒

如果德军能将攻占斯大林格勒作为当务之急,那么他们可能早就占领了这座城市,1942年战役最大的讽刺莫过于此。克莱斯特的陈述揭示了这一点:“在我左边挺进的第四装甲军本来可以在7月底之前轻而易举地占领斯大林格勒,但他们却受命转向南面帮助我的部队渡过顿河。我并不需要他们的援助,他们一来反而把我们的道路搞得拥挤不堪。两星期后,等到他们再度北上,苏联人已经集结了足够的军队固守斯大林格勒。”

在7月后半个月,战争的态势对德军最为有利。两支装甲军团一路横扫,打得苏军节节败退。苏军乱了阵脚,恐慌万分,形势便于德军乘胜追击扩大战果。所以德军装甲部队轻而易举地渡过了顿河下游。德军所向披靡势不可挡,向东南可以进军高加索,向东北则可以直逼伏尔加河。大部分苏军还待在顿河下游以西地区,遭到德军装甲部队的穷追猛打。

由于第四装甲军一时转向东南,没能抓住战机一举攻克斯大林格勒,战争的格局开始逆转。苏联人赢得了时间来集结军队保卫斯大林格勒。德军的第一次进攻受挫后,只能等待保卢斯的大部队前来助攻。保卢斯的第六军先得



打到顿河,围歼河湾地带的苏军,然后才能参与围攻斯大林格勒。但是保卢斯的军队未能及时赶到既定的战场,这不仅是因为它以步兵为主,而且它的冲击力也已经大打折扣,因为它不得不将整师整师的兵力分出去加强沿顿河中游不断延伸的侧翼。

到8月半,德军鼓足劲开始进攻斯大林格勒时,苏联人也已经在那里聚集了更多的增援部队。进攻一再受阻,斯大林格勒靠近苏联的主要前沿阵地,比起高加索那里更容易得到增援。进攻接连受挫让希特勒恼羞成怒,在他看来,“斯大林之城”这个名字本身就是对他最大的挑衅。他从主要战线和其他地方调集军队,力图攻克斯大林格勒,就此消耗了大量兵力。

长达三个月的战斗,在德军方面无非是攻城战术的反复运用。他们越逼近市区,其战术回旋的余地也就越窄,这就如杠杆的阻力越小,其撬动的范围也就越小。与此同时,随着阵地的缩小,守方更易调动兵力加强弧形防线上的任何薄弱环节。德军越深入房屋密集的区域,其进军的速度就越慢。在围城战的最后阶段,德军已经推进到离伏尔加河西岸仅半英里之遥,但因为伤亡惨重,此时德军的力量已濒临消耗殆尽,每前进一步所付出的代价远远大于所得。

面对顽强的抵抗,巷战时进攻方的困难超过守军。苏军最大的困难是其增援部队和给养都必须用渡轮和驳船在炮火下运过伏尔加河。这就限制了西岸守军的增援部队的数量和给养。结果守军的压力一直很大。而且苏军高层指挥考虑到反攻大计,将兵力集中在侧翼,尽量不向正面守军派出增援,这种冷漠的战略决策对城中的守军更如雪上加霜。在战役的后阶段,仅有两次才从准备反攻的部队中抽调一个师去增援斯大林格勒的守军。斯大林格勒的守军打得英勇顽强,他们固守的地盘并不大,但已经足够了。

斯大林格勒攻防战的故事在苏联方面已经有不少生动的描述。因为大多数参战的德军将士已经沦为苏军战俘,德国方面还有许多详情仍付阙如。据目前所知,德军只是逐街苦战,伤亡日增。早在强令他们发起进攻之前,将士们就已经无心恋战,只是慑于希特勒的严令,他们才被迫拼死一战。

德军对斯大林格勒的进攻是如何演变成自掘陷阱的,其中来龙去脉很值得进行一番历史学的探讨。其实侧翼崩溃的不祥之兆早就如阴影笼罩,布卢门特里特在强调这一点时说:“进军时侧翼拉长的态势是逐渐形成的,但是只要不是故意视而不见,任何人都足以意识到由此带来的危险。在8月份,苏军逐渐从沃罗涅日东南向顿河另一侧增兵。这些试探性的进攻让



苏军搞清楚了驻守沃罗涅日南部的是匈牙利的第二军,由此再往前的地区则由意大利的第八军驻守。9月后罗马尼亚军队接管远至斯大林格勒以西到顿河河湾东南的大片地区,潜在的危险就更大了。德军仅对‘友军’如此漫长的防线略作加固。”

哈尔德派我乘飞机去视察意大利军的阵地,前方传来紧急报告,说苏军已经突破那里的防线,并打开了一个很大的缺口。然而我视察后发现发起进攻的只是苏军的一个营,可是他们却吃掉了意大利人整整一个师,我立刻采取紧急措施,调来阿尔卑斯山地师和德国第六军的部分兵力来收复这个缺口。

我在那里待了10天,回去后写了一份报告,指出在冬季很难固守如此长的侧翼防线。铁路的终端远离前线达200公里,光秃秃的山野没有可供采伐的树木来构筑防御工事。德军的战斗师的防线约50到60公里,那里没有像样的战壕和坚固的据点。

这个报告得到哈尔德将军的认可,鉴于敌方防守力量的增强,我军侧翼过长,危险有增无减,哈尔德强烈要求德军暂停进攻。但希特勒根本不听。在9月份,元首和哈尔德之前的关系日趋紧张,俩人的争论也越来越激烈。能亲眼看到元首和哈尔德之间的争辩倒是很长见识。元首总是用手在地图上扫来扫去——“进攻这里;进攻那里。”含含糊糊的,根本无视实际困难。如果能行的话,无疑他会将整个总参谋部也这样一扫而去。他感到参谋长们没能全心全意地支持他的主张。

总参谋长哈尔德终于明确表示他没法承担在冬季继续进攻的责任。9月底,哈尔德被解职,取代他的是蔡茨勒。当时蔡茨勒是陆军元帅伦德施泰特西线军团的参谋长。我被派到西线顶替他的职位。

初来乍到,又刚被委以重任,蔡茨勒当然不会像哈尔德那样动辄对元首的主张横加非议。希特勒便可以毫无顾忌推行自己的主张,但苏联人不会让他随心所欲,我军已经越陷越深。没过多久,蔡茨勒便对战事的前景深感不安,他与希特勒争辩,指出元首想让德军在整个冬季不断向斯大林格勒逼近的计划是难以实现的。战争的结局证实了蔡茨勒的先见之明,希特勒对他的敌意则有增无减。希特勒没有将他解职,而是对他日益冷淡。



布卢门特里特概括了当时的形势：

此时撤军未必会产生恐慌，因为德军已经配好冬季作战的装备，已经克服了一年前的不知所措的恐惧。但是他们还缺乏足够的力量固守已占领的地盘，而苏军的实力则每个星期都在增强。

但是希特勒却依然一意孤行，去年他的“直觉”被证明是对的，他坚信这次还会再度显灵。所以他坚持“决不后退”。结果苏军发起冬季大反攻，攻打斯大林格勒的德军被分割围歼，不得不缴械投降。德军本已疲惫不堪，兵败斯大林格勒更让它大伤元气，战争的天平开始向不利德国的一边倾斜。

## 揭开更多的真相

谈到1942年攻势的目的和主攻方向究竟是斯大林格勒还是高加索这些尚无定论的问题，哈尔德将军的解释给了我很大的启发。

希特勒给我的手令表示，要准备在1942年夏向苏联南部发起进攻，既定目标是斯大林格勒的伏尔加河。所以陆总的作战指令十分强调这个目标，只是提到保护顿河南岸侧翼的必要性。首先必须确保侧翼无虞，封锁高加索东部，以防苏军向那里发起进攻。其次派一支强大的机动部队驻守在阿尔马维尔（Armavir）和东部高地，以防苏军从北高加索和马内奇河中间出击。希特勒并没有对陆总的作战指令提出什么异议。但是希特勒的一贯作风是高估自己军队的实力，低估敌方兵力。在我看来，他内心早就对陆总将进攻目标侧重于顿河南部颇不以为然。我还记得当时的一些过激言辞，指责总参谋部胆小怕事缩手缩脚。不过希特勒还没将这些指责针对陆总将目标局限于顿河南部。显然他当时还没有充分把握对陆总的命令提出反对意见。

陆总的基本作战指令下达之后，希特勒与一些将领商讨作战目标，这些人不会像陆总那样反对希特勒的白日梦。克莱斯特就是其中之一，他干劲十足，通过参谋长蔡茨勒，与希特勒之间建立的密切关系远远超过其他将领。为了寻找与自己想法一致的将领，希特勒似乎给克莱斯特留下



某种印象,他所谓的夏季攻势方案在整体上与陆总下达的作战指令并不是一回事。

如果像克莱斯特所认为的那样,进军斯大林格勒仅仅是为了防备高加索方面受到侧面攻击,那么克莱斯特就可以正确地预料德军的主力部队将开往高加索。在这种格局下,他会同意希特勒长线出击的大胆计划,而这正是希特勒与克莱斯特商谈的目的所在。还有一种可能是,戈林和凯特尔向希特勒施加了灾难性的影响。希特勒原本是想拿下斯大林格勒,后来在他们的影响下,却渐渐不知不觉地将目标转向巴库和波斯。

我得再次强调,这些解释仅仅是当事人的一己看法,并没有文件档案作为依据。不过我有过好多次这样的经历,希特勒故意曲解陆总的作战思想,以赢得下级军官的赞许,而这种经他曲解过的想法恰恰是为陆总所摒弃的。所以我认为这次很可能是他的故伎重演。不过鉴于当时德军高层所处的特殊氛围,我至少从没听说过陆总的基本指令与希特勒私下给将领下达的指令有什么分歧。

瓦尔利蒙特从最高统帅部角度对战役作出的评价对我颇有启发。

希特勒 1942 年的作战计划仍能反映出他最初的设想,也就是两翼并进,中路殿后。可如今他改变了一年前的想法,转而将重心放在南翼。在尚未聚集足够的兵力之前,暂时搁置了向北挺进的方案。

促成向南挺进的内在原因无非是为了经济利益,尤其是为了那里的小麦、锰矿和石油。不过,在希特勒看来更重要的是切断苏联这些必备的战略物资供应,包括来自顿尼茨地区的煤炭供应。他以为这样就能让苏联的战争机器停止运转。虽然我坚信当时普遍的舆论是反对再次发动攻势,至少也是反对希特勒想要发动的那种大规模进攻,但是我未曾听到过任何人站出来反对希特勒的计划。

还有一些因素对 1942 年夏季攻势产生过影响,或许你对此会有兴趣。首先,我要肯定布卢门特里特所言不虚,希特勒确实未曾打算让德军越过沃罗涅日。我记得希特勒曾经大骂陆军元帅博克,指责他毫无必要地将部队深入沃罗涅日市区。(博克被撤职,取代他的是陆军元帅魏克斯)而且,战役伊始希特勒就下令加强从沃罗涅日到库斯克北侧翼防线的反坦克力量,以防苏军向那里发起猛烈的反攻。





导致失败最根本的原因在于对沃罗涅日第一阶段的攻势刚刚结束就开始抽调前线的兵力。甚至在向顿河与沃罗涅日中间地区进行斜线进军时,希特勒就将第十一装甲集团军调到后方,转归克卢格的中路集团军指挥。其主要原因似乎是没有足够的汽油供给南部地区的装甲部队。但是,在进攻部队被部分调离后,希特勒又想利用它来达到另一个目的。他命令克卢格出动第十一军到萨奇尼兹其(Ssuchinitschi)以西凸出地带,去解决冬季危机遗留下来的问题。而克卢格则想将这支军队派到北面,去抵挡苏军已经在勒热夫(Rzhev)开始的反攻。

最大的错误发生在1942年8月,当时几支装甲师滞留在顿河南部,等着补充汽油。希特勒听说英军入侵迪耶普便乱了方寸,匆忙将两支精锐部队——党卫军警骑师和大德意志师派往西线。他不顾约德尔和哈尔德的反对,坚持要这样做。结果只有党卫军警骑师赶到了西线战场,大德意志师在赶火车的途中,在前线的正中区域遭遇苏军反击,脱不了身,只能在那里苦战。

陆军元帅李斯特在南高加索地区的失败不仅导致他的解职,还让希特勒的总指挥部在1942年9月下旬发生了一场严重的人事危机。早些时李斯特曾接到命令,让他率领军队利用所有可通行的道路,越过高低加索地区,向黑海推进。李斯特没能完成这个任务,希特勒又变得烦躁不安,派约德尔前往李斯特的指挥部察看究竟。约德尔回来向希特勒汇报,说李斯特是完全按照上面的命令行动的,但是苏军凭借着复杂的地形,展开了全面有力的阻击。尽管约德尔指出是希特勒的命令要求李斯特进攻时拉开战线,但希特勒还是不断指责李斯特没能集中兵力有效突破。

约德尔的争辩使希特勒勃然大怒,他死不承认自己发出过这样的命令,听着约德尔当面重述命令内容,希特勒恼羞成怒大为失态。此后很长一段时间,约德尔和凯特尔都失去了元首的宠信。打那以后,希特勒一改以往的生活习惯,不再和随从每日两次共进主餐,白天总是龟缩在他的巢穴内,连前方战报也得送到他的小屋里,只有极少数的随从才能入内。他十分做作地拒绝与最高统帅部的任何一个将领握手,并下令让别的军官取代约德尔的职务。

将约德尔撤职的命令虽然没有真正落实,希特勒习惯的改变却延续了很长时间,我在总指挥部时他一直这样深居简出。难得有一次,约德尔和我作了推心置腹的交谈,他说希特勒之所以在听完他的汇报后勃然大



怒自有其心理因素。约德尔认为狂妄自大是维护独裁的心理根基，独裁者容不得下属挑明他的错误。我的观点和过去一样鲜明，而且更切中要害，可以断言，面对第二次侵苏攻势的真实结局，希特勒猛然醒悟，他的东线战略目标已经化为泡影，这场战争必输无疑。

希特勒显然也看到了西线侧翼过长所形成的危险，尤其是他也知道这与1919年发生的情形极为相似，当年红军在这里一举歼灭“白匪”，指挥官正是斯大林其人。

后来我们才知道陆续赶来防守斯大林格勒西线的罗马尼亚师大多装备极差，他们下火车后还得长途跋涉匆匆赶来，有的士兵甚至是光着脚跑来的。希特勒清楚地知道情况日益恶化，但是他寄希望于尽快占领斯大林格勒，这样就可以有足够的兵力来缓解紧张局势。但是为了在斯大林格勒的拼死一搏，越来越多德军从侧翼防线上被抽调过来，最后甚至于调集单个营的兵力。与此同时，苏军对德中路集团军的反击越打越猛，德军伤亡惨重，在勒热夫(Rzhev)地区的情况尤其危急。正是这个问题让希特勒和哈尔德最后大吵一场，后者也因此被解职。



## 第十八章 兵败斯大林格勒之后

我问过许多德军将领：“你认为在斯大林格勒战役之后，德国能不能避免战败的结局？”伦德施泰特回答道：“我认为行，只要允许前线指战员审时度势自行决定撤退的时间和地点，而不是一再被迫到处死守。”1941年后，伦德施泰特没有参与东线战事，这种立场使他的观点更为客观公正。伦德施泰特始终认为这场战争的前途未可乐观，有着东西两线作战的独特经历，在宏观层面上他的看法具有特殊的价值。其他东线的将领对这个问题的回答则更加明确。他们都认为如果放手让他们展开灵活的防御战，就能拖垮苏军的攻势。有些人还举出明显的事例。

克莱斯特谈了他自己的经历。当保卢斯被困斯大林格勒后，克莱斯特指挥部队主动从高加索撤退，从而避免了重大的损失。他也因此被提升为陆军元帅，荣获这等奖励可谓实至名归、不同寻常，通常多数将领都是因为攻城拔寨才得以晋升。天寒地冻，路途遥远，大军压境，侧背受敌，在如此险恶的情况下能够全身而退，史所罕见。

克莱斯特讲述了这次撤退的经过：

1942年11月，我军对高加索的攻势以流产而告终，战局陷入僵持状态，虽然如此，希特勒执意要我们仍旧停留在那些易遭攻击的深山老林中。1月初，苏军越过马内奇河南端，从埃利斯塔（Elista）向西，朝我军的后侧发起进攻，情况十分危急。这比在莫兹多克附近向我正面发起的反击威胁更大。但最大的威胁还是来自从斯大林格勒一路杀来的苏军，他们沿顿河而下，直趋罗斯托夫，深入我军的后方。

当时苏军离罗斯托夫仅70公里之遥，我的部队位于罗斯托夫以东650公里处，希特勒命令我在任何情况下都不准后撤，这等于是在宣判我的死刑。然而，第二天又传来新的命令，让我撤退，但必须带走全部装备。



在任何情况下都不易做到这一点,时值隆冬就更是难上加难了。

原先委派安东内斯库元帅(Antonescu)的罗马尼亚军团从侧翼掩护我军从埃利斯塔撤回顿河,但是安东内斯库没能亲临战场,真得感谢上帝!于是这个任务便交给了曼斯坦因。他的南方集团军中有一部分罗马尼亚部队。在被苏军分割之前,我军成功地撤出罗斯托夫的瓶颈地带,这全靠曼斯坦因的倾力相助。他那边也一度情况吃紧,我不得不派出几个师前往增援,共同阻击从顿河向罗斯托夫进攻的苏军。1月中下旬时情况最最危急。

克莱斯特强调指出,能在几近绝望的困境中成功撤退表明了灵活防御战术的威力。他的部队安然撤回第聂伯河之后,便向从斯大林格勒和顿河西进的苏军杀了个回马枪,一举扭转局面。这次反攻收复了哈尔科夫,稳定了南线的局势。直到1943年仲夏,这一带还算比较太平。

利用这一喘息时机,德军加强了东线的防守。他们重整旗鼓,虽然还难以恢复到原先的实力,但已经足以使苏军望而却步。然而希特勒就是听不进任何改变防御战略的建议。在夏季首启战衅的不是苏联人,而是希特勒。虽然这次他的进攻范围不像以往那么大,但他还是倾其所有,动用17个装甲师围攻库尔斯克凸出地带。谈到这次进攻,克莱斯特说他一开始就认为不会有什么好结果。但是负责实施钳形攻势的克卢格和曼斯坦因在事先却似乎颇为乐观。“如果能提前六个星期发起进攻,很可能我们能取得伟大的胜利——尽管我军的实力已经难以做到一锤定音。苏联人在事先听到风声,探知我军正在准备进攻,便在前线布下了大批地雷阵,将主力部队撤回后方,这样在我军高层预设的包围圈里留守的苏军也就所剩无几了。”

## 库尔斯克攻势中的有关证明

曼斯坦因向我解释了他的态度和没有及时发起进攻的原委:

1943年3月,德军再度占领哈尔科夫,这是我们在东线取得的最后一次胜利。我给希特勒分析当时的情形,指出我军兵力有限,难以全面阻挡苏军的攻势。我们唯一的机会在于凭借机动灵活的防御战术,充分利用我军长于指挥和能征善战的优势。



道路泥泞的时节过去以后,在1943年有两种可行的作战方案。

第一种是以攻代守先发制人,以此来遏制苏军的进击。那样的话,发起攻势的时间越早越好,要抢在苏军恢复兵力,尤其是坦克数量得到补充之前。进攻的第一步必须分割库尔斯克凸出地带的苏军,摧毁其准备投入战斗的后备装甲部队。然后我军全部装甲部队朝南进军,横扫南乌克兰地区的苏军防线。必须在5月初发起进攻。

第二种方案更好,那就是以静待动后发制人,我军等着苏军发起进攻,他们肯定会向我南乌克兰前沿阵地发起进攻,目标是摧毁我黑海北部的的前沿阵地。敌军开始进攻后,我军就主动后撤。然后集中兵力在基辅地区向正在进攻的苏军北翼发起猛攻,一举拿下苏军在南部的的前沿阵地。

希特勒决定采用第一个方案,因为他不愿放弃顿尼茨流域,而且他也不是那种敢于在战略上大胆冒险的人物。原定5月的第一个星期开始进攻库尔斯克,但是几天前在莫德尔的影响下,希特勒又下令暂缓进攻,以便等待聚集更多的坦克。他先将进攻日期往后拖延了四个星期,后来一直推迟到7月13日,这与我和克卢格的判断完全相悖。

拖到这时才发起进攻,困难之大是显而易见的。然而我还是抱有希望,我的两支部队双双告捷,他们成功突破苏军在库尔斯克南面的防线,全歼战场上的苏军装甲部队。此时,希特勒下令停止进攻。这样做是不得已而为之,因为苏军突破了克卢格集团军的阵地,莫德尔的部队(隶属克卢格的集团军)从北面发起的攻势受挫。我不得不转攻为守,抽出好几个装甲师去增援克卢格。致使我余下的部队兵力不足,难以担起防守的重任。

然而,在瓦尔利蒙特看来,虽然希特勒不愿后撤,但促成库尔斯克攻势的主要人物并不是他,而是新任总参谋长蔡茨勒。瓦尔利蒙特对我谈了他的看法:

希特勒虽然制定了进攻计划,并不愿意付诸实施。蔡茨勒与希特勒意见一致,他认为东线的德军兵力不足,通信设施太差,坐视苏军来决定何时何地发起攻击风险太大。所以蔡茨勒一直怂恿希特勒进攻库尔斯克。



当时约德尔是希特勒在其他战区的参谋长,他反对在东线重兵出击,他预料盟军将会在地中海战区登陆,指出必须加强意大利和巴尔干地区兵力和后备力量。

但是蔡茨勒对这些遥远的问题不感兴趣,作为陆军总参谋长他却无权过问东线以外的战事,这一直让他十分恼火。所以他全力以赴实施“他自己的”攻势,并向希特勒抱怨约德尔插手自己的事务。这样一来,以约德尔为首的“最高统帅部作战局”从此不再担任总揽全局的角色,而是成了负责除东线战场以外战区的次级作战参谋机构。事实上,从此以后能够统揽战略全局的只有希特勒一人。

希特勒最后终于勉强同意进攻库尔斯克,德军因此损失惨重。从一开始,希特勒就对取胜信心不足。他之所以最后同意进攻,主要原因在于不这样做他就不得不认真考虑从东线进行大规模的战略撤退。然而,后退绝对有违于希特勒的信念。正如他后来所言:“将领们打算采取行动,无非是想要撤退。”出于同样的原因,希特勒还一再禁止任何建立并加强后方阵地的措施。

## 库尔斯克攻势的结局

德国最后一次进攻被挡住后,苏军便着手反攻,如今他们实力雄厚,而德军则在这最后一搏中消耗了大量兵力。要不然他们可以利用这些兵力对苏军反攻进行长期的抗击,甚至可能打成平局。德军几乎耗尽了所有的后备机动力量。这样一来,苏军的在秋冬的攻势简直是所向披靡,偶有停顿也不是因为德军的反击,而是因为自己供给不继。德军的南部阵线开始土崩瓦解。

但是在北部战场,由于那里的德军获准保持守势,苏军的攻势屡屡受挫于德军顽强的阻击和组织严密的抵抗。当时海因里希将军率领第四军驻扎在从罗加切夫(Rogachev)到奥尔沙(Orsha)一带,守卫着横跨莫斯科到明斯克的公路,他的叙述值得一阅。他提到曾反复阅读过我写的有关现代战争趋势的著述,他说:“你的结论是在战术上攻难守易,我想告诉你根据我的实战经验情况确实如此。诚如你所言,问题的关键在于兵力与防守空间的比率。我提供几个自己的实战例证,或许你会感兴趣。”

德军从斯摩棱斯克撤退后,苏军向前推进到离奥尔沙近20公里处,



德国第四集团军在那里仓促构筑防线,在仅有一条战壕的情况下阻击苏军。那年秋季,从10月开始一直到12月,苏军向我发起多次猛攻。这回苏军连续向我发起5次进攻,我有10个师驻守在直线距离宽150公里的防线,由于前沿阵地弯弯曲曲,实际防守距离约有200公里。第四集团军曾遭重创,也没有后备部队,好在大炮仍安然无恙,这可是制胜的关键武器。

苏军的主要目标是奥尔沙的铁路枢纽,企图截断从列宁格勒到基辅的铁路通道。因此他们集中兵力猛攻横跨主要公路的约20公里的防线。苏军的第一次进攻动用了20—22个师,第二次是30个师,后来三次增加到每次36个师,其中部分军队是原有的,大多数则是新组建的。

我用3个半师的兵力进行正面阻击,其余6个半师守卫宽阔的防线。我们成功地挡住了敌军的每一次进攻。前后5轮接连不断的进攻每次都苦战5到6天,往往在第3到4天的攻势最猛,随后便日渐消退了。我军的阵地没有被撕开过较大的缺口,苏军的进攻也没有动用大量的坦克。他们每次进攻最多动用50辆坦克增援,但都遭到我军的阻击。

苏军通常一天进攻三次,早上9点钟,先是重炮猛轰,然后发起第一波攻势。第二次在10—11时,第三次在2—3时,就像闹钟精准报时。苏军不断向我推进,除非遭到我军炮火的阻击。他们被后面的军官和政委用枪逼着朝前冲,谁敢后退就会毙命。苏联的步兵没受过多少军训,但打得很顽强。

在我看来,德军防守的成功有三大要素。首先,我采取分区防守,每个区域范围不大,在苏军主攻方向重兵设防。其次,我集中380门大炮,组成一个强大的炮火群来掩护受到威胁的地段。这些大炮由司令部的一名军官统一指挥,他可以集中炮火向正面20公里范围内的任何一点发起轰击。苏军冲锋时最多有上千门大炮助攻,但是他们的火力不像我们这么集中。再次,德军各参战师每天的伤亡约一个营,我们安排从其他阵地调来一个营的兵力及时补充。在敌军发起进攻前,我总是准备好三个预备营,部署在每个参战师的后面,预备队所属师的余部紧随其后。这样我就可以及时向前线派出增援部队,重新再造编制齐备的战斗师。当然有的师会暂时合并在一起,这是不可避免的,也是成功防守必须付出的部分代价,但我总是尽快恢复各个师的完整性。



1944年5月,海因里希受命指挥第一装甲军,和匈牙利第一军驻守喀尔巴阡山脉前沿阵地。1945年初,德军北方防线崩溃后,海因里希率领这些部队退守西里西亚。1945年3月,海因里希受命指挥集团军阻击苏军对柏林的最后进攻,他负责指挥奥得河战役和柏林战役。

在后来的战役中上述防御战术又有所改进。一旦得知苏军正在集结,准备发起进攻,我就在夜色的掩护下将部队从前沿后撤到第二线,通常靠后2公里左右。苏军的第一次进攻扑空后,后面的攻势就不会有那么凶猛了。当然这种防御战术的成功前提是能获悉敌军进攻的确切日期,我派出侦察分队抓获俘虏来收集情报。苏军的攻势被瓦解后,我就将第二道防线作为向前推进的起点。出动未遭攻击战区的部队收复第一道防线。这套战术在奥得河战役中非常奏效。唯一的欠缺是此时我军已经实力不济,原先的死守硬拼虚耗了大量兵力。

在最后三年的防御战中,我动用这种战术从未打过败仗。我感到自豪的是自己从未向最高司令部要求增援部队。我发现在应用这种防守战术时,最为得心应手的武器是自动火炮。

你认为进攻方需要三倍于敌的兵力才能占有优势,根据我的经验这还不够,我认为对于工事坚固防守严密的敌人,进攻方至少需要六到七倍的兵力才能克敌制胜。如果要攻破我的防线还得成倍增加兵力,攻防力量对比至少要达到十二比一,甚至十八比一。

在我看来,德军东线防守失败的主要原因是,本来可以集中兵力固守重要的地点,却被迫去死守漫长的防线。这样就永远失去了战争的主动权。我认为仅靠死守没法拖垮苏军,但是如果采取灵活机动的防御战术,缩短防线,腾出部队进行有效的反攻,就可能扭转局势。

但是希特勒从来不向指挥员咨询防守方案和战术。最后一年的总参谋长是古德里安,他对希特勒毫无影响,他的前任蔡茨勒对希特勒略有一点点影响,更早的总参谋长哈尔德的建议大多被弃置不理。

1942年我担任第四军指挥,此后的经历让我大开眼界。我曾将一支部队从不易防守的阵地撤出,时任集团军总司令的克卢格将军马上警告我,如果再有类似行动将把我送上军事法庭。

希特勒总是要我们寸土必争,以军法惩治来威胁任何不听话的人。没有他的正式批准,任何撤退都不可以,甚至于极小规模的后撤也不行。





这条规定在军队中已经牢不可破,以至于传言称营长都不敢“把岗哨从窗口挪到大门”。每当情况发生变化,这种死板的规定捆住了我们的手脚。部队一再在不利的情况下死守,直到被包围缴械。不过也有些指挥官尽可能回避希特勒的命令。

这种回避只有在局部有限的范围内才行得通。蒂佩尔斯基希继海因里希后接任第四军指挥,他见证了灵活机动防御战术的价值,也看到了没法在最大程度上实施这种战术所造成的灾难性后果。“1944年3月,我在莫吉廖夫(Mogilev)指挥仅由三个师组成的第十二军团。苏军在进攻的第一天动用了10个师,到第六天共计上了20个师。然而他们只是攻占了第一道防线,在第二道防线就被挡住了。我利用暂时的间歇,趁着月色发起反攻,一举收复失地,我军损失比较轻微。”

蒂佩尔斯基希接着讲述了1944年苏军夏季攻势时的战况。在夏季攻势发动前三个星期,他出任第四集团军指挥。前线的指战员恳求上级同意他们后撤到别列津纳河一线,这样大步后退将能避开苏军进攻的锋芒。但是他们的请求遭到拒绝。然而蒂佩尔斯基希还是稍作后撤,退至第聂伯河一线,以保持前沿阵地的完整无缺。但是左右两侧阵地均被攻破,德军全线崩溃,一直溃退到华沙附近的维斯瓦河才稳住阵脚。

当时如果及时全线撤退在战略上堪称上策,苏军在进攻时往往会自乱阵营,德军撤退后,他们通常会花一段时间修整部队。德军连续大踏步的后撤可以消耗苏军的实力,而且还可以创造战机,趁德军实力尚存之时进行有效的反击。

希特勒在1941年坚持不撤退的决策是有道理的,但是他在1942年以及后来的战役中故伎重演则铸成大错,因为情况已经发生了变化。入侵第一年后,德军已经装备齐全,准备好冬季作战,也具备了在这样的条件下与苏军较量的实力,进行战略撤退并不会挫伤士气。我军具有在冬季机动作战的能力。这样不仅可以养精蓄锐,还能让我们发起强有力的反攻。

德军失败的根源在于我们常常采取一些徒劳无功的行动,尤其是在一些错误的时间和地点进行无谓的防守,致使兵力受损,这都得怪希特勒。我们的一些战役毫无战略意义可言。



曼陀菲尔说：“如果我们采取机动灵活的防御战术来牵制敌军，斯大林格勒战后红军在各个阶段的进攻结果就会大不相同。我运用这种战术曾屡次获得成功，即使面对兵力占优势的对手，也能克敌制胜。”

迪特马尔(Dittmar)将军的视野更为开阔，立场也更为不偏不倚，他的观点也很有意思。作为一个德国军事评论员，他的战时广播评论出奇地客观，远远超过其他任何国家的军事评论。更为难能可贵的是他所面临的新闻限制和危险远远大于西方盟国的军事评论员。我问他怎么做得到在许多场合如此直言不讳。他告诉我，这得归功于广播电台主管弗里奇的宽容。我的广播稿播出前只要通过他一个人的审查就行了。我感到他内心对纳粹政权深感失望，所以乐于借他人之口来表达自己真实的想法。评论播出后自然会收到一些抗议，弗里奇尽其所能保护迪特马尔。“我总感到自己颈脖上的绞索越来越紧。”

我问迪特马尔如果采取灵活机动的防御战术，德军能否拖垮苏军。他回答：“我看能行，灵活机动防御战术的优势是显而易见的，但是由于希特勒的反对，我军将领没法适当地运用这种战术。总参谋部不准下令组织后防，甚至不许探讨万一我军后退后应该采取的作战方案。希特勒禁止他们准备任何撤退的预案。然而，在1943年，总参谋部还是悄悄地做了一些预案，他们将一些措词谨慎的指令以传单的形式散发到各个部队，不过没有任何文字表明这些指令出自总参。”

我问迪特马尔在苏军1943年7月和1945年1月先后发起强大的攻势之前，德方是否曾试图进行战略性撤退。他回答道：“没有。由于希特勒硬要死守，每次的结局都是防线被彻底突破。有些聪明的下层军官，不顾希特勒不惜一切代价寸土必争的命令，在自己可行的范围内，作了一些小规模的后退。有些指挥官死抱希特勒命令不放，结果无非是被分割围歼。每次灾难性的后果都应归咎于希特勒冥顽不化的死守战术。最惨的一次是1945年1月苏军从维斯瓦河发起的攻势。在紧要关头原先准备上去的增援部队却被调去解救布达佩斯。”这支部队由装备最为精良的三个装甲师组成。

“拼命死守的战术一次又一次地重演，致使战争的格局每况愈下。旧的缺口尚未补上，新的缺口又频频告急，左支右绌的被动应战最终使德军走向毁灭。”



## 第十九章 红 军

德军将领对红军的印象比较有趣,他们的描述通常也非常生动。克莱斯特对红军的赞赏最为简要:“踏上战场,他们就是一流的勇士,我们起初能打败他们要归功于曾受过良好的训练。经历过沙场的磨炼,他们就成了一流的战士。他们打得顽强坚韧,在缺乏军用必需品的逆境中能坚持抗战。他们的参谋部很快就从最初的失败中汲取教训,迅速提高作战效能。”

其他一些德军将领并不同意这种看法,他们说在战术上和装备方面,苏军步兵总体上都比较落后,只是苏军的坦克部队颇具威力。然而,我注意到贬低苏军的德国将领大多在北部前线参战,可见红军的精锐部队主要在南方作战。另一方面,在德军北部前沿阵地的后方,苏联的游击队十分活跃,到1944年,他们迫使德军放弃大部分地区,仅仅驻守着几条主干道和供给线。在那年苏军发起的夏季攻势中,蒂佩尔斯基希的第四军在第聂伯河北被围堵,他告诉我,撤往明斯克的大路已经被封锁,他率部往南绕向普里皮亚季河湿地,由于游击队的破坏,那里荒无人烟,道路破烂不堪。“我发现一路上所有的桥梁都已经被炸毁,我们不得不边修复边撤退。”

谈到在北部前线四年的作战经历,蒂佩尔斯基希说:“在1941年,我们的步兵已经不再害怕苏联步兵,但他们还是很怕被俘后送到西伯利亚或更可怕的地方。这种恐惧感反而促使他们拼命抵抗,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尤其是身处被分割围攻孤立无援的险境,希特勒还要命令他们死守,此时他们就会感到格外恐惧。”

我问伦德施泰特在1941年苏军有哪些长处和短处,他回答:“刚交火不久,我就发现苏军重型坦克的质量和性能都出奇的好,但是其炮火的威力不如我们原先预计得那么厉害。在第一次战役阻击德军时,苏联空军也没有发挥多大的作用。”

曼陀菲尔认为:“1941年,苏军面临的问题是步兵没有配备足够的反坦克武器,若无机动的反坦克防线(也就是没有坦克的支持),就没法抵御德军的进攻。我军在1942年以后遇到相同的麻烦。所以步兵必须配备反坦克装甲



战斗队,这对装甲部队有着致命的威胁,它能将敌军的坦克分割围歼。”

克莱斯特特别谈到了苏军的武器,他说:“即便是在 1941 年,他们的武器也相当棒,尤其是坦克。苏军的大炮相当厉害,步兵的武器也很不错,步枪比我们的更先进,射速更快。苏军 T34 型坦克堪称世界第一。”在好几次交谈中,曼陀菲尔特别提到苏联坦克基本构件设计相当出色,其优势体现在“履带宽阔坚固,擅长爬坡涉水,跨越战壕,轻易不会脱落。”英国专家认为苏式坦克不够精巧灵便,行动过于笨拙。但是德国坦克专家却认为英美过于追求灵便精巧,却有损于坦克的战斗力。

至于武器装备的供应问题,克莱斯特说,1942 年苏军的装备最差,他们还来不及弥补 1941 年的损失,那一年最为缺乏的是大炮。“他们只好把迫击炮装在卡车上代替大炮。”但是到了 1943 年,苏军的装备供应日趋好转,因为西方盟国的大量装备涌入苏联,尤其是西方制造的汽车,加上苏联东部新开的工厂又生产出更多的各种武器装备。苏军使用的坦克全部是国产的。

古德里安说:“苏联人的坦克设计是向美国人学的。1941 年首次问世的苏制克里斯蒂式坦克(Christie),就是仿造美式克里斯蒂坦克,略加改造而制成的。侵苏战争打响后,苏联推出著名的 T34 型坦克,其外形近似美式克里斯蒂坦克。T34 型坦克 1941 年首次出厂,同年 7 月出现在战场上,斯大林式坦克的问世是在 1944 年。”

我不认为苏联人很落后,1933 年我有机会在哈尔科夫看到他们在工厂生产拖拉机。邻近的一家工厂生产坦克,我亲眼看到有 20 到 25 辆坦克开出厂门。苏联人告诉我每天都是这样,要知道这可是在 1933 年!苏联人擅长模仿国外的设计,然后根据本国的情况加以改进。

苏制 T34 型坦克在履带、发动机、甲壳和火炮方面优于德制坦克,其光学仪器和无线电通讯则不如德国坦克。苏式坦克没有炮塔,里面的指战员没法进行全方位的观察。1943 年,德国的豹式和虎式坦克出现在战场,武器优势再次回到德军手中,但这仅仅是坦克在一对一情况下的胜出,而不是坦克总体数量上的优势。苏联人不加改动便大批量生产 T34 型,而希特勒却老是要改变坦克的型号,以致产量总是跟不上需求。

所以要以史为鉴,千万不可小看俄国人。他们至少能在极短的时间内照搬他人的设计。



冯·森格尔(von Senger)上尉的一番评论也颇有意思。他的父亲是德军装甲部队司令,森格尔曾在苏联战场指挥过一支坦克部队作战,后来失去了一个臂膀。在战争后期,他曾任德国装甲部队督察的副官。他说:“苏制坦克的总体设计相当优秀,只是比较粗糙。不像德、英、美式坦克,苏制坦克没有为里面的坦克兵提供舒适的空间。里外都很粗糙,甚至连油漆都不涂。不过火炮底盘和其他关键装置的设计都相当不错。1943年夏以前,只有排长以上的坦克指挥官才能配备无线电台。此后所有的坦克都配备了电台,而首先这样做的就是新型 T34 式坦克。坦克内的士兵也从四个增至五个,多了一个报务员。”(曼陀菲尔提到过:“我在好多场合遇到过苏联女坦克报务员,她们勇敢坚强,非常激进。”)

森格尔强调指出:

苏联人笃信如下原则:在能到手的武器中挑选出最好的,型号宜少不宜多,尽量搞得简单实用,然后就大批量生产。1942年我们的装甲部队有12种不同型号的装甲战车,还有20种型号不同的车辆。苏联的装甲部队大多只有一种型号的坦克,那就是 T34 型,车辆的型号也只有一种,那就是福特卡车!

苏军的机械化部队就只有坦克和卡车,没有小汽车、摩托车或其他车辆。在战争后期,他们有了一些美式吉普,供营级指挥员使用。与德军相比,苏军简单化的装备有其短处,也有其长处。德军战车的型号、功能和设计过于繁复,这就在零件配备和行动部署上带来诸多不便。

苏联坦克的保养工作也做得不错。虽然大修不像德军那么快,常规保养却效率很高。他们有许多优秀的技师。事实上德国的坦克修理厂也越来越多地聘用苏联技师。战前,德国和其他地方的人都以为苏联人不擅长机械类的技术活,事实证明这种看法大谬不然。他们在机械方面颇具天赋,或许还超过某些西方人。

曼陀菲尔说:

装甲部队离不开救助和维修部门,苏军在这方面的工作做得相当不错。他们步行前进,紧随坦克,随时拖走损坏的坦克进行修理,展示了高



超的技能。我要是向德国维修人员下达类似的命令，恐怕他们会把我的坦克放在火上烧掉。

另一方面，苏军装甲部队的编队缺乏机动性，合理的编队配以精干的指战员是随机应变灵活作战的基础。在这方面，他们学会了不少，但直到战争结束还是没能达到德军和盟军的水准。

森格尔就这个问题作了更详尽的探讨：

苏军的坦克战术相当简单，他们只是照搬战前精心设计的训练模式行事，也不要求发挥个人的主观能动性和判断能力。苏军坦克指挥官虽然在其有限的职权范围内还算能干，但缺乏高度的智慧。进攻之前会发给他们一张地图，上面标有彩色的路线和攻击目标。我们缴获了许多这样的地图，可以从中揣度出他们的战术“部署”。

实际上，苏军的战术就是小部队作战的“步兵增援”，通常动用一队坦克，也就是10辆左右，为后面的步兵连在前面打开通道。进攻时坦克一字排开，步兵紧跟在每辆坦克背后。他们不用大规模的坦克编队发动攻势，但在突破之后，坦克就会聚集在一起，以大规模编队的方式挺进，直到遭遇新的防守阵地。

苏军没有半履带式或全履带式装甲车来运送步兵。有一些增援的步兵就坐在坦克顶上，此外，苏军的机动部队主要靠卡车运送。

虽然苏联空军号称世界领先，在战前的军事演习中曾有过出色的表现。但是东线战役一个出乎意料的特点就是苏联没能有效地动用其空军。我曾与施图登特探讨过这个问题，他说：“我也奇怪苏军为什么从不出动伞兵部队，我想原因可能是他们的伞兵缺乏训练，缺少导航和空降的实战经验。他们所做的只是空投几个侦察兵或小部队在我后方搞些破坏。”

苏联空军基本无甚作为，但也有一次例外。当时苏军一反常态，进行了一次大规模的空投行动。施图登特对此有所叙述：“在1941—1942年的冬季战役中，为了帮助苏联骑兵部队突围，苏联空军在莫斯科西南德军阵地的后方空投了上千名士兵，苏联人办事鲁莽，这次空投的方式也相当原始。在月色如洗的夜晚，苏联的运输机飞过广袤的皑皑雪原，在离地面仅几米的高度上缓慢地滑翔，士兵不用降落伞，直接跳下飞机。这可是最简单的空降行动。”



谈到军事指挥能力,我向伦德施泰特请教,根据他的经验,那几个苏军将领堪称一流。他答道:“在1941年,没有碰到什么军事奇才。至于我曾与之交战的布琼尼元帅,一个被俘的苏军军官的评价十分到位,‘此人胡子大,脑袋小’。不过在战争后期,他们指挥作战的能力无疑有很大的改进,朱可夫(Zhukov)就相当不错。有意思的是朱可夫在1921—1923年期间曾在德国学习军事战略,他的教官是泽克特将军。”

迪特马尔是德国的首席军事评论员,他容易了解德军将领的看法。他说他们一致认为朱可夫最为出色。科涅夫也不错,是个相当聪明的战术家,但与朱可夫相比毕竟不是同一等级。“随着战争的演变,苏军指挥作战的水平从上到下都有很大的提高。他们的长处在于军官们十分好学,而且能在战争中学习战争。”他补充道,苏军兵源充足,有条件让犯错的将领从失败中吸取教训,德国人可交不起这个学费。

也有一些德国将领,尤其是来自北方战场的将领,对这种说法提出质疑。一般而言,在苏联军队的等级阶梯上,上层和下层指挥员的意见最有分量,中层军官则总是战战兢兢的。能够跻身高层的大多精明强干,可以直言自己的看法,也有权按自己的方式行事。下级军官人数众多,在有限的范围内,他们具有良好的战术意识,因为枪炮无情,在战场上无能的必然结果就是伤亡。然而较之其他国家的军队,苏联中层军官往往更加顾虑重重,上级的命令和指示往往比敌人更让他们胆战心惊。

一位曾在苏联北部前线参战过德国军官就此作过一番意味深长的评论,他说:“只要我们能采取灵活机动的防御战术,就不怕挑起苏军的进攻。他们的进攻十分莽撞,只知道反复往前冲。因为苏军指挥官害怕一旦停止进攻,上级就会责怪他们没有决心。”

我问迪特马尔苏联军人的素质如何,他生动地描绘了苏军的主要特征,他的分析颇为透彻。他说:“我首先要说,这是一支具有铁石心肠的军队,不仅仅是听天由命,简直就是麻木不仁。大难临头之时,他们却似乎木然无知,其他国家的军队决不会像他们那样无动于衷。我曾在芬兰前线作战,只有一次是苏军真正向我投降。这种麻木不仁固然使他们难以被征服,但同时也使他们在军事上过于迟钝,侵苏战役初期,这种迟钝往往导致他们被德军包围。”

迪特马尔还说:“希特勒后来还特别下令,要将主导红军的这种精神状态灌输给德军。我们力图在精神上学习苏联,他们则向我们学习战术,而且还学得不错。苏联就是这样死板地训练军队,因为他们不在乎人员伤亡。他们的



军人已经习惯于盲从。”

这种盲从的习惯压抑了苏联军人原有的战术意识,使其不善于随机应变,遭到突然袭击时不知所措。蒂佩尔斯基希举例说:“苏军很死板,打乱他们的部署并不难。尤其是在战斗进行的时候,往往要过好长时间,他们才会改变作战方案。根据我的经验,只要能够出其不意,迅速坚决地予以反击,往往可以以弱胜强,阻止并挫败苏军的攻势。我军强有力的阻击往往让苏军感到出乎意料,让他们吃了不少苦头。然而一旦他们感到自己占有优势,就会变得十分大胆。他们就像野生动物那样,察觉到威胁,马上就会寻找藏身之处。或许这就是为什么他们的空军尽管在技术和机械上并不亚于对方,却在实战中始终处于下风。因为空军长于进攻,这与苏军的秉性相悖。不过要打败他们必须具有高超的指挥能力、一流的训练、高昂的士气和坚定的意志。这样的部队才能以少胜多。”

布卢门特里特将军喜欢从哲学和历史的角度来探讨这些问题。他对我详谈了自己的看法,他从第一次世界大战的亲身经历谈起。

1914年到1918年世界大战时我还是个中尉,1914年8月,我在比利时中南部的那慕尔与法国军队和比利时军队有过短暂的接触,后来又和俄国人打了两年。我们第一次向俄军阵地发起进攻后就发现,他们与法国和比利时的军人根本不同。他们善于隐蔽,工事做得相当精致,而且十分顽强!我军损失惨重。

在那个年代,他们还是沙俄的军队,相当厉害,不过总的来讲还算比较善良。当他们被迫撤离东普鲁士时,便按照习惯和军事条例放火焚烧当地的城市和村庄。后来他们在自己的国土上也是这么干的。当红色的火焰从被焚烧的村庄上空升起,照亮了傍晚的天际,我们便知道俄军要走了。奇怪的是俄国百姓并不抱怨,这是他们一贯的做法,已经沿袭好几个世纪了。

我说大多数俄国军队比较善良,主要是指俄国欧洲地区人民组成的军队。至于亚洲地区居民组成的军队,如西伯利亚军团,则举止相当野蛮,哥萨克人组成的军队也是如此。1914年德国东部曾遭到他们的大肆蹂躏。

即便是在1914—1918年,德军在东线也是打得比西线更艰苦。人们宁肯到西线,而不愿上东线战场。西线作战主要依靠武器装备和大规模的炮火,如凡尔登战役、索姆河战役等等。西线也挺折磨人的,但至少对手还是西方人。东线战场的炮火没那么猛。但打得更加艰苦,面对面的



厮杀，场面极为惨烈。夜战、肉搏战、丛林战，这些都是与俄国人的交战中学会的。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德军中流传着一句话：“英勇的军队在东线拼命厮杀，消防队员在西线袖手旁观。”

然而，只是在这次大战中，我们才领教了“俄罗斯”的真正含义。1941年6月揭幕战打响后，苏维埃军队向我们展示了它的新面目。我军损失高达百分之五十。在布列斯特-立陶夫斯克，特工部队和妇女营不顾德军飞机大炮的狂轰滥炸，在一个旧城堡内坚守了一个星期，打到最后一人。我们的战士很快就明白了与苏军作战意味着什么，可是元首和大多数高级将领却不知道，我们为此付出了沉重的代价。

1941—1945年的红军要比沙俄军队厉害得多，他们狂热地为共产主义理想而战。这使他们变得更加顽强，也让我军出手更狠，因为东线战场的格言就是“你死我活”。红军的纪律远比沙俄军队要严厉。他们对上级的命令一味盲从。我们曾经截获过一些红军的命令，如“为什么没有进攻，我最后一次命令你占领斯特兰科（Strylenko），否则当心你的脑袋！”“为什么你的部队还不到预定地点准备进攻？立即行动，除非你不要命了。”我们由此得知对手居然是这般性情冷酷。在1941年时，谁又想得到没过几年，同样的情况会出现在我们的部队里。

回顾战史，凡是俄国人参与的战争无不打得激烈、残酷无情，而且伤亡惨重。俄国人一旦决定坚守自卫，要打败它真难上加难，结果必定是血流遍野。作为自然的宠儿，他们享有天时地利。他们光知道盲从，亚洲斯拉夫地区（Slav-Asiatic）的特征就是只懂专制，不许抗拒。俄国指挥官可以任意向下级提出不近人情的苛求，不准嘟哝，不准抱怨。

东方和西方是两个世界，他们没法相互理解。俄罗斯就像狮身人面像上无言的问号，他们双唇紧闭，从不向我们敞开心扉。

布卢门特里特的反思所触及的问题对战争的作用非同小可，其重要性绝不亚于部队的士气。几乎所有的将领都提到过，苏军最大的长处在于，即便没有正常的供给，他们也能坚持作战。曼陀菲尔将军曾多次率领坦克冲入敌营，他的叙述颇为生动。“苏军向前推进的方式是西方人难以想象的。坦克在前面冲锋，后面跟着成群的部队，大多骑在马上。战士们背着一袋干粮，里面是他们行军途中在乡村和田野里收集来的干面包屑和生的蔬菜。马料是房顶上的干草，而且少得可怜。苏联人习惯于这种原始的生存方式，在进军时能坚持三星期之久。你没法像对付一般的军队那样，通过切断其供给线来阻止他们前进，因为你几乎找不到他们的后勤车队进行打击。”



## 第二十章 盟军进攻意大利

1943年5月,德意在突尼斯的阵地全线崩溃,这给盟军提供了极为有利的战机。德意的8个师和大批援军被分割包围,沦为“非洲大袋”中的战俘,包括德国在地中海战场的主力部队和意大利的精锐部队。意大利国门洞开,防守乏兵,意军士气极为低落。只有一些德国部队可以马上帮助意大利加强防守,德军两个师奔赴意大利本土,这两个师都是刚刚征兵组建的,一个本来正准备派往西西里岛,另一个则准备派往撒丁岛。

然而,盟军在突尼斯大获全胜后,过了两个月才于7月10日在西西里岛(Sicily)登陆。当时只有两个德国师迎战盟军八个师的进攻,因为盟军一登陆,大部分意军便土崩瓦解了。守卫意大利的德军虽然没有空军的支援,仅仅得到两个师兵力的增援,还是顶住了入侵的强敌。在德军的阻击下,盟军直到8月中旬才占领西西里岛。在高射炮火的掩护下,德军通过墨西拿海峡(Messina)撤退到意大利本土。凯塞林(Kesselring)元帅是德军在意大利南部的总指挥,他对能赢得喘息的机会深感欣慰,当德军全身而退时,他更是如释重负。他原来担心盟军会进而攻占意大利西南端的卡拉布里亚的(Calabrian)——“意大利半岛足尖”,如果那样的话,在西西里岛作战的德军就被断了退路。

在战略大计上,盟军错过了一个更大的机会。意大利人在7月25日推翻了墨索里尼政权,西西里岛的意军很快就向盟军投降,这显然表明意大利希望尽快求和。但是同盟国却没有尽力为意大利新政府的和平之路提供方便,一直拖到9月3日才背着德国,与意大利达成停战条款并秘密签约。8日,也就是盟军在那不勒斯(Naples)以南的萨莱诺(Salerno)登陆的前夜,他们才公开宣布意大利投降的消息。早在五天之前,3日那天,蒙哥马利将军就已率领英军通过墨西拿海峡,不急不躁地向意大利半岛的足尖推进。

德军派出8个师抵达意大利北部,还有一些增援部队正在途中。尽管如此,凯塞林只有7个师的兵力,却要负责防守意大利半岛的南部和中部。必须



解除意大利军队的武装并加以防范,这又使德军本已有限的兵力更为紧张。所幸的是盟军大部队的登陆地点主要集中在萨莱诺,在那里凯塞林比较容易集结部队先进行阻击。至于向半岛南端的足尖推进的盟军暂时并不能对德军构成很大的威胁。盟军的指挥官不敢让部队越出空中掩护的范围,这让凯塞林有机可乘,他可以借此算出盟军的行动规律。盟军得意地将萨莱诺的登陆称为“雪崩行动”,却遭到顽强的阻击,损失相当惨重,而且差一点导致灾难性的后果。

盟军行动之前,我曾认为要瓦解德军的防守,打乱他们的阵脚,最有效的策略是在半岛的脚后跟塔兰托(Taranto)和布林迪西(Brindisi)登陆。这样就能“大大出乎德军的意料”,而且能减少风险,有望尽早占领两大良港。

在最后一刻,盟军才将这个登陆方案作为辅助行动纳入作战规划,但是进攻塔兰托的只有英军第一空降师,这支部队本来还在突尼斯休整,仓促结集后,便由紧急调集的海军船只送上前线了。所幸这支部队没有遇到什么抵抗,它不但没有坦克,也没有大炮,更没有像样的机动车辆,只带了一门榴弹炮。总之,它缺乏乘机扩大战果的必要装备。过了将近两个星期后,盟军另一小支部队(包括一个装甲旅)在亚得里亚海岸东面的港口城市巴里(Bari)登陆,他们占领了福贾(Foggia)周围的一些机场,这就为盟军轰炸德国开辟了一个新的方向。从意大利半岛脚跟发起的间接行动对在萨莱诺附近与盟军对峙的德军后方产生威胁,动摇了德军的抵抗。

10月1日,盟军进入那不勒斯。与此同时,德军在意大利其余地区加强了防守,他们成功解除了意军的武装,从而使意军投降的不利因素化为乌有。这样德军就可以集中兵力阻击盟军在意大利半岛的进攻。意大利半岛宽仅100英里左右,大部分地区处在亚平宁山脉(Apennines),那里荆棘丛生、地势险恶。德军原来只想能暂时拖延盟军占领罗马的日期,争取时间在意大利北部构筑一条牢固的防线。但他们看到盟军进展缓慢,便忍不住派增援部队向南推进。这就像为了顶住越来越大的压力,将一个黏滞的活塞在一个黏滞的汽缸里来回抽动。

马克·克拉克(Mark Clack)将军率领的英美第五军从萨莱诺出发,在那那不勒斯20英里开外的沃尔图里诺河(Volturno)一线遭到德军的阻击,在卡西诺(Cassino)前面的加里利亚诺(Garigliano)再次遭到德军更坚定的阻击。盟军11月和12月连续发起攻势,都无功而返。与此同时,在亚平宁山脉东面,蒙哥马利的第八军在10月1日从福贾出发,先派一小支部队在泰尔莫利



(Termoli)偷袭德军后方,然而乘机从正面进逼比费尔诺河(Biferno)。但还是在萨莱诺一线受阻于德军的抗击。11月底,蒙哥马利组织了一次强大的攻势,他说:“将德军赶到罗马以北的时机已经成熟,……局势对我们极为有利,我们要把敌人打得落花流水。”但蒙哥马利的军队渡过河后便遭到德军的阻击,战争陷入僵持状态,亚平宁山脉的东面和西面都是如此。

历时4个月之久,到年底时,盟军仅向萨莱诺以北推进了70英里,而且大部分地区还是在9月份占领的。打那以后,盟军推进的速度是如此缓慢,以至于他们自己将其形容为“寸进”。

蒙哥马利在年底离开意大利战场,回英国筹备诺曼底登陆。他还带走了几个久经沙场的精锐师,由几个新组建的师来填补空缺。对意大利战役更为不利的是大量的登陆装备和船只都被调去备战诺曼底战役。奥利弗·利斯(Sir Oliver Leese)取代蒙哥马利指挥第八军,克拉克仍为第五军司令,亚历山大继续担任意大利战役的总指挥。

1944年1月下旬,盟军进行了一次海上登陆行动,目的是动摇守卫在卡西诺周围和加里利亚诺的德军防线。一支强大的盟军部队在罗马以南25英里处的安齐奥(Anzio)登陆。但是它没能迅速向内地推进,德军马上出动后备部队加强薄弱环节。德军虽然没能如愿以偿将盟军打回到海上,但还是将他们包围在一个狭隘的桥头堡上。盟军在卡西诺重新发起的主攻也遭到德军的阻击。

僵持了四个月,亚历山大将军发起新的攻势,目的是让第八军的部分兵力越过亚平宁山脉,增援第五军的出击。在地面攻势展开之前,先派飞机对敌方供给线进行猛烈轰炸。在朱安(Juin)将军率领擅长山地战的法国殖民军团从大山的侧翼突破,在他们的帮助下,英军这次终于占领了卡西诺。在安齐奥的盟军及时插入,攻破敌方的桥头堡。在这套组合拳的打击下,德军才被迫开始全线后撤。6月5日,也就诺曼底战役开始的前一天,盟军进入罗马。

凯塞林临危不乱,以高超的指挥能力使部队摆脱困境,并成功地对盟军展开新的阻击战。他在佛罗伦萨以北构筑新的防线,盟军再次被迫止步不前。8月下旬,亚历山大将军率领的第八军的主力调回亚得里亚海海岸,突进到波河(Po)河谷一带,但因秋雨绵绵,部队只得暂停进军,意大利战役就这样被拖到了冬季。

为了应付苏军和英美联军对德国的东西夹击,希特勒只得从意大利抽调兵力和武器装备。在盟军的不断打击下,德军在意大利的防线终因不堪重负



而土崩瓦解,但此时已是1945年4月。当初意大利宣布投降,盟军踏上半岛之时没曾想到他们得花20个月的时间才将德军逐出意大利,德国人自己也未曾料到。

我在1954年下半年有机会与之交谈的德国将领中没有几个人曾经在意大利服役,有些人只是在某些地区或战役的某个阶段有所参与。因此在本书初版时没有涉及意大利战役,因为我担心资料不全。不过后来我有机会听到凯塞林将军的叙述,他的参谋长韦斯特法尔(Westphal)将军也提供了不少可供佐证的资料。韦斯特法尔被公认为德国军方青年才俊之一,曾任隆美尔将军的作战部长和参谋长,在北非呆了18个月后,于1943年夏被调任为凯塞林的参谋长。第二年又到西线接替布卢门特里特出任伦德施泰特的参谋长。

森格尔将军也提供了有关意大利战役的一些有价值的新材料。他曾指挥过西西里岛的德军,在指挥德军撤出撒丁岛(Sardinia)和科西嘉岛(Corsica)的战役中表现了杰出的军事才干。从1943年11月起,他在意大利半岛担任第十四装甲军团司令。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他曾荣获牛津大学罗德斯奖学金(Rhodes)。后来成为德国进步教育家库尔特·哈恩(Kurt Hahn)的朋友。库尔特·哈恩曾经在萨莱姆(Salem)创办过著名的中学,纳粹掌权后,他又在苏格兰的戈登斯通(Gordonstoun)组建过同类的学校。战后,萨莱姆中学重拾自由教育的校风,森格尔曾在那里任职。

在对意大利战役作了概述之后,我要将“山的那一边”对这个战役的评述作个总结,就像在描述其他战役时所做的那样,我会在适当的地方直接引用参与战役的将领们的评论。

## 序 幕

1942年11月,盟军进攻法属北非殖民地,此举完全出乎希特勒和最高统帅部军事顾问的意料。(凯特尔和约德尔在战后承认这是他们始料未及的。)德国人得到情报说是美国计划在达喀尔(Dakar)和非洲西海岸的一些岛屿登陆,他们想当然地认为美国人不会进入地中海,因为那里是英国人的势力范围!当报告说大批运输船只驶离摩洛哥海岸时,德国人又自以为那是运送英军去远东。甚至在得知一部分舰队穿过直布罗陀海峡时,他们还是贸然断定那不过是盟军打算在利比亚登陆,从背后包抄被刚被蒙哥马利逐出埃及的隆美尔军团。



凯塞林将军持不同的观点。身为德军驻地中海中部总指挥,他预感到情况不妙,早在一两个月前,他已经在为盟军可能在法属北非登陆而忧心忡忡。就在盟军发起进攻的前三天,德国最高统帅部还是认为凯塞林的警告不可信,他紧急求援的吁请被置之不理。面对突变必须立即回应,德国匆忙通过空运不断将一小批一小批的部队送到突尼斯,在比塞大(Bizerta)成功阻击从阿尔及利亚赶来的盟军先头部队。如果盟军跨境奔袭的起点不在离西线很远的地方,德军的阻击战就难以得逞了。

在突尼斯战场,盟军力量在增加,德军的实力也在增长。德军构筑了大量工事保卫比塞大和突尼斯其他地区,盟军在整个冬季毫无进展。隆美尔的部队在从阿拉曼撤出后,经过长途跋涉,总算找到了一个庇护所。然而,为了拯救隆美尔的残部,守住非洲的立脚点,这次迟到的行动让希特勒的部队和友军付出了沉重的代价。所以当5月份德军阵地被局部突破后,整个前沿阵地全线崩溃,该地区所有部队被围捕,近25万将士沦为战俘,其中德国人占三分之二。如果当初希特勒愿意舍弃隆美尔的残部,盟军的包围圈将比他们预料的范围更大,也更难确保能够围歼德军。

隆美尔本人“在战场又坚持了一天”。部队刚抵达突尼斯边境,他就再次病倒,被飞机送回德国养病,此时离北非大败仅一个月。9月,隆美尔被任命为德军驻意大利北部战区司令。凯塞林负责指挥南部德军。另有一位军人有幸被“疾病”击倒,他就是在二战后期让盟军大吃苦头的曼陀菲尔将军。1944年年底,他指挥装甲部队成功突破美军在阿登高原的阵地。他在突尼斯比塞大的一个战区指挥一个临时组建的师与美军对峙。就在5月6日盟军发起总攻的那一天,曼陀菲尔病倒了,和其他一些伤病员一起坐飞机撤到西西里岛。他告诉我,在飞往特拉帕尼(Trapani)的途中,他们的飞机三次遭到盟军空军的攻击。我说大难不死真是幸运,他淡淡一笑,回答道:“结果全一样,我最终还在英国的特伦特公园(Trent Park)与战友会师,他们休息的时间比我更长!”

突尼斯德军前沿阵地的崩溃让希特勒和他的军事顾问大为震惊。连绵起伏的山势使通往比塞大和突尼斯的隘口难攻易守,他们原先指望凭借有利的地形,这条防线可以永保安然无恙。但是他们未曾考虑到外围防线宽达100英里,与有限的后备军不成比例,而前沿阵地的纵深又太浅,极易在空袭下陷入瘫痪,防线一旦被突破也来不及重新集结部队加以补救。守军的基地离前沿阵地太近,很不安全。敌人突破前沿阵地后,很快就能冲进基地。德国军队原本就对背海一战忧心忡忡,基地的丧失将使他们更为悲观,要知道制海权和



制空权都牢牢地掌握在盟军的手中。最高统帅部里的那些决策者远离战场，根本没有对前方将士的士气予以充分的考虑。此前他们也曾低估向地中海那头远征军大部队提供给养的困难。像哈尔德和陆总其他参谋一样，凯塞林也曾反对发动北非战役，反对以这个理由入侵埃及。他认为没法确保维持如此长的供给线，北非战役打下去就会演变成一场“供给线之战”。在这个问题上凯塞林与隆美尔意见相左。随着北非战役的深入，这种担忧与日俱增，隆美尔的残部被逐回突尼斯时，凯塞林所担心的危机发展到了顶点。当德军第一次突袭突尼斯，并向已经占领的桥头堡派出大规模的增援部队时，凯塞林本人也曾错误地站在乐观派一边。后来他承认：“我们既不能向部队补充给养，也没法让他们全身而退。”

## 盟军进攻西西里岛

盟军占领突尼斯为进军南欧扫清了路障，可谓一举两得。德意军队在突尼斯惨遭全歼，这让意大利半岛和周围诸岛几乎无兵可守。危急时刻，希特勒向墨索里尼表示，可以派出五个新募集的精锐师前来相助，墨索里尼回答说他只需要三个师就足够了。墨索里尼事先并没有征求凯塞林的意见。凯塞林得知此事后认为这表明了意大利人的政治愿望“在咱家里，我仍是主人。”墨索里尼的答复也与意军首脑罗阿塔（Roatta）将军意见相悖。罗阿塔曾强烈要求必须增派六个装甲师，分赴三个战场——北部的来航（Leghorn）、中部的罗马和南方的那不勒斯。削减援军之举使意大利在抗击盟军进攻时付出了惨重的代价。

而且德意军方吃不准盟军将从哪里发起进攻，这也增加了防守的难度。盟军可以主动选择进攻目标，防守方处于两难的境地——他的兵力捉襟见肘，不知道如何部署，猜不准该把有限的兵力放在什么地方。在约德尔的影响下，希特勒认为盟军下一步会在撒丁岛登陆。那里的德军只有仓促招募的第九十装甲榴弹师。撒丁岛的港口原本就不多，那里的码头大多已被盟军的空袭炸毁，援兵和给养很难运送上岛。于是希特勒决定出动施图登特的第十一空降军团。这支部队有两个伞兵师，驻扎在法国南部，作为“元首的后备军”，如果盟军进攻撒丁岛，他们就用伞兵发起反击。施图登特告诉我，计划就是这么定的。

然而，凯塞林则认为盟军下一步行动很可能是在西西里岛登陆。墨索里



尼和意军指挥部也持同样的看法。留守那里的德军只有第十五装甲榴弹师，也是临时招募组建的。不过“赫尔曼·戈林”装甲师被派到那里。即便如此，原来守卫该岛的10个意大利师装备不整，实力太弱，能够出手帮助他们的德军毕竟还是太少。

5月13日是德国一举攻入色当的周年纪念日，在罗马召开的会议上，凯塞林提出以间接的方法迅速出兵西班牙，以解救意大利的燃眉之急。与会的新任海军司令德尼茨(Doenitz)上将同意凯塞林的想法。(去年11月，在盟军进入法属北非后，他的前任海军上将雷德尔曾多次敦促希特勒采取同样的行动。)德尼茨回到德国后，去见希特勒，催他尽快采取这个方案。他认为这样既可以威胁英美侵意军队的侧翼，又能夺回战场的主动权。但希特勒认为为时已晚。他说较之1940年，佛朗哥现在更不会同意这么做。没有佛朗哥的首肯，德军没法进入西班牙，因为西班牙人骁勇善战，他们会发动游击战，破坏入侵者的通信联络，使德军难以立足。

即便如此，在盟军进攻西西里岛之前又过去了两个月，令人惊异的是德意在加强欧洲门户的防守方面依然无所作为。在突尼斯沦陷后的一个月里，盟军空军不断轰炸非洲和西西里岛海峡之间的潘泰莱里亚(Pantelleria)岛，尽管该岛工事坚固，最后还是被攻陷了，盟军的意图十分明显，但更奇怪的是德意还是无动于衷。盟军耗费大量的“炸弹”进行如此旷日持久的“准备”，确切无疑地表明下一个目标就是西西里岛。尽管敌方高层也意识到这一点，但他们并没能从这个明确的警示中有所获益。这主要是因为德意之间互不信任，彼此猜忌。回首往事，凯塞林认为本来有可能击溃盟军的进攻。盟军在西西里岛海岸站稳脚跟后，当时匆匆赶往西西里岛增援的两个德国师如果能早一点到达，并由德军统一指挥，就能组成强有力的机动反击。他的结论似乎不无道理。

德军要求将新派到西西里岛的两个师由德军司令部统一指挥，意大利人却拒绝其友军的要求，致使有效反击盟军的行动付之东流。意方所能接受的是德国可以任命一位联络官，与意大利驻西西里岛第六军司令古佐尼(Guzzoni)将军保持联系。陆军中将森格·翁德·埃特林(Senger und Etterlin)被任命为联络官，给他配备了一些精干的作战参谋、一个通信连，以便在情况紧急时亲自指挥驻岛德军。正如韦斯特法尔所言，这只是个“权宜之计”。盟军入侵西西里岛后，意大利第六军不堪一击，此时德军作战参谋才带着第三个德国师(第二十九装甲榴弹师)匆匆赶往西西里岛。





这个师是从意大利亚得里亚海岸调来的,此前刚刚被派去守卫重要的福贾机场和“意大利之踵”。他们刚到福贾就被调走,盟军本可乘机攻击“意大利之踵”,但他们却行动迟缓坐失良机。因为没有大规模的空中掩护,盟军不敢贸然行动。凯塞林敢于从这个至关重要的阵地抽调兵力可谓算计老到,他充分利用了盟军的“谨慎策略”。

森格尔将军从守军的角度给我讲述了西西里岛战役的经过。他棱角分明的面容给我留下很深的印象。作为一个装甲部队的指挥官,他特别谈了装甲部队在战役中的表现。

德意指挥部正确地预测到盟军登陆地点很可能是西西里岛的东南部。然而,他们认为最易受到攻击的地方是南部海岸杰拉(Gela)附近的沿海平原和位于东海岸的卡塔尼亚(Catania)。那里地形平坦,适于装甲部队排兵布阵,一登陆就有足够的腾挪空间,也便于向岛屿中心地带推进。这个具体而微的分析恰恰错了。7月10日,盟军打响西西里岛战役,其登陆的范围从锡拉库萨(Syracuse)延伸到利卡塔(Licata),包括整个东南海岸。登陆的坦克部队没有遭到海岸守军任何有效的阻击。这些意大利守军只是些二三流的部队,装备简陋,又缺乏相应的炮火掩护。

盟军指挥部偏偏不选适于坦克推进的海滩上岸,而是让坦克部队和其他兵种一起在整个地区登陆。我猜想他们不让坦克集中在平原地带可能是考虑到两个因素:其一是因为盟军拥有制空权和制海权,他们就可以全线登陆以分散守军的兵力,还可以避免刚上岸就遭到守军坦克的重点反击。众所周知登陆行动的初期最为关键。他们采取这种战术的第二个原因是杰拉和卡塔尼亚后方的平原毕竟不像非洲大平原那样能让坦克迅速挺进。

盟军坦克部队主要沿着大路进军,依仗着海军的炮火和空军的掩护,他们可以快速推进。在战争后阶段,即使没有海军炮火的掩护,即便地形不利坦克的腾挪,凭借空中优势,他们仍然能顺利前进。但是与苏联和北非的情况不同,在地形险要之处,盟军从来不曾突破过轴心国精心组织的防线。也未能通过追击来歼灭溃逃的敌军,而苏联和非洲的地形则会让他们轻而易举地做到这一点。

森格尔将军接着谈了战役初期关键时刻守军采取的行动,他特别提到了



德军坦克反击在杰拉附近突破海岸防线的美军,这次反击战让盟军受到重创。

正如蒙哥马利元帅所言,轴心国的部队兵力分散,防守就显得左支右绌。轴心国的最高指挥部担心盟军从东西海岸同时登陆,所以不得不分头设防。虎式坦克群是德军装甲部队的主力,这些坦克和“赫尔曼·戈林”师集中在东面,准备(用这些虎式坦克和戈林师中的装甲团)来阻击盟军坦克在杰拉或卡特尼亚平原地带的进攻。德军从卡尔塔吉罗内(Caltagirone)向南发起反击。我亲眼看到坦克冲到杰拉-拉古萨(Gela-Ragusa)公路南面的沙丘上,就在那里成功地阻击了盟军的进攻,但是同盟国海军的大炮给德军造成很大的损失。虽然他们成功地击退了盟军,甚至在那里将登陆的盟军赶回舰艇。无奈这局部地区的胜利没有什么战略价值,因为盟军遍布整个锡拉库萨和利卡塔的其他地区,所有的道路都向他们敞开。

德军最高司令部曾对虎式坦克寄予厚望,指望依靠先进技术东山再起。但是事实证明虎式坦克尤其不适于西西里岛的地形。这种坦克比较高,甲壳很厚,体积巨大,在山间小路上显得十分笨拙,而且还容易被敌人的侦察机发现。甚至于只要一组降落大路边上的伞兵就可以在橄榄树的掩护下对它进行攻击。坦克无法离开大路,因为在意大利,橄榄树都种在山边斜坡石头砌成的平台上。虎式坦克在狭窄的路面上无法转弯,稍有损坏便不能动弹,需要至少两辆坦克来拖,这一来便成了敌军炮火密集轰炸的活靶子。

然而,在缓慢而有序的撤离西西里岛行动中,作为反坦克武器,虎式坦克和其他坦克却发挥了极大的作用。它们藏身于小路边的灌木丛中,设下埋伏,向盟军那些同样行动笨拙的坦克发起袭击。盟军推进的速度越慢,德军用坦克来打坦克的效率就越高。坦克比固定的反坦克炮更经打,它有厚厚的外壳,可以就近左右移动避开密集的炮火。它能使士气低落的步兵振奋精神。坦克内的无线通信设备还能联络各个部队加强防御。在高级指挥官看来,哪怕是在队形分散的情况下,坦克组成的阵形也要比步兵阵形更为可靠。

取道卡特尼亚是通往墨西拿海峡的捷径,蒙哥马利的军队在卡特尼亚东海岸受到德军的有力阻击。除此以外拖延行动本来未必能为守军创造多少机



会，盟军之所以一再遭到阻击是因为德军突然加强了西西里岛的空中防御。

英军在上岛后三天内便肃清了东南角的敌军，稳住了阵脚。蒙哥马利说，在13日那天“我决定从伦蒂尼(Lentini)地区出发，全力以赴向卡特尼亚平原突进。”关键在于夺取卡特尼亚南面几英里处的锡梅托河(River Simeto)上的普里马索桥(Primasole)。为此动了一个伞兵旅。虽然只有一半的伞兵空降到正确的地点，他们还是成功地占领了完好无损的大桥。

施图登特将军给我讲了故事的另一半：“7月10日，盟军在西西里岛登陆后，我马上建议立刻派两个伞兵师进行反击。但希特勒不同意，约德尔更是加以反对。所以仅派了第一伞兵师从法国南部飞往意大利，一部分到罗马，另一部分到那不勒斯。第二伞兵师则和我一起还是呆在法国尼姆(Nimes)。不过第一伞兵师很快就飞往西西里岛，作为地面部队增援那里为数不多的德军，因为那里的意大利军队已经开始全线崩溃。这个伞兵师分批降落在南卡特尼亚东部我军防线的后方。我原本希望他们能空投到盟军前沿阵地的后方。第一批伞兵降落在我前沿阵地后面3英里处，正巧遭遇几乎同时空投在那里的英国伞兵，英军想从这里打开通向锡梅托河大桥的通道。我军击溃了这些英国伞兵，从盟军手中夺回了大桥。那是7月14日。”

在增援部队的协助下，经过三天的激战，英军夺回了大桥。但是此后他们在向北挺进的途中一再受到德国伞兵和坦克的顽强阻击。盟军沿东海岸迅速进军60英里外的墨西拿的希望日渐渺茫。蒙哥马利将军被迫将第八军的主力转向西面，准备沿着埃特纳(Etna)山脚迂回前进，与从巴勒莫(Palermo)向东推进的美军会师。面对森格尔将军所谓的拖延战术，盟军历经艰辛缓慢推进，整整耗费了1个月时间。德军赢得了时间，安然撤回意大利本土，准备“他日再战”。

盟军最高指挥部没有试图在“意大利半岛的足尖”卡拉布里亚登陆，以切断西西里岛德军通往墨西拿海峡的退路，这使凯塞林将军如释重负。在西西里岛战役期间，他一直十分担心盟军会采取这个行动，因为他已经无兵迎战。在他看来，“如果对卡拉布里亚发起第二次攻势，西西里岛之战将会以盟军大获全胜而告终”。到西西里岛战役结束，德军在岛上的四个师全身而退，而当时凯塞林麾下只有两个师的兵力驻守意大利南部。

## 意大利的倒戈和德国的反政变

7月25日，墨索里尼被赶下台。尽管巴多里奥元帅(Marshal Badoglio)为



首的意大利新政府保证将继续忠于轴心国，希特勒还是立刻就预感到意大利早晚设法退出战争。希特勒马上采取应对措施。27日，希特勒命令驻扎在希腊的隆美尔B集团军负责意大利北部的防御，其借口是为了减轻意军的负担，这样就可以有更多的意军去解救祖国南部的燃眉之急。B集团军负责埃尔巴-安科纳(Elba-Ancona)线以北区域的防务。为了排兵布阵，从其他战线勉强抽调一些德军师，乘火车匆匆赶往意大利北部。

与此同时，施图登特和第二伞兵师飞往罗马附近的奥斯蒂亚(Ostia)。德方没有在事先将这次调防通知意大利，只是告诉意方第二伞兵师是用来增援西西里岛和卡拉布里亚的。然而施图登特却被告知“希特勒预料意大利新政府会向盟军投降”。他受命指挥从奥尔维耶托(Orvieto)地区移师罗马的第三装甲榴弹师，准备一旦意大利投降就马上收缴罗马周围意军的武器。凯塞林对希特勒和最高统帅部的提法持有异议，他坚信意大利的领导人将会继续忠于德国盟友。他悲叹“德国政府对巴多里奥政府极其冷淡的态度”，害怕这会促使意大利新政府对德国离心离德。他尤其担心德国的轻率举措会迫使意大利突然倒戈。8月初，凯塞林接到指令，如果意大利政府向盟军投降，他必须解除意军武装，将意大利军人全部关押起来。凯塞林争辩道，他兵力有限，难以完成如此重任。考虑到兵员、地域和盟军干预的危险，凯塞林的辩解不无道理。但是他没法改变上司的命令，他决定只在可行的范围尽其所能。

韦斯特法尔说凯塞林“决定只对那些紧邻德军据点的意大利空军加以监控，至于其他地区的意大利空军就顾不上那么多了。他委派德国驻意大利的海军指挥部尽可能运用有限的手段——E型军舰和U型军舰——来阻止亚得里亚海(Adriatic)港口内的意大利军舰逃离。他向为协调在南意大利的德军而刚刚组建的第十集团军司令部发出指令，关照他们行动必须看准形势因地制宜，尽量以温和的方式让他们放下武器，不要忘了他们毕竟是曾经的友军。凯塞林将军在事先唯一措词明确的命令就是：德国人决不能最先露出敌意”。

凯塞林面临的问题看来确实相当棘手。“在罗马地区就集结了五个以上的意大利师，德军最高指挥部和总司令曾经诱说意大利最高指挥部将这些部队派去增援南方前线，但意方不为所动。”巴多里奥宁肯让盟军进入，也不愿让德国人占领罗马。这是很自然的事情，因为他已在暗中和盟军协调停战事宜，准备倒戈。虽然凯塞林尚不知秘密谈判的详情，他也已经能够察觉到“罗马附近的意大利军队实力不凡，足以对德国第十军的后方交通构成严重威胁”。

艾森豪威尔(Eisenhower)一语中的：“意大利人迫不及待地想要投降。”但



不幸的是这种愿望没能及时成为现实,部分原因在于需要安排好防范措施,部分原因在于盟军“无条件投降”的要求让他们颇感为难。长期拖延不决对盟军和意大利都不利,双方终于在9月3日签订了停战协议。同一天,蒙哥马利率军穿过墨西拿海峡,在意大利的足尖登陆。停战协议一直秘而不宣,直到盟军在意大利半岛的“小腿”部(盟军选定萨莱诺湾)第二次登陆后才予以披露。他们准备同时在罗马空投一个师的盟军伞兵,帮助那里的意军起义。然而这个方案最终胎死腹中。9月8日午夜,在宣布意大利投降的几个小时前,盟军打响萨莱诺登陆战役,意大利领导人感到有点措手不及,他们向盟军抱怨准备工作尚未准备周全,于是取消了空降行动。停战协议也让德国大吃一惊,尽管萨莱诺方面情况危急,德军还是在罗马采取了迅速果断的行动。因为意大利人极其渴望停战,所以在盟军还没到场的时候,他们就先向德国人投降了!

如果意大利人作战也像演戏一样在行的话,事情的结局可能就大不一样了。在这场戏的序幕阶段,他们的表演相当出色,隐匿了真实的企图,蒙住了德国人。对于那几天发生的事情,韦斯特法尔有过相当生动的描述。“9月7日,意大利海军部长库尔唐(Count de Courten)上将造访凯塞林,通知他说8日或者9日意大利舰队将从斯佩齐亚(Spezia)出发,向英国地中海舰队挑战。他两眼噙着泪水表示,舰队此行将破釜沉舟,不成功,毋宁死。然后他详述了作战计划。”信誓旦旦的保证让德国人信以为真。次日,韦斯特法尔和图桑(Toussaint)将军一起驱车前往蒙特罗通多(Monterotondo)的意军司令部。“起初我们被罗马北面的意军关卡挡住去路,不过等了一个多小时后,就顺利抵达蒙特罗通多。罗阿塔将军热情地接待了我们。他和我深入探讨了意大利第七军和德国第十军在意南部联合作战的事宜。我们谈话的时候,上校冯·瓦尔登堡(von Waldenburg)打来电话,告诉我们广播已经宣布意大利向盟军投降的消息。……罗阿塔将军向我们担保,这只是敌方拙劣的宣传伎俩。他说意德两国仍将一如既往并肩作战。”

韦斯特法尔并没有完全听信意方的保证,傍晚他回到自己的指挥部,发现凯塞林已经向下属军官发出暗码“轴心”——这个事先安排的暗号表明意大利已经背叛轴心国,必须采取相应的行动。

德军各路指挥根据当时的形势和各自的处境分别采取了威逼利诱、软硬兼施的策略。在罗马,施图登特看到敌众我寡,断然采取突变的策略。“我派伞兵从天而降,突然占领意军司令部。不过这仅仅是局部的成功,我们在司令部的一处捕获了30个意军将领和150个下级军官。但其他人员却坚持不降。



早在前一天晚上，意军总参谋长就跟着国王和巴多里奥元帅一起逃之夭夭了。”

施图登特对停战宣言做出强硬反应，这似乎让意军将领大吃一惊，误认为施图登特兵力雄厚。巴多里奥元帅告诉我们，罗阿塔将军对他说，他已经命令卡尔博尼(Carboni)将军集中兵力，后撤到蒂沃利(Tivoli)，那里的地形有利于防守。此时意军将士已经无心恋战。后撤行动不仅将首都罗马拱手让给了德军，也为德意谈判扫清了道路。可以戴着天鹅绒手套来摆平此事，就不必再挥舞铁拳了。

故事的其余部分可以用韦斯特法尔的话来结束：

意军总司令无条件接受德国的投降建议，罗马周围地区完全恢复平静。第十军也再无供给线被切断之忧，驻意德军指挥部也终于摆脱将与昔日的友军兵戎相见的梦魇。意军投降后，士兵们就可以马上回家了。德方的这个承诺引起不小的反响，这有违希特勒的命令，希特勒曾下令将全体意军收为战俘。不过如果硬要执行希特勒的命令，意大利人肯定不会动心，不可能接受德国人提出的投降条件。

我们大为宽心的是罗马再也不会沦为战场。陆军元帅凯塞林在投降协议书许诺罗马将成为不设防城市。他保证只让警察来管理这个城市，用两个连的兵力来守卫电话通讯设施。德军信守承诺，直到最后退出意大利。意军投降后，德军又恢复了与最高统帅部的无线电联络，8日以后无线电联络一度中断。兵不血刃地解决意大利军队的另一结果是，可以马上从罗马通过公路向南方的第十军派去增援部队。原先对罗马附近情况的种种担忧统统烟消云散，这个结局真是再好不过了。

如果盟军登陆的同时，意军向盟军投降，最初的命令能否得以实施，意大利的局势能否摆平，甚至连德国最高统帅部在事先也显得信心不足。按照韦斯特法尔的说法：“最高统帅部私下已经对凯塞林的部队不抱希望。到8月，消息泄露，凯塞林元帅也得知此事。从8月份起，给我们的给养、人员、武器、装备全部断档，也证实了消息所言非虚。我军提出的所有要求都被最高统帅部搁置不理，并以‘视将情况而定’来搪塞。这种悲观的情绪很可能也影响到B军团在意大利北部的设防。他们进入亚平宁山脉的阵地，准备接纳逃脱盟军和意军夹击的德军。”



“陆军元帅凯塞林同样感到局势相当严重,但是他认为在一定的条件下,还是可以有所作为的——盟军登陆的地点越靠南就越有可乘之机。不过如果敌军从海上和空中在罗马地区全面登陆,那么第十军要逃脱被围歼的命运就难上加难了。我军在罗马附近的兵力实在有限,根本没法歼灭强大的意大利军队和击退登陆的盟军,更谈不上还要确保第十军后方的交通线。早在9月9日,意军就开始封锁通往那不勒斯的要道,也等于切断了第十军的给养,这当然让德军很不高兴,第十军没法在这种状态下长期坚持作战。9日和10日,盟军并没有在罗马附近的机场空降,这让德军总司令大大地松了一口气。在这些天里,我们每时每刻都在担心盟军会在意军的配合下从天而降。盟军空降肯定会让意军士气大增,对我军不满的意大利平民无疑也会因此大受鼓舞。”

凯塞林的结论可谓是一语中的:“如果盟军登陆地点不是在萨莱诺,而是在罗马附近空降或在就近的海岸登陆,我军就不得不乖乖地从意大利南部全线撤离。”

## 盟军登陆意大利

9月8日的后面几天,德军最为紧张,尤其是凯塞林,他的指挥部就设在罗马南面的弗拉斯卡蒂(Frascati)。他没有把握能使意军屈服,并解除他们的武装,他还得对付三个方面的进攻。当务之急是应对盟军在萨莱诺的大规模登陆。

由于情况不明,开头几天最令人心焦。德军在友邦的国土上作战,友军却突然倒戈,“战争的迷雾”顿时显得空前浓厚。且听韦斯特法尔的叙述:“总司令起初对萨莱诺的战况几乎一无所知。电话联系已经中断,电话通讯是由意大利邮电系统控制的。因为不允许我们检查意大利的电话设施,所以也没法马上修复电话线路。第十军新组建的通讯小组不熟悉南方的气候状况,所以无线电联络一开始也不行。在最初的那几天里,总司令对萨莱诺的战况感到心急如焚。”

他仅能得到的一条消息却使他更为焦虑。他得知英国第八军正在渐渐逼近,而由于汽油短缺和指挥失当,从卡拉布里亚撤回的德军没能及时赶到萨莱诺前线。

于是凯塞林“寻求别的途径来增援萨莱诺前线”。9日,韦斯特法尔电告



最高统帅部的约德尔,要求立刻将意大利北部曼托瓦(Mantua)附近的两个装甲师调来增援。“这些请求和我军直接向B集团军的求援都遭到拒绝,理由是这些部队就算赶来也已经太迟,而且B集团军也离不开这两个装甲师。”凯塞林和韦斯特法尔认为这些借口毫无道理。虽然曼托瓦离萨莱诺有450英里,他们估计两个师可以在13日赶到战场,而此时战斗尚胜负未决。“德国空军的劣势和缺乏压制敌舰炮火的手段是萨莱诺之战失利的两大主要因素,第三大因素是缺乏地面部队”。在韦斯特法尔看来“如果这两个师能及时出手,萨莱诺的战况很可能逆转。”韦斯特法尔说,因为没能满足增兵要求,后来约德尔曾向凯塞林表示悔意。

凯塞林和韦斯特法尔固然感到失去了在一开始就打败侵意盟军的机会,不过他们认为盟军也坐失了一次大好良机。凯塞林在评析这次战役时说:“盟军的作战部署自始至终表明其最高指挥部的主导思想就是稳中求胜,致使他们在战术运用和装备调配方面都采取相当保守的方法。所以尽管德军的侦察手段不足,情报稀缺,我还是可以算出对手下一步的战略或战术动向,尽我所能采取适当的应对措施。”

盟军在萨莱诺的主要登陆地点果然不出凯塞林所料,他以有限的兵力在关键地带加以阻击。虽然德军的力量尚不足以将盟军赶回海上,但毕竟遏制了其进攻的势头,没让它立刻构成极大的威胁。虽然英国第八集团军如期推进到意大利半岛的足尖,毕竟离德军距离尚远,没有构成即时的威胁。严重的威胁来自从塔兰托附近半岛之踵登陆的盟军,好在其实力不强,缺乏机动车辆,这个威胁也就自行消解了。

韦斯特法尔对我谈了他在“山的那一边”的看法:“如果盟军登陆地点不是萨莱诺,而是在位于罗马西北的奇维塔韦基亚(Civitavecchia)和话,将会对德军产生致命的打击。如果那样的话,只需几天的时间,罗马就会落入盟军之手。大家都明白驻守罗马的德军只有两个师,也没法迅速调集其他部队来加强防守。有五个意大利师在罗马作为内应,如果盟军从海上和空中发起进攻,72小时内肯定可占领罗马。攻克罗马不仅会产生巨大的政治影响,而且可以一举切断德军从卡拉布里亚撤退的五个师的供给线。同时在那不勒斯和萨莱诺以及周边道路重新布阵。这样盟军就能将罗马到佩斯卡拉(Pescara)一线以南的意大利领土尽收囊中。”

英国第八集团军长途跋涉穿越卡拉布里亚向意大利半岛的足尖进军,此举也遭到韦斯特法尔的批评,他指出意大利半岛之踵和亚得里亚海沿岸防守





薄弱大门洞开,如果英第八集团军取道于此,将取得更大的战果。“英国第八集团军本当集中兵力在塔兰托登陆,驻守在那里的德军只有一个伞兵师(下面仅有三个炮兵连!)。当然,如果能保证陆上供给来弥补港口设施的不足,最上策是在佩斯卡拉和安科纳一带登陆。由于德军兵力有限,罗马方面无法派兵抵抗。波河平原那边也无法迅速派出像样的部队。”

凯塞林和韦斯特法尔都认为盟军为了对付空袭,战术力求稳当,为此他们在战略上付出了沉重的代价。其实意大利南部的德国空军力量相当薄弱,盟军严加防范实属过虑。他们还认为盟军最高指挥部习惯于将进攻距离控制在空中掩护的范围内,这就简化了繁杂的防守问题,反而成全了守军。

意大利半岛以外的问题是已经派往撒丁岛和科西嘉岛的德军,意大利的投降让他们处于十分危险的境地。他们的成功脱身让凯塞林和韦斯特法尔感到又惊又喜。“从撒丁岛和科西嘉岛撤出的德军居然没有遭到敌人海军和空军的阻击,这简直是不可思议。三万多装备齐整的德军就这样安然无恙地撤回到了大陆。”韦斯特法尔进而指出:“面对敌军的海空优势,总司令非常清楚,要让那里的德军全身而退谈何容易。但令人惊讶的是居然没有遭到盟军的任何阻击。从两个岛上撤出的后方部队在科西嘉集结待命的时候情况比较危急,西西里岛撤退的成功经验再度得到应用。运兵北非时已经有了先例,大部分人员是通过空运来转移的。那次成功的撤退主要得归功于森格尔将军,他头脑清醒,指挥若定。”森格尔将军在西西里岛战役结束之前,一直负责那里的战事。第九十装甲榴弹师在比萨(Pisa)地区重整旗鼓,准备再战。这支部队的成功撤退对下一阶段意大利本岛之战的作用非同小可。

## 桑格罗之战

盟军第五集团军在萨莱诺登陆后牢牢地稳住了阵脚,但是接下来朝北向罗马的推进却十分缓慢。凯塞林不断对其进行阻击,最后在卡西诺附近的加里利亚诺迫使盟军止步不前。盟军对卡西诺发起的深秋攻势也没对德军的防守构成多大的威胁。

但是,蒙哥马利11月向桑格罗(Sangro)发起进攻的次日,在亚平宁山脉的另一边亚得里亚海岸却军情吃紧。盟军出动三个师和一个装甲旅向沿海地区发起攻击。韦斯特法尔说:“可以迎战的德军只有第六十五步兵师,它只有七个营和十二个炮兵连。在总攻开始的前一天,陆军元帅凯塞林和我刚刚视



察过这个师……斯大林格勒战后,这个师进行了重组,至今还没参加过实战,将士们斗志昂扬。但是它还不曾真正领教过敌军密集空袭和炮击的厉害,这种密集的炮火使守军在战场上寸步难行,而且完全压住了我军的火力。在空中和地面炮火的掩护下,英军一个营接着一个营前仆后继向前猛冲,这种战术简单实用,第六十五师被打得溃不成军。”

11月28日夜,总攻打响。“到第二天结束,第六十五师实质上已经不复存在。北上的道路已经洞开,至少通往安科纳的大路已无德军防守。”

“我们急忙从西线抽调第二十六装甲师,该师竭尽全力匆匆赶来,但在穿越山地的时候极易受空袭,耽搁了不少时间。从北方调来的第九十装甲榴弹师刚刚归我们指挥,它从北方赶来,一路上几经延误,没能及时赶到战场,师长和团长均被免职。”

“在这两个师抵达之前,英军第八集团军通往北方的道路完全畅通无阻。其进军的势头一度称得上所向披靡。在第九十装甲榴弹师没能填补缺口,让前线重新联为一体之前,我军的阵地还没法得到巩固。它在行军途中很容易被彻底打垮,但是英军没有抓住这个机会。这样我们便很快就化解了亚得里亚沿海的危机。”

## 战略的改变

在桑格罗和卡西诺的成功防守确定了一个战略决策,就在这些战斗刚刚开始之前,希特勒产生了这一想法。佛罗伦萨北部伊特鲁里亚(Etruscan)一带的亚平宁山脉峰峦起伏道路难行,希特勒和他的军事顾问过去一直认为唯有凭此天险才能阻止盟军的推进。一旦第十军退到那里,就马上划归隆美尔的B集团军,凯塞林的指挥权就此终止。

这个计划改变的经过颇为有趣,韦斯特法尔给我谈了其中的过程。

最高统帅部原来计划在幅员辽阔的亚平宁山脉排兵布阵,当得知意大利南部战况比预料更好后,他们就改变主意,打算将防线设在罗马东南部的狭窄地带。

他们之所以这样盘算,一个原因是想让盟军的空军基地尽量远离德国本土。另一个原因是最高统帅部起初估算这条靠南的防线只需要七个步兵师,在后方两翼再配备两个机动师作为战术后备就可以了。相比之



下,亚平宁防线则至少需要十二个步兵师。

10月份,有人请陆军元帅隆美尔谈谈他对这个问题的看法。隆美尔表示他在总体上反对这个计划,主要原因是从长远看这种尝试风险太大,他感到没有把握。如果实施这个计划,凯塞林仍将留在驻意德军最高指挥这个位子上。希特勒对此一直犹豫不决,部分原因是自从突尼斯失陷后,凯塞林已经失宠。凯塞林比较亲意,这也被认为不合适担任这个职位。不过这时也得听听凯塞林的意见。凯塞林声称他能够守住罗马以南的防线,他清醒地认识到这项任务的艰难,但是,作为一个空军将领,他深知意大利中部机场事关重大,决不能拱手让给盟军。除此而外,他还表示驻意德军兵力有限,很难守住亚平宁山脉一带的防线……凯塞林元帅深信在他选定的防线上,他有把握拒敌于亚平宁山脉之外,他保证至少可以坚守六到九个月。

时光一天天慢慢地流逝,11月份行将结束,希特勒依然举棋不定。后来他决定将意南部或全境的最高指挥权授予隆美尔,任命电报正在打印时,他又突然改变主意,转而任命凯塞林为全意最高军事指挥官,此项任命于11月21日生效。B集团军就此离开意大利战场,原来在意大利北部的德军改编为第十四军,归西南总司令指挥(或称C集团军),任命凯塞林元帅后改称此名。

此时,德军已经下决心让防线尽量靠南,坚守的时间越长越好。这条防线从东到西横贯卡西诺,称之为伯纳德(Bernard)防线(盟军将其称为冬季防线)。

在桑格罗防御战成功以后,希特勒甚至想在意大利发起反攻,其目的是重新夺取福贾的机场。希特勒之所以有这个打算,主要是因为盟军空袭德国南部的飞机就是从那里的空军基地起飞的。凯塞林提出如要发起攻势,至少还得增派三到四个装甲师和两个山地师。希特勒没法提供所需的兵力,这个计划只得作罢。

德军兵力的确不足,不仅师级部队少于盟军,人员和火力也远为逊色,要维持有效的防御谈何容易。德国步兵师的成员已从1939年的16000人减至12000人,实力大不如前。大炮和坦克也供不应求,尤其是空军力量最弱。更糟的是盟军进攻时,德国驻意空军“第二航空队”已经不属于凯塞林管辖。“那是因为戈林的要求,他远在东普鲁士,却自以为比空军出身、亲临战场的凯塞林更高明,认为他可以更有效地直接指挥第二航空队”。那时德国海军也拥



有自主权。虽然凭借凯塞林的个人威望和影响,他能够得到其他兵种较好的配合,但凯塞林和他的部下“还是非常羡慕敌方责权明晰的指挥体系——一个总司令负责一个战区,一切听从他的指挥”。

## 盟军登陆安齐奥

1944年1月22日,盟军一个军的兵力在罗马附近的安齐奥和内图诺(Nettuno)登陆,展开了一次大规模的海上侧翼包围行动。一开始他们运气不错。

韦斯法特尔讲述了事情的经过。“凯塞林元帅一直敦促空军必须时刻保护那不勒斯港口的航运,敌人在意大利西海岸的任何新的登陆行动显然都会以那里为起点。”几个月来,德国战机很少能飞越那不勒斯。由于恶劣天气和防空设施的强力干扰,德国战机即便飞越该地也很难拍到清晰的照片。不过,在1月初,侦察机终于拍到了港口清晰的照片。“我们由此看出新的登陆行动迫在眉睫。”德军马上拟定对策,凯塞林决定从东面战区的第十军抽调第二十九和第九十装甲榴弹师到罗马附近,作为后备力量严阵以待。

1月12日,盟军向西面的卡西诺进攻,到18日他们越过加里利亚诺,进一步加强攻势。德军指挥官担心盟军将突破到利里河(Liri)河谷,便要求借调两个后备师增援,并声称仅需几天就行了。凯塞林不太情愿批准这个请求,正巧此时他要接见来访的德国谍报局局长海军上将卡纳里斯。卡纳里斯在回答凯塞林的询问时保证“没有丝毫的迹象表明盟军会立刻发起新的登陆行动,那不勒斯港的运输状况一切正常”。所以尽管很犹豫,凯塞林还是同意了派遣增援部队。

英美联军在安齐奥登陆后,没有遭遇到任何抵抗,直到他们深入内地,为桥头堡构筑起一道防线,都没有发现任何德军。雅恩(Jahn)将军当时赶到该地,他告诉我:“盟军登陆时,那里的德军只有两个营。盟军可以轻而易举地抵达阿尔邦丘陵(Alban Hills)。”凯塞林的司令部就坐落在阿尔邦的山坡上,紧靠安齐奥到罗马的公路。韦斯特法尔说:“盟军登陆后的那几天,我们非常紧张。在敌人占据罗马东南的制高点之前,是否还有可能先派一部分兵力赶到那里?这个问题十分关键。任何理性思考所能得出的答案都是‘不可能’。在22日,甚至在23日,敌方只要派遣一支小分队,如一个加强侦察团,迅速突进,大胆攻击,就能轻易攻入不设防的罗马城内。甚至可以在22日轻取瓦尔



蒙托内(Valmontone),封锁卡西诺前线到罗马的公路和供给线。然而敌方却在登陆后止步不前了,贻误了大好时机,这就大大有利于我们采取应对措施。”

多亏事先有所准备,搞过应急预案,这些应对措施以极快的速度得到落实。德军事先就制定了反登陆战的方案,预测了五个可能登陆的地点,梳理了各条战线和地区的后备力量,随时准备开往登陆点。准备工作包括行军路标、中途加油以及穿过亚平宁山脉隘道时的破冰设备。

到25日傍晚,凯塞林和他的参谋们感到“罗马和瓦尔蒙托内被攻占的危急状况已经缓解。”直到30日,盟军才从前沿阵地发起进攻。尽管盟军指挥官这时拥有五个实力不凡的师,但是很容易遭到德军的阻击,到2月1日,盟军的攻势已如强弩之末。因为此时凯塞林已经集结了与敌方几乎相等的兵力,包括从意大利北方调来的一个师和从法国调来的一个师。第十四军司令冯·马肯森(Mackensen)将军和他的参谋也从北方赶来,亲自指挥作战。

此时希特勒迫切希望“尽早发起决定性的反攻,将敌人的登陆部队赶回大海”。他甚至不厌其烦亲自选定反攻的确切方向——集中攻击不超过四英里宽的区域。马肯森提出异议,认为范围过于狭窄,凯塞林也持相同的意见。约德尔回答说,希特勒“断然拒绝扩大进攻范围”。韦斯特法尔坦然承认,希特勒信心十足,凯塞林和他也多少受其影响,没能坚持自己本该坚持的反对意见。由于天气不好,空军又需要补充弹药,进攻一直延迟到2月16日,尽管如此,对盟军桥头堡的进攻一度构成极大的威胁,差点突破。盟军的空军发挥甚大的作用,使德军的攻势陷入僵局。29日,德军再次发起猛攻,但正如雅恩将军所言,“毫无希望”。结果盟军在安齐奥的桥头堡就像德军咽喉里的一根刺,最后终于从这里突破德军的防线。安齐奥登陆一个重要的间接后果是它打破了希特勒长期酝酿的方案,希特勒一直打算从意大利抽调五个精锐装甲师去法国,准备迎战盟军在西线的进攻。

尽管如此,盟军自安齐奥前沿阵地发起的进攻一开始便遭到阻击,这使盟军在意大利全面推进的时间大为延迟。2月,盟军从卡西诺的阵地发起的正面攻势再次受挫,伤亡惨重。3月,盟军发动第三次攻势,经过9天的激战,又以失败告终。此后,盟军最高指挥部决定暂停进攻,积蓄力量,准备在3月发起总攻。与此同时集中力量,用空袭来截断德军的供给线,以此削弱其阻击盟国夏季的防守力量。然而意大利战役的拖延不决消耗了盟军大量资源,本来他们可以将这些资源投入1944年的西线进攻。盟军进攻意大利所付出的代价要比德军防御所遭受的损失大得多。



本尼迪克特(本笃会)修道院(Benedictine Monastery)坐落在卡西诺山顶,是欧洲著名的古建筑,在盟军2月份发起的攻势中,修道院被炸毁,此事一直是人们热议的话题,现在应该可以作出历史的定论。事情是由美国大批轰炸机和地面炮火干的。当时盟军指挥部宣称,修道院位居通往市镇的要道,德军在寺院“修筑了工事,盘踞其中”,所以下令将其炸毁。陆军元帅梅特兰·威尔逊(Sir H. Maitland Wilson)在1946年发布的报告中重申了这种说法。但这种说法似乎与梵蒂冈和修道院院长早期提供的证词相抵牾。他们证明,虽然德军明知会不利于作战,还是没有贸然闯进修道院。我和森格尔讨论过此事,他曾对此事作过详细的笔录。当时森格尔在卡西诺指挥第十四装甲军团作战。“陆军元帅凯塞林下发紧急命令,德军将士不准擅自进入修道院,以免给盟军找到轰炸和炮击修道院的借口。我个人没法证明这个信息是否传达到盟国,但是我敢肯定梵蒂冈有途径做到这一点,因为它非常关注修道院的安危。陆军元帅凯塞林不仅下令严禁德国军人进入修道院,还派兵把守在修道院大门口,以确保命令得到落实。森格尔的叙述与我独自听到的其他当事人的证言完全吻合。

正如森格尔和菲廷霍夫(Vietinghoff)所言,具有讽刺意味的是炸毁修道院反而对德军的防御大为有利。这样德军就可以放开手脚在修道院的废墟上构筑工事,藏在破墙瓦砾背后要比躲在完好的修道院里更有保障。“任何有过巷战经验的人都知道,房屋倒塌后就从老鼠的陷阱转化成了防守的堡垒。”隐匿在废墟背后的排炮可以进行扫射,英军冲进卡西诺市区的企图被彻底粉碎。德军将领认为,要攻占卡西诺,只有展开大范围的侧翼包抄才能奏效。他们想不通盟军为何直到第四次卡西诺之战才采取这种战术。

## 舍弃罗马和退守亚平宁

盟军在兵力上占有优势,而且已经控制了安齐奥的侧翼。有鉴于此,德军比较明智的策略应是在盟军发起夏季攻势前主动退守到亚平宁山脉一带的防线。趁盟军显然有所懈怠之时,审时度势,主动后撤一步,这不仅能减少自己的损失和压力,而且能给盟军“占领”罗马后的嚣张气焰泼一盆冷水。更明智的策略是适度后退到罗马附近的临时阵地,而不是困守在卡西诺和加里利亚诺。这样才能减轻滞留在南部所造成的危险和压力,并有可能挫败盟军的夏季攻势。



然而德军既没有全线后撤,也没有局部后撤,他们为何没有主动后撤呢?当时强调的一个理由是,亚平宁山脉那边构筑的哥特防线(Gothic Line)远未完工。当在夏季攻势中受到重创狼狈不堪的德军退守亚平宁时,这里的工事也还没完工,但是身处逆境的德军还是在哥特防线挡住了盟军前进的步伐。不愿及时后撤的做法有其深层次的原因,它不是源于头脑,而是源于情感。韦斯特法尔对其上司凯塞林元帅极为崇拜,他这样说:“陆军元帅凯塞林意志坚强超乎常人,加上军人无私奉献的精神,这种性格的人凡事总是欲将有限的能量发挥到超过极致。所以我认为,直到战斗行将结束,元帅的内心仍执着于罗马不可失陷的信念。”其他德军将领也向我证实了韦斯特法尔的看法。如雅恩将军就曾声称:“我们的司令曾希望让盟军永远止步于卡西诺阵地之前。”

凯塞林的这种希望与希特勒的态度正相一致。希特勒后来一系列反对任何后撤的做法表明,他期望尽最大的努力保住现有的阵地,凯塞林深知希特勒在这个问题上的态度。不过正如事情所发生的那样,当时没人下令一定要坚守,是凯塞林本人坚信自己有能力守住阵地。早先出乎意料的战果更加强了他的信心。凯塞林认为盟军指挥马肯森比较悲观,这又强化了凯塞林自己的乐观情绪。这两人的性格截然不同,凯塞林认为以盟军现有的兵力足以战胜德军,但马肯森过于谨慎,缺乏自信。“这就使凯塞林对自己十四军所存在的焦虑和担忧掉以轻心。”韦斯特法尔进而指出,十四军的兵力看似充分,足以在安齐奥遏制盟军的攻势,但主要都是新兵组成的步兵师。而第十军的主体则是久经沙场的老兵。

尽管如此,若不是加里利亚诺那边的防线被盟军突破,安齐奥阵地所面临的危险未必能成为现实。朱安将军率领法国殖民地军团翻过大山,攻破了加里利亚诺的德军防线,这次间接的进攻使德军整个防线阵脚大乱。“山的那一边”的情报没能及时到达,使这次突袭更加令人猝不及防。凯塞林说:“不幸的是事后第三天我才得知遭到法国突袭。特别设置的‘紧急报告’系统瘫痪了。到第三天,已经来不及按计划派出增援部队赶到山上的阵地。”

法军的侧翼进攻动摇了德军在卡西诺的防线,随后盟军开始在安齐奥突破德军的前沿阵地。第十军指挥菲廷霍夫将军感到部队的供给线岌岌可危,建议迅速北撤至瓦尔蒙托内一线,以便和第十四军联手布防。然而即便在这个时候,希特勒还是严禁后撤,致使德军丧失了最后一次保住罗马南部阵地的机会。德军没能按计划撤退,它拉得过长的防线开始分崩离析,罗马城陷入敌手,德军长距离后撤到北方的哥特防线。第十军沿内陆的小路绕道而行,摆脱



了盟军的追击,第十四军则被打得落花流水。(有些德国军人伤心地抱怨,由于凯塞林将军要确保罗马古城的完好无损,致使部队惨遭重创。凯塞林下令不准炸毁台伯河上的桥梁,因为它们具有极高的历史价值。德军被捆住了手脚,盟军则乘虚而入。)即便如此,凯塞林还是顶住了盟军的追击,并在哥特防线迫使盟军止步不前。虽然由于西线和东线战场吃紧,部队的给养和后续日渐枯竭,凯塞林还是在哥特防线成功地坚守了一年之久,直到1945年4月。

## 德方眼中的盟军战略

韦斯特法尔给我谈了他和凯塞林的看法,他们认为在意大利战役中盟军本来可以采取更有效的战略战术。他说:

盟军在萨莱诺登陆后,接下来两栖作战的地点不应在安齐奥,而该选在离罗马尽量靠北的地方,如里窝那(Livorno)(来航)。那里到处都有便于登陆的地形。到1943年年底,盟军最高指挥部肯定已经了解在意大利北部的德军规模甚小,德军主力集中在罗马以南的前线。考虑到意大利德军的布防和德军的整体格局,无论是在意大利北方、罗马还是如里窝那之类的其他地方,在盟军登陆并巩固阵地之前,德军都没有能力进行强有力的反攻。

1944年春,在盟军5月大举进攻之前,形势非常有利于盟军采取登陆行动。当时除了两个师驻守里窝那,其余全部可供调动的部队都和第十军、第十四军在卡西诺和安齐奥前线。盟军的上策是用相应的兵力牵制这些德军,主力部队进行战略性的侧翼包抄,就能将驻意德军各个击破。

我想盟军可能是担心战线过于分散,唯恐在德军空袭下蒙受损失,所以不敢冒险采取这个策略。然而他们肯定知道,德国空军在北非战役中遭到重创后,已经几乎消失在战场上。那是因为空军缺乏训练有素的后备力量和梅塞施米特式109型战斗机质量太差,而且轰炸机也太少。

有鉴于此,我们的结论是如果盟军在里窝那和斯佩齐亚一带实施大规模的登陆行动,面对盟军的逼近和登陆,德军将无可奈何。而且敌军不仅可以顺利上岸,还能在德军赶来之前封锁亚平宁的要隘,从前沿阵地赶到新的登陆地点路程长达200英里,大多数德军得徒步前进。在我看来,





对登陆行动进行空中掩护也不难做到。飞机可以从航空母舰起飞,或者就从科西嘉岛起飞,从巴斯蒂亚(Bastia)到里窝那只不过80英里,战斗机只需一刻钟的时间就能飞到。这样的登陆行动将一举击溃德军在意大利中部的防线,极易给全体德军以致命的打击,很难想象哪个负责任的指挥官居然不敢采取如此轻松的登陆行动?

德军兵力不足,没法击退正面进攻和登陆行动,所以靠近德军前线的登陆行动也能使第十军和第十四军阵脚大乱。安齐奥东南的桥头堡是一个比较理想的登陆点,从那里登陆可以与进攻第十军的部队联手,截击第十军的右翼。另一个可行的登陆地点是台伯河河口,目的是从后面攻击第十四军。从罗马北面的奇维塔韦基亚登陆最具有威慑力。驻扎在那里兵力十分薄弱,增援部队若不能及时赶到,根本就别指望在那里构筑有效的前沿阵地。那里地势平坦,从格罗塞托(Grosseto)以北到里窝那都无险可守,那里的地形最适宜敌军登陆。说实在的,如果盟军马上发动登陆行动,我军唯一能进行有效阻击的地方恰恰是安齐奥前沿阵地的北面 and 南面。

## 漫长的最后阶段

当德军摆脱盟军的截击,最终抵达亚平宁北段山脉时,指挥官们大大地松了口气。盟军在诺曼底登陆后,8月又在法国南部登陆,这更让驻意德军如释重负。他们算准盟军不会再从他们背后的意大利北部发起登陆行动。他们对战争的结局已经不抱幻想,不过既然盟军已经收复法国,兵临莱茵河,意大利已成战争的死角,他们暂时就能苟延残喘,不会马上遭到灭顶之灾。

但是随着部队不断被抽调去加强莱茵河和东线阵地,应征入伍的新兵和装备日趋减少,轻松的情绪便渐渐烟消云散了。兵员缺口必须由新建的意大利师来填补,这些部队还是在德军占领意大利北部时,墨索里尼和格拉齐亚尼元帅征募组建的。那年冬季,蒂佩尔斯基希被派往意大利指挥第十四军,他告诉我当时只有两个德国师和四个意大利师,虽然这些意大利师要比曾在苏联作战的意军远为精干,但兵员匮乏已经到了危险的程度。第十军被抽调的兵力不多,但为新增兵员和装备严重不足而困扰。

雅恩将军对我作了意大利战役最后阶段的总结,他当时负责指挥德意联军。



为了抗击盟军的秋季攻势，我们打得十分艰苦，我军伤亡惨重。盟军最后几次进攻尤其危急，幸亏暴雨和大雪的帮忙，才让我们转危为安，勉强守住了阵地。1945年初，又有四个师被抽调到德国，这进一步削弱了我们的防守实力。连精锐部队“赫尔曼·戈林师”也被调去抗击苏联军队。

兵力不济的状况要求我们调整策略，撤退到阿尔卑斯山。但是最高统帅部却要我们尽可能晚点后撤，他们认为保住意大利北部至关重要，因为那里可以提供军火和粮食。不过早在10月份，就已经制定好计划，一旦盟军突破，德军就该撤退到阿尔卑斯山山脚。4月，盟军突破我军阵地，由于缺乏机动车辆和汽油，加上美军进军神速，这样的撤退已经不可能实现了。美军穿过科莫(Como)后，转向西面，切断了德军的后路。我们已与上级指挥部失去了联系，收不到任何命令，又没有飞机，德军等于成了瞎子和聋子。撤退的部队“在蓝天下”迷失了方向，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也不知道如何是好，直到命令我们投降！



## 第二十一章 诺曼底失陷

对英美而言,诺曼底登陆堪称冒险一搏。盟国方面有关诺曼底登陆的著述可谓是卷帙繁多。听一听“山的那一边”对此战的评述或许能让人耳目一新。诺曼底战役的第一个月,德方的总指挥是陆军元帅伦德施泰特,从1942年初开始,他就一直负责西线战场。他对我谈了自己的看法。第二个月,陆军元帅克卢格接替伦德施泰特,担任西线总指挥直到德军崩溃。诺曼底沦陷后,克卢格在绝望和对希特勒的恐惧中服毒自杀。他的参谋长布卢门特里特将军自始至终一直参与这个重大战役,他对两个阶段的情况作了详细的论述。

伦德施泰特和克卢格先后出任西线总指挥,诺曼底阻击战主要由隆美尔的B集团负责,防线从布列塔尼延伸到荷兰。隆美尔也死了,不过从他参谋们的叙述,再参照其他参战的高级将领的回忆,可以揭示出隆美尔在诺曼底战役中作用。

瓦尔利蒙特将军是幸存的最高统帅部高级军官,我可以从他的叙述中窥见希特勒和他随从的想法。

通过敌方的眼睛来考察一场战争是很有意思的事情。这与“倒看望远镜”最大的不同就是,它不是缩小景象,而是放大,场面之生动具有惊人的效果。

站在英国的海岸来看进攻,会感到任务十分艰巨。如果从法国的海岸来看进攻,也就是从敌方的视角来看,你就更易理解对方完全不同的感受。拥有制海权和制空权的强敌大军压境,“我要防守的海岸线长达3 000英里。”伦德施泰特告诉我,“从南面的意大利边境到北面的德国边境,驻守这条防线的兵力只有60个师。其中大多数不是精锐部队,有些只是弱旅残兵。”

从战略角度考虑,60个师根本没法“守住”3 000英里的防线,就算剔除必备的后援部队,平均每个师也得防守50英里。这个任务根本不可能完成。1914—1918年大战时,通常认为平均每个师至多只能防守3英里,才能顶住敌



人的强攻。此后随着现代防御能力的加强,一个师的防守范围可以扩大到两倍,乃至三倍。即便如此,区区这点兵力是绝对不可能保障如此漫长的防线。

可见只有猜准盟军可能登陆的地点才能进行有效的防守。那些不太可能作为登陆点的海岸只得任其置于几乎无兵驻防的境地,以加强那些有可能作为登陆点的海岸线的防守。即便如此,这些区域的防守还是显得力量单薄,因为必须在战区内配备增援部队,以便得知真正的登陆地点后进行反攻。

伦德施泰特和布卢门特里特向我强调指出,希特勒想当然地认为盟军可能在欧洲德占区的任何地方登陆,他对敌方船运的动向却往往不屑一顾,这让前线的将领们更加为难。

## 序 幕

我问伦德施泰特元帅,他是否曾预料盟军的进攻会比后来实际发动的时间更早。他回答:“1941年我军深入苏联境内时,你们没有发起进攻,这曾让我感到惊讶。不过当时我还在东线,对西线的局势不是很清楚。我到西线对情况有所了解后就不再认为盟军会过早发起进攻,我知道你们在兵力和武器装备上还没有做好充分的准备。”伦德施泰特的这番话与他1941年给希特勒的报告相吻合,当时他指出西线过于暴露,可能会让德国腹背受敌。他的警告让希特勒十分紧张,于是便将伦德施泰特派去负责西线战场。伦德施泰特所辖的区域从荷德边境延伸至法意边境。

有人认为1942年8月盟军在法国迪耶普的登陆预示着真正的反攻行动,伦德施泰特表示他不敢苟同,他认为那只是一次佯攻,以试探德军沿海防御的虚实。我问布卢门特里特如何看这个问题,他的回答略有不同。“当时我不在西线,9月底我接替蔡茨勒出任参谋长,到了西线后,听说了不少有关这次登陆的情况。德军指挥部也吃不准这是否仅仅是一次突袭,如果盟军一开始突袭成功,也可能会有大部队随后跟进。”看来当时蔡茨勒和凯特尔认为问题相当严重。正如本书第十七章所写,希特勒下令抽调两个精锐师前往西线,否则这两个师很可能扭转斯大林格勒战役的局面。

伦德施泰特继续说:“1943年,我们占领法国全境时,我预料盟军会进攻欧洲大陆。我以为你们会及时抓住机会,趁德军战线拉得过长而发起进攻。”

布卢门特里特对此作了补充说明:“1942年12月,盟军在法属北非登陆后,希特勒认定盟军会从北非进攻法国南部,元首于是命令我军进驻法国未占



领区。我们认为盟军会从地中海沿岸登陆，维希政府不会作出抵抗。我军顺利地进驻了法国全境，没有引起什么摩擦，只是游击队的行动导致了一些伤亡，这些行动已经开始令我们感到不安。在部队开进未占领区之前，伦德施泰特元帅只身先行一步，目的是与维希政府协商和平进驻事宜，从而避免双方不必要的损失。伦德施泰特此行成功地达到目的。”

## 1943年——“疑惑不安的一年”

布卢门特里特说：“5月突尼斯失陷之后，希特勒越来越担心盟军会在法国南部登陆。实际上那一年希特勒预测的登陆地点老是在变，他一会儿猜挪威，一会儿说是荷兰，一会儿又说在索姆河附近、诺曼底和布列塔尼、葡萄牙、西班牙、亚得里亚海沿岸。他的目光就这样老是在地图上扫来扫去。”

“他尤其担心盟军会采取钳形攻势，在法国南部和比斯开湾（Biscay）同时登陆。他还害怕盟军会一举占领地中海西部的巴利阿里群岛（Balearic），然后在巴塞罗那登陆，进而北上进入法国。他又恐怕盟军入侵西班牙，下令将精锐部队开往比利牛斯山脉，准备进行阻击。与此同时，他一直坚持严禁德军破坏西班牙的中立，任何行动都不准冒犯西班牙。”[但是，盖尔·冯·施韦朋堡告诉我，1943年4月，他在达克斯（Dax）指挥第八十六军团，当时该部队正驻扎在比利牛斯山脉（Pyrenees）。他接到命令准备快速挺进西班牙。该作战方案称为“吉塞拉行动（Operation Gisela）”。五个师中四个师配备了卡车和摩托车，准备实施盖尔所谓的“荒唐行动”。“其中一个师准备进军西班牙北部的毕尔巴鄂市（Bilbao），其余的部队展开扇形攻势，其左翼进军西班牙中部，目标是马德里。”]

布卢门特里特继续说：“对于希特勒的某些担忧，我们这些军人并不抱有同感。我们认为英军指挥部不可能派部队在比斯开湾登陆，因为这超过了英国战机对其实施空中掩护的距离。我们也有诸多理由排除盟军入侵西班牙的可能性，我们怀疑盟军会冒险挑起西班牙的敌意，无论在什么情况下，都不适于在这个国家展开大规模的军事行动。那里的交通设施极差，比利牛斯山脉障碍重重。而且我们和驻守比利牛斯边界线的西班牙军官关系不错，他们明白无误地让我们知道，如果德军入侵西班牙，他们将奋起抗击，同时他们又给我们提供有用的情报。”

不过，布卢门特里特继续说，德国将领虽然排除了希特勒所担忧的一些威



胁,但他们认为盟军肯定会在某个地点发起登陆行动。“这一年的种种迹象表明,盟军的进攻势在必行。整个1943年,有关进攻的传言甚嚣尘上。消息主要来自外交渠道——德国驻罗马尼亚、匈牙利和日本大使馆的武官,还有维希政府。”

看来谣言似乎要比刻意安排的骗局更能影响敌方将帅的思路。我曾问伦德施泰特,他是否预料过那年9月盟军会越过英吉利海峡发起登陆行动,当时我们精心策划了一次佯攻行动,调动大部队云集英国南部海岸,似乎要发动一场登陆行动。伦德施泰特微笑着说:“你们的举动太露骨了,显然是在虚张声势。”

那次过分的表演让德国将领松了口气,它表明盟军不会马上越海出击。秋风将起,这意味着在战争的风暴降临之前,驻守法国边境的德军还有一个冬季尚可苟且偷生,这让长期以来惊恐不安的德军略感放松。

总之,1943年可以概括为“疑惑不安的一年”,布卢门特里特说:“法国抵抗运动声势日壮,给德军造成很大伤亡。我们如坐针毡,日子越来越难过。抵抗运动在1942年还没达到高潮,那时抵抗组织分为三个派别——共产党、戴高乐主义者和吉劳德主义者(Giraudists)。三个组织相互敌视,还经常给我们提供对方活动的情报。但1943年三派联合起来了,英国人给他们发去指令,空降武器。”

## 改变防卫策略

在1943年期间,由于兵力不足,德军的防御计划一直在变。法国一直就像部队疗养院,那些在东线战场打得精疲力竭的师团往往被调回法国休养生息,整顿重组。布卢门特里特在谈及此事时说:“到1943年,先后有五六十个师调防法国,那些在苏联战场上损兵折将的师被频频撤回法国轮换休整。这样持续的轮岗不利于构筑有效的沿海防御体系。于是便成立了长期的海防部队,针对其特殊的战区,形成特殊的组织体系。这个体系的长处在于它能确保军队对所属防区十分熟悉,同时也能尽量利用西线有限的武器装备。但它有一个无法避免的弱点,部队的官兵大多年事已高,武器也不如一线部队。大多数武器是从法国、波兰和南斯拉夫缴获的,所用弹药规格不一,在紧要关头往往会供不应求,不像标准武器那么方便。大多数师只有两个步兵团,两个重炮连,共二十四门大炮。另外一个中型炮兵连,有十二门炮。这些大炮要靠马车



运输,机动性极差。”

“除了这些海防师,还有海岸炮兵部队。海岸炮兵部队无论是海军还是陆军均属海军司令部指挥,而海军司令部和陆军司令部常常意见相悖。”

那年年末,隆美尔将军来到西线视察,新的矛盾随之而来。此前隆美尔曾一度负责指挥驻意大利北部的德军,11月,希特勒委派他去视察并改进从丹麦到西班牙边界的沿海防御部署。圣诞之前,隆美尔结束丹麦之行,进入法国——这就进入了伦德施泰特统辖的地盘。隆美尔根据希特勒给他的特别指令行事,但希特勒又没有明确交代隆美尔和伦德施泰特之间的关系。两员大将之间的冲突自然难免,而两人观点的不一则必然使矛盾更为加剧。

布卢门特里特评论道:“不久,部队就不知该听伦德施泰特还是隆美尔的指挥,隆美尔要求他们处处设防。为了解决这个问题,伦德施泰特提出隆美尔负责从荷德边界到卢瓦尔河这片最重要的战区。布拉斯科夫斯基(Blaskowitz)将军负责从卢瓦尔河到阿尔卑斯山一带的南部防线。两人均隶属最高指挥伦德施泰特。隆美尔的B集团军驻扎在荷兰;第十五军防守从荷兰到塞纳河;第七军防守从塞纳河到卢瓦尔河一线。布拉斯科夫斯基的G集团军中的第一军负责比斯开湾和比利牛斯山,第十九军的防区为地中海沿岸。”

根据隆美尔的参谋所言,是隆美尔提出这个建议的,“因为只有这样才能尽快将他的想法付诸实施。”不管怎么说,在隆美尔来后一个月左右,这个方案得到了批准。虽然这使两位将领之间的关系多少有所缓和,但是由防御策略分歧所引起的矛盾并没有真正得到化解。

而且,新的部署又在部队内部引起新的矛盾。盖尔·冯·施韦朋堡刚刚被任命为“西线装甲集团”司令,那里所有的装甲部队本当归他指挥。他自然希望集中装甲部队的兵力,但是新的部署不仅削弱了他的权威,而且还引起了不同观念的冲突。隆美尔主张将装甲部队分散布防,这与盖尔的观念存在着本质分歧。盖尔是装甲战最早的领军人物之一,得到装甲部队总督察古德里安的支持。隆美尔过去也坚信集中兵力的作战原则,但认为现在情况有变,尤其是盟军掌握着制空权,这就迫使德军在实战中对原先的作战原则作出相应的调整。

两位坦克战专家的意见冲突让伦德施泰特处于两难的境地。他在战略直觉上比较倾向盖尔和古德里安,但是当必须决策时,他又不得不承认隆美尔的主张言之有据,他有与英美强敌实战的经验,盟军占有绝对的空中优势。而盖尔和古德里安主要在东线作战,那里空军的作用不是很大。人们常把这种冲



突说成是伦德施泰特与隆美尔之间的矛盾,其深层次的原因在于隆美尔与得到古德里安支持的盖尔在战略战术上的分歧,伦德施泰特只不过是一个仲裁者,何况他还要受到希特勒的制约和战况的影响。

伦德施泰特对我谈起过隆美尔,他说:“隆美尔是个勇士,擅长指挥一些小型战斗,但还算不上是一个卓越的高级将才。”(这种观点在德军高级将领中很有市场,不过我发现,隆美尔手下的军官和一些相当精干的参谋长对这种说法极为不满。)伦德施泰特对隆美尔的忠诚未加非议:“他总是不折不扣地执行我的命令。”

另一方面,那些对作战方案持有异议的将领则抱怨伦德施泰特优柔寡断。每当隆美尔的观点与他的看法相悖,并难免影响到他的决策时,伦德施泰特却不能断然加以否决。有些人认为伦德施泰特为人过于谨慎,唯恐干预下属的权限,所以总是犹豫不决。盖尔讲得更客气:“伦德施泰特的个性太软弱,不能坚持己见。面对各种冲突,他总是保持中立。结果在一些存在争议的问题上总是得不到明确的定论。航船东飘西荡没人把舵。”盖尔还说:“伦德施泰特是个绅士,既聪明又理智,但我平生在军界高层遇到过的最懒散的军人非他莫属。他不喜欢我‘无事生非’的性格。1944年,伦德施泰特已是将军老矣,身心俱疲之人,指挥作战难免无精打采。”

由于隆美尔的据理力争,伦德施泰特的某些举措会有所改变,盖尔对这些措施的评价可能过低了。隆美尔的参谋长施派德尔(Speidel)告诉我,伦德施泰特常会被隆美尔说服。盖尔也承认这一点,不过他认为这正表明伦德施泰特缺乏主见,“不能坚持自己原先的看法”。纵观所有的说法,除了一些其他的麻烦,伦德施泰特确实是有点身心俱疲。那种状态可以说明不少问题,但是这样一个疲惫的老人却能赢得众多部将的尊重,而且多数人认为他是不可替代的统帅,这显然表明伦德施泰特元帅具有非凡的人格魅力。随着战争的结束,他沦为囚犯,历经磨难,这种人格魅力再度闪烁出光芒。面对审判,他举止得体,给人留下深刻的印象。

在此,我不得不承认,与伦德施泰特接触的次數越多,他给我留下的印象越好。有许多事情都直接或间接地证明了这一点。资历不浅固然是他深孚众望的原因之一,但他能赢得众多囚犯由衷的爱戴靠的决不是资历。伦德施泰特的思想相当正统,这不光表现在军事领域,他精明强干又心细如发,这种气质使他显得卓绝不凡。他高贵而不高傲,举止谈吐无不让人感到什么才是纯正的贵族。





他的长相看似十分严肃,但不时会流露出可人的微笑和一丝幽默。有一次散步后回到他那狭窄的囚室,我们穿过布满铁丝网的大门,走进内院,来到囚室的前门,我示意他先进去,他却躬身微笑道:“哟,不,这可是我的寓所。”

## 在 哪 里?

到了1944年,大批美军被运往英国,显然主攻将从英国发起。但盟军将在法国哪个地方登陆仍难以确定。“几乎没有可靠的消息从英国传来,”布卢门特里特告诉我,“我们军方没法插手情报工作,德国情报机构完全由希特勒的最高统帅部控制,由党卫队保安处负责执行。我们的情报全靠他们提供。”

“他们笼统地告诉我们英美军队各自在英格兰南部集结的消息,在那里有为数不多的德国特工,他们通过无线电报将侦察到的情报发回国内,不过内容也就仅此而已。我们的空军太差劲了,飞越英国上空的侦察工作极为有限。不过在临近登陆日时,夜间侦察机报告发现大批盟军正运往西南沿海。飞机是根据夜间的车灯发现了这个情况。”(估计这些部队是美军,因为美军驻守在英格兰南方的西半区域。)“我们截获从英国军舰发出的电报也表明,英吉利海峡行将发生重大的事件。”

“另一个迹象来自法国的‘抵抗运动’日趋活跃。我们查获了几百台无线电报,破解了与英国联系的密码,内容虽然有点晦涩,大致的意思还是很明显的。”

“但是我们掌握的情报并不能确定具体的登陆地点。这个关键问题还得依靠我们主观判断。”

布卢门特里特接着说“德国海军参谋部一直坚持认为盟军将在一个大型港口附近登陆。他们预测盟军将会进攻法国北部的勒阿弗尔市,那是一个大港,而且有一个小型潜艇基地。我们陆军不同意这种看法。我们不信盟军会直接进攻这么一个严加防守的城市。而且我们还得到情报,英国南部正在进行大规模的军事演习,部队的登陆点是平坦开阔的海滩。”

“我们由此推断,盟军在一开始不会进攻港口城市。但是我们没想到,也没有任何报告,他们在搞一个代号‘桑树林’的人工码头。我们以为你们会将船横排,形成一个浮桥,将装备卸在海滩上。”

伦德施泰特坦然承认:“我以为反攻将从比较狭窄的地方通过海峡,会选择勒阿弗尔和加来之间,而不是卡昂和瑟堡之间。我预测登陆地点会在索姆



河入海口的一侧,首先在西侧的特雷波尔(Treport)和勒阿弗尔上岸,进而扩大到索姆河和加来一带。”

我问伦德施泰特他这样推断的理由。他回答:“从盟军的角度看,索姆河到加来一带对我们具有战略意义,因为那里离德国很近,是通往莱茵河的捷径。我估计你们四天就可以到达。”

这些理由表明伦德施泰特的推断是基于一种先入之见,即在理论上设定盟军会选择一条最佳路线,而无视其实际困难。我提醒他说,基于同样的理由,这条路线也很可能有重兵防守,当然这也恰恰说明了盟军很可能会避开这条路线。

他承认这一点,但是又说:“德军的防御能力被高估到荒唐的程度。所谓的‘大西洋屏障’纯粹是宣传机器捏造出来的幻觉,它不仅欺骗了盟军,也欺骗了德国人民。读到‘大西洋屏障’无懈可击的谎言就让我火冒三丈。希特勒从没来看过这究竟是怎么回事,战争期间他只来过一次英吉利海峡,那还是在1940年,当时他来到格里内角(Cap Gris Nez)。”我说:“就像拿破仑那样遥看英国海岸?”伦德施泰特脸含讽刺的微笑点了点头。

伦德施泰特继续说,他认为盟军将反攻索姆河-加来的另一个理由是因为那里架设着V型火箭,为了使伦敦免遭火箭的毁灭,英军不得不尽早攻击这个地区。他听说这些火箭威力之大超乎想象。希特勒对这种武器也抱有过分的期望,德国的战略部署因此受到影响。

然而正是希特勒猜中了盟军的登陆地点是诺曼底。布卢门特里特透露了这一点。“3月底,最高统帅部发来指令,预测诺曼底将遭到攻击。从此以后我们不断收到这种警告,开头总是‘元首担心……’,我也搞不明白是什么原因促使他得出这个结论。于是将第九十一空降师和一些坦克中队派往那里,作为后备军驻扎在卡朗唐(Carentan)附近瑟堡半岛的后面。”

隆美尔的参谋告诉我,隆美尔与伦德施泰特的看法相反,他也认为盟军会在诺曼底登陆。我问伦德施泰特和布卢门特里特,他们说确实是这样。隆美尔是在春季时逐渐改变看法的,他们不知道那是隆美尔自己作出的判断,还是因为希特勒不断发出“注意诺曼底”的预警。

希特勒的“直觉”一向备受嘲讽,可这次他比一流的将才算得更准。将领们往往易受正统军事理论的束缚,过于刻板。也许他们认定盟国的决策者也会恪守传统的战略战术,恰恰忽略了“出其不意”的制胜之道。

在回答我的有关问题时,伦德施泰特透露了一个重要的情况。“如果盟军



在法国西部的卢瓦尔河附近登陆,他们将轻而易举地获得成功,他们可以构筑开阔的前沿阵地,然后向内地进军。我连一个师的兵力都没法调到那里进行阻击。”布卢门特里特补充道:“在那里登陆的话,盟军根本不会遭到实质性的抵抗,只有三个师驻守在卢瓦尔河以南 300 英里的海岸,其中两个还是由新兵组成的训练师。连长要巡视本连的防区得驾着摩托在海岸上绕一天。我们认为卢瓦尔河一带离英国太远,超出了盟军空中掩护的范围。我们深知盟军指挥极其重视空中掩护,所以料定他们不会选中那里作为登陆点。”(我对他透露的情况特别感兴趣,我曾于 1944 年 1 月打过一份报告,建议盟军将卢瓦尔河口附近的西海岸作为登陆地点,“切实贯彻‘出其不意’的军事原则,打乱敌军的部署”。)

除了隆美尔,德军将领大都认为登陆点不会是诺曼底,更可能是在海峡较狭窄和更易实施空中掩护的地带。伦德施泰特也说:“我们以为进攻诺曼底的目的只是为了占领瑟堡,英军在卡昂附近登陆的可能性要大于美军登陆诺曼底。”

不妨听听瓦尔利蒙特将军从最高统帅部的视角所作的评述。“情报部门权欲熏心,惯于勾心斗角,结果总是铸成大错。从组建到 1944 年,‘对外事务和反情报处’隶属于最高统帅部,由海军上将卡纳里斯负责,他们收集情报,进行整理后提供给三军参考。这样一来,主要隶属于陆总的西线战场陆军作战参谋部还得依靠海军和空军的配合。1944 年初,希特勒下令解散卡纳里斯的反情报处,撤除卡纳里斯的职务,这主要出于政治因素。原有的情报部门并入第三帝国安全中心,其头目是党卫队保安处处长卡尔滕布伦内(Kaltenbrunner)。出于个人目的,卡尔滕布伦内常常避开正常的官方途径,将重要的或者他认为重要的情报直接递交希特勒或约德尔。这种‘体制’的必然结果是麻烦多,情报少。1944 年 6 月 5 日下午,卡尔滕布伦内认定他掌握的情报表明盟军入侵行动迫在眉睫,便通报约德尔。约德尔没当回事,至少他没通知参谋长和希特勒。”

“至于登陆地点,是希特勒首先提出诺曼底可能性最大。5 月 2 日,希特勒下令加强诺曼底一带的防空设施和反坦克装备。那是因为他得到英军活动的有关情报,盟军两支主力部队在那里集结,英军在东南方,美军在西南方。尤其是美军的行动让希特勒预测诺曼底的西面将遭到攻击。希特勒的推断除了根据盟军的活动情况,还在于他认定盟军首先需要夺取一个大港,其所处的位置要适于能迅速到位的短线防守。瑟堡和科唐坦半岛(Cotentin Peninsula)



正好符合这些条件。我们也吃不准希特勒是否言之有理,但他一直喋喋不休地咬定诺曼底,不断要求加强诺曼底的防御能力。我们军官根据军事常规运筹帷幄,希特勒则总是根据直觉进行决策。”

我对希特勒推断盟军登陆点的缘由特别感兴趣。我曾经建议登陆地点要出其不意,因此在3月中旬被召到战时内阁办公室,与伊斯梅(Ismay)将军和雅各布(Jacob)将军一起探讨此事。我指出英美军队在英国南部港口间的调动过于明显地暴露我军计划在瑟堡和塞纳河口之间登陆。奇怪的是德军将领居然没有像希特勒那样作出正确的判断,这个问题的症结不是所谓的直觉,而在于合理的推断。

瓦尔利蒙特继续说:“希特勒越来越坚信自己的判断,而且在诺曼底登陆之前和登陆以后很长时间内他都认定盟军还将在英吉利海峡发起第二次入侵。所以得在巴黎周围预备小股的增援部队以防西线入侵。为了加强诺曼底的防御能力就得向各地调集增援部队,但是除了新组建的第九十一空降师和一部分防空武器外,几乎无兵可调。这是生死攸关的问题,希特勒曾在我面前一再重申:‘如果我们没法阻止入侵,不能将敌人赶回大海,这场战争就输定了。’希特勒将希望全部寄托在隆美尔和他的装甲部队上,指望身经百战的德国将士能够挡住战绩平平的盟军战士,却没把盟军的空中优势考虑在内。”

然而正如瓦尔利蒙特所言,希特勒极为精明,他声称:“如果我们成功地打退了盟军的入侵,那么在短期内他们不可能马上卷土重来。这就意味着我们的后备部队可以腾出手来,转战意大利和东线。这样我们就能稳住东线战场,或许还能转守为攻。如果我们不能击退盟军,就不可能打赢一场持久战,因为我们所能提供给前线的资源远远不如敌方。我们赢不了一场持久战的另一个原因是,我们每后退一步,就意味着在法国的防线将拉得更宽。没有重要的战略后备力量,根本没法守住这么长的防线。所以必须坚决打败入侵者的第一次进攻。”

## 德军的部署

1944年4月,准确地说西线德军共有59个师,其中8个师在荷兰和比利时。一半以上为海防师或训练师。27个野战师中只有10个装甲师,其中3个在南方,1个在安特卫普附近。

在塞纳河以西长达200英里的诺曼底海岸有6个师驻守(其中4个是海



防师)。其中3个师驻守在瑟堡半岛,两个师驻守在从瑟堡到卡昂40英里的防线,也就是从维尔(Vire)到奥恩河(Orne)。一个师驻守在奥恩河到塞纳河一带。布卢门特里特说:“这样的部署与其说是‘防御’,不如说是‘防护’!由于我们预测盟军不会在瑟堡半岛西面登陆,所以那里的防守相当薄弱,甚至把从苏联招募来的杂牌军也派到那里。”

一个装甲师被部署在突出地带,准备进行反攻。那就是第二十一装甲师。“一直就第二十一装甲师的布防问题争论不休,”布卢门特里特说,“冯·伦德施泰特赞同将其部署在瑟堡半岛后面的圣洛(St. Lo)以南一带。隆美尔却主张将其部署在紧靠海岸的地方,在靠近卡昂一侧。这就意味着它靠海岸太近,难以作为整个地区的预备队。”

不过,事实证明将该师部署在卡昂附近至关重要,若非如此,英军在登陆的第一天就可能占领卡昂。隆美尔也曾恳求再派一个装甲师驻守维尔河口附近,但没有得到同意,美军就是在那里上岸的。

德军内部的尖锐分歧对防御计划产生重大的影响。伦德施泰特认为既然兵力有限,海岸线又如此之长,想要阻止盟军登陆是不可能的。所以他主张趁盟军上岸伊始阵脚未稳之时,发起强有力的反攻将其击退。如前所述,盖尔力挺伦德施泰特,认为这是符合坦克战的正确战略。

隆美尔则认为应当在敌人尚未完全上岸时,在海滩上将其击溃,这才是唯一的取胜之道。他经常对参谋说:“成败胜负取决于前24小时。”布卢门特里特虽然与隆美尔的观点并不一致,还是客观地解释了隆美尔的理由:“隆美尔在北非战场发现坦克部队喜欢在关键时刻从远距离发起反击。他认为如果现在按照总指挥的想法,将作为后备军的装甲部队部署在远离前线的内地,一旦它们要发起反击时很可能遭到盟军的空中阻击。”我从隆美尔的参谋那里得知,在北非战役的后期,隆美尔的装甲部队曾被敌人的空军死死咬住,好多天进军不利,对此他一直耿耿于怀。而如今盟军的空中力量比那时更为强大。

古德里安向我描述了他所看到的分歧所在:“1944年3月,在法国造访了盖尔将军之后,我向希特勒谈了隆美尔的防守策略,我对希特勒说,装甲部队紧靠前线不太安全,这会使它失去机动性。希特勒有些迟疑,命令我到法国去和隆美尔商讨。4月,我造访了隆美尔在拉罗什-基扬(La Roche-Guyon)的指挥部。隆美尔向我和盖尔将军明确地表示他的态度。”古德里安将隆美尔的观点归纳为,由于盟军掌有空中优势,德军的装甲部队无论是白天还是黑夜行动都会很困难。因此,隆美尔要将可以调动的装甲部队部署在海岸阵地,或者紧



靠在阵地背后。在商讨这个问题时，隆美尔认为盟军最可能登陆的地点是索姆河口，那里离英国距离较近，有利于通信联络。“我指出如果他预测的登陆地点有误，那么后备师的布防也将选错地点。”

古德里安继续说：“这次商讨没有结果。5月初我又去见希特勒，再次谈到这个问题，还是无功而返。希特勒赞同隆美尔的观点，他不愿否定战地指挥官的意见。见希特勒之前，我在巴黎先与陆军元帅伦德施泰特交换了意见。将近4月底时，隆美尔改变了原先的看法，转而预测盟军的登陆点可能是在诺曼底。但他显然没有对麾下装甲部队的位置作出相应的调整，致使在登陆点没能部署足够的后备部队。尽管盟军掌握制空权，实际上德军还是在日日夜夜地调动装甲部队，只是白天运兵确实损失很大。”（但是，伦德施泰特的参谋指出，晚上时间太短，运兵的路线受到限制。而且每次调动所耗费的时间都超过原先的预料。伦德施泰特本人也强调这一点。后面将有所涉及。）

由于古德里安没能说服希特勒，而伦德施泰特也开始倾向隆美尔的观点，盖尔决定亲自到最高统帅部申诉，反对隆美尔的方案。5月初，盖尔为此来到贝希特斯加登，声称首先应当将大部分装甲部队作为机动后备力量“雪藏在巴黎西北或南方的森林中，这样既可以免遭敌机的轰炸，当敌军深入法国境内时又可以从这里发起反攻。”盖尔的干预促使希特勒作出了致命的妥协，他下令将西线的四个装甲师作为战略后备力量划归最高统帅部指挥。这个决定造成了难以预见的后果。它削弱了隆美尔的实力，使他难以实施自己的方案。它又使伦德施泰特缺乏后备军的支援。而且它也没有让盖尔如愿以偿。伦德施泰特已经坚信要趁入侵者阵脚未稳，及时将其击退的重要性，同时他也没有放弃集中兵力进行反攻的信念，但是他没有后备力量来达到这两个目的。

由于希特勒不愿削减其他战区的兵力来提供西线所需的后备军，伦德施泰特看到唯一的办法就是大幅度收缩在法国的防线来集结兵力。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在隆美尔的鼓动下，他向希特勒提出了一个激进的方案。伦德施泰特告诉我说：“在盟军入侵之前，我就想将整个法国南部的防线撤至卢瓦尔河，将兵力集中起来，组成一个强大的机动部队，以便向盟军发起反攻。要打一次机动战，至少需要10到12个步兵师和3到4个装甲师。虽然我认为这是组成实力相当的后备军的唯一办法，但希特勒不愿听从我的建议。德国的报纸都在吹嘘什么‘伦德施泰特的中央集团军’，这全是胡扯——根本不存在这样一支军队。更糟的是，我根本没有权力指挥在法国的区区几个装甲师。没有希特勒的批准，我一个师都没法调动。”



隆美尔在实施他的“靠前”方案时也受到阻碍。那确实不是因为伦德施泰特从中作梗,而是因为最高统帅部组建预备师后,可以调配给他的装甲师就所剩无几了。他的防线从斯凯尔特河延伸到卢瓦尔河,却只有三个装甲师驻守其间,这点兵力去迎战入侵的强敌简直是杯水车薪。隆美尔将其中两个师部署在塞纳河的东边后,情况就更加不利了。既然隆美尔已经相信登陆点可能在塞纳河的西边,那他为什么不将兵力作相应的调动呢?那是因为隶属于最高统帅部的两个精锐装甲师已经作为后备军部署在诺曼底的后方,隆美尔指望他们会首先出兵相助。

伦德施泰特关注的是预测的登陆地点言之有理,所以他不顾盖尔的反,希望达到调动后备军的目的。在登陆日的最初几个小时内,伦德施泰特还希望通过最高统帅部下令调动后备师,但他发现很难得到批准。直到那天下午才同意了他的请求。(为了弥补失去的时间,命令精锐装甲师白天就从勒芒地区(Le Mans)出发,致使他们受到重创,延误了更长的时间。次日的进军情况更糟,一路上空袭不断,以至于部队戏称这条进军路线是“炸弹跑道”。)

盖尔说这次调兵事先没有通知他,直到命令下达后他才得知此事。于是他“吁请陆军元帅伦德施泰特暂缓调遣第二个师,至少要等到夜幕降临”,但是“伦德施泰特没有同意我的请求”。这支被炸得千疮百孔的部队的指挥是拜尔莱因,他说他当时提出等到黄昏再行动,但第七军的指挥多尔曼(Dollmann)坚持要他在下午5点钟就出发。

能否如盖尔所愿集中兵力进行大反攻,这一点颇令人置疑。但后备军远离前线无疑使隆美尔及时反攻的方案难以落实。前线的装甲部队严重不足,后方增援部队又迟迟拉不上来,在这种情况下,想要趁登陆的敌军阵脚未稳之时将其击溃谈何容易。

早期对沿海防御的忽视也使取胜的希望更为渺茫。隆美尔的参谋长告诉我,1944年春季,隆美尔曾正确地预测登陆地点,竭尽全力在诺曼底沿海设置水下障碍物,建造防空碉堡,布下雷区。在他来到战场的前三年,法国北部沿海地区布下地雷不到200万枚。在登陆日前几个月内,埋下的地雷增加了三倍,但离他的希望的5000万枚还差得远呢。德军在短期内没法完成大量的防御设施,这真是盟军的幸运。

伦德施泰特对我解释道:“缺少工兵和物资造成防御能力的下降。原先在法国的托德(Todt)工兵部队中大部分人被抽调到德国去抢修被空袭破坏的地方。海岸防御师驻守的范围也太广,通常超过40英里,致使一些必要的工作



难以落实。此外,缺少军用物资更是雪上加霜,由于盟军空袭不断地干扰,我方必备的物资在生产和运输上均受到极大影响。”

这还没包括隆美尔所抱怨的 1942 年到 1943 年对防御的忽略。至此问题症结还不是因为工作不力或不相信会有反攻,而是在于伦德施泰特和他的部下都是机动攻击战的倡导者,相当轻视静态防御,对构筑阵地防守根本没当回事。隆美尔的参谋就是这种观点,也与伦德施泰特所偏爱的以攻为守的作战风格不谋而合,当然也是盖尔一向力挺的。

总之,由于军方上层的意见冲突,加上希特勒对后备军的死不放手,德军的防御措施最终“两头落空”。法国被攻陷的主要原因与其说是因为盟军的突袭,不如说是因为德军防御措施的失当。

## 登 陆

布卢门特里特说:“有许多迹象表明入侵将临。法国境内的动乱构成严重的威胁,游击队的伏击和偷袭让我们损失惨重。许多装运物资和增援部队开往前线的火车出轨倾翻,法国和德国西部的铁轨,尤其是索姆河、塞纳河和卢瓦尔河上的桥梁均遭到有计划的轰炸,所有这些都是盟军空袭的目标。”

伦德施泰特强调:“虽然不知道盟军会在哪一天进攻,但那没多大关系,从 3 月起,我们时刻等待着这一天。”我问当暴风使登陆行动被迫推迟 24 小时,并差点被取消时,这是否诱使德方在这关键时刻有所放松。布卢门特里特答道:“没有,没什么影响,因为我们认为盟军肯定有不畏风浪的船只。所以我们一直提心吊胆,时时以防不测。”

伦德施泰特继续说:“登陆的时分确实出乎意料,因为海军参谋告诉我们登陆应在潮水高涨之时。盟军选择在退潮时登陆的一大优点是可以利用礁石作掩护,在很大程度上减少了伤亡。”

“登陆部队的规模倒在预料之中,实际上我们原先预料可能规模还要更大,因为我们得到的情报夸大了驻英美军的兵力。然而过高估计登陆部队的规模产生了一个间接的后果,那就是我们更倾向于在索姆河与加来地区会有第二次登陆行动。”

布卢门特里特从德军西线指挥部的角度向我讲述了登陆日的故事。西线指挥部位于巴黎西部的圣日耳曼(St. Germain)。(隆美尔的指挥部位于鲁昂和巴黎中间的拉罗什-基扬。)





6月5日下午9点刚过,我们截获一份英国发给法国抵抗运动组织的电报,从中推断出反攻迫在眉睫。我们的第十五军马上发出了“警报”。<sup>①</sup>真是倒霉,午夜刚过,就有消息传来,盟军伞兵开始空降。

至关重要的就是时间。可供调动的最近的增援部队是驻扎在巴黎西南的党卫队第一装甲军团。但是没有希特勒最高统帅部的命令,我们无权调动这支部队。早上4点,我就代表伦德施泰特打电话要求派出这支部队以加强隆美尔的攻击力。但是约德尔代表希特勒予以拒绝。他怀疑诺曼底登陆仅仅是一次佯攻,相信塞纳河以西将会遭到另一次进攻。这场口舌之争一直“打到”下午4点,总算答应我们的要求派出这支部队。

部队出动时又遭到新的麻烦,他们的大炮原来安放在塞纳河东岸,敌人的空军已经炸毁了桥梁。伦德施泰特和我亲眼看到有些大桥被炸得粉身碎骨。必须在巴黎南面绕个大圈才能将这些大炮运过塞纳河,一路上又遭到狂轰滥炸,耽搁了好多时间。这支增援部队整整花了两天总算到达目的地,准备出击。

到这个时候,盟军已经巩固了海岸阵地,及时反击的机会就此落空。德军装甲部队不再打算将敌军赶回大海,而是各自为战,力图阻止登陆者深入内地。

透露出来的两件事情令人吃惊,希特勒直到那天上午很晚的时候才得知入侵的消息,隆美尔又像在阿拉曼之战时一样,没有亲临战场。若非如此,德军的行动可能会更加迅速有力。

希特勒就像丘吉尔,喜欢熬夜,这个习惯搞得他的参谋们精疲力竭。他们又不能起得很晚,所以早上处理有关事务时总是显得昏昏欲睡。盟军登陆的那天早上,约德尔似乎不敢叫醒正在睡觉的希特勒,便自作主张拒绝了伦德施泰特的请求,没有出动隶属于最高统帅部的后备军。瓦尔利蒙特给我讲了布卢门特里特从法国来电话告知后发生的事情。他说自己“感到登陆行动未必真正已经开始”。中午时分,他们在奥地利萨尔茨堡(Salzburg)的克莱谢姆(Klessheim)就当前形势开会讨论。瓦尔利蒙特回忆希特勒走进房间时发出一阵怪笑,用一种相当冷僻的奥地利方言说:“哦!到底还是来了。”

---

<sup>①</sup> 根据第七军的档案,发出警报的时间是凌晨1点30分。



会议之后，希特勒批准伦德施泰特的请求，派出最高统帅部的增援部队。如果隆美尔没有离开诺曼底，增援部队可能会来得更早。布卢门特里特说：“隆美尔与最高统帅部关系十分密切，经常直接给希特勒打电话，而伦德施泰特却不行。在战争开始时，隆美尔就在最高统帅部工作，熟知那里的人脉关系。”

可是隆美尔在6月5日上午离开指挥部回了趟德国。布卢门特里特说：“最高统帅部‘默许’隆美尔回国给他妻子过生日。他驱车回家，他的家就在多瑙河(Danube)沿岸的乌尔姆。西线总指挥‘知道’这事。”但是，隆美尔的参谋长施派德尔说，隆美尔此行的目的是次日在贝希特斯加登觐见希特勒。“因为敌人掌有制空权，德军高级将领出行禁乘飞机，所以隆美尔才坐车回国。”6日早上6时，施派德尔告知在赫林根(Herrlingen)的隆美尔登陆已经开始。隆美尔马上赶回诺曼底，下午5时左右回到指挥部。在盟军登陆的最初12小时内，隆美尔却不在指挥部，很难评估这究竟造成多么严重的后果。虽然反击的措施早有安排并及时生效，不过如果隆美尔当时身处现场，他可能会加速行动，或采取其他措施。

那天德军的指挥系统肯定是出了某些故障。驻扎在卡昂和法莱斯(Falaise)之间的第二十一装甲师离战场最近。午夜盟军伞兵在卡昂海边登陆后，第二十一装甲师师长福伊希廷格尔(Feuchtinger)马上就知道了，但是直到早晨7时，他没有接到任何命令，只是通知他划归第七军指挥。(盖尔说，从2点15分起，第七军参谋部就“不断请求批准装甲部队立刻参战”。)

半小时前，福伊希廷格尔已经自行决定主动向奥恩河东岸进军，攻击那里的盟军伞兵。上午近10时，通知他部队转归第八十四集团军指挥，负责把守海岸地区，并接到第一个作战命令——向奥恩河西面的英国登陆部队发起攻击。(盖尔说，改变进攻方向的命令是由第八十四集团军发出的，这与第七军的意图相悖)。这就意味着福伊希廷格尔必须中止进攻伞兵部队(英国第六伞兵师)，转而将坦克开到河对岸。其目的是阻止入侵者(英军第三师和加拿大第三师)向卡昂进军，但是这却让他们失去了扫平奥恩河桥头堡的机会。

虽然到下午坦克突进到海岸的某些地区，但盟军已经在岸上站稳脚跟，德军欲将其赶下海的企图遭到挫败。德军的突击不仅为时已晚，而且规模太小，难以达到目的。第十二党卫队装甲师直到入夜才迟迟赶到，次日的进攻也因汽油短缺而大打折扣。利尔装甲师一直到6月8日才赶到。最关键的三天时间就这样贻误了。此后，由于防守海岸的步兵师被打得溃不成军，这三个装甲



师和其他后续部队忙于填补缺口，兵力都虚耗在分散的防线上。

如果将这三个装甲师集中起来，在敌军登陆的第一天就向奥恩河东西两面的盟军发起进攻，很可能在敌军的陆上据点尚未巩固之前就将其打垮。这是德军击退登陆部队唯一真正的机会。如今回过头来看就清楚了，只有全面实施隆美尔的方案，才能给德军带来唯一的希望。

我问伦德施泰特，登陆以后，他是否对打败反攻还抱有希望。他答道：“几天后就没希望了。盟军的空袭使我军处于瘫痪的状态，甚至在晚上也难以行动。他们将塞纳河和卢瓦尔河上的桥梁全部炸毁，将整个地区炸得千孔百疮。这极大地阻碍了后备部队的集中，部队赶到战场的时间要比我们事先预计的晚三到四倍。”

伦德施泰特补充道：“除了空袭，你们海军炮舰也极大地遏制了我军的反击。军舰大炮的射程和威力大大出乎我们的意料。”布卢门特里特指出，战后审讯他的陆军军官似乎也没有意识到海军炮火对德军的打击有多么严重。

不过还有一个原因致使德军行动迟缓。伦德施泰特和布卢门特里特说，到盟军登陆后的第二个星期，他们就确定原先预料在塞纳河以东的第二次登陆行动不会再发生。但是希特勒的指挥部却认定会有第二次登陆行动，不愿让他们将兵力从加来向东调往诺曼底，也不同意他们按自己的想法重组在诺曼底的德军。“处于绝望之中的陆军元帅伦德施泰特恳求希特勒到法国面谈。6月17日，伦德施泰特和隆美尔在苏瓦松与希特勒会见，他们力图让希特勒认清形势。虽然诺曼底的军事要地卡昂和圣洛还没易手，但显然没法长期固守。此时两位元帅已经达成共识，除了大范围撤退，没有任何办法可以扭转局势。他们也知道希特勒不会同意撤退。他们希望先从卡昂撤退，留下步兵防守奥恩河一线，将装甲部队撤回来进行休整重组。他们计划让装甲部队向瑟堡半岛的美军侧翼发起强有力的反击。

但是希特勒坚持不准撤退，“你们必须原地固守。”他甚至于不许我们按照自己认为的最佳方案来调动部队。

从第二个星期开始，元帅和我已经越来越清醒地认识到，我们没法将敌军赶回大海。但希特勒却依然认定有这种可能！由于他拒不修正自己的命令，德军只能在支离破碎的防线上死守。德军已经没有任何章法。我们只是绝望地执行希特勒的命令——不惜一切代价死守卡昂和阿夫朗什(Avranches)一线。



布卢门特里特不无同情地谈到部队所受的苦难,他说:“德军不像在一战时那么经得起炮火的打击。德国步兵在二战中的表现不如一战,士兵为自己的利益想得太多,不如一战时那么严守军纪服从命令。仓促扩军影响到部队的素质,没有时间来整饬军纪。”

在17日的会议上,希特勒无视两位元帅有关战场形势危急的警告,还让他们放心,说什么新式V型火箭,也就是所谓的飞弹,很快就能让这场战争一锤定音。昨天一早飞弹已经开始轰炸伦敦。两位元帅于是表示既然飞弹的威力如此之大,何不赶快用来对付在海滩上登陆的盟军,如果有技术上困难,那么就先攻击英国南部向法国运兵的港口。希特勒坚持先集中轰炸伦敦“以迫使英国求和”。隆美尔在分析了军情后表示应当尽快结束这场战争,希特勒打断他的话,驳斥道:“这不关你的事,还是管好自己的防线吧。”

伦德施泰特和隆美尔这次晋见元首的唯一所得就是希特勒答应到附近的前线会见一些指战员,亲自听听他们的意见。可是第二次电话通知说,希特勒已经在晚上回到贝希特斯加登。施派德尔告诉我,希特勒之所以急忙离开是因为一颗飞弹在苏瓦松指挥部附近爆炸。很可能这只是许多偏离目标的飞弹之一,但这让希特勒大惊失色,顿生疑虑。

6月最后一个星期,伦德施泰特和隆美尔再次去贝希特斯加登见希特勒,希望能让他正视现实,可结果还是无功而返。希特勒让他们等了好几个小时,会见时希特勒不谈别的,只是给两人拼命鼓气,加以训诫“在任何情况下,都要顶住”。

29日第二次会见不久,伦德施泰特就被暂时停职。“陆军元帅伦德施泰特直截了当地说,除非他有自主权,否则他没法执行命令。有鉴于此,加上伦德施泰特对战争的悲观论调,希特勒决定起用新的指挥官取而代之。他给元帅写了一封信,措词比较客气,说当前状况使他得出结论,最好还是有所改变。”

布卢门特里特说,伦德施泰特另一段直言不讳的话也促成了希特勒要他辞职的决定。凯特尔曾给伦德施泰特打电话询问他对军情的看法,听了伦德施泰特悲观论调后,便伤心地问:“我们该怎么办?”伦德施泰特斩钉截铁地说:“结束战争!除此以外你还能干什么?”

盖尔也被撤了职。他写过一份报告,由伦德施泰特批准并递交,强烈要求放弃卡昂,实施“机动防御”,同时声称由于最高统帅部死板的策略,德军装甲师正在“溶解”。对于这些直言不讳的批评和警告,希特勒恼怒万分,下令立



刻将盖尔解职。

## 前后夹击,德军崩溃

那时陆军元帅克卢格正巧来到希特勒的指挥部,克卢格在苏联的一次空难中受伤,有9个月的时间休假养病,但是东线局势危急,希特勒在7月初召他前来商讨对策。希特勒本来打算派克卢格去东线取代布施,担任中央集团军总司令。此时苏联刚好发起夏季攻势,东线战场岌岌可危。据布卢门特里特说,克卢格和希特勒在一起交谈时,凯特尔走了进来,将伦德施泰特在电话里说的话告诉了他。希特勒马上决定克卢格不再去东线,改为去西线当总指挥(任命莫德尔将军取代布施为东线总指挥)。虽然这是一时冲动下作出的决定,但希特勒早就打算一旦形势需要,就让克卢格代替伦德施泰特行使职权。

“陆军元帅克卢格是个精力充沛,进取心极强的军人,”布卢门特里特说,“他于7月6日来到位于圣日耳曼(St. Germain)的指挥部,作为西线总指挥走马上任。新官上任,一开始他情绪高昂,信心十足,确实很看好战争的前景。”

我们第一次谈话,他就责备我不应批准并向上递交隆美尔有关战局吃紧的报告。他说不应该将这种充满悲观论调的报告递交给元首,事先应当对其中的措词进行修饰。当时伦德施泰特还在圣日耳曼,克卢格抵达后,伦德施泰特还呆了三天。我将克卢格的话告诉伦德施泰特,他大为震惊,大声强调:“这样一份重要的报告必须原封不动递交上去,这样做完全正确。”

克卢格一开始显然以为我们对局势的描述过于悲观,但他很快便改变了看法。他习惯于上任后尽快亲临战场,他会见了第七装甲军司令豪塞尔(Hausser),第五装甲军司令埃贝巴赫(Eberbach)和其他一些兵团的指挥官,包括第一、第二党卫军军团的指挥官。这些人无不向他指出,形势十分严峻。几天下来,克卢格变得清醒了,经常沉默寡言。他的报告不再充满乐观的语调,这引起了希特勒的不快。

17日,隆美尔的汽车在路上遭到盟军飞机的袭击,他身受重伤。希特勒命令陆军元帅克卢格在担任西线总指挥的同时,负责指挥B集团军。



三天后,7月20日,希特勒在东普鲁士的指挥部内遭到暗算。密谋者的炸弹没能炸死希特勒,却对本已风声鹤唳的西线战场产生了可怕的影响。

那天陆军元帅克卢格在前线视察,我直到傍晚才联系上他。这时他已经得知了刺杀希特勒的事件——一开始说刺杀成功,后来又说希特勒还活着。克卢格告诉我一年前就有参与密谋的军官和他接触,他和他们见过两次,不过在第二次他表示自己不想参与密谋。然而他知道密谋仍在进行。元帅以前从没和我谈及此事,我对密谋也一无所知。

此后几天,盖世太保着手调查密谋,他们发现有关文件曾提及克卢格名字,于是他成为重点怀疑对象。接着发生的一件事又使情况变得更糟。巴顿将军从诺曼底突破后不久,在阿夫朗什的决战正在进行,陆军元帅克卢格却与指挥部失去联系达十二个小时。当时他到前线去了,被盟军强大的炮火困在那里。此时他的无线电报务员又被炸死了,他没法和外界联系。他在掩体中躲藏了好几个小时才出来,然后经过长途跋涉赶回指挥部。与此同时,我们也遭受着来自后方的“猛烈轰炸”。元帅的长时间“失踪”,立刻引起希特勒的疑心,他马上联想到密谋分子的文件。希特勒发来电报,严令“陆军元帅克卢格立刻离开阿夫朗什的战场,到第五装甲军战术指挥部负责指挥诺曼底的战斗”。<sup>①</sup>

后来我听说,希特勒之所以下这个命令是因为他怀疑元帅前往战场是为了与盟军联系,商讨投降事宜。元帅的最终归来并没能使希特勒就此息怒,从那天起,希特勒发给克卢格的命令措词都相当无礼,有时甚至还有污辱性的语言。元帅变得非常焦虑,他担心随时可能被逮捕,同时他也越来越明白,无论立下多少战功都无法来证明他的忠诚。

本来多少还有一些阻止盟军突破的机会,但这些事态致使局势更加恶化。在这危机四伏的时刻,陆军元帅克卢格忐忑不安,如坐针毡,他没法专注于前线的战事,常常得回头瞧瞧希特勒的最高统帅部会不会对他下手。

担心自己被牵涉到刺杀希特勒密谋事件的并非克卢格将军一人。这种恐惧感到处弥漫,在此后的几个星期乃至几个月内,高级军官几乎人人

---

<sup>①</sup> 施派德尔证实了这种说法,但是他说命令是要克卢格离开“法莱斯的包围圈”,时间则是8月12日。



自危,工作陷于瘫痪。以7月20日刺杀事件对德军将领的影响为主题,可以写成一本书。

巴顿将军从诺曼底突破后,西线处于崩溃状态,8月17日,陆军元帅莫德尔突然来到西线,出任总指挥。

莫德尔的到来是陆军元帅克卢格得到的第一个指挥易位的消息,突然替换指挥的做法成为一种惯例,此前在第十九军和第十五军都发生过突然撤换指挥的事情。当时陆军元帅克卢格正在拉罗什-基扬B集团军的指挥部。他在那里呆了24小时,向莫德尔元帅介绍军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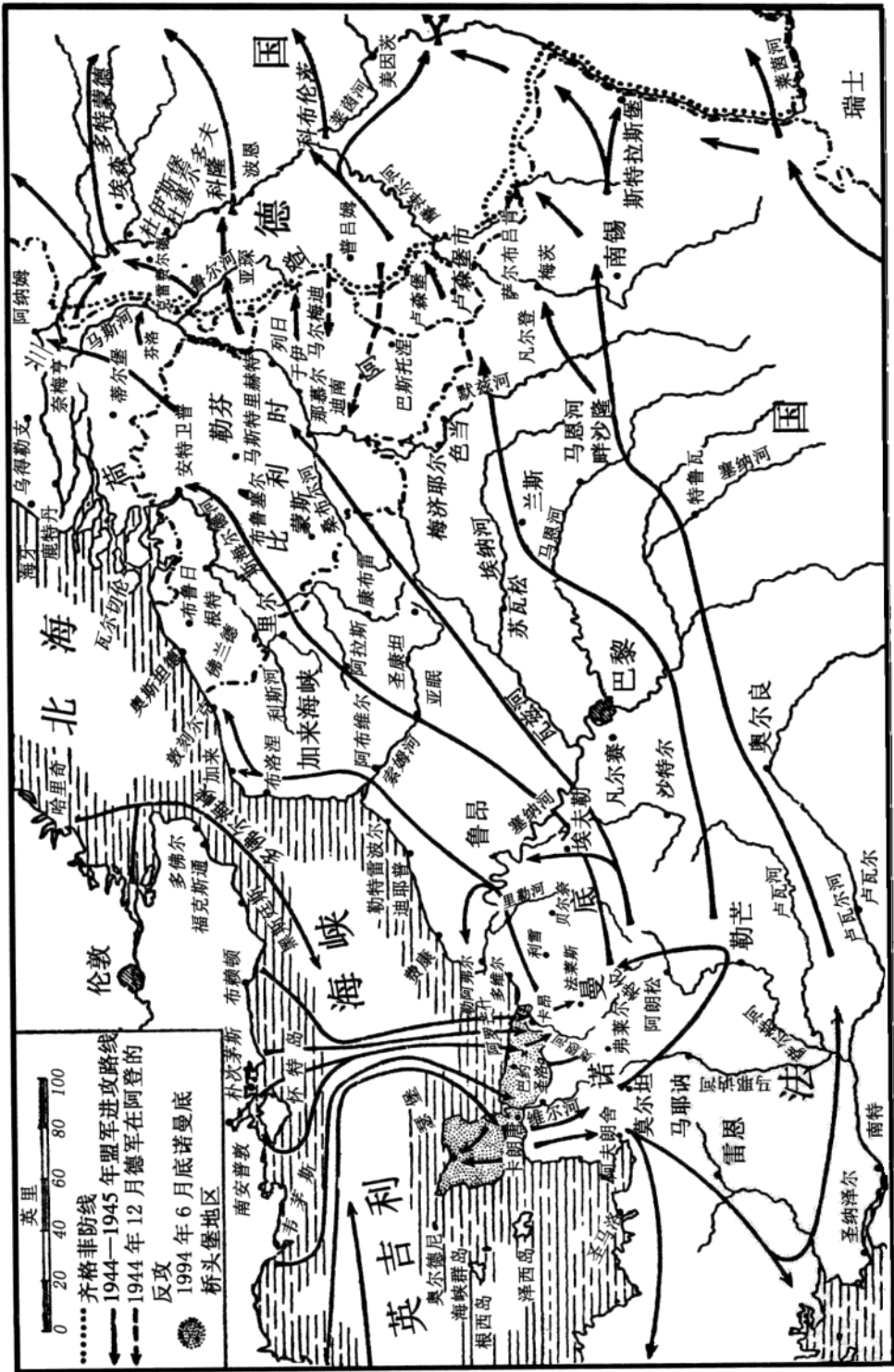
我从圣日耳曼赶到那里与克卢格告别,看到他独自一人。我走进屋子,他坐在桌子边,面前摊着一张军用地图。他不停地用手指敲击着“阿夫朗什”这个地名,巴顿就是在这里突破的,他对我说:“我作为军人,一生英名毁于此地。”我试图安慰他,但没什么用。他在房间内来回踱步,满面愁容,陷入沉思。他给我看元首来信,那是由莫德尔带来的。信的措词彬彬有礼,元首说紧张的战斗让元帅不堪重负,最好还是作些人事变动。但末尾的一句话暗示着一种不祥的兆头——“陆军元帅克卢格必须汇报自己在德国的行踪。”元帅对我说:“我已经给元首写了封信,把当前的军情和其他事务向他交代清楚”——但是他没有给我看这封信。<sup>①</sup>

陆军元帅克卢格次日就回家了。他离开的那天傍晚,从梅茨来电话说克卢格将军死于心脏病突发。两天后医疗报告称他死于脑溢血。后来听说要为他举行国葬,由陆军元帅伦德施泰特代表希特勒献花圈和致悼

---

<sup>①</sup> 后来在缴获的德国档案中发现了这封信。克卢格在表示接受撤职之后,承认主要是因为没能在阿夫朗什成功地阻击盟军的突破,接着写道:“当您读到这封信时……我已经不在人世。要说是因我的错误致使西线失守,我不能忍受这样的责备,也无从为自己申辩。成千上万的将士已经捐躯沙场,我决定与他们同赴黄泉。生命对我已经没什么意义,我心里明白谁将作为战犯被押上审判台。”接着他详解了阿夫朗什溃败的必然性,委婉地批评了希特勒没将隆美尔和克卢格在关键时刻发来的警告当回事。

“我们对军情的判断并非为悲观情绪所左右,而是基于客观事实的冷静分析。莫德尔元帅身经百战,我不知道他能否控制局势。我由衷地希望他能够力挽狂澜。但是,如果他也无能为力,如果您寄予厚望的新型武器不能成功,那么,我的元首,下决心停止战争吧。德国人民遭受的苦难一言难尽,这种惶恐的状态该结束了。肯定有办法达到结束战争的目的,首先要确保帝国不能匍匐在布尔什维克的脚下。”信的最后赞颂了希特勒的伟大,也表明克卢格的忠诚至死不渝。



西线 1944—1945年





词。突然又说不再举行国葬,然后我就听说尸检报告称陆军元帅克卢格是服毒自杀。像东线其他军官一样,克卢格随身携带含毒胶囊,准备在被苏军俘虏时服用,虽然许多人在被俘时并没服毒自杀。克卢格在车上吞了一颗毒丸,还没到梅茨就死了。我认为他自杀不是因为被撤职,而是他确信一回国就马上会被盖世太保逮捕。

克卢格是主动自杀,一个月后,隆美尔则是被迫吞食毒丸,当时他还没有完全康复。两个军官带着希特勒的命令来到隆美尔家,和他一起驱车外出。他们在车上向他出示了希特勒的命令,他必须自杀,否则将蒙辱受审,遭到处决。隆美尔肯定卷入了密谋,他早就明白西线毫无希望,并准备反戈一击。他的参谋告诉我,在盟军登陆之前,隆美尔就已经对防守丧失信心,并不断批评希特勒不切实际。

盟军在诺曼底成功构筑进攻据点后,隆美尔就对参谋说:“一切都完了。我们现在最好立刻结束战争,即使受英国人的统治,也比被无望的战争拖死要强。”知道希特勒是和平的主要障碍,隆美尔公开说唯一的办法就是除掉希特勒,向盟国靠拢。希特勒的宠将已经完全改变态度,这可非同小可。隆美尔为此丢了性命,要拯救德国为时已晚。

巴顿从诺曼底的桥头堡突破后,德军全线崩溃。布卢门特里特又透露了一个重要的情况。“希特勒和最高统帅部的参谋以为如果需要,德军会有时间后撤,并在后方建立新的防线,抱着这样的幻觉,他们便尽量推迟撤退。他们寄希望于英军的谨慎和美军的笨拙,但伦德施泰特将军的老朋友贝当(Pétain)元帅曾多次告诫,美军一旦有了经验,决不可低估其进军速度。战局的演变证明了这一点。最高统帅部指望的后防线尚未成形,就已经在巴顿一连串的侧翼进攻下分崩离析。”

瓦尔利蒙特从最高统帅部的角度对我详谈了最后关键时期希特勒指挥部的反应,所言所述让人明白了一些内情。

7月,希特勒承受着巨大的压力。苏军发起进攻,德国在东线的中央集团军随之瓦解。在东西两个战场,盟国首次在战略上协同作战,7月20日的刺杀事件更是雪上加霜。

在7月末的那些日子里,陆军元帅克卢格几乎每天早上10点左右都



会来电话,绘声绘色地告诉我诺曼底的情况日趋危急。他为什么向我说这些,却不向希特勒本人汇报或亲自告诉约德尔,我只能猜测。(约德尔为了适应希特勒的习惯,也经常工作到深夜。)我尽可能将克卢格的话仔细记录在案,送给约德尔,作为上呈希特勒的午间军情报告。在此之前,不会作出任何决定。

我很想飞到法国,亲自体验一下诺曼底的真实情况,但约德尔一直不同意。克卢格的电话内容促使我不断请求亲临法国,终于我被同意在8月1日去法国,那时盟军已经在阿夫朗什突破。

动身之前,我问约德尔,如果陆军元帅克卢格没能堵截阿夫朗什的缺口,对他下一步行动有何指示。与布卢门特里特的说法相反,最高统帅部曾多次讨论过这个问题。作为最高统帅部作战处处长助理,我每天向希特勒汇报战况,可时至今日,我对下一步的作战纲要依然毫无头绪,更不用说能得到一个直接的指令。约德尔平时沉默寡言,对我的问题也是避而不谈,但是他特意安排我晚上和希特勒会面。希特勒给我的指示十分简单:“你可以告诉陆军元帅克卢格,他的眼睛只要盯着前线就行了,后方任何事情都用不着他来操心,最高统帅部自有部署。”

8月1日晚,我在慕尼黑附近机场停留时,约德尔打来电话,关照我要特别留意西线高级军官对7月20日刺杀事件的态度。有些情况当时我一无所知,战后约德尔才告诉我,我一走,希特勒就将约德尔叫到他的屋子里,关照他立刻将我召回,希特勒怀疑我去见克卢格的目的是要重新策划反对他的阴谋。约德尔的劝解打消了希特勒的怀疑,并打电话要我注意军官们的动态,这才让希特勒放心。但是在离开统帅部的八天里,我得时时向约德尔汇报自己的行踪,最后他命令我立刻回去。

我在圣日耳曼停留片刻会晤布卢门特里特后,于8月2日下午来到克卢格位于拉罗什-基扬指挥部。诺曼底前线的情况日趋恶化,在诺曼底西南角,德军独立步兵营驻守着一条薄弱的防线,这些部队大多是从布列塔尼海防军调来的,兵力太弱,难以抵御来自半岛方面的进攻。在其他前沿阵地,尤其是卡昂周围,德军还在尽最后的努力,死守着支离破碎的防线。制空权完全为盟军所掌控。

早在8月3日我前往第七军之前,克卢格给我看了一份来自最高统帅部的电令,命令他由东向西发起反攻,夺回在阿夫朗什被盟军突破的阵地。这个决策固然不错,克卢格本人对此也早有考虑,可是因为兵力不



足,他还是放弃了。如今上面命令他进行反攻,却又不提供任何增援部队和供给。这再次证明了无论是发指示下命令,还是为达到目的配备必要的手段,希特勒都根本无视指挥作战的基本准则。

接到希特勒的命令,为了完成任务,克卢格一早就着手在诺曼底各个前沿阵地收罗部队准备反攻。在那些日子里,我欣喜地看到克卢格、豪塞尔、埃贝巴赫和芬克(Funk)在极其困难的情况下,积极准备反攻。他们一致认为此战将决定诺曼底前线德军的命运,各位都尽力而为。然而尽管他们作出极大的努力,无奈坦克和大炮实在太少,尤其是几乎完全丧失了制空权。

反攻开始之前,我已于8月7日前往东普鲁士。8月8日中午我回来时,反攻失利的消息已经传到指挥部。那天早上,希特勒派了最高统帅部的另一位军官带来命令,要克卢格在第一次进攻失败后,再准备发起第二次攻势,可还是没有给这支已经被打败的军队提供任何增援部队和武器装备。

新的作战方案基于如下设想,承认盟军在诺曼底的突破已不可阻挡,巴顿将会兵指巴黎。德军的意图是从阿夫朗什东部出动一支装甲部队,另一支部队则从法莱斯出发向马耶纳(Mayenne)进军,目的是打击向东迂回的美军的侧翼和后方。这种想法完全脱离实际,我认为克卢格不会把它当回事。况且命令还要求克卢格“等待”天气变化使盟军难以发挥其空中优势!

8月8日下午,在向希特勒汇报诺曼底之行的情况时,我特别强调,为争取阿夫朗什反攻的最终胜利,克卢格已经在他职权范围内尽了最大努力。希特勒神态不安地听着,没有插话,也没提问。我讲完后,他冷冷地说:“没能取得胜利,是因为克卢格根本不想取胜。”希特勒如此过激的议论给总司令和将领之间的关系蒙上了一层阴影。

德国最高指挥部认为,盟军的突破具有决定性的影响。所以在此有必要作一些补充,让曾经鏖战疆场的指挥官来谈谈事情的经过和他们的感受。

德军将领艾菲尔特(Elfeldt)向我生动地描述了美军突破阿夫朗什时的情况。当时他是驻守在瑟堡半岛的第八十四军指挥。盟军决定性攻势刚刚打响时,他才被派到那里。此前他是第四十七师的师长,驻守在加来和布伦涅战区。



记得是在7月28日,我接到命令立刻去陆军元帅克卢格的指挥部。到了那里后,他告诉我由我取代第八十四军指挥冯·肖尔蒂茨(Choltitz)将军。他说他不同意肖尔蒂茨的防守策略,但没说具体有哪些分歧。他告诉我这支部队是由七个师的残部拼凑而成的。他还说第一百十六装甲师将向西发起反攻,以减轻防守的压力,这个师也归我指挥。和元帅谈了一晚,次日早晨我便驱车前往勒芒,来到位于阿夫朗什以东10到15公里的第七军作战指挥部。有人将我带进军部,我记不起具体的位置,它藏身于远离村庄的树林中。一切都乱了套,盟国的空军在整个地区任意施虐。第二天,我去巡视部队。兵力实在太弱,阵地也是断断续续的。有些师仅剩300个步兵,大炮寥寥无几。

我下达的第一个命令是靠近阿夫朗什的拉西河(River La See)以南所有部队负责防守南岸,东面的部队继续坚守阵地,等到第一百十六装甲师抵达后,一起参加反攻。但是第一百十六装甲师并没有来,它在半路上转到别的地方去救急了。31日早上美军的坦克向布莱希(Brescy)发起进攻,冲到阿夫朗什以东15公里的拉西河。当时我的指挥部位于布莱希以北,差点就被美军的这次侧翼进攻分割。指挥部的成员整天都在前线作战,有幸的是这些美军冲劲不是很足。

在接下去的两天里,来了两个师的增援部队,第一百十六装甲师也赶到了,部队实力因此大增。我将另外七个师的残部组成一支部队。我命令部下阻止盟军在布莱希和维尔河之间的进一步突破,延迟美军从阿夫朗什向东南方的突破,因为由芬克将军率领的装甲军团很快就会发起反攻。埃贝巴赫第五装甲军的坦克也全被调来,增大了这次反攻的规模。

艾菲尔特继续详述了局势是如何恶化的。装甲部队没能攻到阿夫朗什,他的左翼反而渐渐被包围。他逐渐向东转移,从前沿阵地撤离的装甲部队引起了一些混乱,使撤退行动增加了难度。好在美军对他的正面和侧翼的压力尚未形成巨大的威胁——巴顿的第三军迂回的范围太大。

与我正面交锋的美军第一军在战术上并不十分机智,他们丧失了很多机会。有好几次他们本来能将我军分割开来。最可怕的是盟国的空军。

等到我们回到奥恩河,整个防线变得比以前更狭窄了。我的军部显得有点多余,就从前沿阵地暂时撤了下来。但是,第二天早上,加拿大军



向南突破,直奔法莱斯。我接到命令构筑防线加以阻击。可供调动的部队所剩无几,通信又完全中断。加拿大部队的炮火向我的指挥部猛烈轰击,大约发射了上千颗炮弹,幸运的是没造成多大的伤害。炮弹在我的小屋子周围四处开花,但没人受伤。在白天,我还能重新组织一条防线,不过在我的右翼以外,可以看到英军的坦克正开到迪沃河(Dives)的对岸,朝着特伦(Trun)方向进军。我们的退路被切断了。

第二天我接到命令跟在那些装甲部队的背后朝东北方向突围。我那里的英军太强大了,我们很快就明白突围是不可能的。于是我向第七军指挥豪塞尔将军建议将我的部队归伞兵部队的迈因德尔将军(Meindl)统一指挥。迈因德尔正率领伞兵部队在圣·兰伯特(St. Lambert)附近向东南方突围。在我看来,集中力量进行突围要比零零星星的小规模突破更有效。迈因德尔突围成功,但等到我第二天早上赶到圣·兰伯特,缺口又被封堵了。我用仅剩的兵力,两辆坦克和200个士兵发起进攻。一开始还不错,后来撞上了波兰第一装甲师。经过两个小时激战,我军弹药不济。后面的部队先投降,剩下我和几个战士被分割在前端,我们也不得不投降。波兰装甲师师长长相英俊,颇有绅士风度,他把最后一支烟给了我。他的部队处境也相当困难,连水也用完了——双方的窘境难分高下。

我乘机问艾菲尔特,德军士兵相比第一次世界大战表现如何。他的看法与布卢门特里特不同。

步兵和1914—1918年时一样优秀,炮兵比那时更强。武器更为先进,战术也大有长进。但还有些其他因素。在一战的最后两年,倾向和平的社会主义思想在部队中传播,影响了士气。在这次战争中,纳粹主义则反之——它能提升士气。

“比较一下两次大战中德军的军纪?”“这个问题不易回答。纳粹主义使将士更为狂热——这对纪律而言有利也有弊。官兵关系比1914—1918年时要好,这有利于维持纪律。官兵关系的改善一部分原因是国防军吸取1914—1918年的教训,加强了军纪教育。另一个原因是纳粹主义多少填平了官兵之间的鸿沟。普通士兵表现更为主动,比一战时更善于动脑子,尤其是在单兵作战或小组作战时。”在这点上,艾菲尔特的看法与英军指挥的评价不谋而合。



英军指挥官常说,德国士兵在单独或几个人作战时要比对手更厉害。这个评价与1914—1918年的经验相反,也与如今还在流传的观点不同,人们通常认为德国人擅长整体行动,独自发挥则稍逊一筹。因为纳粹主义十分强调集体本能,所以人们自然会设想,在纳粹主义下长大的一代德国人在战场上个人主观能动性肯定不如其父辈。我问艾菲尔特对此该作何解释。他说他本人也感到困惑难解,但又补充道,“可能是因为受过童子军训练的关系,这些年轻人都加入过‘希特勒青年团’组织。”

几天后我在和德军将领海因里希、勒里希特和贝希托尔斯海姆交谈时触及到比较两次大战中德国军人的优劣问题。海因里希认为第一次世界大战时的德军更为训练有素,纪律则未必比后来好。勒里希特和贝希托尔斯海姆同意他的看法。勒里希特补充道:“在波兰战役和西线战役之间,部队需要长时期的休整,以便加强训练,尤其是对军士的训练。作为总参军训部主任,我对这个问题有直接的感受。不过,二战后期德军的士气和纪律要好于一战后期。1916到1918年,军队的士气逐渐受到社会主义思想的侵袭,人们认为他们是在为皇帝当炮灰。这一次士兵坚信希特勒,面对各种困难,仍然保持必胜的信念。”

海因里希和贝希托尔斯海姆对这种说法表示赞同,勒里希特继续说:“然而,由于在战场上疲于奔命,加上党卫队抓捕了一些最优秀的军人,德军的士气逐渐低落。在东线,部队一直没有机会休息,难免大伤元气。”

在谈到纳粹主义对军队的影响时,勒里希特说:“其影响是比较复杂的。它带来一些问题,削弱了我们对士兵的控制。但它也强化了士兵的爱国激情,爱国精神比1914年时更深入人心,这次没有出现过去那种战争狂热。精神因素使他们在逆境中更富有韧性。”海因里希同意勒里希特的看法,同时强调指出个人崇拜的作用比制度更大。“无论你喜欢与否,部队对希特勒的极端信念是主导因素。”

德国将领对其西方对手看法如何?对此他们意见不一,我在谈话时,收集了一些这方面的内容。在谈到盟军指挥官时,伦德施泰特说:“蒙哥马利和巴顿是我遇到的最为杰出的将领。陆军元帅蒙哥马利作战中规中矩。”他补充道:“如果你有足够的兵力和足够的时间,这样做自然不错。”布卢门特里特也持同样的看法。他对巴顿将军的进军速度表示钦佩,他又说:“蒙哥马利元帅从没打过败仗。他的行动就像这样”——布卢门特里特小心翼翼地在地上踩了几步,步子很小,但每一步都很用力。



布卢门特里特还谈了他对英美军队的不同印象。他说：“美军进攻时充满激情，善于机动作战，但如果遭到猛烈的炮火，他们通常都会后退，哪怕已经获得成功的突破。相反，一旦被英军咬住，只要占领阵地达 24 小时以上，他们决不会轻易动摇。对英军进行反击总会让我军付出很大的代价。1944 年秋天，我的右翼对阵英军，左翼对阵美军，所以有很多机会观察这种有趣的差异。”

谈到德军在法国的阵地崩溃后的战略格局，布卢门特里特说：“盟军最佳策略是集中优势兵力，攻破亚琛到鲁尔河（Ruhr）的地区。无论是在战略上和政治上，最终目标无疑是柏林。德国的兵力主要部署在北方。南方并不受到重视。谁控制北部德国，谁就掌控了整个德国。一旦突破，加上盟军把握制空权，就能将德军脆弱的防线打得支离破碎，一举结束战争。盟军能在苏军之前抢占柏林和布拉格。在莱茵河背后没有德军设防，在 8 月底的时候，我军的防线几乎是大门洞开。”

“9 月，盟军在亚琛地区突破，这就更易攻克鲁尔，加速进军柏林。盟军部队从亚琛迅速北上，德军的第十五和第一伞兵军团就被钉死在马斯河（Maas，即默兹河）和莱茵河河口，没法向东逃回德国内地。”

布卢门特里特认为盟军的进攻拉得太开，兵力分布过于平均。他特别批评盟军对梅茨（Metz）的进攻。他指出在这里防守摩泽尔河（Moselle）沿线的德军要比其他地方守军更强。“没有必要直接进攻梅茨，可以对梅茨的堡垒围而不打。相反，如果朝北向卢森堡和比特堡（Bitburg）进军，就能大获全胜，击溃德军第一军的右翼，随后击溃第七军。以这样的北向侧翼运动将第七军分割包围，不使它逃往莱茵河后方。这样就能全歼莱茵河以西的德军残余的大部队。盟军进而向马格德堡（Magdeburg）和柏林发起主攻，与此同时，各路辅助进攻经过法兰克福（Frankfurt）、美因河（Main）和爱尔福特（Erfurt）向同一个方向汇聚。”

和我交谈过的德国将领都认为盟军最高指挥失去了一次极好的机会，否则在 1944 年秋就能结束战争。他们赞同蒙哥马利的观点，认为最佳策略是集中所有兵力，向北突破，直指柏林。

施图登特将军也强调这一点，他当时在防线的侧翼指挥所谓的“第一伞兵军团”。他说：“英军的坦克部队突然冲进安特卫普，这完全出乎元首指挥部的意料。这时无论是在西线还是德国境内，我们都没有像样的后备军可供调动。9 月 4 日，我出任位于艾伯特运河西线右侧阵地的指挥，手下的兵力只有一些新兵和残余部队，再加上一个从荷兰过来的海防师。后来才补充了一个装甲分遣队——只有 25 辆坦克和自行火炮！”他的防线却长达 100 英里。



## 第二十二章 西线指挥部眼中的刺杀希特勒密谋

7月21日密谋事件已被人们从多个角度谈起过,可是迄今尚未有人探讨过这个事件与军事问题的直接关系。炸弹在东普鲁士希特勒的指挥部爆炸,希特勒死里逃生。在柏林发生的一系列事件,以及密谋者在关键时刻如何没能抓住机会,整个事件的画面已经比较清晰。然而为使这幅画更为完整,就必须追溯那生死攸关的一天在西线指挥部里所发生的事。布卢门特里特将军详谈过此事件以及后来的反应,我作了很多记录。在此全文引述是很有价值的,这不仅是直接的证据,更在于它能传递出当时的真实氛围。

### 布卢门特里特的叙述

1944年头几个月,许多人造访过位于圣日耳曼的西线最高指挥部,在那里花了不少时间探讨战局。他们经常探讨的问题是元帅们是否应该联手向希特勒提出建议,敦促他向盟国求和。

3月底的一天,陆军元帅隆美尔在他的参谋长施派德尔的陪同下来到圣日耳曼。临走之前,施派德尔对我说,他有些话想和我私下谈谈。我们离开屋子,施派德尔对我说,他是代表隆美尔和我说话,他说:“现在我们必须告诉元首,这场战争已经没法再继续下去。”我们都认为此事应该先向陆军元帅伦德施泰特提出,于是便告知了伦德施泰特。我们发现他也持同样的看法。我们向最高统帅部发了一份电报,请求元首到圣日耳曼来视察,看看法国的形势有多么严峻。但是没有收到任何答复。

施派德尔将军为此事再来见我,在谈话时,他告诉我,国内有些人要对希特勒下手。他提到了陆军元帅冯·维茨莱本(Von Witzleben)、贝克将军、赫普纳将军和格德勒。他还说隆美尔元帅批给他几天假,让他到斯图加特(Stuttgart)和其他人商量此事——施派德尔和隆美尔都是符腾堡州人,与格德勒是





老相识。不过,在这次谈话中,施派德尔从没暗示过有人预谋刺杀希特勒。

伦德施泰特在与凯特尔通电话时语气激烈,坚持认为应当结束战争。后来克卢格便接替陆军元帅伦德施泰特成为西线总指挥。在此之前,密谋活动并无进一步的动作。有关指挥易人一事我还得多说几句。希特勒知道陆军元帅伦德施泰特在军界颇孚人望,连敌军也对他不无敬意。盟国的广播宣传经常暗示陆军元帅伦德施泰特及其部下与希特勒存在意见分歧。值得注意的是我们的指挥部从来没有遭受过盟军的空袭。陆军元帅本人也从未受到过法国抵抗运动的威胁。可能那是因为人们知道伦德施泰特主张善待法国人。德国特务向上汇报的这些情况自然会引起希特勒的注意。虽然希特勒表面对伦德施泰特元帅敬重有加,超过对其他的将领,但内心却时时加以提防。伦德施泰特强谏停战议和,希特勒便乘机将他解职。

陆军元帅克卢格于7月6日来到圣日耳曼。17日,陆军元帅隆美尔遇袭受伤。克卢格便赶到拉罗什-基扬的司令部,指挥那里的战斗。留下我在圣日耳曼负责。

## 7月20日

我最早得知谋杀希特勒的消息是在下午3点左右,是陆军上校芬克(Finck)告诉我的。六个星期前,他刚从东线调来西线。他走进我的屋子说:“将军,元首死了,盖世太保在柏林发动叛乱。”我大吃一惊,忙问他消息是从哪里来的。芬克说是军事督导冯·施蒂尔普纳格尔(von Stulpnagel)将军打电话告诉他的。

我想与在拉罗什-基扬司令部的陆军元帅克卢格取得联系,被告知他上前线去巡视了。于是我用十分谨慎的措辞在电话里对施派德尔说,出大事了,我将驱车前来亲自告诉他到底发生了什么。下午4时左右,我离开圣日耳曼,约在5:30分到达拉罗什-基扬。

陆军元帅克卢格刚刚回到那里。我走进他的房间时,看到克卢格面前放着一份电台广播的摘录,大意是说有人企图谋害希特勒,但是没有成功。克卢格告诉我此前他已经收到两次德国来的电话,但打电话的人没有透露身份,只是说:“元首已死,你必须作出抉择。”克卢格继续说,大约在一年前,维茨莱本、贝克和另外一些人曾到过他家,探听接近希特勒的途径,以及如何操作。他还说他有那次谈话的记录。



我们正在交谈时,从圣日耳曼有电话过来,说收到一份匿名电报声称希特勒已经死了。克卢格感到十分困惑,不知道哪个是真的,怀疑电台的报道会不会有假。谈了一会儿,我就给最高统帅部约德尔的副手瓦尔利蒙特将军打电话。打了好久才打通,只是说瓦尔利蒙特不在,他正和凯特尔在忙。

于是克卢格和我又一起商量,下一个电话该打给谁。我们打电话给驻巴黎的党卫队队长,他说除了广播中所说的消息,别的他一无所知。我们又给陆军总司令部的组织处长施蒂夫(Stieff)将军打电话。我和施蒂夫很熟,但并不知道他是密谋的核心人员,直到事后才知道。施蒂夫马上就问:“你们是从哪里知道元首已经死了?”他又说:“元首安然无恙,精神也很好。”说完就挂了电话。打完这个电话,我们深感不安,意识到情况扑朔迷离。

施蒂夫的回答和态度如此怪异,这只能说明一个问题。我对克卢格说:“这是一次失败的谋杀行动。”克卢格告诉我,如果密谋成功,他要做的第一步是下令停止 V1 型导弹对英国的轰击,第二步是与盟军的指挥官取得联系。

克卢格指示我打电话给施蒂尔普纳格尔将军,叫他到拉罗什-基扬来。我同时也通知了西线空军指挥施佩勒尔元帅前来。

下午 7:30 分,施蒂尔普纳格尔将军先到,陪同他的是陆军中校霍法克(Hoffacker)。他俩和克卢格元帅、施派德尔和我一起围桌而坐。如今幸存在世的只有我和施派德尔了。施蒂尔普纳格尔将军先说:“让霍法克中校来解释吧。”我们很快就明白,霍法克对刺杀希特勒密谋早就一清二楚,他负责施蒂尔普纳格尔和维茨莱本之间的联络。他追溯了密谋的来龙去脉,一开始只是打算向希特勒请愿,要求他停止战争。后来认识到希特勒不可能听从求和的意见,盟军也不可能接受希特勒的议和请求。事态就演变成军事政变了。他给我们详述了冯·施陶芬贝格(Von Stauffenberg)是如何策划并实施这场密谋的。

他讲完以后,克卢格失望地说:“先生们,密谋失败了。一切都完了。”施蒂尔普纳格尔尖声叫道:“元帅,我看你了解整个密谋,你必须有所行动。”克卢格答道:“啥都别想干成,元首还活着。”我注意到施蒂尔普纳格尔将军脸色一沉,起身走向阳台。回来后,他就几乎一言不发了。

施佩勒尔元帅到达后只呆了几分钟。他拒绝了克卢格请他共进晚餐的邀请。我感到施佩勒尔不想参与我们的谈话,或者说他不愿卷入此事,免得以后说不清楚。



我们其余的人就去吃晚餐。克卢格似乎显得很轻松,无忧无虑的样子。施蒂尔普纳格尔则闷闷不乐沉默寡言。过了一会儿,他对克卢格说:“我能和你私下再谈一下吗?”克卢格表示同意,又对我说,“你也一起去吧。”我们走进一个小房间,施蒂尔普纳格尔告诉我他离开巴黎前已经采取了“先期防范措施”。克卢格惊叫道:“老天爷呀!你都干了些什么?”“我下令逮捕巴黎所有的党卫队队员。”他指的不是武装党卫队,而是指党卫队保安处。

克卢格拉高嗓音说:“可没我的命令你不能那样做。”施蒂尔普纳格尔答道:“我下午给你打过电话,可你不在指挥部,所以我只能自作主张。”克卢格说:“好吧,那你自己负责。”后来他们没再来吃晚饭。

克卢格叫我打电话给施蒂尔普纳格尔的参谋长询问是否确实已经采取逮捕党卫队员的行动。接电话的是上校林斯托(Linstow),他现在也死了<sup>①</sup>。他告诉我,已经采取行动,并说,“没法加以阻止”。克卢格便对施蒂尔普纳格尔说:“你瞧瞧,你现在最好是换身便服,躲藏起来。”他命令施蒂尔普纳格尔立刻释放已被捕的党卫队成员。

施蒂尔普纳格尔走后,我对克卢格说:“我们应当帮他一把。”克卢格想了想,叫我驾车去追赶施蒂尔普纳格尔,劝他在巴黎隐藏一些日子。严格地说,克卢格应该将他逮捕。

我开车到圣日耳曼。刚到那里,参谋便拿来许多我离开时来的电报。其中一份电报来自陆军元帅凯特尔,说所有有关元首已死的报道全是误传。根据误传所发的命令均属无效。另一封电报来自弗罗姆将军,声称希姆莱已经从他那里接管了国内军队的指挥权。希特勒不再相信国内任何一位将领。第三封电报是希姆莱打来的,只是通知说他已经接管境内军队的指挥权。我在看电报时,西线海军总司令克朗克(Krancke)上将打来电话,问我能否到巴黎去见他。克卢格元帅没想到叫他来参加会谈。

午夜1时左右,我出发前往巴黎。到了后,发现海军司令部的成员都聚集在那里。克朗克上将给我看陆军元帅维茨莱本发来的电报,内容很长,说元首已经死了,他正在着手组建临时新政府。于是克朗克便给最高统帅部打电话,正巧接电话的是海军上将德尼茨。德尼茨说电报所言都不真实。

然后我来到党卫队保安处。他们都刚刚从牢中释放出来。一碰到我,那些官员就问究竟发生了什么事,为什么无缘无故把他们给抓了。他们的举止

<sup>①</sup> 布卢门特里特在叙述时不时会插入“死了”一词。



颇为得体,表示愿意尽快息事宁人。我问秘密警察的头目奥贝格(Oberg)现在人在哪里。他们说奥贝格和施蒂尔普纳格尔在一家旅馆里。

凌晨2点,我来到那家旅馆,那里好像正在举行舞会,德国驻法大使阿贝茨(Abetz)也在那里。奥贝格把我拉到一边,带进另一个房间,说他也搞不清事情的内幕,不过我们必须就下一步行动达成共识。我必须承认奥贝格的态度始终非常配合,为了军队的稳定尽量平息事态。他建议将实施逮捕行动的部队软禁在营房里,告诉他们这不过是一次演习。施蒂尔普纳格尔认为难免走漏消息。于是我向他传达了克卢格的建议,劝他先躲藏起来。但是当我回到圣日耳曼时,就看到最高统帅部来电,命令施蒂尔普纳格尔立即去柏林递交一份报告。

那天下午,施蒂尔普纳格尔驱车前往柏林,路经凡尔登和梅茨。除了司机,还派了一名军人护送,以防法国游击队。车子即将抵达凡尔登时,施蒂尔普纳格尔下令停车,说是马上就要进入游击队活动区域,最好先下车,朝树上打几枪,试试手枪有没有故障。上车开到凡尔登旧战场时,他又下令停车,一战时他曾在这里打过仗,说是故地重游,要陪他们到处看看。走了一小段路后,施蒂尔普纳格尔对他们说:“你们就在这里呆一会儿,我独自到前面一个地方看看。他们建议一起去,怕万一碰见游击队。但他说没必要一起去。过了一会儿,他们听到一声枪响,跑过去看到他浮在运河上。入水前他先朝自己开了一枪,打算如果没能一枪毙命就会淹死。但是自杀没有成功。两个人将他救上岸,送进了医院。子弹打瞎了一只眼睛,另一只因伤势过重也得摘除。

奥贝格对我讲了这些详细情况。他认为施蒂尔普纳格尔很可能卷入了谋杀希特勒事件。奥贝格曾驾车去医院看望施蒂尔普纳格尔,对平息事态还抱有一线希望。他告诉我,施蒂尔普纳格尔拒绝说话。住院两周后,上面命令将他转移到柏林,对他进行了审判,处以绞刑。

与此同时,在巴黎的德军军官人人自危,唯恐会成为怀疑对象。奥贝格收到许多电报要他逮捕各种各样的人。最先是霍法克,接着是芬克,总共逮捕了三四十人,有军人,也有平民。几天后,奥贝格来电话要我去见他。他告诉我霍法克在预审时提到了克卢格。奥贝格说,他不相信克卢格会参与密谋。

我陪同奥贝格去见克卢格,向他汇报有关事态。克卢格对奥贝格说:“就按照你的职责进行这次审问吧。”奥贝格对我说,他并不喜欢这样做,但也没法



推辞,希望能用尽量温和的方式进行审问。因此他安排我的一个下属军官列席审讯。在此有必要提一下,无论是我还是施派德尔,都没对7月20日傍晚的那次会议向任何人吐露过只字片言。

此后不久,克卢格去巴黎的医院看望隆美尔。回来时他告诉我,隆美尔的态度与敦促希特勒求和时截然不同,他对刺杀希特勒表示大为震惊。

在以后的那些日子里,我发现克卢格越发显得忧心忡忡。他经常谈起他自己和一些与他有关的事情。有一次他忧郁地说:“事有必然,听天由命吧。”后来陆军元帅莫德尔突然前来取代克卢格的职位。如前所述,在回家的途中,他服毒自尽,死在车中。

除了7月20日傍晚的那次谈话,克卢格从来没有向我提到过推翻希特勒的密谋。我于1942年1月调离克卢格的班子,直到1944年7月前,与他没有密切的接触。冯·特雷斯科(Von Tresckow)将军曾经担任克卢格的参谋长,也许他更受元帅的信任,但是他也已经死了。<sup>①</sup>1945年5月德国投降后,我和登普西(Dempsey)将军在石勒苏益格(Schleswig)。即便在那时,我也能清楚地看到,德国老百姓对希特勒的看法分为两派。一半人对将领们参与推翻希特勒的密谋感到震惊,对这些军人不无怨恨——军界的反应同样如此。另一半人则抱怨将领们为何不早点干掉希特勒。

## 事件余波

接任西线总指挥后,陆军元帅莫德尔坐镇B集团军的司令部。他到那里一两天后,打电话给我,说他收到元首大本营发来一则令人不安的消息。“如今他们的所言所思离不开7月20日事件,现在他们要把施派德尔作为嫌疑犯带走。”他向凯特尔一再强调,当前形势危急,集团军指挥部离不开参谋长。结果施派德尔一直在那里呆到9月的第一个星期。后来他被解职,跑来见我,说他受命回国。他一到家就被盖世太保逮捕了。

施派德尔离开后,来电说韦斯特法尔将军将取代我的职位,我必须在9月13日到元首大本营报到。我感到有点郁闷!动身前,我先去科布伦茨(Coblenz)见陆军元帅伦德施泰特,重新出任西线最高指挥官后,他将指挥部设在那里。

---

<sup>①</sup> 出于宗教信念,特雷斯科坚决反对希特勒,可是当他的上司被调到西线时,特雷斯科被留在东线。所以他没能在关键时刻起作用。



他刚刚复职,又听到我被调离,这让他感到非常恼火。他马上向最高统帅部提出抗议,要求我留下来作为他的参谋长。但他的请求没能得到批准,上面的理由是我曾一再申请当主将。在当时的情况下,这种托词让人难以信服。

9月9日,我离开科布伦茨,为防不测,我先抓紧时机去马堡(Marburg)看望家人。10号是星期天,我一直呆在家里。电话铃声一响,或者听到门外汽车驶近的声音,我都会情不自禁地哆嗦,不时走到窗边张望。

11日,我乘上开往柏林的火车。火车在卡塞尔(Kassel)因遭到空袭而耽搁,我打电话告诉他们,我被堵在这里,赶不上夜晚从柏林开往东普鲁士的特快专列了。火车继续往柏林开,由于轨道被炸毁,我只好在波茨坦(Potsdam)下车。刚下火车,突然在黑暗中听到有人问:“布卢门特里特将军在哪里?”我又是一阵战栗。听到我的回答后,一位军官走过来,一个手持冲锋枪的士兵陪伴着他。他彬彬有礼地向我问好,说他受命护送我去柏林的阿德隆(Adlon)旅馆。到了那里后,门房告诉我有一封密件。我打开一看,里面装着一张前往东普鲁士安格堡(Angerburg)的车票。峰回路转,但也只能给我带来片刻的轻松。我还得等待,不知道元首大本营等着我的将是什么结局。

次日晚上,我乘上专列,13日早上抵达安格堡。来接我的是陆军元帅凯特尔的副官,他领我到凯特尔的专列。我在那里吃了早餐,留下行李。他们告诉我元首太累了,不想马上见我,不过,如果愿意的话,我可以参加中午举行的例会。我决定去参加会议。

在会议室的屋外,我看到不少将领。我走上前向古德里安将军报到,他最近刚升任为总参谋长。我注意到他不想和我握手,而凯特尔和其他人则冷冷地站在一旁。古德里安大声对我说:“西线出了这么多事,你居然还敢来这里。”<sup>①</sup>我给他看了命令我前来报到的电报。这时一位党卫队军官过来说,元首还是决定来参加例会。几分钟后,我看到希特勒缓步穿过树林,略显疲态,有五个人陪伴在他身边。

古德里安转身对我冷冷地说:“现在你自己向元首汇报吧。”出乎意料,希特勒高兴地和我打招呼,说:“你在西线吃苦了,我知道盟国空军占尽优势,有多厉害。会后我想和你谈谈。”

---

<sup>①</sup> 古德里安告诉我:“我已经记不清楚布卢门特里特描述的场景。我对他从来不抱任何偏见。”他认为布卢门特里特或许是因为过于忧虑才对他有所误解,也可能他当时只是开开玩笑。(我注意到古德里安很有幽默感,经常喜欢开玩笑。)

会议结束时，古德里安对我说：“来和我谈谈东线的情况。”我答道：“恕我暂时没有兴趣。”接着我和希特勒单独谈了10分钟，他的态度还是十分和善。

我出来后，发现许多将领都等在外面，他们立刻上来问我：“元首对你说了什么？”我答道：“他很高兴。”他们都显得很高兴。凯特尔邀请我一起品茶。我说我打算今晚就离开，回家去看看。“已经有两年多没有和妻子儿女在一起了。”凯特尔说：“恐怕不行吧。”我说：“但元首同意我走，要我随后去向陆军元帅冯·伦德施泰特报到，伦德施泰特会委派我出任西线某个军团指挥。”凯特尔叫我等半小时。他见了希特勒后，出来告诉我可以走了。

在这次谈话中，凯特尔谈起克卢格，说他们有书面证据表明克卢格参与叛乱密谋。凯特尔说，他们截获了盟军指挥部要与克卢格联络的电报，还说：“这就说明了为什么克卢格会在阿夫朗什长时间失踪的原因。”我提出异议，表示这种怀疑有失公正。我解释了当时克卢格被迫藏身掩体，因为无线电台坏了，所以他有几个小时与指挥部失去联络。但凯特尔显然不相信这种解释。

离开前，我去见了约德尔。约德尔不和我握手，他说：“你在西线的表现并不好呀。”我反驳道：“你最好亲自到前线去了解一下那里的战况。”听说我当晚就走，他很惊讶。

我回到凯特尔的专列取行李，勤务兵给了我一瓶红葡萄酒，让我带走。他说：“今天早餐你坐的位置就是施蒂夫曾经坐过的地方。”我感到自己总算有幸逃过一劫。即使我后来回到家中，电话铃一响，我还是会感到惊吓。直到我重回前线，指挥新的军团才稍觉心安，但内心的焦虑始终挥之不去。<sup>①</sup>

从那时起直到战争结束，几乎是人人自危，乌云笼罩在人们心头，唯恐成为怀疑对象。1945年3月，我在荷兰指挥军队时，收到最高统帅部发来的电报，要我汇报家属的行踪。这看来像个不祥之兆，似乎要将家属扣为人质。我察看了一下地图，美军正在向马堡挺进，已经不到60公里距离。于是我决定

---

<sup>①</sup> 从我掌握的其他一些资料看，布卢门特里特的恐惧似乎是出于多虑。“最高统帅部考虑要加强对西线的控制，韦斯特法尔将军有三年北非和意大利作战的经历，更适宜这个职位，所以让他取代布卢门特里特。至于布卢门特里特被召到东普鲁士，那是因为希特勒想亲自授予他铁十字骑士勋章。布卢门特里特并没对元首刻意奉迎，但他是少数几个始终受到希特勒宠信的官员之一，他出身南德世家或许是最主要的因素。”

对布卢门特里特恐惧心理的说明并不等于他的叙述没有价值。一个受独裁者如此宠信的人，在被召见时还感到心惊肉跳，足见当时氛围是何等恐惧。



不回复这份电报！我感到在美军占领区家属更为安全。

7月20日以后,德军将领经常私下商议是否应该与盟军联系,就像克卢格以为希特勒已死的那天晚上所想的那样。阻止他们这样做的原因如下:

(1) 他们曾发誓忠于元首。(他们会争辩道:“我们曾发誓忠于元首。如果他死了,誓言自然就无效了。”所以大多数人愿意相信希特勒死了。)

(2) 德国人民不了解真实的战况,也就不能理解将军们为求和所采取的行动。

(3) 东线的军队会责怪西线的军队导致战争失败。

(4) 惧怕作为叛国者留名史册。





## 第二十三章 希特勒孤注一掷

### ——第二次阿登战役

1944年12月16日凌晨,大雾弥漫,天色阴沉,德军在阿登发起猛攻。进攻让盟军大吃一惊,盟军指挥官曾自信德军没有能力再发动一场攻势。德军的进攻很快便突破了美军在阿登高原的防线,盟军面临被分割的危险,这使他们更为震惊。阵地的后方警报声声,盟国的首都伦敦更为惊惶。这犹如一场恶梦,谣诼纷起,说什么德军将冲到英吉利海峡,敦刻尔克溃败的一幕行将重演。

这是希特勒的孤注一掷,也是他最为鲁莽的冒险一搏。

从德国人的视角看一切大不相同。这次攻势不仅胜率极低,而且简直就是胡来。盟军将这次进攻称为“伦德施泰特攻势”。给它加上这个头衔等于是用红布去惹斗牛,因为伦德施泰特对进攻方案一直持强烈反对的态度。实际上他也没为这次进攻出过一点力,除非有些事是以他的名义去实行的。既然说服不了希特勒,又感到这是一场必输无疑的豪赌,伦德施泰特干脆置身事外,让陆军元帅约德尔去操作。

是希特勒决定发动攻势,进攻的战略战术也出自希特勒之手。假设他拥有足够的军队和装备来达到目的,这原本能再一次证明他出色的谋略。进攻初战告捷主要应归功于年轻军官曼陀菲尔提出的战术。年仅47岁的曼陀菲尔将军说服希特勒采纳了这个方案。希特勒不信任资深将领,对他们的建议往往爱理不理。对年轻军官和他们的建议则态度迥然不同。他认为曼陀菲尔是他发现栽培的青年才俊。他喜欢大胆出奇的战术。

确保作战方案秘而不宣是突袭初战告捷的另一大原因。但过分的保密搞不好也会弊大于利,它会引起很多混乱,使进攻前功尽弃。当该方案碰壁以后,希特勒固执己见坚持继续进攻,严禁德军及时后撤。如果盟军行动更快一点,德军很可能被围歼。结果德军虽然没有全军覆没,但还是遭受了重创。此



战的损失对德国的防守有着致命的影响。

德军高级将领对战事的看法对我们将不无启迪。级别最高的是伦德施泰特，9月初，盟军逼近莱茵河，希特勒亟须一个有威望的人物让惨遭挫败的军队重振士气，伦德施泰特被重新任命为西线总指挥。伦德施泰特下面是莫德尔，莫德尔算不上伟大的战略家，但他有本事竭尽全力从这个山穷水尽的国度拼凑出后备军。他也是敢于当面顶撞希特勒的少数将领之一。莫德尔在战争行将结束时自杀身亡。莫德尔之下是两位装甲军团司令，泽普·迪特里希和曼陀菲尔。泽普·迪特里希是党卫队头目，从前是个三脚猫，曾在好多行当里混过，他为人争强好胜，因此赢得希特勒的宠信。伦德施泰特将进攻关键时刻的失误归咎于泽普·迪特里希。曼陀菲尔属于年轻一代的职业军人，具有贵族气质。他举止庄重，颇有伦德施泰特的风度。他也是新战术的有力倡导者。在一年之内，他便从装甲师师长晋升为集团军指挥。他不仅制定了阿登战役的战术，而且正是他的突破给盟军造成了最大的威胁。因此我将大量引用他的叙述，并利用其他资料进行核实和补充。

曼陀菲尔富于军人气质，乐于在讨论中“重温往日战事”。他善于从哲学的高度分析问题，而不会过分拘泥于细节的得失。他也不乏幽默感，所以能熬过艰难的牢狱生活。那时被俘的德军将领被囚禁在军营里，他们终日惶恐不安，为家人的命运担忧，不知此生是否还能和妻儿老小团聚。阴气沉沉的战俘营隐身于遥远的高山深谷中，即使没用铁丝网隔离，压抑的氛围也足以让人患上幽闭恐惧症。在一个天气阴沉的冬天，我来到格里兹代尔(Grizedale)战俘营。我对曼陀菲尔说，冬季呆在这种地方可不好受，到夏天可能会好一点。他微笑着说：“哦，也可能更糟。我倒想明年冬季可能会在一个荒岛或锚在大西洋中间的船上度过。”

## 作战方案

曼陀菲尔告诉我：“阿登攻势的作战方案完全是由最高统帅部制定的。然后作为既定的‘元首命令’下达给我们。预定目的是动用两个装甲集团军(迪特里希的第六装甲军和我的第五装甲军)在西线取得决定性的胜利。第六装甲军向东北进攻，渡过位于列日和于伊(Huy)之间的默兹河，直趋安特卫普。我的部队则进行长距离的迂回，渡过那慕尔和迪南之间的默兹河，向布鲁塞尔推进，进行侧翼掩护。到第三天或第五天，由布卢门特里特率领的由特别加强



的第十二党卫军团组成的第十五集团军朝东北马斯特里赫特附近的默兹河挺进,配合第六装甲集团军向安特卫普的进军。元首的想法是阿登攻势会消耗大量增援美军的部队,这样的话,尽管规模不大,第二次进攻就有机会取胜。”

“整个战役的主要目的是切断英军与其供给基地的联络,迫使英军退出欧洲大陆。”

希特勒的如意算盘是如果他能重演敦刻尔克一幕,英国就会实际上退出战争,德国因此获得喘息的机会,从而能阻止苏军的进攻,稳住东线。

10月24日,进攻方案付诸实施。伦德施泰特向我描述了他当时的反应:“我大为震惊,希特勒事先根本没有向我询问过此战的可行性。在我看来,这个方案期望绝对过高,我军有限的兵力显然难以承担。莫德尔和我的观点相同。事实上,没有一个军人会相信能够达到目的,挺进安特卫普。不过,我知道此时再向希特勒说什么可行性问题已经无济于事。在与莫德尔和曼陀菲尔商议后,我感到唯一的希望就是提出一个比较折中的方案,劝说希特勒对其野心勃勃的计划略加收敛,接受我们的比较实际的方案。那就是将进攻的目的限于夹击突前在亚琛一带的盟军先头部队。”

曼陀菲尔对我详谈了他们商讨的情况和结论。

我们就反对原进攻方案达成共识。首先战略部署就有问题,如果不能增强两侧的兵力,我军侧翼将受到极大的威胁。再说有限的弹药也无法支撑如此庞大的攻势。而且盟军的绝对制空权将使我们难以达到此战的目的。更何况我们明知盟军在法国和英国有着强大的后备力量。我还特别强调要防备驻扎在英国的空降师前来助战。我还强调指出默兹河那边良好的道路系统也为盟军的行动提供了极大的便利。

我们草拟了一份报告上呈最高统帅部,强调指出现有的兵力难以完成既定的进攻任务。同时提出了个修正方案。修正方案计划在强大的右翼部队配合下,第十五军向亚琛北部发起猛攻,进军马斯特里赫特。第六装甲军向亚琛南部进攻,从其后面插入,最终目的是在列日地区的默兹河岸建立起桥头堡。其主要意图是吸引盟军的全部注意力。第五装甲军穿过阿登高原,从艾费尔高原(Eifel)向那慕尔进攻,目的是夺取那里的桥头堡。然后部队向北运动,包抄默兹河沿岸的盟军。如果盟军顶不住德军的攻势,德军便可乘胜向安特卫普进军,倘若不行,所冒的风险也不至于很大。



曼陀菲尔说他们最希望的是歼灭越过亚琛突进到鲁尔河(River Roer)一带的美军。不过他本人宁愿引而不发,让盟军先发起新的攻势,集中德军的装甲部队攻其一点。布卢门特里特向我证实,伦德施泰特也持有同样的观点。“元帅确实反对我方再发起进一步的攻势。他主张在鲁尔河加强防御,将所有的装甲部队雪藏起来,一旦阵线被突破,便动用这些装甲部队发起强有力的反攻。他希望采取防守战略。”由于希特勒拒绝接受这种观点,要想让他改变主意,唯一的希望便是提出一种风险较小的进攻方案来劝诱他对原方案有所修正。

曼陀菲尔指出这个作战方案的范围和进攻方向与希特勒的原方案比较相似。在提出用新方案取代原方案时,他们强调如果敌军防守崩溃,就可以乘胜进军安特卫普,力图使方案显得更具有说服力。“我记得在11月4日,这个有所变通的方案递交最高统帅部,请求希特勒批准。方案强调发起攻势的日子不可早于12月10日,而希特勒原定的方案是12月1日。”

曼陀菲尔继续说:“这个更为收敛的方案遭到希特勒的否决,他坚持原定的方案。由于估计希特勒通常不会马上批复,而会让我们久等,于是我们同时就着手对方案作些有限的准备工作。我的第五装甲军所有的战斗师都已集结待命,但是部队之间还是保持一定的距离,分别驻扎在特里尔和克莱菲尔德(Kerfeld),这样盟国的间谍和当地的百姓便难以察觉部队的动向。通知部队准备迎战盟军对科隆的进攻,只有极少数几名参谋得知真实的方案。”

第六装甲军集结的地点更靠后,位于汉诺威(Hanover)和威悉河(Weser)之间的地带。它的战斗师被调离前线进行休整和重新装备。奇怪的是事先既没有将作战计划告知泽普·迪特里希,也没有向他咨询要由他去实施的作战方案,直到临战之前才向他布置任务。大多数师级指挥官都只是在开战几天前才接到通知。曼陀菲尔的装甲部队也是花了三个通宵才抵达进攻的前沿。

## 缺 陷

战略上的虚虚实实使其不意的进攻获益匪浅,但对内过度的保密也让德军付出了很大的代价,对第六装甲军来讲尤其如此。指战员们临战才获知进攻方案,没有时间研究问题侦察地形并做好充分的准备。结果忽略了很多事情,进攻开始后就出现了许多问题。希特勒和约德尔在他的大本营里拟定了详细的计划,似乎已将一切都考虑周全。他忽视了局部情况的特殊性,以及



各级将领个人能力所造成的问题。对于参战部队的需求,他也显得过于乐观。

伦德施泰特指出:“增援部队严重不足,弹药供应严重不足,参战的装甲师数量不少,各个师拥有的坦克却不多,简直就是外强中干虚张声势。”(曼陀菲尔说,两个装甲军的坦克总数约为 800 辆,这与盟国声称的数字大相径庭。盟国是依据德军装甲师的数量来估算坦克的数量,照那样的算法,德军此战集结的坦克之多堪称二战之最。)

汽油短缺最为严重。曼陀菲尔说:“约德尔曾向我们保证有足够的燃料让部队的战斗力得到充分的发挥,完成进攻任务。这种保证结果完全落空。错误在于最高统帅部只会就一个装甲师推进 1 公里所需的燃料作出刻板的运算,在苏联作战的经验告诉我,在实战中所需的燃料至少要翻一倍。约德尔根本不懂。”

“考虑到阿登高原地形复杂,又是冬季作战,肯定会有许多意想不到的困难,我当面对希特勒说,所需汽油应当是通常标准的五倍。事实上,进攻开始后,提供给我们的汽油只有通常标准的一倍半。更糟糕的是装载大部分汽油的车队远在莱茵河东岸。一旦云开雾散,天气晴朗,盟国空军一出动,必将使车队难以前行。”

德军大部分将士无从获知这些潜在的弱点,他们绝对相信希特勒,对胜利的保证充满信心。伦德施泰特说:“进攻伊始,全军士气高昂,他们确实相信胜利在望,只有高级指挥官才对实际情况心知肚明。”

## 新 战 术

进攻旗开得胜得益于两大因素。首先是美军在阿登地区防守较为薄弱。德军掌握了有关情报,得知延绵 75 英里的防线上仅驻守着四个师的兵力。希特勒惯于行动出其不意,他抓住了这个弱点。这同时也表明,尽管 1940 年德军曾在地形复杂的阿登地区发起攻势,但盟军高级指挥官还是没有吸取教训,对突袭毫无准备。

第二个有利因素是所采取的战术得当。最初的方案并没有包括这些战术。曼陀菲尔告诉我:

当我看到希特勒的进攻命令时大吃一惊,命令对进攻的具体方法和时间都作了刻板的规定。上午 7:30 开炮,11 点步兵发起进攻。其间几小



时则由空军轰炸敌人的司令部和交通要道。步兵大部队取得突破后,装甲部队才能出击。炮击的范围包括整个进攻区域。

在我看来这样做在很多方面显得太愚蠢,于是我马上拟定了与之相反的战术,并向莫德尔解释我的战术好在哪里。莫德尔表示同意,但又用嘲讽的口吻说:“你能说服元首就好了。”我答道:“行,如果你能一起去的话,我就去和他争辩。”12月2日,我们俩人在柏林晋见希特勒。

我先说:“没人能确知进攻那天的气候,面对盟军的空中优势,你能确保德国空军能够顺利完成任务吗?”我提醒希特勒早先孚日山脉(Vosges)地区两次经历已经证明装甲部队在白天难以展开行动。我接着说:“7:30开炮只不过是惊醒美军,使它有三个半小时准备迎战我军即将发起的进攻。”我还指出,我军步兵的实力已大不如前,要进行深入突破,尤其是在地形险恶的阿登高原,对他们有点勉为其难。美军的防线环环相扣,其主要的防守阵地相当靠后,很难突破。

我向希特勒提议对原方案做出多项修改。首先将进攻的时间提早到凌晨5:30,这时天还没亮,可以掩护进攻。当然这也会使炮火难以瞄准每个目标,但可以集中轰击已确定的重要目标,如炮兵阵地、弹药库和指挥部。

其次,我建议从每个步兵师中选出精兵强将,组成一个“狂飙营”。(由我亲自挑选军官。)凌晨5时,不要任何炮火掩护,这些“狂飙营”借着夜幕穿越美军的前沿阵地。尽量避免与敌军交战,直到抵达纵深。

高射炮部队的探照灯直射云层,反射到地面,“狂飙营”可以借光而行。不久前,我看到过这种演示,留下了相当深刻的印象,感到这是天亮前迅速渗透敌营的关键因素。(奇怪的是曼陀菲尔似乎不知道英国人早就发明了这种“人工月光”。他提到我在1932年出版的《未来步兵》一书曾给他留下一定的印象,但他忘了运用这种新发明正是那本书提出的主要建议之一。)

曼陀菲尔继续说:

向希特勒直陈我的建议后,我争辩道,若希望进攻成功,舍此别无他途。我强调:“下午4时天就暗了,所以如果上午11时才发起进攻,进行突破的时间仅有5个小时,要在这点时间内实现突破谈何容易。如果你

采用我的方案,就能多5个半小时来达到这个目的。然后,等到夜幕降临,坦克就可以出动了。整个晚上坦克都可以向前推进,并超过步兵,到次日拂晓坦克就可以沿着已经扫清的通道向敌人的主要阵地发起猛攻。”

根据曼陀菲尔的说法,希特勒一言未发便接受了这些建议。这很有意思,看来希特勒愿意倾听他信任的将领的意见,这样的人为数不多,莫德尔也是其中之一。希特勒对大多数资深将领有一种出自本能的反感。他信任身边的参谋,同时也明白他们缺乏实战经验。

凯特尔、约德尔和瓦尔利蒙特都没上过战场。他们缺乏实战经验,容易低估实际困难,经常怂恿希特勒异想天开,让部队去实施那些根本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希特勒愿意听取有实战经验的将领的意见,他们的建议比较符合实际。

然而,尽管战术的改变增加了进攻获胜的希望,但兵力的削弱最终还是使胜利化为乌有。参战的指挥员不久就得到令人沮丧的消息,由于苏军的进攻,东线压力加大,原先答应调配给阿登战役的部队来不了了。结果布卢门特里特对马斯特里赫特的助攻被取消,这样一来,盟军便能轻松地 from 北方调来增援部队。更糟的是,第七集团军本当向前推进,从侧翼掩护进攻。可这时只剩下几个师,一辆坦克也没有。听到这个消息,曼陀菲尔更为失望。他在2日曾向希特勒进言,指出美军将从色当一带向巴斯托涅(Bastogne)发起反攻。“我指出许多大路均通往巴斯托涅。”

然而,野心勃勃的进攻目的并未得到任何修正。奇怪的是,希特勒和约德尔似乎对进攻的势头没有准确的估计。曼陀菲尔告诉我:“从来没有认真商讨过抵达默兹河的时间。我原以为希特勒应当知道,时值冬季,还有种种牵制,部队不可能迅速推进。但是后来得知希特勒以为进军速度可以比实际上更快。但我们不可能如约德尔所期望的在两三天内抵达默兹河。约德尔和凯特尔就是喜欢怂恿希特勒自鸣得意想入非非。”

希特勒拒绝“保守方案”后,伦德施泰特退居幕后,让能够影响希特勒的约德尔和曼陀菲尔去争取在希特勒允许的范围内对原计划作些技术性的修正。布卢门特里特挖苦道:“事实上,任何问题都不再向西线总指挥咨询。他只要按照元首的作战指令,亦步亦趋地实施进攻就行了。那些命令规定得极



细,下级不能按照自己的想法略加改变。”12月12日,在位于巴特瑙海姆浴场(Bad Nauheim)附近的齐伦贝格(Ziegenberg)西线指挥部召开进攻前最后一次军事会议,伦德施泰特只是按例行程序到场而已。希特勒亲临会场,掌控全部议程。

## 错失好牌

有一次交谈,我向曼陀菲尔询问运用伞兵部队的事情。我说,战前我曾到过阿登地区的许多地方。我惊讶地发现,并不像通常所认为的,尤其是保守的法国高级指挥官所想象的那样,事实上,坦克应当可以在那个地区行进。不过那里确实地形险恶,河流交错,峡谷陡峭,只要严加防守,要攻破它决非易事。在我看来,攻取之道在于以空降兵先行占据战略要隘,然后再动用坦克推进。所以在阿登战役开始时,我发表评论认为德军会出动伞兵。但实战中,德军并没有动用空降部队。我向曼陀菲尔询问其中的缘由。

曼陀菲尔答道:“我完全同意你对阿登地区特点的分析,我想按照你所建议的那样动用空降部队是个不错的主意。那就可能打开缺口。不过,我不记得在制定作战方案时议及过这个问题,毕竟可供动用的空降部队实在太少。首先我们的伞兵部队受阻于运输机不够,而且在发起进攻时,也没有所需的伞兵。东线吃紧,迫使希特勒只能将空降部队当作步兵去封堵缺口。其他一些空降部队被调到意大利,忙于那里的战斗。由于这些因素,阿登战役开始时,能够参战的伞兵只有900名。他们被部署在第六装甲军的前沿阵地。”

曼陀菲尔继续谈到自1941年占领克里特岛后,德国伞兵再也未能得到有效的发挥,他们的作用被忽略了。他谈到当时曾指派空降部队进攻马耳他和直布罗陀,但最后并没付诸实施。施图登特曾经想在苏联战场使用空降部队,但遭到希特勒的否决。希特勒本想将伞兵部队雪藏起来,专门用于突然袭击。结果反而被当作地面部队虚耗在常规战中,没能发挥其应有的特殊作用。曼陀菲尔总结道:“在我看来,装甲部队和伞兵部队协同作战效果最佳。”

托马以前也和我谈过空降兵问题,他说:“古德里安和伞兵指挥施图登特一直配合得很好,但是戈林总是对他们协同作战的建议横加阻挠。他就想保持空军的实力,出手吝啬,不愿为伞兵部队提供运输机。”

从施图登特将军那里我得知了阿登战役时如何部署伞兵的详情。德军在法国的阵地崩溃后,盟军在9月初冲进比利时,施图登特受命在荷兰南部构筑





一条新的防线。为了完成这个任务,让他担任所谓的第一空降军司令。这支部队是临时拼凑起来的,由一些损兵缺将的步兵师和在施图登特手下受训的少量伞兵组成。新防线组成后,盟军的进攻受到遏制,在荷兰的德军组建成 H 集团军群,包括第一伞兵军和新成立的第二十五集团军。空降部队总司令施图登特同时担任该集团军群总指挥。

12月8日,施图登特得知德军将在阿登发起攻势,指示他挑选训练有素的伞兵组成一个加强营。此时离发起进攻只有一个星期。以上校冯·德·海德(Von der Hytte)为首的加强营由1000名士兵组成,它被派到泽普·迪特里希的第六装甲军。冯·德·海德上校在与空军指挥部取得联系后,发现负责空运的大多数机组人员没有伞兵战的经验,必要的装备也不齐全。直到13日,冯·德·海德才总算见到迪特里希。迪特里希却说 he 不想用伞兵了,因为他担心那样反而会使盟军有所警觉。但希特勒坚持要用伞兵。

最终派给伞兵部队的任务不是在装甲部队之前去抢占难以对付的要隘,而是空降在马尔梅迪-奥本-弗尔维尔斯(Malmedy-Eupen-Verviers)十字路口附近的里吉山(Mont Rigi),从侧翼阻截来自北方的盟军增援部队,将其牵制住。尽管冯·德·海德提出异议,为了防止惊动盟军,还是命令伞兵在夜晚而不是在黎明着陆。进攻前夜,运送伞兵去机场的汽车却没来,空投被延迟到次日夜晚,那时地面进攻已经打响了。结果仅有三分之一的飞机抵达预设的空降区域,大风将许多伞兵刮到森林和雪山上,造成很大的伤亡。此时此刻,大路上已经挤满向南奔袭的美军,冯·德·海德集结起来的伞兵只有一二百人,没法占领十字路口,构筑阵地阻挡敌军。几天来,他只能带着小部队在路上对盟军进行一些骚扰。看不到任何泽普·迪特里希率领部队前来增援的迹象,他企图向东走去和大部队会合,但在半路上成了盟军的俘虏。

“这是我们最后一次伞兵行动,”施图登特说,“在诺曼底登陆日时,我军有15万名伞兵,组成六个像样的空降师。其中训练有素的占5万人,其余则处于受训阶段。老是派他们去参加地面作战,所以我们没法完成对他们的训练。五个月后,当阿登战役需要这些伞兵出力时,能上战场的伞兵少得可怜。他们被充当步兵耗尽了能量,没能发挥伞兵应有的作用。”

## 出 击

阿登攻势使盟军感到极大的震惊,力度之大似乎为1942年以来之最。其



实德军真正的力量并没有如盟军当时所描绘的那么可怕。现在从缴获的德军作战指令来看,这是十分清楚的。曼陀菲尔在叙述战事时相当克制,他没有强调德军战败是因为实力不济。哪怕再有理由,也不愿为自己的失败找借口,他就是这种类型的人。

12月16日,进攻开始。德军沿着蒙绍(Monschau,亚琛南部)和埃希特纳赫(Echternach,特里尔的西北)之间长达70英里的战线发起猛攻。但是第七军在南部的进攻没起多大作用,因为它只有四个步兵师。预定的主攻方向为仅有15英里的狭窄地带,由泽普·迪特里希的第六装甲军负责。第六装甲军是由第一和第二党卫队装甲军团组成,再加上第六十七步兵军团。虽说它的装甲师多于第五装甲军,但相对其任务而言,还是显得力不从心。

泽普·迪特里希的右翼进攻一开始就遭到驻扎在蒙绍美军的顽强抵抗。他的左翼进攻突破了盟军的防线,德军越过马尔梅迪,在18日渡过施塔沃洛(Stavelot)那边的昂布莱沃河(Ambleve)。但是德军在一个狭窄的关隘前遭到阻击,然后被美军的反攻逼入困境。美军的增援部队源源不断地赶到战场,德军的一再努力均未成功,第六军装甲军的进攻以失败而告终。

曼陀菲尔进攻的范围较大,宽达30英里。他给我勾画了部队的部署和路线。他右翼是第66步兵集团军,正对着圣维特(St. Vith)。“这样的部署是有针对性的,因为那里的地形比南方更为复杂,部队难以迅速推进。”中路是第五十八装甲军,位于普吕姆(Prum)和瓦克斯韦勒(Waxweiler)之间。第四十七装甲军部署在左边,位于瓦克斯韦勒和比特堡之间,面对巴斯托涅(Bastogne)。一开始这两个军只有三个装甲师,尽管后来得到补充,各自所拥有的坦克也只有60到100辆,只有正常编制的三分之一到一半。泽普·迪特里希装甲师的坦克也强不了多少。

曼陀菲尔的进攻开局不错。“我的突击营就像雨水一般迅速渗入到美军的阵地。下午4时,坦克借着‘人造月光’向前推进。奥尔河(Our River)上也已架起浮桥。装甲部队在半夜跨过浮桥,早上8点抵达美军的主要阵地,然后呼叫大炮掩护,迅速突破敌阵。”

“巴斯托涅很难突破,部分原因是第七军实力不济,它的任务是封锁从南方通往巴斯托涅的道路。”在达斯堡(Dasburg)渡过奥尔河后,第四十七装甲军团还必须在沃尔兹河(Woltz)的克莱沃(Clervaux)突破另一个难啃的关隘。天寒地冻、关隘重重,致使进军速度一再延误。“坦克一到,敌军的防守便容易动摇。但是装甲部队推进的速度太慢,这就抵消了战役初期敌军防守薄弱的有



利条件。等到装甲部队赶到巴斯托涅,盟军的力量已经得到增强。”

从前沿阵地发起进攻,经过将近 30 英里的路程,德军在 18 日逼近巴斯托涅。但是,在 17 日夜晩,艾森豪威尔将军已经将兰斯(Rheims)附近的第八十二和第一百零一空降师调拨给布拉德利(Bradley)将军。第八十二空降师的任务是加强北部阵地,第一百零一空降师则沿公路迅速进军巴斯托涅。与此同时,美军第十装甲师的一部分军队及时赶到巴斯托涅,协助已被打得焦头烂额的第二十八师顶住了德军最初的攻势。18 日晚,第一百零一空降师抵达巴斯托涅,这个交通枢纽的防守大为加强。此后两天,德军从正面和侧翼一再发起猛攻,但都无功而返。

20 日,曼陀菲尔决定不再为攻克这个难关而耗损更多的时间。

我亲自率领利尔装甲师绕过巴斯托涅,在 21 日向圣于贝尔(St. Hubert)进军。第二装甲师从巴斯托涅的北面绕行。为了掩护绕道行动,掩饰我军的真正动向,我用第二十六国民榴弹师围攻巴斯托涅市镇,从利尔装甲师调来一个装甲榴弹团助攻。与此同时,第五十八装甲军团急速朝北转向,威胁在圣维特附近阻击第六十六军团的盟军侧翼,帮助第六十六军向前进攻。然后第五十八装甲军团从霍法利兹(Huffalize)和拉罗什推进。

尽管如此,对巴斯托涅的佯攻毕竟还是让我进攻的兵力有所分散,也就增加了及时进军迪南附近默兹河的困难。况且第七军还被挡在维尔茨(Wiltz)过不来。在它右边的第五空降师穿过我的阵地,向巴斯托涅通往南面的一条公路逼近,并没有穿过这条路。

情况对德军越来越不利,曼陀菲尔没想到潜在的危险更大。盟军的增援部队云集各地,兵力大大超过投入进攻的德军。突破口以北的所有盟军暂归陆军元帅蒙哥马利统一指挥,英军第三十军团进军默兹河,支援美军第一军。突破口的南面巴顿第三军的两个军团向北迅速出击。其中一个军团在 22 日向从阿尔隆(Arlon)通往巴斯托涅的公路发起猛攻。虽然它推进的速度不算很快,但它构成的威胁迫使曼陀菲尔不断从主攻的部队中分兵应付。

机会最大的几天已经过去了。虽然曼陀菲尔向默兹河方向的迂回突破让盟军指挥部感到震惊,但毕竟为时已晚,难以构成真正严重的威胁。根据德军的方案,原定在第二天就要拿下巴斯托涅,可直到第三天还没到达那里,等到



第六天才绕过去。24日,第二装甲师的一个“小手指”触及迪南几英里处,但这已是德军这次进攻的极限,不久这根手指就被切断了。

道路泥泞,汽油短缺,德军的推进遭到极大的阻碍。由于汽油短缺,只有一半的大炮投入战斗。空军的支持也未能弥补这些缺陷。进攻开始的几天,大雾弥漫,盟军的战机没法起飞,这有利于德军的渗透。但是到23日天气放晴,就再也无法蒙住敌军了。德国空军力量单薄,根本挡不住盟军战机不断的狂轰滥炸,地面部队得不到有效的空中掩护,损失相当惨重。希特勒也为自己的决策付出了沉重的代价,他让第六军作为主力部署在北翼,那里空间狭窄,难以腾挪。

在第一周,德军的进攻就远没达到他们所希望的目标。第二周开始时进军速度有所加快,但结果也是徒劳无益。因为美军已经牢牢地守住了那些交通枢纽,德军深入的结果只是使自己被夹在这些交通枢纽之间。圣诞夜那天,曼陀菲尔直接给希特勒的大本营打电话,汇报实际战况,并提出自己的建议。他对约德尔强调指出,时间已经所剩无几,巴斯托涅造成了太多的麻烦,而第七军行动迟缓,没法掩护他的侧翼。他估计盟军很快就会沿南面的公路大举反攻。“今晚务必让我知道元首的想法。现在的问题是我应该竭尽全力攻克巴斯托涅,还是用小部队佯攻,主力部队进军默兹河。”

我接着指出,我军最大的希望在于抵达默兹河,并列举了数条理由。第一,围攻巴斯托涅已经耗费了很多时间。第二,第七军没有封锁南面所有道路的实力。第三,作战时间超过8天后,盟军肯定会加强默兹河的防御,我军难以攻克如此坚固的防守阵地。第四,第六军没能深入突破,而是被拦截在蒙绍-施塔沃洛一线。第五,我们显然得在默兹河的这一边打一仗。因为我截获了盟军在于伊交通管制处的电报,他们定期通报增援部队经过默兹河大桥的情况。当时我们已经破译了盟军的密码。

然后曼陀菲尔提出自己的建议——部队向北靠近默兹河的一边迂回进军,将河东的盟军包围起来,歼灭在河湾一带。这样就能如其所愿保持强势。“为了达到目的,我敦促部下各路人马(包括最高统帅部和第六军的后备部队)集中到拉罗什周围的乌尔特瑟河(Ourthe)的南面,然后走一条环形路线,通过马尔什(Marche),向列日进军。我说:‘将那些后备军给我,我将占领巴斯托涅,到达默兹河,再转向北方,帮助第六军突破前进。’我最后强调了这几



点,要求当晚给我明确的答复。最高统帅部的后备军必须备足汽油,我还需要空中支持。直到那时,我只看到敌军的飞机!”

那天晚上,元首的副官约翰迈耶(Johannmeier)少校来见我,交谈之后,他打电话给约德尔。最后我接过电话,亲自询问约德尔。但是他说元首还没作出决定,他目前所能做到的就是调拨给我一个装甲师。

直到26日,才将其余的后备军派给我,可那时他们却没法行动了。正当需要他们的时候,却因汽油短缺来不了,部队前后长达上百英里,在公路上滞留不前。(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在施塔沃洛附近的昂德里蒙(Andrimont)有一个大型油库,储藏着250万加仑的汽油,其储备量是德军夺取的最大油库的一百倍。而19日那天德军已经推进到的地点离那里不到四分之一英里。)

我问曼陀菲尔如果当时马上将后备军调配给他,并有足够的汽油,迟至12月24日发起进攻,他是否认为仍有胜利的可能。他回答:

“我认为仍有可能取得有限的胜利——抵达默兹河,或许能攻占河对岸的桥头堡。”然而在深入探讨后,他承认从长远看,太晚攻占默兹河阵地不利因素可能大于有利因素。

我们还没来得及展开新的攻势,盟军就开始反攻了。我电话告知约德尔,让他转告希特勒,我将让突前部队后撤到拉罗什-巴斯托涅一线。但是希特勒不准我们后撤。我军没能主动及时撤退,结果是被盟军的进攻逼得步步后退,遭受到无谓的重创。到1月5日,情况更为危急,我十分担心蒙哥马利会切断我们两支大部队的退路。虽然我们尽力避免了这个危险的结局,但部队损失极为惨重。战役后期我军的损失要远远大于初期,这正是希特勒下令“不准后退”所造成的。德军经受不起如此沉重的打击,已经濒临绝境。

## 后 果

曼陀菲尔用两句话总结了战争后阶段的战况:“阿登攻势失败后,希特勒开始‘散兵战’。德军不再有大规模的作战计划,只有许多零星的战斗。”



他继续说：“看到阿登攻势受阻，我想实施全面撤退。先退到进攻起点线，然后退到莱茵河，但希特勒听不进我的话，致使德军主力在莱茵河西岸这场毫无希望的战斗中丧失殆尽。”

伦德施泰特认可曼陀菲尔的看法。但是他澄清了一个事实，虽然德军擅长进攻，但在这次战役中根本没能发挥自己的特长。“阿登攻势每推进一步，侧翼的危险就增加一分，因为侧翼拉得越长，越容易遭到盟军的反击。”伦德施泰特边谈边在地图上给我演示。“我在战役的初期就提出停止进攻，因为它显然难以达到目标。但希特勒大为恼怒，一意孤行。再度重演斯大林格勒的悲剧。”

“进攻是最好的防御”，阿登攻势则荒唐地将这一军事信条引向极端。事实证明阿登攻势是“最坏的防御”——它毁掉了德国继续顽强抵抗的机会。此后，德军指挥官最关心的似乎不是能否阻挡盟军的进攻，而是盟军为何不快点进攻，趁早结束战争。

希特勒的计谋和希姆莱的警察将德国将领羁勒在各自的官位上，但是他们祈望能早日解脱。在战争最后的9个月里，他们大多数时间是在商议如何与盟军联络，安排投降事宜。

和我交谈过的德军将领都曾说到盟国“无条件投降”的要求延长了战争。他们告诉我，要不是顾虑到这一点，他们可能早就各自或集体投降了。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事实。二战时期，德军普遍“偷听”盟国电台。但是盟国的宣传从来没从正面谈到过和平的条件，以鼓励德军放下武器停止战斗。盟国对投降事宜的缄默容易从反面印证纳粹的宣传，即如果投降不会有好下场。本来德军早就准备放下武器，但盟国的失策使纳粹得以控制德国军队和人民，让他们继续苦战下去。



## 第二十四章 希特勒——一位年轻将领的看法

在一次有关阿登攻势的谈话中，曼陀菲尔向我讲述了希特勒的军人气度，他的描述与老将们对希特勒的印象显然不同。他的评述值得引起重视，它能更深入地说明希特勒的权势和失败。

曼陀菲尔引起希特勒重视的经过就颇能说明问题。1943年8月，曼陀菲尔被任命为第七装甲师的指挥，隆美尔在1940年指挥过这支部队，它曾隶属于曼斯坦因的集团军。那年秋季，苏联军队攻势如潮，他们冲过第聂伯河，攻克基辅，然后迅速向西面的波兰边境进军。曼斯坦因没有现成的预备部队来应付当时的危局，就委派曼陀菲尔尽其所能网罗零星的部队，随机应变发起反击。曼陀菲尔打入正在进攻的苏军后方，在夜晚发起突袭，将苏军逐出日托米尔(Zhitomir)，并向北乘胜前进，重新占领克罗斯坦(Korosten)。曼陀菲尔将有限的兵力分成各个战斗小组，虚张声势，以出其不意的反击迫使苏军暂停进攻。

从此以后，曼陀菲尔进一步发挥这个战术，深入突袭，在苏军纵队中穿插作战，从敌人的背后发起袭击。“苏军不依赖正常的后勤供给系统，这多少影响到我的战术发挥。我在‘深入’突袭时从来没有遇到过苏军的辎重部队，只在背后打击苏军主力时占领过他们的参谋指挥中心。这种渗透突袭的战术能有效地引起敌军的混乱。当然，要实施这种战术，装甲师必须能够自给自足，带好必需品，作战时就能自由行动，不必依赖交通供给线。”（显然曼陀菲尔所实施的战术正是霍巴特(Hobart)将军1934—1935年在索尔兹伯里平原(Salisbury Plain)所应用过的战术，当时他只是英军第十一坦克旅旅长，尽管这并没能让英军总参谋部认可这种战术的可行性。）

这种新战术让希特勒十分欣喜，他急于了解这方面更多的情况。于是他邀请曼陀菲尔和他的坦克团团长舒尔兹上校到东普鲁士安格堡附近的元首大本营共度圣诞。希特勒向曼陀菲尔表示祝贺后说：“作为圣诞礼物，我送给你



五十辆坦克。”

1944年初,曼陀菲尔受命指挥特别组建的“大德意志”加强师。希特勒经常派他率领这支部队到各地去封堵被突破的缺口,或者去营救被苏军如潮攻势所包围的德军。9月,他成功地杀开一条血路,营救出被苏军包围在里加(Riga)周围波罗的海海岸一带的德军。因此他被破格擢升,出任西线第五装甲集团军司令。

在1944年,曼陀菲尔见到希特勒的次数比别的将领更多,因为希特勒经常召他到元首大本营商讨紧急军情,听取他对坦克战的看法。频繁的近距离接触使曼陀菲尔对希特勒有了更深入的了解,而不像其他一些将领那样被希特勒的表象所吓倒和迷惑。

希特勒极具个人魅力,确实能让人为之折服。这一点对去向他陈述自己观点的人有很大的影响。他们一开始是去提出自己的异议,渐渐地却为希特勒的个人魅力所征服,结果往往反而接受了与自己原意相违的观点。在战争后期,我对希特勒了解颇深,我知道该如何坚持自己的观点,不让他扯开话题。我不像许多人那样,见到希特勒就会诚惶诚恐。日托米尔之捷让希特勒对我刮目相看,自从被邀请到大本营共度圣诞后,他经常在本营召见我,向我咨询战况。

希特勒读过不少军事文献,喜欢听军事讲座。作为士兵,他参加过一战,因此他深谙低层次作战的情况——各种武器的性能、地形和气候的影响、部队的精神状态和士气高低。他尤其善于了解部队的感觉。在探讨这类问题时,我几乎都会附和他的观点。在另一方面,他对战略战术这类高层次的问题常常不得要领。他可以很好地把握一个师的行动和作战,却不懂如何进行集团军的整体作战。

曼陀菲尔继续谈到“刺猬”防御体系的来龙去脉,希特勒又是如何使这种战术运用过头的。

苏军的进攻迫使我军后撤,败退的德军就像被磁铁吸引那样,集中到后方原有的防守据点。他们自然而然地集结在那里,进行顽强的抵抗。希特勒很快就看到这些据点的价值,认识到维持它们的重要性。但是他忽略了必须给这些据点内的指挥官合理的空间,使他们能够自行调整部署,在必要时主动撤退。他固执己见事必躬亲,结果经常是没等到他作出决策,苏军已经突破了德军岌岌可危的防线。





在战略战术上,他确实独具天赋,尤其是在突然袭击方面。但是他缺乏正确实施战略战术的基本军事技能。而且他还容易常常自我陶醉在数字和数量之中。在和别人讨论问题时,希特勒常常会拿起电话,打给某个部门的头头,询问“有多少,我们能够有多少?”然后对与他争辩的人抛出这些数字说:“就是这些。”似乎这样就能解决问题。他总是相信纸面上的数字,而从不过问这些数字是否等于实际的存在。不管谈论什么东西,在他看来,坦克飞机与步枪铁铲全是一回事。

通常会打电话给负责军工厂的斯佩尔(Speer)或布尔(Buhle)。布尔总在身边带着一本小册子,里面记着希特勒关心的各种数字,而他的回答也总是能投希特勒所好。然而即便真的生产出那么多的武器,那也还是在工厂里,根本没到部队手里。戈林的作派也如出一辙,他曾发过一次简短的通知,声称将从空军中抽调出十个师的兵力支援苏联战场。殊不知这些人只受过空战训练,还得经过一段时间的训练,才能适应地面作战。

我对曼陀菲尔说,听了越多德军将领对战争的看法,越使我产生这样的印象,一方面,希特勒在战略战术上具有天才的创意。另一方面,德军总参谋部非常能干,却缺乏创见。我从许多将领那里得到这种印象,希特勒对军事技能的误解使他们感到震惊,以致他们容易低估他的创见。而希特勒则对将领们的保守固执恼怒万分。因此在我看来,希特勒与将领之间似乎没能做到互相协调,反而像拔河那样拉来扯去。曼陀菲尔表示他完全同意我的看法。这就点出了德国军方矛盾不断的要害。“1943年我与希特勒共度圣诞,谈到坦克部队指挥与那些传统将领的观点分歧时对他讲过类似的话。在新的战争格局下,资格越老的将领往往越是难理解实战部队的想法。”



## 结 论

纵览战时德国领导层的记录和作战进程,我们将由此得出什么结论呢?在战争政策和宏观战略上的彻底失败,同时也不乏战略战术上的非凡之举,尽管两者并不完全相等。这一解释具有双重性质。老一辈职业军事领导人是在总参体系下训练出来的,他们精明强干韧性十足,但缺乏天赋。他们能力极强又不无局限。他们指挥作战中规中矩如下棋,但不像历史上的战争大师那样具有艺术风范。他们看不惯有创新思想的同僚,如果那些新思想出自非正规军事专业出身的人,就更易遭到他们的鄙视。他们大多数人对军事领域以外的东西所知甚微。

对于新思想、新武器和新的人才,希特勒却十分敏感,他能很快发现其价值。他比总参谋部更早地认识到装甲部队机动作战的潜在威力,他支持德国新式武器的倡导者古德里安,这是二战初期德军旗开得胜的决定因素。在运筹帷幄和指挥作战时,希特勒常常会犯一些低级错误,但他确实不乏军事天赋。他选拔的年轻将领往往具有类似的气质——尤其是隆美尔,最受宠信的军界“新贵”。这类人物禀赋非凡,思维如天马行空,擅长出其不意克敌制胜,堪称难能可贵。他们给战争带来新气象,宣告了统领军界达半个世纪的军事谋略已经过时,传统教条已不再适用于现代战争。希特勒的成功证明了正统军事教条的谬误,这使他在与军界的较量中占据上风。对于德国军事集团,希特勒的态度是尽快加以利用,而不是加强团结。

事实证明有时非专业军人的直觉是正确的,有时职业军人的精准运筹是正确的,从长远看,后者的胜率更高。但是两派人物的相互嫉妒、由观点不同产生的激烈冲突所造成的致命后果要比任何一方自身的错误更为严重。主要责任应归咎于盘根错节的军事集团。导致这样的结果势所难免,因为战争不是传经授道,也不是对立观点的掺和。考虑到希特勒的政策和脾气,在任何情况下要对他加以制约都不容易,但是军界委曲求全的态度和希特勒屡次应验



的判断,使他显得更加高明,他也就更为随心所欲、无所顾忌。双方都没能意识到自身的局限。

不管怎样,二战中德军将领的专业素质毕竟是一流的。如果他们的视野更为开阔,思想更具深度,他们应能表现得更为出色。不过,如果他们成了哲学家,也就成不了军人了。



## 德军高级将领列表

国防军总司令：1933—1938，布隆贝格（一译勃洛姆堡，Blomberg）。  
1938—1945，希特勒（Hitler）、凯特尔（Keitel）。

陆军总司令：1933—1938，弗里奇（Fritsch）。1938—1941，勃劳希契（Braun-  
chitsch）。1941—1945，希特勒。

总参谋长：1933—1938，贝克（Beck）。1938—1942，哈尔德（Halder）。  
1942—1944，蔡茨勒（Zeitzler）。1944—1945，古德里安（Guderian）。

本书所涉战时德国将领任职情况：

伦德施泰特（Rundstedt）

1939年，波兰，南方集团军。

1939年到1940年，西线A集团军。

1941年，苏联，南方集团军。

1942年到1944年2月7日。1945年4月9日—1945年3月18日，西线  
最高指挥官。

博克（Bock）

1939年，波兰，北方集团军。

1939—1940年，西线B集团军。

1941年，苏联，中央集团军。

1942年年初，退役。

莱布（Leeb）

1939—1940年，西线集团军。

1941年，苏联，北方集团军。1942年年初，辞职。



赖歇瑙(Reichenau)

1939年,波兰,第十集团军。

1940年,西线,第六集团军。

1941年,苏联,第六集团军。

1941年12月,苏联,南方集团军。

1942年1月,去世。

克卢格(Kluge)

1939年,波兰,第四集团军。

1939年到1940年,西线,第四集团军。

1941年,苏联,第四集团军。1942—1943年,苏联,中央集团军,(因空难受伤)。

1944年7月到8月,西线总指挥,被撤职查办,自杀身亡。

克莱斯特(Kleist)

1939年,波兰,装甲军团。

1940年,西线,装甲军团。

1941年,苏联,装甲军团。

1942年10月到1944年,苏联,A集团军,退役。

曼斯坦因(Manstein)

1939年到1940年1月,波兰和西线,任伦德施泰特的参谋长。

1940年,西线,第38军。

1941年,苏联,第五十六装甲军。

1941年9月到1942年11月,苏联,第十一军。

1943年,苏联,南方集团军。

1944年3月,退役。

隆美尔(Rommel)

1940年,西线,第七装甲师。

1941年到1943年4月,北非,非洲军团,后为非洲装甲军团。

1943年,意大利,北方集团军。



1944年,西线,B集团军。

1944年7月受伤,10月,被迫自杀。

托马(Thoma)

1936年到1939年,西班牙,德国军队。

1939年,波兰,装甲旅。

1940年,机动部队,参谋长。

1941年到1942年,苏联,装甲师,装甲军团。

1942年9月到11月,非洲军团,在阿拉曼被俘。

莫德尔(Model)

1940年,西线,布许第十六军参谋长。

1941年,苏联,第三装甲师,装甲军团。

1942年到1943年,苏联,第九集团军。

1943年10月到1944年8月,苏联,先后指挥北方集团军、南方集团军和中央集团军。

1944年到1945年,西线,B集团军。(1944年8月末,暂任西线总司令。)

海因里希(Heinrici)

1940年,西线,第十二集团军。

1941年,苏联,第四十三集团军。

1942年到1944年5月,第一装甲集团军。

1945年3月,W集团军,卫戍柏林。

蒂佩尔斯基希(Tippelskirch)

1941年到1942年,苏联,第三十步兵师。

1943年到1944年,苏联,第十二集团军。

1944年5月到6月,苏联,第四集团军。(在空难中受伤)

1945年初,意大利,第十四集团军。

1945年4月,德国东部,第四集团军。

曼陀菲尔(Manteuffel)



1940年,西线,1941年,苏联,摩托化步兵团,隶属于隆美尔第七装甲师。

1942年,苏联,第七装甲师摩托化步兵旅。

1943年年初,突尼斯,混合师。

1943年到1944年,苏联,第七装甲师和大德意志装甲师。

1944年9月到1945年,西线,第五装甲集团军。

布卢门特里特(Blumentritt)

1939年,波兰,1940年西线,伦德施泰特A集团军作战处长。

1941年,苏联,克卢格第四集团军参谋长。

1942年,副总参谋长。

1942年9月到1944年9月,西线,参谋长。

1944年10月到1945年5月,西线,集团军指挥。



## 译名对照表

### A

阿运河 Aa Canal  
 亚琛 Aachen  
 阿布维尔 Abbeville  
 阿贝茨 Abetz  
 阿德隆 Adlon  
 阿柯蒂里半岛 Akortiri Peninsula  
 艾尔河 Aire  
 埃纳河 Aisne  
 阿拉曼 Alanmein  
 阿尔巴公爵 Duke of Alba  
 艾伯特运河 Albert Canal  
 亚历山大 Alexander  
 亚历山德鲁波利斯 Alexandropolis  
 昂布莱沃 Ambleve  
 亚眠 Amiens  
 安科纳 Ancona  
 昂德里蒙 Andrimont  
 安格堡 Angerburg  
 安东内斯库 Antonescu  
 安齐奥 Anzio  
 亚平宁山脉 Apennines  
 阿登高原 Ardennes

阿登轻骑兵 Chasseurs Ardennais  
 阿尔隆 Arlon  
 阿尔马维尔 Armavir  
 阿拉斯 Arras  
 阿斯特拉罕 Astrakhan  
 阿特金森 G. R Atkinson  
 奥金莱克 Auchinleck  
 欧蒂河 Authie  
 阿夫朗什 Avranches  
 亚速海 Sea of Azov

### B

巴多利奥 Badoglio, Pietro  
 巴库 Baku  
 巴利阿里群岛 Balearic Islands  
 巴尔干 Balkan  
 波罗的诸国 Baltic States  
 巴里 Bari  
 巴斯托涅 Bastogne  
 巴统 Batum  
 拜尔莱因 Bayerlein, Fritz  
 巴泽耶 Bazeilles  
 贝希托尔斯海姆 Bechtolsheim  
 路德维希·贝克 Ludwig Beck





- 贝尔格莱德 Belgrade  
贝希特斯加登 Berchtesgaden  
别列津纳河 Beresina  
贝尔格 Bergues  
贝尔特里 Bertrix  
贝桑松 Besancon  
贝蒂讷 Bethune  
比亚里茨 Biarritz  
比费尔诺 Biferno  
毕尔巴鄂 Bilbao  
比斯开 Biscay  
比特堡 Bitburg  
比塞大 Bizerta  
布拉斯科夫斯基 Blaskowitz  
布隆贝格 Blomberg  
布卢门特里特 Blumentritt, Guenther  
波尔多 Bordeaux  
鲍里斯 Boris  
布永 Bouillon  
布伦涅 Boulogne  
布拉德利 Bradley  
瓦尔特·冯·勃劳希契 Walther  
    von Brauchitsch  
冯·布雷多 von Bredow  
布莱希 Brescy  
布鲁宁 Breuning  
布林迪西 Brindisi  
布林克曼 Brinkmann  
布里斯托尔 Bristol  
波罗德 Broad  
布鲁日 Bruges  
白金汉郡 Buckinghamshire County
- 布达佩斯 Budapest  
布琼尼 Budenny  
布格河 Bug  
布勒 Buhle  
布施 Busch, Ernst
- C
- 卡昂 Caen  
卡拉布里亚 Calabrian  
加来 Calais  
卡尔塔吉罗内 Caltagirone  
康布雷 Cambrai  
卡纳里斯 Canaris, Wilhelm  
干尼亚 Canea  
卡波雷托 Caporetto  
卡朗唐 Carentan  
喀尔巴阡山脉 Carpathians  
里海 Caspian  
卡西诺 Cassino  
卡特尼亚 Catania  
香槟 Champagne  
沙勒维尔 Charleville  
肖蒙 Chaumont  
乔塞 Chaussee  
谢尔河 Cher  
瑟堡 Cherbourg  
切尔特科沃 Chertkovo  
肖尔蒂茨 Choltitz  
克里斯蒂 Christie  
温斯顿·丘吉尔 Winston Churchill  
齐亚诺 Ciano  
克莱沃 Clervaux



科布伦茨 Coblenz

科尔马 Colmar

贡比涅 Compiègne

科尔贝 Corbeil

康沃尔 Cornwall

科西嘉岛 Corsica

科唐坦半岛 Cotentin Peninsula

库隆德尔 Coulondre

科特赖克 Courtrai

克里特岛 Crete

克里米亚 Crimea

克罗克 Croker

克鲁威尔 Cruwell

昔兰尼加 Cyrenaica

**D**

达巴 Daba

达喀尔 Dakar

丹姆杨斯克 Damyansk

多瑙河 Danube

但泽 Danzig

达斯堡 Dasburg

达克斯 Dax

杰贾加赫 Dedeagach

登普西 Dempsey

德斯蒙德·弗劳尔 Desmond Flower

德文郡 Devon

迪耶普 Dieppe

迪特尔 Dietl, Brig. Edward

第戎 Dijon

迪南 Dinant

迪特马尔 Dittmar

迪沃河 Dives

圣迪济耶 St. Dizier

第聂伯河 Dnieper R.

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 Dnepropetro-  
vsk

德尼茨 Doenitz

多尔曼 Dollmann

顿河 Don

顿尼茨河 Donetz

顿尼茨河流域 Donetz Basin

多德雷赫特 Dordrecht

杜芒克 Doumenc

多佛尔 Dover

德累斯顿 Dresden

德维纳河 Dvina

代尔河 Dyle

**E**

伊斯特本 Eastbourne

埃本·埃马尔 Eben Emael

埃贝巴赫 Eberbach

艾登 Eden

艾费尔高原 Eifel

埃尔巴 Elba

易北河 Elbe

艾菲尔特 Elfeldt

埃利斯塔 Elista

恩格尔 Engel

爱尔福特 Erfurt

埃特纳 Etna

奥伊彭 Eupen

**F**

法莱斯 Falaise  
福伊希廷格尔 Feuchtinger  
芬克 Finck  
佛兰德 Flanders  
福贾 Foggia  
福克斯通 Folkestone  
枫丹白露 Fontainebleau  
弗朗哥 Franco  
法兰克福 Frankfurt  
弗赖贝格 Freyberg  
维尔纳·冯·弗里奇 Werner von  
Fritsch  
弗罗姆 Fromm, Friedrich  
芬克 Funk

**G**

莫里斯·甘末林 Gamelin, Maurice  
加里利亚诺 Garigliano  
戴高乐将军 General de Gaulle  
杰拉-拉古萨 Gela-Ragusa  
加沙拉 Gazala  
杰拉 Gela  
让布卢 Gembloux  
总参谋部 General staff  
乔治斯 Georges  
圣日耳曼 St. Germain  
根特 Ghent  
日安 Gien  
吉劳德 Giraud  
吉劳德主义者 Giraudists

吉塞拉行动 Operation Gisela  
纪韦 Givet  
格莱尔 Glaire  
格鲁考夫 Glukov  
戈培尔 Goebbels  
卡尔·格德勒 Goerdeler, Carl  
戈林 Goering  
戈登斯通 Gordonstoun  
戈特 Gort  
格腊夫林 Gravelines  
鲁道夫·格拉齐亚尼 Graziani, Rodolfo  
格赖芬贝格 Greiffenberg  
格里内角 Cap Gris Nez  
格里兹代尔 Grizedale  
大德意志 Gross-Deutschland  
格罗兹尼 Grozny  
海因茨·古德里安 Guderian, Heinz  
德·甘刚 de Guingand  
吉斯 Guise  
古佐尼 Guzzoni  
基扬 Guyon  
吉尔顿菲尔特 Gyldenfeldt

**H**

哈夫登 Haefen  
海牙 Hague  
哈默施泰因 Hammerstein  
汉纳特 Hannut  
汉诺威 Hanover  
豪塞尔 Hausser  
阿兹布鲁克 Hazebrouck  
海因里希 Heinrici



昂代 Hedaye  
 伊拉克利翁 Heraklion  
 海耶 Heye  
 兴登堡 Hindenburg  
 霍巴特 Hobart  
 赫普纳 Hoepfner, Erich  
 霍法克 Hoffacker  
 霍特 Hoth, Hermann  
 赫林根 Herrlingen  
 希特勒 Hitler  
 圣于贝尔 St. Hubert  
 霍法利兹 Huffalze  
 阿尔弗雷德·胡根贝格 Hugenberg,  
 Alfred  
 于伊 Huy  
 海德 Hydte

## I

伊尔门湖 Lake Ilmen  
 伊斯梅 Ismay

## J

亚布伦卡关隘 Jablunka Pass  
 雅各布 Jacob  
 雅西 Jassy  
 耶拿 Jena  
 阿尔弗雷德·约德尔 Jodl, Alfred  
 约翰迈耶 Johannmeier  
 朱安 Juin  
 圣·加斯特 St. Just

## K

卡尔滕布伦内 Kaltenbrunner

卡卢加 Kaluga  
 卡塞尔 Kassel  
 喀山 Kazan  
 威廉·凯特尔 Wilhelm Keitel  
 克莱菲尔德 Kerefeld  
 凯塞林 Kesselring  
 哈尔科夫 Kharkov  
 基辅 Kiev  
 金斯顿 F. S. Kingston  
 克莱斯特 Kleist  
 克莱谢姆 Klessheim  
 克卢格 von Kluge  
 科赫 Koch  
 柯尼斯堡 Koenigsberg  
 伊万·科涅夫 Koniev, Ivan  
 科罗斯坚 Korosten  
 屈希勒尔 Kuchler  
 屈布勒 Kuebler, Ludwig  
 库尔斯克 Kursk  
 库特·汉姆 Kurt Hahn

## L

莱肯 Laeken  
 拉费尔 La Fere  
 圣·兰伯特 St. Lambert  
 朗格勒高地 Plateau de Langres  
 拉昂 Laon  
 拉罗什 La Roche  
 拉西河 River La See  
 勒加托 Le Cateau  
 莱布 Leeb, Wilhelm Ritter  
 来航 Leghorn



勒阿弗尔 Le Havre  
 勒芒 Le Mans  
 伦蒂尼 Lentini  
 利奥波德 Leopold  
 利比亚 Libya  
 利卡塔 Licata  
 列日 Liege  
 里尔 Lille  
 林斯托 Linstow  
 李斯特 List, Sigmund Willhem  
 圣洛 St. Lo  
 勒尔策 Loerzer  
 洛尔 Lohr  
 卢瓦尔河 Loire  
 冯·洛斯堡 von Lossberg  
 鲁登道夫 Ludendorff  
 卢森堡 Luxembourg  
 莱姆湾 Lyme Bay  
 里昂 Lyon  
 利斯河 Lys

## M

马斯特里赫特 Maastricht  
 马斯特里赫特盲肠 Maastricht Appendix  
 马格德堡 Magdeburg  
 美因河 Main  
 马莱迈 Maleme  
 梅赫伦 Malines  
 马尔梅迪 Malmedy  
 小雅罗斯拉韦茨 Malo Yaroslavets  
 埃里希·冯·曼斯坦因 Manstein,  
 Friz Erich von

曼陀菲尔 Manteuffel, Hasso von  
 马内奇河 Manych  
 马堡 Marburg  
 马尔什 Marche  
 马莱 Mareth  
 马克·克拉克 Mark Clack  
 马恩河 Marne  
 马特尔 Martel  
 马耶讷 Mayenne  
 迈因德尔将军 Meindl  
 米洛斯 Melos  
 圣芒日 St. Menges  
 梅维尔 Merville  
 墨西拿海峡 Messina  
 梅茨 Metz  
 米列罗沃 Millerovo  
 明斯克 Minsk  
 莫德尔 Model  
 穆尔代克 Moerdijk  
 莫吉廖夫 Mogilev  
 摩泽尔 Moselle  
 毛奇 Moltke  
 蒙绍 Monschau  
 蒙特罗 Montereau  
 蒙哥马利 Montgomery  
 圣·弗伊·德·蒙哥马利 Sainte Foy  
 de Montgommery  
 蒙梅迪 Montmedy  
 蒙丹梅 Montherme  
 莫兹多克 Mozdok  
 明斯特 Munster  
 墨索里尼 Mussolini



## N

纳尔奇克 Nalchik  
 那慕尔 Namur  
 那不勒斯 Naples  
 纳尔维克 Narvik  
 瑙恩海姆浴场 Bad Nauheim  
 圣纳泽尔 St. Nazaire  
 讷沙托 Neufchateau  
 尼科波尔 Nikopol  
 尼姆 Nimes  
 尼韦勒 Nivelles  
 诺森伯兰 Northumbrian  
 努瓦永 Noyon

## O

奥贝格 Oberg  
 奥康纳 O'Connor  
 奥得河 Oder  
 奥尔德鲁夫 Ohrdruf  
 瓦兹河 Oise  
 最高统帅部(简称 O. K. W)  
 奥卡河 Oka  
 奥利弗·利斯 Sir Oliver Leese  
 圣·奥姆 St. Omer  
 欧宝 Opel  
 奥尔忠尼启则 Ordzhonikidze  
 奥廖尔 Orel  
 奥尔良 Orleans  
 奥恩河 Orne  
 奥尔沙 Orsha  
 奥尔河 Our River

乌尔特瑟河 Ourthe

## P

巴勒莫 Palermo  
 潘泰莱里亚 Pantelleria  
 弗朗茨·冯·巴本 Papen, Franz von  
 弗里德里希·保卢斯 Paulus, Friedrich  
 伯罗奔尼撒 Peloponnese  
 佩雷考普地峡 Perekop Isthmus  
 佩罗讷 Peronne  
 普洛耶什蒂 Ploesti  
 波河 Po  
 普瓦泰龙 Poix-Terron  
 蓬圣马克桑斯 Pont Sainte Maxence  
 朴次茅斯 Portsmouth  
 波茨坦 Potsdam  
 普里马索 Primasole  
 普里皮亚季河 Pripet  
 普里皮亚季沼泽 Pripet Marshes  
 普罗赫拉德纳亚 Prokhladnaya  
 普吕姆 Prum  
 皮特林根 Puttlingen  
 波泽尔 Putzier  
 比利牛斯山脉 Pyrenees

## Q

维德昆·吉斯林 Vidkun Quisling

## R

埃里希·雷德尔 Raeder, Erich  
 拉姆斯盖特 Ramsgate  
 赖歇瑙 von Reichenau



- 兰斯 Reims(英文惯用名 Rheims)  
赖因哈特 Reinhardt, Georg-Hans  
莱茵兰 Rhineland  
罗德斯 Rhodes  
里希特霍芬 Richthofen  
里吉山 Mont Rigi  
罗阿塔 Roatta  
罗姆 Roehm  
里加 Riga  
鲁尔河 River Roer  
鲁尔蒙德 Roermond  
罗加切夫 Rogachev  
勒里希特 Rohricht  
埃尔温·隆美尔 Rommel, Erwin  
罗斯福 Roosevelt  
洛斯劳尔 Rosslaw  
鲁贝 Roubaix  
鲁昂 Rouen  
鲁莱斯 Roulers  
鲁尔河 Ruhr  
格尔德·冯·伦德施泰特 Rundstedt, Gerd von  
勒热夫 Rzhev
- S**
- 萨尔布吕肯 Saarbrucken  
萨莱姆 Salem  
萨莱诺 Salerno  
索尔兹伯里平原 Salisbury Plain  
扎尔穆特 Salmuth  
萨洛尼卡 Salonica  
萨尔茨堡 Salzburg
- 撒丁岛 Sardinia  
沙尔 Schaal  
亚尔马·沙赫特 Schacht, Hjalmar  
斯凯尔特河 Scheldt  
库特·冯·施莱歇 Schleicher,  
Kurt von  
石勒苏益格 Schleswig  
史里芬 Schlieffen  
施蒙特将军 Schmundt, Rudolf  
施尼温德 Schniewind, Otto  
色当 Sedan  
塞纳河 Seine  
瑟穆瓦河 Semois  
森格尔 Senger  
森格·恩德·艾特林 Senger und Eterlin  
桑利斯 Senlis  
塞瓦斯托波尔 Sevastopol  
谢尔曼 Sherman  
西西里岛 Sicily  
西韦特 Siewert, Curt  
西里西亚 Silesia  
锡梅托河 River Simeto  
西莫维奇 Simovich  
斯摩棱斯克 Smolensk  
索旦斯登 Sodenstern  
苏瓦松 Soissions  
索姆河 Somme  
施佩尔 Speer  
施派德尔 Speidel  
施佩勒尔 Sperrle, Hugo  
施波内克 Sponeck, Count Hans Von



党卫队 S. S (Schutzstaffel)  
 萨奇尼兹其 Ssuchinitsch  
 施陶芬贝格 Stauffenberg  
 斯塔沃洛 Stavelot  
 施蒂夫 Stieff  
 斯敦尼 Stonne  
 格雷戈尔·施特拉塞尔 Strasser,  
     Gregor  
 斯特兰科 Strylenko  
 施图登特 Student  
 施蒂尔普纳格尔 Stulpnagel  
 斯图卡式 Stukas  
 施图姆 Stumm  
 斯图加特 Stuttgart  
 苏台德区 Sudetenland  
 萨利 Sully  
 锡拉库萨 Syracuse

**T**

塔甘罗格 Taganrog  
 坦嫩贝格 Tannenberg  
 塔兰托 Taranto  
 塔古尔弗鲁摩斯 Targul Frumos  
 捷列克河 Terek  
 泰尔莫利 Termoli  
 泰晤士河 Thames  
 蒂瑞堡 Chateau Thierry  
 托马 Thoma, Wilhem Rittervon  
 色雷斯 Thrace  
 梯弗里斯(第比利斯的旧称) Tiflis  
 蒂尔福德 Tilford  
 蒂佩尔斯基希 Tippelskirch, Werner

图卜鲁格 Tobruk  
 托德 Todt  
 特拉帕尼 Trapani  
 特伦特公园 Trent Park  
 特雷波尔 Treport  
 特里尔 Trier  
 的黎波里 Tripoli  
 的黎波里塔尼亚 Tripolitania  
 特隆赫姆 Trondheim  
 特鲁瓦 Troyes  
 特伦 Trun  
 图阿普谢 Tuapse  
 突尼斯 Tunisia  
 蒂伦豪特 Turnhout

**U**

乌格拉河 Ugra  
 乌尔姆 Ulm  
 乌拉尔 Ural

**V**

瓦尔代高地 Valdai Hills  
 凡尔登 Verdun  
 弗尔维耶 Verviers  
 维也纳 Vienna  
 维尔 Vire  
 维斯瓦河 Vistula  
 圣维特 St. Vith  
 沃尔图里诺 Volturmo  
 孚日山脉 Vosges  
 福斯 Voss



## W

武装党卫队 Waffen-S. S.  
 瓦尔利蒙特 Warlimont, Walter  
 阿奇博尔德·韦维尔 Wavell, Archibald  
 瓦克斯韦勒 Waxweiler  
 魏克斯 Weichs  
 魏茨泽克 Weizsaecker, Ernst  
 威灵顿 Wellington  
 威悉河 Weser  
 韦斯特法尔 Westphal  
 马克西姆·魏刚 Weygand, Maxime  
 韦茅斯 Weymouth  
 维也纳新城 Wiener Neustadt  
 维特斯海姆 Wietersheim, Gustav  
 怀特岛 Wight  
 威廉敏娜 Wilhelmina  
 切斯特·威尔莫特 Chester Wilmot  
 维尔茨 Wiltz

威森 Wison  
 维齐希 Witzig  
 维茨莱本 Von Witzleben  
 沃尔兹河 Woltz  
 沃尔弗顿 Wolverton Park  
 伍德 Wood

## X

## Y

伊彭堡 Ypenburg  
 伊普尔 Ypres

## Z

库尔特·蔡茨勒 Zeitzler, Kurt  
 日托米尔 Zhitomir  
 朱可夫 Zhukov  
 齐伦贝格 Ziegenberg  
 佐波特 Zoppot  
 佐森 Zossen



## 战争是政治的破产 (译后记)

成王败寇，自古皆然。本书主要是一些第三帝国“败寇”对二战的回忆和反思。书名《山的那一边》意指了解敌方的所思所虑，从德军将领的视角，让他们以第一人称的口吻来追述二战。沙场复盘，痛定思痛，其价值不言而喻。

作者李德·哈特身历二次世界大战，以《第一次世界大战战史》、《第二次世界大战战史》和《战略论》等著述名世。作为一个享誉世界的战略思想家，他在书中对一些战役的评点高屋建瓴，独具只眼，为本书增色不少。

身为军事大师，李德·哈特对这些败军之将不无同情敬畏之心。作者深知“要撰写一部大战史，收集对立面的材料至关重要，如果只是从‘山这边’来考察这场战争，不仅眼光会受到局限，历史真相也难免会受到歪曲。”他不无自谦地表白，这仅仅是一部史料的汇编，不敢自称是在“撰写历史”。不过通观全书，可见作者并不是简单地堆砌德军将领的口述，而是经过仔细的分析厘正，巧加取舍编排，由此可窥见其独具的史家匠心。

秉笔作史，贵在求真。西谚曰：历史是胜利者的宣传。但那是政客和御用学者的惯伎。李德·哈特虽然是英国人，作为一个战争史家，他具有历史学家的职业操守。在他的笔下，我们看到谦恭有礼的伦德施泰特、骁勇善战的古德里安、足智多谋的隆美尔，而不是一帮凶神恶煞。相反，他毫不客气地指出，论军人风度，某些盟军将领却显得等而下之。作者写道：“二战以来，我曾走访法国、比利时和荷兰，经常有些坚强的反法西斯战士向我坦言，那些德国占领军军官的举止不但与党卫队有别，也比前来解放自己的盟国将领表现更好。如此口碑当归功于某些德军将领的举止，尤其是伦德施泰特。”李德·哈特也对一些被胜利者歪曲的事实作了订正，如盟军指挥部宣称，欧洲著名的本尼迪克特修道院是德军炸毁的。而实际上却是美国大批轰炸机和地面炮火干的。他认为不应将战时的“野蛮行为”全部归咎于失败者。

李德·哈特是机械化闪击战理论的先驱之一，对坦克战情有独钟。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墙内开花墙外香，他的学说在英国本土没有受到应有的重视，



倒是在敌对国找到了知己，古德里安等人将坦克战付诸实践，使德军坦克在二战中大显神威。从古德里安的口述中可以看到，装甲部队机动作战新观念的崛起也曾备受保守派的阻挠，他也提到了若无希特勒的慧眼识才、破格提携，也不可能有这些后起之秀的一战成名。

希特勒与德国军界元老一向心存芥蒂，那些老将军们原本就看不起这个“波希米亚下士”，希特勒重用年轻将领也多少有点出于无奈。当然，以新进少年来压元老重臣原本是独裁者惯用的权术。老将军看不惯年轻人的跋扈，年轻人瞧不起老家伙的颀颀，希特勒便可以坐收渔翁之利，集军政大权于一身。

李德·哈特对希特勒的评价对读者也不无启发。他指出战时发生的一切在当时看来和在战后往往迥然不同，希特勒形象变化之大尤其如此。二战伊始，德军战无不胜，希特勒的威望与日俱增，而当德军受挫于苏联后，其形象就大为减色，到德军土崩瓦解之时，人们便将一切灾难归咎于希特勒。可见“领袖的公众形象在战时常常失真，而且随着胜负的潮起潮落而沉浮。”

疆场成败，军界枯荣，德军将帅的命运同样随着战场上的胜负而沉浮。军人好战，希特勒的扩张政策让他们有了用武之地，但希特勒对军事行动的横加干涉又常常让他们难以充分发挥自己的才干。捷报频传之时，首先归功于希特勒。一旦战场受挫，那些将领便成了失败的替罪羊。宠辱无常，几上几下的经历所在多有。也有人试图反戈一击，但又因种种原因终究未能痛下杀手，从德将的口述中不难体会到他们心中的纠结和惶恐。“面对升迁的机会，将军们往往会隐忍内心的质疑，这就使希特勒有足够的时间来离间军方的共识。任何军队都会有这种现象，但在专制独裁下，其表现尤为典型。新近得到提升的军官往往自信其所面临的境遇要比前任更好，自己不会重蹈前任的覆辙。这种格局无疑会成为任何统治者手中强有力的杠杆。”诚如李德·哈特所言：“是追逐个人的野心还是割舍一己私利，这对矛盾构成了他们致命的弱点。”

更致命的是军方内部对战略战术的分歧，军方与最高统帅在战略战术上的矛盾。当德军在战场上与敌人厮杀之时，希特勒和德军高层也始终在暗中博弈。希特勒的确不是等闲之辈，二战之初他力排众议，大胆冒险又屡屡得逞，军事专家失策反衬出他的高明，致使德军将领在后来重大战役中不敢大胆建言，希特勒也就更为随心所欲无所顾忌。在对苏战役中，希特勒执迷不悟，一意孤行，致使德军遭到重创，从此一蹶不振。李德·哈特指出：“希特勒的战略直觉和德军总参谋部的战略运筹结合在一起，本当产生压倒一切的力量，但是双方冲突所产生致命的矛盾却成了他们对手的大救星。”古人云：“知胜有



五：知可以战与不可以战者胜，识众寡之用者胜，上下同欲者胜，以虞待不虞者胜，将能而君不御者胜，此五者，知胜之道也。”（《孙子·谋攻》）希特勒的所作所为几乎无不与先哲的教诲背道而驰。

德军总参谋长哈尔德反对希特勒四面出击，将战线拉得过长。他尖锐地指出：“我们的危险在于——赢得所有的战斗，输掉最后的决战。”一语成谶，能征善战的德军最后还是走上了这条不归路。一位美军指挥官说过：“我们没有输过任何一次战斗。但美国还是输了越战。”楚霸王项羽兵败乌江时曾言：“吾起兵至今八岁矣，身七十余战，所当者破，所击者服，未尝败北，遂霸有天下。然今卒困于此，此天之亡我，非战之罪也。”太史公认为项羽至死不悟，岂不谬哉！“夫乐兵者亡，而利胜者辱。”（《孙臧兵法·见威王》）“是以数胜得天下者稀，以亡者众。”（《吴子兵法·图国》）自古到今，这是穷兵黩武者的必然下场，凡事总想赢，也总能赢的人，最终往往会彻底输掉。

二战是人类历史上一场空前的浩劫，败军之将的反思值得人们深思。“战争是政治以另一种手段的继续。”军事大师克劳塞维茨的名言我们耳熟能详，在当年德国也不无市场，但真理过头便成谬误，正如德将克莱斯特所言：“这一格言，它揭示政治因素比军事因素更为重要。德国错就错在以为军事上的成功可以解决政治问题。在纳粹的统治下，我们把克劳塞维茨的名言颠倒了过来，竟把和平视为战争的继续。”德国国防军先驱泽克特将军的话更为发人深省，他曾以先知般的口吻告诫世人：“‘战争是政治的继续’，已经成为众人皆知的格言，这是很危险的，同样可以言之有理的是：‘战争是政治的破产’。”

战争是流血的政治，更是失败的政治。政治的目的本应是为人类谋求最大的幸福，但动物聚在一起免不了撕咬，地球在日益变小，人类的自我折腾却总是越闹越大。从国际关系到人际关系，“我对你错”的论争往往会恶化为“我对你死”的“战争”。“矛盾”不论敌我内外，无非是兵器的冲撞，从“我对你错”到“我对你死”，讲得革命一点叫“阶级斗争”，说得学术一点叫“生存竞争”，归根到底离不开一个“争”字。与天奋斗，与人奋斗，人类“生存竞争”的最终结果会不会是“无处生存”？二战已经成为历史，但历史的阴影至今挥之不去，战争的幽灵时隐时现，“山的那一边”和“山的这一边”都是血肉之躯，都有父母儿女，普天之下，何处不是人类故乡，春秋无义战，当代有吗？

战争是政治的破产。

2011年6月于沪杭高铁下

封面

书名

版权

前言

目录

本版序言

第一部分 希特勒的将领

第一章 自寻死路的分裂

第二章 泽克特打造军队

第三章 布隆贝格和弗里奇时期

第四章 勃劳希契和哈尔德时期

第五章 古德里安将军——初期胜利的缔造者

第六章 “阳光下的战士”——隆美尔

第七章 阴影下的军人

第八章 “老卫兵”——伦德施泰特

第二部分 走向战争

第九章 希特勒的崛起

第十章 装甲部队的崛起

第三部分 德国将领眼中的战争

第十一章 希特勒如何打败法国和拯救英国

第十二章 兵临敦克尔克时下令“暂停进军”

第十三章 法国战事的终结和德军首次受挫

第十四章 哑火于地中海

第十五章 希特勒入侵苏联

第十六章 何以兵败莫斯科

第十七章 兵败斯大林格勒和高加索

第十八章 兵败斯大林格勒之后

第十九章 红军

第二十章 盟军进攻意大利

第二十一章 诺曼底失陷

第二十二章 西线指挥部眼中的刺杀希特勒密谋

第二十三章 希特勒孤注一掷——第二次阿登战役

第二十四章 希特勒——一位年轻将领的看法

结论

德军高级将领列表

译名对照表

战争是政治的破产（译后记）